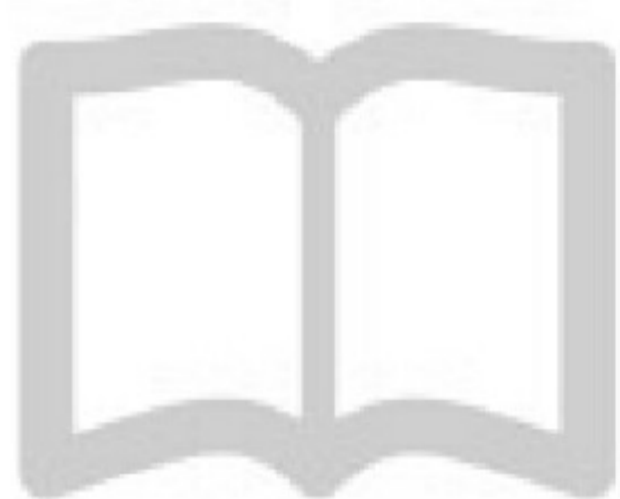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四卷

1987-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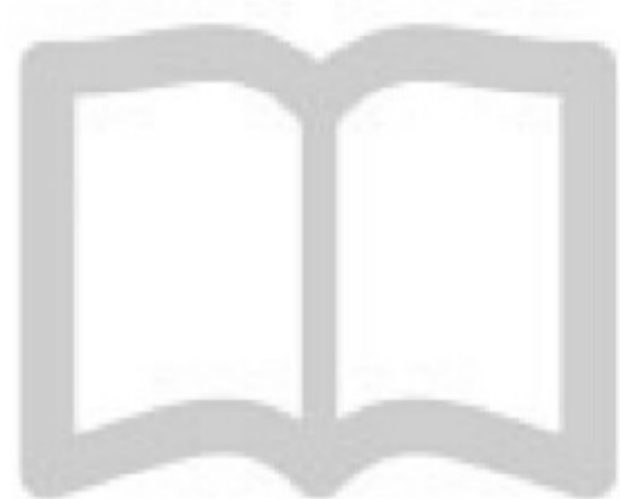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

第四卷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四卷

1987 - 1989



中文大學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四卷（1987-1989）》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 香港中文大学 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9-0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ume 4 (1987-1989) (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809-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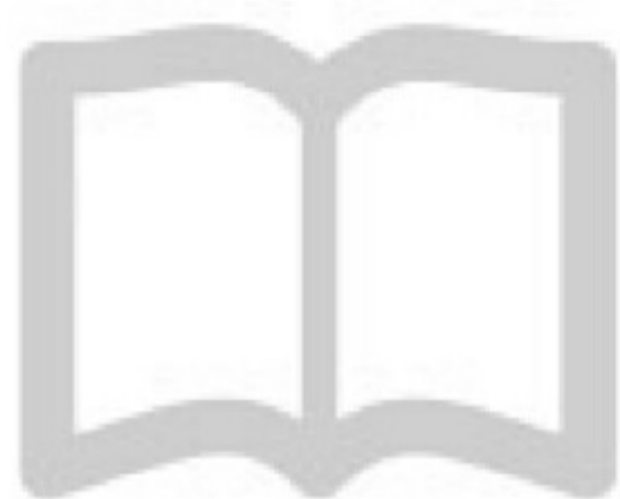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

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 录

一九八七年

总结经验 稳定物价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至七日	11
进一步使我国经济发展建筑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12
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一月	18
给外文出版社《中国手册》英文版的贺词	
一九八七年一月	19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20
在研究经济改革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	25
祝贺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28
关于组织机电设备攻关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31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	32
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40

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47
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49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50
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75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7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83
在上海市调研时谈深化企业改革等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87
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90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91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96
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五月	105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搞好智力开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119
在全国整党总结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120
关于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封信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123

发展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124
继续稳定物价 控制通货膨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五日	130
就联合国“五十亿人口日”发表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138
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140
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143
国家计委要成为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145
搞稳一点 收紧一点	
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	148
在改革中加强对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151
立足国情 面向未来 制定我国长远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152
让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起带头作用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164
关于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170
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173
使创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175
在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176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布罗考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178

在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85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199
给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201
关于党政分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202
附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207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217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255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257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265
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的谈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273
致陈守一教授的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	282
关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283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党外人士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289
给《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293
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294

总结实践经验 提高贯彻十三大精神的自觉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295
关于一九八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302
对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305
以改革总揽全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313
接见第八期体改研究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317
下决心把住房制度改革搞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23
给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新的动力和新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329

一九八八年

党对于具体艺术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339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	342
对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逝世发表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356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汇报经济形势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357
给《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362
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外贸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	363

向瑞士达沃斯一九八八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366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	369
关于起草制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的三次批示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二月	384
致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的电报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386
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387
关于《对今年物价形势的分析及“双紧”方针的看法》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390
接见全国企业承包责任制座谈会部分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	391
经济要繁荣 党政机关要廉洁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395
规章制度要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397
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400
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401
落实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402
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405
给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417

关于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两次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	418
在研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420
在全国第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424
对杜星垣和吕东关于闽粤两省对外开放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431
认真研究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	432
同安志文和马洪谈物价与工资改革问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435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九日	438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发挥辐射作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442
关于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七日	444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445
想办法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	457
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害何在》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	459
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视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460
在晋陕两省视察工作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	463

关于信访工作的批示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	472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473
在中央军委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474
会见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教授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476
认真整顿流通秩序 坚决控制物价上涨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484
在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	497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499
同弗里德曼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	510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519
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528
关于形势教育问题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539
肃贪工作必须有制度有机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544
物资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办法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546
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	547
农业发展关键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551

在会见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菲雪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553
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	561
在治理整顿中进一步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569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572
进一步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全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574
同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577
附录：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 廉洁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583

一九八九年

在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上的致词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	591
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	594
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 妥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599
社会治安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	602
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604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618

在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619
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622
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624
关于一些集体企业将资产折股划给职工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	625
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626
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邹至庄等人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	630
关于厂长如何领导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634
认真搞好治理整顿 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641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	646
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	648
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650
中朝友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654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657
后 记	663



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期的赵紫阳





左上： 1987年10月，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 Getty Images）

左下： 1987年8月，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乡访问贫困户，与农民群众交谈

右： 1989年2月，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北京会谈
（© AP Images）

~~小平同志~~ (减之)

完全赞成

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廿八日讲的精神，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五月四日稿)

开会，现将讲话
稿送上，请审阅指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如原则问
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不久就要在十三大提出来；如何做好这两个
方面的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部主持，好好讨论一番。
下面我先说点意见。

一、如原则问
意，我再找一波
高昆、万里、陪

一、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取得了
很大成绩，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概括地说，是
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具体地讲，可以举出这
么六条：(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
全社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
主义那种乌七八糟的话不敢说了，也没有地方登了；(四)
极少数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
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立同志面商
一下，并提请各
院讨论最后
再开会布置为
引避免引起新
的不必要的振
动，最近发生的
一些事

可) 汇报时不提，
已从稿中删去。
敬礼
赵家阳 五月
四日

为准备 1987 年 5 月 13 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所拟的讲话提纲(首页)，及手写的给邓小平的请示。邓在其上批示“完全赞成”。

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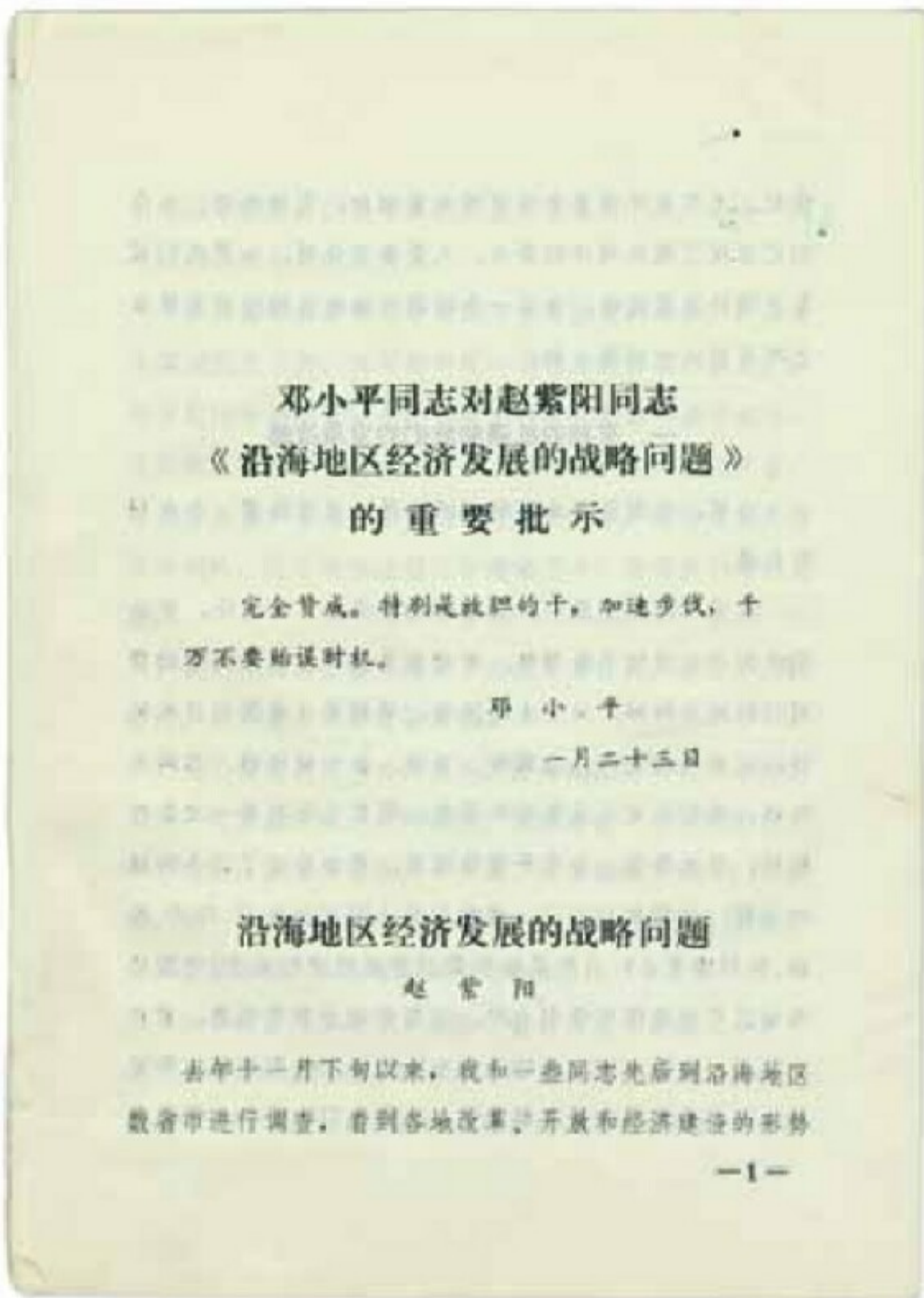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今天的会议打算这样开，我先讲几句，然后主要是李鹏同志讲话，最后请万里同志和其他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讲一讲。

我简单地讲三点意见。

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经同意。大家也都知道，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由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就由李鹏同志全面领导。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国务院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李鹏同志领导国务院工作是胜任的。同志们知道，在十三大以前，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一些老同志反复酝酿，大家都认为李鹏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国务院在他主持下是能够做好

1987年12月1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首页)，收入本书时以《以改革总揽全局》为题



1988年1月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一文(首页)和邓小平的批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文件

(1988) 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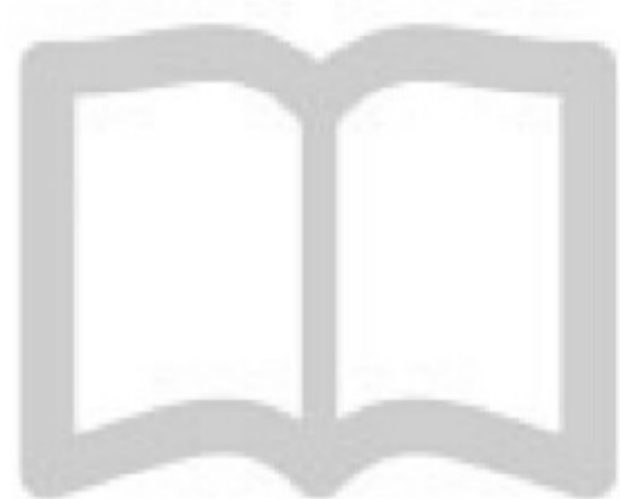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建议印发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下周一）。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讲把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事可以议一下。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赵 紫 阳

三月二日

1988年3月2日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批语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一九八七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总结经验 稳定物价*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至七日

一、一月五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四十一期上批示：“纪云同志：看来物价问题，值得反思一下，请组织几位同志系统加以研究。”

二、一月七日在王任重的信上批示：“送依林、纪云同志阅。请考虑物价问题，是否进一步明确表一下态，并让各城市加强物价检查。各地反映如此强烈，我们不能不认真重视，请酌。”

三、一月七日晚对白美清作了如下指示：物价问题，要认真重视一下，要搞一点安定民心的东西，要总结一下经验。第一，今年物价打算出台的东西，要重新考虑一下；第二，在报纸宣传上，要进一步表态，物价要基本稳定；第三，要加强物价检查，反对乱涨价。物价问题要很好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出乱子。

* 这是赵紫阳对稳定物价、总结经验的几次批示和指示。

进一步使我国经济发展建筑在 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

一、关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

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八年。八年来，国民收入每年递增 8.6%，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11%，高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六年的平均数。在这一时期，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经济上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

积八年的经验，积建国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认为，在经济建设上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应当长期实行的根本方针。经济上的稳定发展，比大起大落、忽快忽慢效益要好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才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八年来，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仍应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这一方针。

现在我国经济建设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全国城乡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百废俱兴，需要我们冷静地从宏观、从长远想一想，怎样才能使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保持下去？究竟还存在哪些不稳定的因素要排除？这次省长会议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讨论得很好。这不仅对当前，而且对今后都有重要的意义。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会议上的讲话。

二、关于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问题

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财政出现较大的赤字。一九八六年财政预算收支本来是打平的，但执行的结果有七十亿元的赤字。今年采取了措施以后，估计仍有七、八十亿元的赤字。如果搞得不好，还有扩大的可能。财政赤字，是与货币发行紧密相联的。少量的赤字，并不可怕，但赤字大了，时间持续长了，票子发行势必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稳定经济，最根本的是要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迄今为止，我国票子的投放大体上是适度的。前几年每年都增发一两百亿票子，这是必要的，是同我们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相适应的，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有好处。但今后绝不能每年再以20%以上的幅度增发票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我国现阶段每年增发票子的额度以13-15%为宜。看来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轻度的通货膨胀，我们还是有承受能力的，现在人民币的信誉是好的，储蓄年年大幅度增长，到去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237亿元。这么大一笔钱，其中相当一部分由消费基金转为积累基金，在支持国家建设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如果连年出现大量的赤字，发大量的票子，物价大幅度上涨，那么这两千多亿元存款就会成为一个隐患，一旦人心不稳，排队提款，就会不可收拾。那时就会被迫回到统制经济的老路上去，只好把一切管得死死的，不但物价改革无法迈步，而且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付诸东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面临的财政赤字，是在前进过程中发生的。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并没有萎缩，财政收入也由下降转为大幅度上升，从一九八〇年的收入1085亿元，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2058亿元，六年翻了一番。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财政赤字呢？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二是整个财政开支的盘子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只是现象，这个问题才是本质。稳定经济，当前必须从解决这两个问题下手。

三、关于控制固定资产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从一九八四年以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九八四年比上年增加 463 亿元，一九八五年又比上年增加 711 亿元。去年压了一下，仍比上年增加 457 亿元，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 3000 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的 1.2 倍，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这是国力难以承受、因而也是不能持久的。

不仅投资规模过大，而且投资结构很不合理。几年来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增加过猛，而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设施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在全民所有制投资中，“一五”时期非生产性投资占 33%，“六五”期间上升为 42.6%。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全民所有制投资用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由 386 亿元增加到 907 亿元，绝对额有较大增加，但所占比重却由 57.7% 下降到 46.3%，这说明其它方面的投资膨胀到了惊人的程度。现在全国都普遍感到电力紧张，根本原因是投资结构失调引起的产业结构失调，电力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 6.84%，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 3.91%。能源、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结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显然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然会形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

从认识上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速度要求过高，改变面貌要求过快，摊子铺得过大。什么好事都想办，而且都要在短期内办成，头脑过热，空气过热。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压缩空气，解决过急过热的问题，在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上要统一认识。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通病。赫鲁晓夫讲要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勃列日涅夫讲自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现在戈尔巴乔夫也降调了，承认自己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出发，来考虑我国的建设问题。

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五年九月的省长会议上我就突出地提出来过，历数了投资规模过大的八大罪状。但当时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措施也不落实。现在，思想认识问题有可能解决了，就要同时考虑采取过硬的措施。过去所以控制不住，归根结底就是由于预算外的钱多了。钱多了，就要投资。

所以，这次要釜底抽薪，通过借款、发债券等方式，把预算外的资金集中一部分，用于国家的重点建设，解决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即使用方向合理的问题。当然，这样砍一刀也不尽合理。下一步需要进一步研究财政税收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问题。但今年还做不到。今年要积极调查研究，提出一套办法，既能搞活企业，保护和发挥企业以及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把资金适度集中起来，引导到合理的使用方向上去。

四、关于削减财政支出盘子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超高速的后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高支出的盘子。一九八五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 303 亿元，把当年的一次性非正常的收入都打进去开支掉了。去年的财政支出，又比前年增加 379 亿元。现在要满足这样大的支出盘子，谁也没有这个本事。而且，财政收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外资金所占比重大大上升，预算内资金比重相对缩小；地方财政所占比重上升，中央财政所占比重下降；统收改变了，而统支没有改变。中央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只能维持正常的需要，不可能承担现在这样大的开支。这几年，各种补贴大量增加，行政事业费也大量增加，去年行政费猛增 20%，是不正常的。现在会议费、招待费、公费旅游、请客送礼，大手大脚，讲排场，比豪华，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我认为，行政经费应当继续压缩，这要作为一个硬任务，层层落实。这个问题不解决，财政开支下不来，赤字无法解决，而且败坏风气，腐蚀干部，脱离群众。我们不仅要压基建支出，而且更要压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这件事有很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五、关于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今年在深化改革，搞活大中型企业的同时，要抓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而且要作为长期稳定经济的重要措施。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要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开展起来。特别是在企业中，要把降低成本，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作为重要内容，力求在今年取得新的成绩。这也是增强企业的消化力和竞争力所必须的。在国内资金、物资的使用上要精打细算，各方面要努力增产节约，在创汇和用汇上也要增收节支。

今年的外汇平衡是个严重问题，不可忽视。

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要十分关心，能够做的事要扎扎实实做好。总的精神是应当量力而行，少说多做。许愿不能过多过高过早，宣传上也要注意不去刺激高消费的欲望。要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相当一个时期只能是较低的工资，这样对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有利。提倡高工资、高消费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现在已经出现了消费超前的现象，如果把消费的胃口吊得很高，势必引起很多社会问题，造成群众不满，使我们陷于被动。前一段时间，我们引导得不够，有些人有点昏昏然，“热风吹得游人醉，错把中国当美国”，也有“错把内地当沿海”的。今后在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中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把我国建成中等发达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级干部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掉。

六、关于搞活企业、保护企业

搞活企业，是我们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能动摇。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三条：一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八条规定（国发[1986]106号文件）。二要坚决制止对企业的乱摊派、乱筹款。除城市建设、文教事业的正当需要可以开点小口外，要把四面八方向企业伸手的现象坚决刹住。三是要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探索和试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要注意把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上下功夫，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时，一定要注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挫伤企业的积极性，坚决防止把向地方、部门筹款的措施，转嫁到企业头上。如果把企业搞得一点活力都没有，那就是失败。

七、关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解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主要在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不在经济领域里搞。不要刮风，不要任意发挥。改革、开放、搞活的方向不能动摇。我们常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指什么呢？一个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只谈一个方面，不谈另一个方面，就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现在实行的城乡各项基本政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一律不变，都应继续贯彻执行。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经济才能稳定。

今天围绕贯彻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讲了以上七点。总之，是要在增加和改善总供给的同时，坚决抑止过高的总需求，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力求避免大的波折。经济生活是很复杂的，改革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一个矛盾解决以后，总会出现新的矛盾。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于避免的。重要的是，要察微知著，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通过自觉的小调整，避免被迫的大调整。这次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把全国的家底告诉了同志们。希望大家从全局出发，同心协力，完成今年的经济工作任务，做好稳定经济这篇文章。

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 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一月

《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女士生前亲自创办的，三十五年来在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和成就，增进各方人士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我国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希望编辑部的同志继续努力，坚持严谨的编辑作风，把它办成准确鲜明，生动活泼，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广大海内外读者所喜爱的刊物。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一月

给外文出版社《中国手册》英文版的贺词

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世界注目的变化。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愿意加强同一切对我国实行平等互利的国家合作，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我相信这本《中国手册》，对想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外国读者将会有所帮助，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介绍中国的好书出版。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一月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春节。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拜年，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我们的子弟兵拜年！请允许我以在座各位的名义，向台湾、港澳和远在海外的同胞们，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节日的祝贺之情。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一切支持和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和我们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外国朋友们致意。

最近，中共中央再一次郑重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为重要，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大家都非常关心。因此，我想今天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和大家谈谈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唯一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了。八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世界上许多人都说中国欣欣向荣。十亿人民都身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之惠。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亲切的政治概念，但并不等于都已全面地深刻地理解了它的涵义。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究竟是什么呢？中共中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不讲改革、开放、搞活，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农村不改革，城市不改革，对外闭关锁国，对内把城乡经济搞得死死的，那还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乡人民哪能得到今天这样的实惠？我们国家怎么能达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这个道理，一听就懂，我今天不想多讲。

我要着重谈谈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和内容是载之于宪法和党章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党员还必须遵守党章，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由穷变富，困难矛盾不少，必须集中精力进行建设。如果出现动乱，哪里还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同样，改革、开放、搞活，也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搞活，集中到一点，都是改革。改革已经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今后也一定会继续给大家普遍带来更大的利益。但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经常产生某些利益的变动，需要及时地恰当地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各种矛盾，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如果政治上是动荡的，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改革怎么能进行得下去？大家都渴望中国经济能够起飞，谁有本事能在地震中起飞？政局稳定，经济稳定，中国才有希望。我们大家都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在那种局面下，能改革吗？能建设吗？别说一个国家，我看如果有一个省、一个市处在动乱的局势下，就会闹得大家不得安生，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既然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领导并正在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小平同志说得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只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全国的局势，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行改革和建设。有的人名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丑化党的形象，散布对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他们想过没有这样做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会陷入混乱状态，起码是一盘散沙。诚然，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但是，最坚决最勇敢地纠正这些错误的，不是别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是，主动地公开地揭露和纠正这些缺点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民信赖我们的党，我们也力求不辜负人民的信任。我们并不把执政看成是自己的特权，相反，我们历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得谋取个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我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同时，过去和现在都在力求改善我们的工作。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好。是谁提出了和领导着改革？谁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和领导推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适时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把高度民主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之一。但要最后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创造各种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存在着党政不分现象，但主动提出党政分开并正在研究具体步骤加以实施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八年来，我们党一直致力于在我国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各种切实的步骤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开辟各种正常的民主协商、生动活泼的社会对话渠道在内。不少人关心选举问题。今年对县级选举的办法将进一步改进，包括普遍实行差额选举在内。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盲目追求某些形式，对实现民主未必有益，相反，却会劳民伤财，分散人们对当前建设和改革的注意力。我们这样考虑，无非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集中力量扎扎实实、平平稳稳地进行建设和改革。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农村不搞，企业、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

有人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又是一次政治运动？我代表中

共中央负责地向大家说明：我们不搞政治运动。我们深知，搞运动无助于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靠一次或几次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改革、开放、搞活一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长期的、持久的。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项工作，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当然，对极少数错误严重、后果严重、而又不守纪律的党员，应当按照党的章程，执行党的纪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准绳，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不仅不伤害而且诚心诚意地团结绝大多数，包括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从事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在内，我们欢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我们将十分注意改进我们的工作和作风，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应该努力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活跃民主团结的气氛。我们党经过“文化大革命”，更加成熟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中，决不会也决不允许重复“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因此，它不是也不会酿成什么政治运动。

有些同志和朋友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已经正式宣布，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因此，在向大家祝贺春节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全面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努力提高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各项政策，按照既定的部署，把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工作做好，全面地出色地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

同志们，朋友们！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

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为了深刻理解和全面掌握这些基本内容，我建议，一切希望中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大家都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中国十亿人民在现阶段的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经验，如何脚踏实地地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是改革、开放和搞活的基本保证，等等。我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实际问题，就会得出和我们相同或者非常接近的结论，从而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在面向实际，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一定会更加亲密无间地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我们的国家已经一年比一年好。在更正确更全面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今后的岁月里，我们的国家肯定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我今天是提出一些想法来同大家座谈。我也希望能引起年轻同志们和从事理论工作以及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请大家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团聚一堂，互相问候，互相祝福，并且利用这个机会，来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件关乎四化建设成败的大事，是很有意义的。

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在研究经济改革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

可否拿两、三个月的时间研究一下今后改革的路子，这涉及到对过去要反思一下，四月份以后要有个结果，八月份以前要把明年的改革方案定下来。如何组织，范围是否可以搞得大些，类似搞政治体制改革那样，开座谈会，搞专题小组，这样可以很快出成果，比泛泛地议论好。

“七五”计划报告中，对改革提了三条，还是对的。但由于在搞活企业时，企业本身的机制没有改革，宏观很难对它有影响，有利的事就让它拿过去了，不利的事就让国家背着。创造市场的条件很难加快，宏观控制也很难。现在企业的承受能力差，在企业里仍然是吃“大锅饭”。所以，如果企业的问题不进一步解决，其它改革很难办。企业的经营方式需要认真讨论一下，使我们在宏观方面的控制措施进一步加强，使企业真正受到影响。去年稍稍放松一下，结果奖金发得很厉害，比工资改革时发得还要多，但企业的行为没有什么变化，很值得研究。要想办法做到，使企业有一个活跃的功能，以应付各种挑战，而不是单靠物质刺激。究竟如何解决，要认真考虑。要研究一下到底把企业搞成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考虑企业的活力问题，忽略了市场和宏观管理；在考虑市场和宏观管理时，又忽略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要从搞活企业出发，考虑全部配套的问题。企业的经营责任制，要搞一个细则，搞成之后就在大面积实行，而不是试点。试点是各取所需，无法推广，所以不搞手工业式的试点。日本、西德也搞过军事管制，但企业还是独立经营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如果等完全具备市场条件和宏观管理条件之后，再搞独立经营是不可能

的。独立经营和市场调节、宏观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原来的设想有些理想化。在公有制下的自负盈亏是最大的难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大中型企业要改变公有制性质，这个意见不可取。经营方式是另一个问题，要在这里做文章。经营方式有很大潜力，但又怕出百万富翁，如果出现就很难搞下去。承包租赁和资产责任制都不能出百万富翁，否则会在社会上造成很多矛盾。中国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搞悬殊政策，这都会引起社会不满，造成增加工资的压力。大工业搞承包租赁，证明企业潜力很大，但很快就会出现像有些人说的高薪阶层。中国不能搞百万富翁，要有节制的办法，将来也不能出。一种由厂里职工集体承包的办法，武汉叫全员承包制，这种承包制职工要成为经理的后盾，但经理又不能得的过多。

在解决好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再解决财政、价格、工资、税收、计划的配套问题。计划的宏观改革措施要相适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宏观控制，才能发挥作用。要有个过程，这样工资、价格改革才好进行。根本是要解决企业活力和积极性的问题，农村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不去挖这方面的潜力，所以你抓宏观控制就没有承受能力。悬殊过大，工人和社会就不会干，但又要使经营者有合法利益，并对此要加以保护。

接下来是工厂领导体制如何搞，这个问题要提出来，企业干部是实行聘任制还是选举制，总之不是组织部那一套考察的办法，要配套，要有个实施细则，明令公布。工会的责任要加强，厂长责任制不能对职工负责，工人可以提出对厂长不信任。所以现在有个理顺党政关系的问题，也有个理顺党和其它社会组织关系的问题。工会同政府不能是服从关系，工会要有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这是波兰的经验。波兰的工会，原来是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完全和政府是一个调子，后来出现团结工会，但政府对团结工会没有承认，又成立了新工会。新工会注意了维护工人的利益，现已有一半人参加。

青年团也要影响青年，增强工人主人翁的感觉。

价格问题要重新理一下。过去物价改革每次都不理想，花钱很多，对生产有影响但不大，带来的常常是一次物价上涨。大家都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国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去研究，究竟物价怎么搞是一个值得深议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垄断性很强，要稳定可以，但放开之后可以随便涨，

一调就涨。小商贩主要看国营。本来价格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结果引起全面上涨。副食品价格改革，国家补贴没有减少多少，老百姓意见很大。我们说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现在看难度很大，提价后连锁反应大。现在农产品新一轮涨价又开始了，你不涨他不生产。

工资怎么搞？工资制度还是平均主义，这个问题没解决，改进不大，钱花得不少，但不满情绪在增加。很多厂长年终千方百计想给职工发奖金，但不起作用。

“七五”计划规定的三条是正确的，现在在实行的步骤和相互关系上有很多问题要认真研究，对改革难度的认识比前两年更深了。

企业发展基金都搞技改，不搞流动资金，要规定流动资金的比例。现在流动资金全由银行包的办不办不行。另外要改变中央收入比例太低的问题，中央的财政收入应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企业留利要先留流动资金，这样投资规模也就下来了。现在企业和财政都不负担流动资金，把钱全部用于消费和投资，最后增加流动资金和收购农副产品，只能强迫银行发票子。

很多国家财政都是中央的多，中央给地方补助。我们对地方要收紧，要分点地方的钱，这是个方向。财政太分散后，将来会搞成联邦制度，我们不能搞联邦制度。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一向主张要集中，耀邦同志主张分散一些，我是折衷，现在看财政问题就是要集中一点，这个问题放在下半年解决。

祝贺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

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北京大学在超导体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取得这一成果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物理所赵忠贤、陈立泉和北大甘子钊等在座的十几位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你们所取得的振奋人心的成果，对整个科技界，对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人民，都将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物理所和北京大学有关的同志在超导体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再一次证明，我国的科技人员是有志气，有水平，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攻克科学技术难关。赵忠贤、陈立泉、甘子钊等同志在科研工作中，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忘我劳动，不怕艰难，不辞辛劳，是由于他们具有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的思想境界，具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和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这正是我们在进行改革和建设时所应当提倡和推广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样一支科技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难能可贵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有很大发展，不论科技界的精神面貌，还是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方面，都是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几年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正在落实，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这是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北京大学超导体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庆祝会上的讲话。

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他们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现在是他们施展才能、发挥所长、报效国家的极好时机。我国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到人民的期望，党的关切，都自觉地把自已的前程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宏伟事业联系在一起，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进一步形成一种民主、团结、和睦、活跃的气氛和更加融洽的关系，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任何挑拨知识分子与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的科技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在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是我们的主战场。另一方面，要充分注意高技术的发展，为中远期经济发展打下技术基础。我国高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规划已经制定，从今年起正式开始实施。

你们所从事的工作，在不少方面涉及到基础研究。历史经验表明，基础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有可能引起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新的飞跃。我们是一个大国，对基础研究也要给以重视，给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从“六五”计划开始，在“七五”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建立一批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和若干基础研究较大型设施，去年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拨款有所增加。诚然由于我们的家底不厚，目前，我们投入基础研究的财力还很有限，但请同志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投入基础研究的财力和人力必然会逐步多起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我国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能否有效地解决，有赖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否具有强大的后劲，最深厚的源泉也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当中，当然也包含基础研究工作的贡献。

希望你们今后在这方面要迈出新的一步，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在合作、交流和学习、竞争中，做出更好的成绩。在你们研究集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最小的只有三十几岁。由此，看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力，看到了我们的希望。对此，我十分高兴。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重担，正逐步落到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肩上。希望我

国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继承和发扬我国老一辈科技专家的优良传统，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你们的重任。

你们在研究工作中要加强领导，注意多种学科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一点很重要，很值得称赞。这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科技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协作，再攻难关，以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更大的成就！

关于组织机电设备攻关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现在国家外汇困难，还大量进口机电设备，各个部门技术改造也进口很多的设备，这是不行的。你们机械委能不能调查一下，到经贸部去了解一下，大量进口的机电设备是些什么？要组织机械工业的力量，特别是把军工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攻关，把各部门、各行业技术改造中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制造出来，逐步做到大部分能立足国内。可以搞个规划，立点项目，先搞什么，后搞什么。组织攻关，也可以招标，然后落实任务。这件事要组织一下。

机械工业最要紧的是抓好质量和服务。要有市场观念，一是要面向用户，二是要了解国外机械制造技术。首先要了解各个产业部门需要什么，进口什么，机械工业就要瞄准这些关键设备，组织攻关，组织生产，为他们服务。只要国内能够制造了就停止进口。机械工业要围绕解决各部门的需要来改造自己，发展自己，用户对机械产品的性能要求也要有一段稳定时期。不能国内制造出来的就不要了，一个劲儿光要国外的、先进的，性能即使差一点，也要先用国内的，稳定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工业要积极发展新的，待新的搞出来后，再换代用新的，通过这样不断前进和提高。

* 这是赵紫阳听取国家机械委主任邹家华汇报时的讲话。

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

这次宣传部长会议是在全国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围绕着如何搞好这场斗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主题明确，会议开得是好的，是必要的。下面讲几点意见。

一、必须认真地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央四号文件

从去年十二月底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几个文件以来，经过全党的努力，两个多月的时间，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正如会上同志们所说，“大气候”改变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下一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怎样继续开展？我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决按照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四号文件）的精神办，继续抓紧落实这个文件。

中央四号文件，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开展这一斗争的范围、重点和政策界限。四号文件下达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规定的指导方针、政策界限、部署作法都符合实际，大家都很拥护。这个文件，体现了党中央对开展这场斗争的决心，同时在作法上又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方向是坚定的，办法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多人反映，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到，我们党更加成熟。

据会议反映，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有顾虑，怕执行中扩大化，还存在等待、观望的情绪。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没有根据的。因为斗争一开始，中央就在四号文件中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这与历来的搞法不一样。过去搞运动，总是先反右，普遍发动，出了问题再制定政策去纠偏，去甄别，去落实政策。过去运动的失误，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中国地方这么大，消息又不灵通，等问题发生后反映到中央，再制定政策一层一层传达下去，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因而遗留的问题很多，运动的成果也很难巩固。这次我们改变了过去的作法，一开始就想得周到一些，规定了明确的范围和界限，这样就可以防止过去一些不恰当的作法。还应看到，现在大家都怕重复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作法，党内外怕，国内外也怕，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过去都吃过不少苦头，记忆犹新。再重复过去“左”的作法，搞扩大化，第一不得人心，第二没有市场。因此，出现这种偏差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某些地方出现了，大家都比较敏感，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回顾下一九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开始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大家很敏感，问题一发生，中央和国务院就及时研究了一些措施，很快得到纠正。那次反对精神污染，主要问题不在于开始出了点偏差，或出了偏差没有及时注意，而是在于出了问题以后，就否定这场斗争，不了了之。这次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所以，从总体上说，扩大化的作法，“左”的一套作法可以防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如果忧心忡忡，顾虑很多，就会影响斗争的开展。

另外也有些同志认为文件太稳了一点，运动刚开始，就划了一些条条框框，是不是有点“束缚大家”，感到有些“不过瘾”。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没有根据的。对待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采用简单的办法，特别是不能沿用过去搞运动的作法，那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效果不好。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央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考虑开展这一斗争的，因而在四号文件中相应规定了正确的政策界限，规定了必要的范围和妥善的步骤。这是使这场斗争健康地、深入地开展下去的正确作法。

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大家的认识首先是各级领导的认识统一到四号文件精神上来，全面地、认真地、准确地贯彻落实这一文件。这样既

可以避免“左”，又可以避免右；既可以防止扩大化，又可以防止走过场，保证这一斗争健康地向前发展。

最近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长期的事情。现代化建设需要五十年至七十年时间，整个五十年至七十年都会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基本方法是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小平同志的讲话，讲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要不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起来，这比较容易做到。过去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但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使它没有市场，这就很不简单。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涉及到两种制度谁优越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我们长期封闭，不知道外界的事，认为自己什么都好。一开放，接触外界，走出去到西方世界一看，国外是那个样子，而我们这么落后，势必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产生两种制度谁优越的问题。我看即使将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在经济上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还是有市场的。当我们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后，大概那个时候，它的市场就会很小了。所以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使人们在思想深处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那是很长期的、很艰巨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对这场斗争要有充分的估计，下决心锲而不舍地搞它几十年，绝不能半途而废。二是讲了不搞运动。正因为是长期的，所以不是开展一两个运动，开几次会所能解决的，要靠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要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法，不能急躁，不能简单从事。我认为，很好领会小平同志讲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就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四号文件，避免盲目性，领导好这场斗争。

这里还要说一下，有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他们是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但是有些担心，怕把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说成是“自由化”。据这次会上反映，有的地方在联系实际时，把租赁承包、甚至厂长负责制都视为“自由化”的表现。这是错误的。四号文件讲了，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进行，并明确规定，

“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请各地务必掌握。我们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允许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允许实践中进行试验，即使出点问题也不要怕，可以总结经验，好的予以推广，不好的予以改进，绝不要随便戴什么帽子。有些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中的问题要进行探讨，不要忙于下结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使认识深化，不断地存利除弊。总之，我们要牢牢掌握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在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中，注意保护改革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搞活进一步开展，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培养、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前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暴露了我们理论工作的薄弱。从长远来看，严重的任务是如何培养一支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既要能够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我们的改革，正如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本来是优越的，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优越性发挥得不够。中国也好，苏联也好，东欧国家也好，都存在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起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来讲是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改革，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显示出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的理论要去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同志讲过，要“有的放矢”。在今天，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之“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是理论战线的根本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不少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一部分同志的认识中，还分不清楚。就拿

社会主义来说，苏联过去的模式是一种搞法，戈尔巴乔夫现在又是一种搞法，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也都有自己的搞法，我们现在都承认它是社会主义。以我们自己来说，五十年代是一种搞法，“文化大革命”又是一种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又是一种搞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的内涵有哪些，特点是什么，都需要很好研究。在一九八一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去年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个论点。我认为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它指出了我国是搞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倒退，走回头路；第二，它指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能超越这个最重要的国情，要求过高，急于求成。如何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改革方案、部署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既可以避免右，也可以避免“左”。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于自给、半自给的状态，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这样的国家胜利后要不要先搞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发达了再搞社会主义呢？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胜利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人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搞两极分化，然后搞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应研究一下，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是不是与那些发达国家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作法有所不同呢？是不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实践告诉我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比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应该采取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在分配形式上也要相应地有它的特色；在经营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等。总之，要从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实际出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把以上

这些重大问题研究清楚了，将有助于我们统一思想，正确地进行改革和建设，有助于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的市场，也有助于理论界本身改变脱离实际的学风。

我们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不与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这样的“理论”是没有用的。这支理论队伍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壮大呢？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在斗争中不断发现，培养那些既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于改革、开放的同志。一开始，他们的水平也可能不很高，但他们的基本方向对头，在斗争中可得到锻炼提高。我们应该以他们为骨干，去团结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包括有这样那样片面性的同志，使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要使广大理论工作者都团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同心协力，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缩小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市场和影响。

各级党委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深远意义，把它作为一件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正确地指出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党有了一批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列主义的同志，能够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么，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我们全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必须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改进，只是干巴巴地

说教，说不到群众心坎里去，加强就是一句空话。这几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进步，创造了一些新的经验。但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效果，这还是很大的问题。不少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简单生硬，不联系实际，不从群众的切身体验出发，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学校里的政治课，恐怕也有这个毛病，较多的是只要求学生背条条，不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分析能力。有些学校上政治课，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看别的东西。这当然和“大气候”有关，前一段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也与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关系。我们的一些报刊文章，只一般讲什么对、什么错，至于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则缺乏说服力。前不久陈俊生同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许多读者包括大学生反映可以看下去，觉得写得不错；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美籍华人中，也觉得可以接受，通过大使馆发来电报，希望我们的报纸上能有更多这类文章。这篇文章也没有多少新观点，但是它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件事对我们如何改进报纸的文风，改进思想工作的方法，也有一点启发。我们写文章也好，做思想工作也好，处理社会矛盾也好，都应当注重效果，你讲的，别人能够听得进去。因此，一定要看对象，看人家关心什么，症结何在，把话说在点子上，才能扣人心弦，加深理解，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过去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好的传统，现在丢掉了不少。这是不是与我们多年来搞政治斗争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政治机关用很大精力去搞政治斗争、政治运动，对思想工作下功夫很差。军队比地方好。特别是最近中央军委总结了经验，作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央已经批转。这是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对地方、对各部门和各条战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适用的。地方上要认真研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切实研究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来做，要有针对性地回答人们在改革和建设中的种种认识问题，引导广大群众为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做出贡献。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要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推广一些好的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真正收到实效。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改革，需要创造适应新形势的新经验、新办法。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下功夫去研究。

最后，我还要对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几句话。同志们反映，宣传工作难做，人也难找。这是事实，做好宣传工作的确不容易。同志们的困难，我们也理解。但宣传工作是党的重要事业，我们应当服从党的需要。前一段各级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在一段时期内，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上，有的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绝大部分是属于执行中的问题。这个责任应主要由上面来承担。当然，你们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要正视，要总结教训，采取措施认真加以改进。希望在这次会后，从中央宣传部到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都振作精神，增强信心，积极地、主动地开展工作，当好党委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助手和参谋。

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各位常委，各位同志：

邓大姐¹要我同大家来见见面，谈谈心。我想借这个机会，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件事，讲一些看法。先谈谈经济形势，然后谈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最后谈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协的工作。

一

当前的经济形势怎么样？许多同志感到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感到形势很好，另一方面，又感到问题不少。我看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经济形势很好，这个基本估价是有实际内容的。到商店到市场里去转一圈就可以看清楚了。我们的市场不是在萎缩，而是越来越繁荣。进入市场的商品不再像过去那样单调，而是越来越丰富。消费品不再像过去那样凭证供应，广大消费者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余地。这些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从宏观上也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增加了三倍多。这都说明我们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停滞，而是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尽管前年经济发展一度“过热”，出现了“超高速”，但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发展速度正在逐步地趋于正常，弯子拐得比较平稳。产

业结构的调整，也在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过去多年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比如一强调生产就给生活留下许多欠账，一强调基本建设就挤掉了技术改造，一强调重工业就要轻工业让路，一强调建设就闹得“三材”紧张，等等，这几年通过改革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过去互相卡脖子的因素，现在不少已开始互相促进，看来我们确实走出一条新路子来了。这不仅在当前发挥着作用，而且是今后长远起作用的因素。由此可见，经济形势确实不错。

但问题也确实不少。街谈巷议，谈得比较多的是物价问题。这几年物价有所上涨，当然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仍在继续提高。我们过去的物价结构极不合理：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人为地压得过低，许多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许多消费品价格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持的，财政上背的包袱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不利，不改不行。改，又有一个事实上的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问题。所以，在改革中应力求稳妥，保证价格的调整不至于影响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从去年的情况看，物价的放开和控制大体上还算适度。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并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货币发行情况怎么样？近几年来，每年增发的票子数量都不少。这是有原因的。这几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内部结算的交易，现在许多都得改为现金支付。农产品收购，过去同集体单位结算，现在同每个农户结算，也得用现金。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交易量的扩大，货币发行量当然必须相应增加。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对增加货币流通量在相当程度上起了抵销的作用，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没有酿成什么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已开始与过去有所不同。金融改革的进程，已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今后要注意控制货币发行量，务求货币的发行与经济的发展大体上互相适应。

财政情况怎么样？去年有几十亿元赤字。是不是财政收入减少了？不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我们的财源在不断扩大。问题是在整个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支出也在增长。去年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仅此一项，我们石油出口就损失了三十

亿美元，为了弥补这一项，只好多出口其他产品，因而增加了几十亿人民币的外贸补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由于盲目投资或铺张浪费引起的支出增长。这是我们应当着重分析和解决的。

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改革，打破了统收的体制，另一方面改革又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统支体制。也就是说，地方上已经开了许多小锅饭，而中央的大锅饭仍然照开。这几年，就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比重来说，预算内收入相对下降；就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比重来讲，中央收入相对下降，尽管绝对额都在上升，但相对地说，预算外收入比预算内收入增长得快，地方收入比中央收入增长得快。而财政支出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有所膨胀，特别是中央的支出增加很猛，因而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这是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也确实增加了宏观控制的难度。

既然存在着这种客观上的困难，我们就更应该加强指导。因此，继前年下半年提出控制“经济过热”以来，最近又进一步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压缩空气”。这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从长远来说，我们必须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才能有后劲，才能避免经济上的大起大落大折腾。第二，从当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具体特点来说，更要强调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一种较好的环境，而新的宏观控制机制的最后形成，也只有通过改革才有可能。所以，在今年年初的省长会议上，我们把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两增两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强调三压三保（压计划外建设保计划内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重点建设保重点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都很顾全大局，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当然，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多半还是应急的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深化改革，比如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供应体制等。我们正在总结这几年改革的经验，制定明后年的改革方案。

总之，现在经济形势确实很好，但问题也确实不少。只看到形势很好这一面，不去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难以进一步顺利发展。只看到问题不少这一面，看不到形势很好这个总的趋

势，就无法正确地把握全局。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经济形势肯定会越来越好。

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再过十天，国务院还要向人大作报告，今天我就不一一讲了。

二

现在讲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如果说，“压缩空气”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带动许多工作。经济稳定，政局稳定，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

有些外国朋友不大了解中国的事情，以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最近提出来的新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讲改革、开放、搞活，同时，也不断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党从来反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退让或者容忍的态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本来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去年冬天的学潮和思想理论界一度发生的问题，使我们全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卷入学潮的学生，不到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时间很短，城乡居民的态度是平静的。这就告诉我们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还有一定的市场，不可忽视；第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厌恶动乱，不希望出现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然应该明确、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从深入分析这一事件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现在事态早已平息了。在发生学潮的那些地方社会生活也已恢复正常。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情况也已经扭转了，“大气候”起了变化。正像小平同志最近说的，“麻烦”已经过去了。那么，能不能就此把这件事情放下呢？不能。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事情，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全国人民珍惜安定团结的愿望，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泛滥，决不允许任何社会动乱再来干扰我们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前一段时间我们党内极少数党员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必须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有人担心，“会不会波及到党外”？不会，既不应该，也不必要。问题既然主要发生在党内，我们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想特别应该指出：在这次平息学潮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同时，党外人士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今后，在向全国人民持久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中，在共同维护安定团结以至长治久安的过程中，我们相信，一定能继续得到党外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会不会搞乱？”不会。划清党内党外这条大界限，可以有效地防止扩大化。当然，在党内，也有必要划清各种政策界限。中共中央已为此制定了专门文件。认真执行这一文件的各项规定，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健康发展的保证。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刹住前一个时期的势头，我们采取了一些切实的和紧迫的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性质的份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基本的方法是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又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必须严格执行的各种政策规定，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会不会影响改革和建设？”不会。第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为改革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点，最近已讲得很多。第二，现在的问题是开放得还很不够，必须进一步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开始全面展开的阶段，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比如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各种具体形式，搞活大中型企业，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开辟资金市场，研究改善和加强宏观控制的各种办法等等，事情多得做不完，怎么能够就此止步呢？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处在酝酿阶段，正在研究具体方案。不改革，不开放，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不少外国朋友来问这些事，小平同志对他们讲得非常明确：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

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变，开放、改革的政策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变，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也要继续贯彻下去。总之，“我们一切照旧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第三，从根本上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和建设搞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充分地发挥和显现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因此，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必须抓紧进行而绝不能放松我们的改革和建设。

“会不会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会。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懂得，在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繁荣富强，社会就会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也会激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所在。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会反到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完全是一种误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都是党的既定方针，都将长期地认真地执行下去。一切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人，都将继续受到鼓励。他们的聪明才智，也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努力逐步为知识分子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要努力创造一种民主、团结、融洽、活跃的气氛，使大家精神奋发地工作。

“会不会影响社会的正常民主生活？”现在有的单位确实发生了把向领导干部提意见说成是“自由化”的现象。但这是个别事例。我们党不允许这样做。一经发现，要立即制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本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不得以“反自由化”作为压制民主的借口。相反，我们还要切实开辟多种形式的社会对话渠道，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鼓励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在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的条件下，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将有秩序地、逐步地、切实有效地展开。

目前有些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存在着一些顾虑。但是，斗争的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终将会消除各种疑虑。

实践终将证明：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把它刹住，是必要的，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也是正确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保证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

最后，我想讲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很大，政协的工作成绩很大，爱国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各项政策都已走上轨道。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我们有关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都不必变，也不应该变。这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变，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不变，既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也统统不变。我们赞成、你们赞成、全国各族人民赞成、海外侨胞赞成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变呢？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变呢？

如果一定要说变，就应该变得更好。所谓更好，就是说，团结的人要更多，要团结得更亲密更融洽，使大家积极性更高，大家都来共同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进程。为了这个目的，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对我们党有什么批评，我们都非常欢迎，愿意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改进。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注释

1. 邓大姐即邓颖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县，生于广西南宁市。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

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

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小平同志：

十三大报告正在草拟大纲。三月十八日，我邀集一波、尚昆、万里、乔木、启立同志座谈。大家都认为，这个文件，关系重大，一定要写好，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写清楚，写出分量来。

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写七个部分。一、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二、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三、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四、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五、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六、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包括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和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风气。七、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着重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指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 邓小平 1987 年 3 月 25 日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

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初级阶段，而是特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特点。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倒回去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是害国害民的；二是明确指出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地展开。看来，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预计五月初可拿出一个粗线条的稿子来，推敲到七月，再在北戴河提请中央审议。

当否，请指示！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此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值得认真研究。

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的现阶段，单靠市场的作用，单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靠国家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而要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以改革促使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落实。这样就把经济发展战略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了，也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搞，可能会减少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可能更易于显示改革促进发展的作用。而对计划的改革，也就有了方向。

建议印发体改委（及方案小组）、国家计委、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请安志文、马洪、房维中同志主持讨论几次。

^{*} 这是赵紫阳对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批示。

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当前国内形势和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十亿人民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奋斗，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建国以来更加突出的成就。全国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提高和改善。我们的国家正在日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人民的创造活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改革中日益发挥出来。

一九八六年是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把一九八四年末至一九八五年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初步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继续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全国社会总产值达到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一；其中工农业总产值一万五千一百零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三。国民收入七千七百九十亿元，比上年

增长百分之七点四。粮食产量达到三亿九千一百零九万吨，比上年增产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吨。林业、畜牧业、渔业、其它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基本协调，产品结构有所改善。钢产量达到五千二百零五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发电量达到四千四百五十五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五；原油、天然气产量持续增长，煤炭供应充足。多年来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的状况开始有所缓和。适销对路的工业消费品，增长幅度超过整个工业发展速度。市场活跃繁荣，多数商品供求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对外贸易在面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世界经济激烈震荡等许多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努力和采取一系列措施，超额完成出口计划，压缩了不适当进口，缩小了外贸逆差。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巩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一些方面取得开拓性进展。横向经济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发展。劳动制度的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多种形式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的推行，为健全企业经营机制创造了重要条件。小商品价格的进一步放开和部分产品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的适当拉开，对发展生产和活跃市场起了积极作用。金融体制改革和资金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资金的融通和合理使用。这些既保证和促进了当前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为今后的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必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去年国务院采取的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措施，实行的“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改革方针，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经过自觉的有节奏的调整和改革，把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置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过去一年里也取得许多可喜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满腔热情地继续贯彻执行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认真组织科技攻关，大力开发和推广科技成果，积极落实振兴农村经济的“星火”计划。全国去年取得重要科技成果一万多项，其中大部分已应用于生产建设，取得比较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几千名专家经过几年反复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

定和颁布了能源、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工业等十二个领域的技术政策，以及涉及生物工程、信息、航天、自动化、能源、激光和新材料等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这对我国当前和长远的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善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提高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新进展。广大的思想文化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促进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中作出了新的贡献。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得到巩固，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为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前几年不断加强立法工作的基础上，去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通过了十一项法律，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五十九项行政法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法律体系很不完善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变，在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公民中广泛开展的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使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得到增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共产党和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共事关系，全国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助、亲密团结的关系，得到新的加强。经过继续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其它刑事犯罪，经过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以及对各种不正之风的认真纠正，我国社会秩序安定，社会风气正在好转。实现长治久安是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坚信这个目的必定能够达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新的成就，精简整编、减少员额一百万的任务接近完成，官兵的军政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和发展新型的军民关系，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保卫祖国领土和边境安宁等方面，都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方面将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出

更大的贡献。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安定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

以上事实和基本情况充分说明：总的来看，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兴旺，形势是很好的。

各位代表！当着我们如实地对全国形势的本质和主流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前进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虽已有所缓解，但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仍然存在着某些不稳定因素。国家财政出现一些赤字，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较多，外汇收支还不平衡。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不高，部分产品质量下降和滞销积压，物质消耗过大，生产成本上升。在政治思想领域，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各级政府广大工作人员总的来看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政府工作中还存在着某些预见性不强、措施不够有力等缺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弊病，还需要下很大力量去努力消除。对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高度重视。

实践证明，坚定不移地、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力量源泉。根据这个基本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本次人代会到下次人代会的一年间，我们要集中力量办两件大事：一是在经济领域，坚持正确的建设方针，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深入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级政府，各行各业，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要围绕这两件大事，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希望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警察，都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努力，为办好这两件大事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二、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总的来看，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社会显著进步的基础。努力把这种发展势头长期保持下去，使之不受挫折，这不仅对于巩固和发展当前很好的经济形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经济实力的加强，人民利益的增进，乃至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都必将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必须以此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并为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那么，根据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特别是近八年的经济建设经验，根据当前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着重解决好哪些问题呢？

第一，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大国里，农业这个基础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全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发展所以很不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发展缓慢和收成不稳定。这八年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首先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多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工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我们必须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继续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农业生产全面发展，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占有量还很低，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林业、牧业、渔业等项生产，基础都还比较脆弱。同时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处在开发时期，不仅通过深入改革还可以挖掘出很大潜力，而且农村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也有极大的潜力，农村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很广阔的。我们必须从深化改革和增加投入这两个方面入手，努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要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一系列新的制度性建设，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使正确的政策逐步法律化，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要切实保护农业耕地和森林、草原，大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

必须保证粮食种植面积，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力争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努力做好“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工作，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这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必须按照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去年，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增长的工作初见成效，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三，大大低于一九八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六的速度。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还没有得到很好控制，已经铺开的摊子过多，在建项目总规模过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很不合理。在建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般加工工业，还有许多是在当前国力条件下不该办的或标准过高的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工程，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等建设投资不足。这样的投资结构如不及时加以合理调整，要么大量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设施得不到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方面的必要保证，形不成生产能力或不能投入使用，将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要么就不得不再增加几百亿元的资金来扩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必然导致投资规模恶性膨胀。为了进一步改变在建规模过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已于今年初作出决定，对基本建设坚决实行“三保三压”的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目前各地正在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但有的部门和地方仍然行动迟缓，措施不力，需要切实改正。我们一定要坚决把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国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并使关系全局的重点建设得到切实加强。

第三，必须把消费的增长切实建立在生产发展可能的基础之上。这些年来，认真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的偏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城乡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今后，我们还要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但是必须指出，目前我国经

济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过快，消费欲望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集团消费方面，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讲排场，摆阔气，比豪华，请客送礼，滥发实物，挥霍公款，奢侈成风，各项设施盲目追求现代化，铺张浪费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工资、奖金和集团消费等开支增加过多，既提高了生产成本，又加剧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这几年许多高档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增长，而且花费不少外汇进口了这方面的大量整机和散件，但市场供需矛盾仍相当尖锐。消费结构的这种趋向，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可能。如不加以正确引导，不仅将使资金积累减少，造成经济后劲乏力，更严重的是会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贪图享乐、不求创业的思想，形成现实的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而又消费欲望过高之间的矛盾，引起种种社会问题。生产是消费的前提，生活消费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和集团购买力增加的幅度必须同社会消费品生产增长的幅度相适应。这是不能违反的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阶段，需要积累大量建设资金，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而不能追求过高的消费。前几年对这个方针讲少了，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根据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发展可能来恰当安排人民的消费水平，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严格控制集团消费，并对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档次、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节，使之符合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此外，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四，必须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这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稳定经济的重要保证。去年，国家财政出现一些赤字，银行信贷也出现一些差额。财政赤字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出口收入减少等原因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出规模偏大。经济发展从前两年一度出现的过热现象纳入正常发展轨道以后，某些非正常收入因素逐步减少，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减缓，而在超高速发展中已经抬

上去的过大的支出规模还没有减下来。几年来，地方、部门 and 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下降较多，但不少应当由地方、部门、企业用自有资金办的事情，仍然要求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负担。与此同时，在资金比过去分散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合理方向的制度和机制，这就一方面为地方和部门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和扩大非生产性建设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负担过重，捉襟见肘。如不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今后几年财政赤字还有进一步增大的可能，信贷差额也有扩大的趋势。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是同货币发行紧密相联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某些年份出现一些财政赤字和信贷差额并不可怕，但如果数量过大，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造成通货严重膨胀，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使经济生活发生混乱。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把过高的财政支出压缩下来，同时要根据新的分配格局，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结构，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今年，国家还将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从分散的预算外资金中集中可以集中的部分用于重点建设。银行要大力吸收储蓄，筹集社会闲散资金，积极扩大资金来源，适当安排各项贷款。除了合理保证企业流动资金和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以外，其它贷款都要从严控制，坚决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国家计划的范围之内。

第五，必须继续防止盲目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倾向。只有兼顾需要和可能，讲求按比例和高效益，保持适当的增长率，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已经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和以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为依靠的，是切合实际和完全可以达到的。如果不顾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脱离本地区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可能，一味追求提前翻番和快翻多翻，就会严重干扰正确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使经济大起大落，欲速而不达。去年，就全国来说已经使经济增长由超高速状态转入正常轨道，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企求改变面貌过快的思想尚未完全克服。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家底薄，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和文化发展又很不平衡。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发达，人民普遍富裕，

必须经过坚韧不拔的持久努力，而决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必须确立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方针，脚踏实地前进，而决不能盲目追求过高速，以利于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和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第六，从根本上说，要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近八年来，由于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我国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加。一九八六年同一九七八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四百八十亿元增加到九千三百八十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由三千零一十亿元增加到七千七百九十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百分之九十四点九；国家财政收入由一千一百二十一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二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九十八；部门、地方、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由三百四十七亿元增加到一千六百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三百八十一；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一百七十五元增加到四百五十元，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增长百分之八十六点九。这些数字和事实充分说明，当前遇到的困难，是在生产建设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不是在经济萎缩和人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我们具备着克服这种暂时困难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改革顺利推进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深入改革来加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老体制交替的过程，目前原有体制已在许多方面被冲破，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还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已经进行的许多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配套和完善。这种新老体制并存的状态，是宏观经济前两年一度出现某些失控，以及目前财政、信贷、投资、消费等方面产生某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和积极稳妥地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并要努力使运行中的经济体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它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为此，国务院已经组织各方面力量认真总结前几年的改革经验，精心研究进一步配套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以便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各位代表！除了前面讲的几个问题以外，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要真正使经济建立在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广泛、深入、持久

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这项运动是长期以来我国促进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掉，而且要更好地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努力增产增收，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能够合理地 and 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更好地发展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可以发扬光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长远意义。

这次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是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提出来的，因此一定要同深化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近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凡是改革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有了较大的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有了显著的增进。所以我们说，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改革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直接动力。各个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要把重点放在全面提高社会效益上。就工业生产来说，要在保证正常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所有工业企业都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节约资金，开展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十分注意收旧利废，切实加强综合利用。在流通方面，要积极开拓城乡市场，认真清仓查库，减少商品积压，加速商品和资金周转，节省流通费用，减少企业亏损。在建设方面，要围绕合理调整投资结构，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益。在其它各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战线和机关、团体、军队等，也都必须充分考虑提高经费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坚决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着的严重挥霍浪费现象。国务院决定今年行政费、事业费和管理费等各项开支要比去年预算执行数节约百分之十的总要求，必须努力做到，今后，财政支出要长期坚持从严控制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生产、建设、流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业和商业等

各个行业，都要关心和促进科技进步，把增产节约和改善经营管理纳入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科技部门要继续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坚定地把主要力量放在为企业技术改造和振兴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同时组织精干的队伍积极研究和发 展高技术，并继续搞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充分发挥所有企业以及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圆满实现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希望，生产、流通、建设领域中的各类企业，都要把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挖掘自己内部的潜力上。要切实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健全经济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加强审计监督，严明奖惩制度，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特别要坚决整顿劳动纪律，下决心改变目前许多企业严重存在着的管理不严、职责不清、纪律松弛等落后现象。必须坚决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严格禁止一些地方和部门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广大职工要进一步增强对企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主人翁责任感，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水平，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热情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力量。全体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头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各行各业、各个地方都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出具体的规划和措施，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努力取得实效。

三、深入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

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既要靠坚持正确的建设方针，又要靠深入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把正确的建设方针同正确的改革、开放部署结合起来，使它们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这是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顺利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以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和健全宏观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实践证明，这个既定的改革方向和总体部署是正确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改革的具体步骤和配套措施及时作出恰当安排。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确定

一九八七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着重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继续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适当加快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市场，逐步改革和完善企业劳动工资制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并积极为下一步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做好必要的准备。

第一，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前几年的改革，总的来看企业活力有了一定的增强，但还很不够，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没有真正活起来。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国家规定下放给企业的一系列自主权，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被中间环节所截留，至今没有真正落实到企业；另一方面在对企业的扩权中，责、权、利没有很好结合，为企业放开经营权和真正实行自负盈亏创造条件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这就使企业行为往往不能主动适应国家宏观决策的要求，不能对市场变化及时作出合理反应，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和潜力的发挥也受到很大局限。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除了已经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必须坚决放给企业以外，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上，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认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要根据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的特点，灵活确定企业合理的经营方式。一般来说，小型企业可以推行承包、租赁责任制。大中型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用签订合同的办法明确规定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集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对所有企业以及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正当利益，必须切实予以保护。总之，我们要积极探索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多种有效形式，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又使企业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路子。

同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相配合，要加快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必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普遍推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全面责任，要广泛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促使企业经营者同全体职工一道切实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企业自我约束的行为机制。这样，也有利于

培养和造就我们的事业所迫切需要的一大批有作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

第二，继续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鼓励建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在深入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推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横向联合，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通过几年来的改革，目前在全国注册登记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有三万二千多个，已形成二十四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一九八七年要在这方面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研究拟定更为具体的政策和办法，继续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地向前发展。要鼓励和支持地方、部门、企业之间实行生产要素的联合，相互投资和相互参股，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条件成熟的，可以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各种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并使它们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处理逐步规范化。军工企业也要根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横向联合。根据几年来发展横向联合的经验，当前需要注意处理好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坚持以骨干企业或名优产品为“龙头”，防止把企业集团搞成变相的行政性公司或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在同一行业，可以形成若干个规模不等、各有特点的竞争性企业集团，不能搞成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三是各级经济综合部门和专业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联合，坚决排除条条块块出于局部利益而进行的种种干扰，保证横向联合和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四是建立企业集团要重视吸收科研单位参加，促进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加强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

第三，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活各种社会资金。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既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去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短期资金市场发展较快，对于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和促进社会资金合理使用起了重要作用。今年要不失时机地在这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职能，积极发展多种金融组织和有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开辟多种信贷业务，大力发展城乡保险业务，在各种金融组织之间适当开展竞争；有条件地实行省以下专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企业化，逐步做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改革银行利率体系，逐步理顺存贷款

的利率，实行期限差额利率和浮动利率；改善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办法，改变银行包企业资金供应的做法；逐步实行外汇、外债的集中统一管理，搞活外汇资金；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金融中心作用，有领导有步骤地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资金融通市场，发挥金融市场筹集调剂资金、引导资金流向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良好环境。目前大中型企业普遍活力不强，从外部条件来说主要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产资料市场。今年要积极发展和改善钢材、煤炭、水泥、木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国家准备拿出一部分统配钢材，集中投放到指定的重点市场，切实加强指导和管理，并通过必要的经济办法，引导生产企业自销的钢材和使用单位超储积压的钢材更多地投入市场流通。鼓励企业之间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的经验，对一些重要生产资料，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都实行“同一销价、差价返还、逐步放开、扩大市场”的办法，以利于扩大企业择优选购的自主权，减少社会物资库存，有效防止倒买倒卖现象，更好地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形成。

第五，改革企业劳动工资制度，逐步理顺企业分配关系。所有企业今年都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各项规定。今后全民所有制单位新招用工人，必须面向全社会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要积极建立职工待业保险制度，逐步推行以省、市或县为单位统筹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办法。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除近期内国家还将规定大体统一的工资参考标准以外，今后国家只规定企业工资、奖金增长的限额、幅度或同效益挂钩的定额和比例，企业内部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条件，分别采取计时加奖励、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单位产品工资含量等不同的分配形式，把职工的劳动报酬同他们的劳动贡献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打破平均主义，搞好按劳分配。与此同时，国家要进一步完善对消费基金加强宏观管理的制度和办法，使消费基金的增长同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相适应。

第六，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这几年在基本建设中推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标投标制，对调动部门、

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合理使用资金和增进投资效益，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年要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投资包干责任制。与此同时，要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中简政放权，适当放宽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并使部门、地方和企业相应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和风险，实行责、权、利的统一。在不突破国家“七五”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前提下，放宽各包干部门对项目的审批权限；对非包干部门和地方，也适当放宽一部分行业的项目审批权。扩大计划单列的大型联合企业、国家重点支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在组织实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方面的权限。改进年度计划投资安排办法，在从严控制投资规模的条件下，各部门、各地方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对项目之间的投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整。改进建设项目的审批办法，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办事效率。建设项目从设计、施工到设备供应和设备进口，都要打破地区、部门和军工民用的界限，全面实行招标制，择优选定中标单位，逐步改变过去单纯用行政手段分配任务的办法。

各位代表！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和议论较多的问题。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对价格管得过多过死，我国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如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可能有效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不可能正确引导社会消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就建立不起来。因此，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但价格改革涉及千家万户，难度也很大。我们的价格改革总的来说是结构性调整，但由于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还由于许多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因此在改革中总的物价水平势必有所上升。当然，这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轻度通货膨胀也是分不开的。由于物价总水平上升，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问题。这里，既包括实际经济的承受能力，也包括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从政府来说，每一项价格改革措施的付诸实施，事先必须仔细研究和周密测算，进行多种方案的比较，力求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社会和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从群众来说，也要提高对价格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变动的适应能力。只增加工资，物价不动，是做不到的，要么只能回到过去那种经济缺乏活力，工资和物

价都长期冻结的状况，这显然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很不利，也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愿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努力保证广大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实际生活不仅不下降，而且还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有所改善。在前几年的改革中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消费档次和赡养人口多少的不同，物价上升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也会很不一样，有少数收入增加不多以至没有什么增加的人目前生活确实有困难，有的甚至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这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也是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乘价格改革之机乱收费、乱涨价、变相涨价，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今后的价格改革一定要坚持既定的正确原则，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稳步前进”的方针，谨慎从事，做得更加稳妥和周到。今年的改革只限于调整和放开极少数非动不可的产品价格，要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幅度严格控制在低于去年的幅度之内。要继续发挥国营商业平抑物价的作用。特别要切实加强物价管理，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乱涨价和变相涨价。这是一条必须坚决执行的重要法纪，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加强监督。

在改革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们普遍关心和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随着新老经济体制的逐步转换，各方面利益关系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被突破，新的合理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形成。这同整个新老体制的转换一样，也只能和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向来看，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都将随着改革的进展而得到增加，这已经为前几年改革的实践所充分证实，也是我们的改革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利益的增加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有先有后，有多有少，甚至有些方面的利益还会暂时受到某些损失。而且，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是一下子就能定型的，在某项改革中得到的利益有可能在另一项改革中部分丧失，又可能在另外的改革中得到补偿。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变化，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采取改革措施的时候要立足于尽可能做到增进各方面人们的利益，从而使改革能够始终得到广大群

众的支持，以保证其顺利发展。与此同时，也要结合各项改革，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人们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对个人利益的增进抱有脱离实际的奢望，增强人们思想上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前个时候我们的某些宣传恰恰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在关系社会每个成员实际利益的分配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坚持拉开合理差别，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裕起来，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将有利于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对通过合法的正当途径获得的高收入，也必须实行合理的调节，以防止收入差别过于悬殊。至于对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必须严加取缔，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予以制裁。

各位代表！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开发，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其它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都有显著进展。一九八七年，我们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有效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增加出口创汇等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使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用国外各种资金，吸引外商在我国举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补充国内资金不足、增加出口创汇能力、提高我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已经颁布的对外商来华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要抓紧完善涉外经济法，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利用外资必须把握三条原则：第一，借外债的总额要有控制，外债结构要合理，要同自己的偿还能力和消化能力相适应；第二，一定要用在生产建设上，重点是出口创汇企业、进口替代企业和技术先进的企业；第三，利用外资要讲求经济效益，创造的纯收入，无论如何不能统统花掉，一定要留足及时还本付息的部分。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国际信誉，立于不败之地。

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我国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强。为了增加外汇收入，必须立足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改进花色品种，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要充分发挥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工资成本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和来料加工出口。积极推进工贸、农贸之间的横向联合和合作。逐步建立出口商品生产体系，发展创汇产业，使专门为出口创汇服务的企业信息灵通，并真正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为外贸出口的持久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进一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尽快增加工业制成品特别是轻纺、电子和机械等深加工、精加工产品的出口。努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出口生产经营协作和联合，搞好销售服务网络，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它们发展外贸生产的优势。要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外贸经济效益。在增加出口创汇的同时，要积极发展旅游事业，进一步开展对外承包业务和劳务合作，使它们成为我国增加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不仅要多出口，多创汇，还必须合理用汇，节约用汇，努力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把有限的外汇真正用在发展我国经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使之发挥出更大效益。严格控制不适当的进口，国内能够生产并满足需要的产品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积极发展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努力提高国产化水平。我们还要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制定既有利于联合统一对外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外贸体制全面改革方案，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为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创造良好条件。

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国的建设、改革和开放，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广泛深入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保证建设、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载入我国宪法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

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思想战线领导上软弱涣散，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和支持不够，甚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纵容，使这股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共同意愿的错误思潮滋长蔓延。这种状况搅乱了部分人的思想，蒙蔽了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青年，影响了安定团结，干扰了建设、改革和开放。去年年底波及若干城市的少数学生闹事，尽管直接引发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继续泛滥下去，就会影响更多的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迷失方向，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建设和改革统统将无法进行。所以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这场斗争，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决不能犹豫和动摇。

经过去年年底以来几个月的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情况开始扭转，但要清除这股错误思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当前来说，要集中力量抓好以下几件事：一、继续深入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二、认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三、进一步整顿、充实和加强舆论阵地；四、切实加强和改进各条战线特别是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还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精心地指导好这场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基本点是两条，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遭到破坏，改革和开放就会失去根本的政治保证，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不实行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就会停滞和僵化，不可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不能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绝不是也绝不会影响改革和开放的

进行。必须看到，有的人赞成改革、开放但思想不够清醒，或者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思想不够解放，这些都属于认识问题。通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评，分清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取得越来越明显的成效，我们相信，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理解得不全面、不完整的人们，必将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既要态度坚决，不可半途而废，又要政策和方法正确，始终以理服人。我们必须认真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搞政治运动，决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做法。几个月来，中共中央在这场斗争中已经明确宣布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主要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农村不搞，工厂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不层层找代表人物，不搞上挂下联，不搞人人过关；要把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同有某些自由化观点、但不固执己见、遵守纪律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坚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方针；要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有一般性错误的作品，以及探索中的失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区别开来；对学术理论和文化艺术上的不同意见，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下，继续用正常的自由讨论、批评和反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对人的处理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对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人，既要认真进行批评帮助，又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欢迎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对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而发表过错误言论和错误文章的人，主要是鼓励他们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认识。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即使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仍然要在适当岗位上安排他们的工作，用其所长，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实践证明，上述方针政策有力地保证了斗争的健康发展，今后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这里，我还要再次郑重宣布：在整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不变，进行全面改

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农村和城市的各项现行政策不变，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不变，继续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不变。不但不变，而且还要长期地、更加正确有效地坚持下去。

不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战略方针，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认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削弱，必须加强。但为了加强，又必须改进，否则加强的目的也难以实现。这是需要全国企业、学校、机关、部队、各行各业下功夫探索解决的新课题。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和耐心疏导的方法，讲究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教育群众，鼓舞士气，动员人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建设和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担负着教育人、塑造人的光荣使命，更要注意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给教师积极提供了解实际情况的方便条件，有领导、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扩大视野，丰富实际知识。各级政府都要很好地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继续努力改善广大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切实加强和认真改进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受教育者各方面的素质，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努力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党和政府领导的报纸、时事政治刊物、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要按照各自的特点，完整地、正确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创造、贡献和奋发团结的精神。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发表或反映各方面人们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的负责任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努力

为人民同时也为党和政府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对社会舆论提供正确的引导，对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繁荣文学艺术是陶冶人民道德情操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注意倾听群众和实践的呼声，积极深入生活，深刻反映时代，创造出更多的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进一步发展出版事业，改革出版发行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图书。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展览馆、影院剧场等群众性文化事业的建设，把它们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社会科学研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要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下，继续实行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以及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提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我们必须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认真汲取国外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但同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而决不能一味地盲目推崇，更不能把资本主义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当作所谓的“新观念”加以传播，否则就会腐蚀人们的思想，污染人们的心灵。以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为主要任务的各项文化事业，当然也都应该积极改善经营，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但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国家对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文化事业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对于优秀的创作和研究成果，对于成绩突出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将继续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反对美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错误思潮，不赞成搞“大民主”，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领导、有步骤地继续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建设，特别要活跃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和健全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各级政府领导部门和负责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地、主动地开辟多种渠道，

经常同广大群众对话。要把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建设和改革的成绩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同时也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接受合理建议和正确批评，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更加热忱而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通过对话，沟通思想，加深理解，消除隔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民主团结、相互帮助、共同前进的新型关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工作必须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我们还要在加强行政监察工作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发挥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重视和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任何时候，决不允许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压制民主，决不允许抵制甚至打击对实际工作缺点、错误的正当批评。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现在尚不完善，需要有一个长期建设的渐进过程。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巩固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前提下，通过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加以完善。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内容、重点和步骤，然后付诸实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族政策的教育，深入进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政府各部门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要努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日臻完善。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大发扬起来，以团结全国各族同胞为加强祖国统一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并且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定不移地执行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切实保证全面改革和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切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带头做守法、执法的模范。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工作，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具体指导，使之进行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公安、司法部门和广大人民警察要继续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文明礼貌、忠诚积极的职业道德，形成良好警风，密切警民关系。我们要继续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和其它刑事犯罪，依法禁止一切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及时正确地调解和处理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切实做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定。

各位代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当前的国际局势尽管错综复杂，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经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实现世界和平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受到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欢迎，在去年一年的外交工作中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我国为维护和平、实现裁军、推动合作、促进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在国际上赢得普遍赞赏。我国作为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超级大国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既是中国实现振兴经济宏伟目标的需要，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有力推动，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我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地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谋求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愈益深得人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正在顺利实施，我国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已载入协议的关于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业已圆满结束，并将于明天由两国政府代表团草签有关协议。这是按照“一

“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另一个成功范例，是朝着最终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合情合理的方针，它已经为愈来愈多的台湾同胞所理解。我们殷切希望台湾同胞继续发扬爱国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各展所长；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继续为沟通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往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采取切实的步骤。

总之，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建设和改革都是有利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同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友好合作，继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任何力量和干扰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同时满怀着必胜的信心。

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对需求膨胀要加以分析，膨胀的是投资还是消费？有些同志脑子里一讲膨胀就是投资膨胀。但现在建设规模并不大，计委不是有个材料吗？消费膨胀很厉害，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消费膨胀，平均主义。消费不解决，一刀砍向重点建设，消费会更加膨胀，生产力会萎缩。钱发得多，又没有效益。消费放开了，但没有找到路子，在平均主义路上放开了。有些企业就是应当很苦，有些企业就是要多发一点，现在平均主义大发展。这几年在消费问题上，工资问题上，步子迈不开，收又收不住。挂钩有顾虑，不挂的比挂的差得多。虽然在巴山轮会议¹上中外许多专家都不同意挂钩，但实际结果，效果很好。

这种局面再搞三年，改革要出大问题。这是改革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解决了，症状可以缓解，不解决就会加剧。出路在于改革，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企业责任制改革。还有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结构调整。同时要压缩开支，不下很大决心，压不下来。再就是压缩进口。压缩进口，亏损减少。原料投资要少压，机械加工投资要多压。

现在的问题是：用新的观点分析形势，还是用老的观点分析形势；是用改革的办法，还是用别的办法解决问题。

我是讲自我批评，放开了，办法没跟上去，结果平均主义发展。这个问题不制止，下半年可能消费基金大膨胀，效益下降，结果势必压基本建设。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对经济形势和改革问题的讲话。

需要防止惊惶失措，悲观情绪。不要认为大事不好。有这种情绪，措施不会得当。国民收入“超分配”怎么算出来的，根据什么？借外债算不算超分配？“超分配”的概念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借外债超分配，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超分配”的说法甚嚣尘上，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

多发了票子，到底占多大因素。物价上涨，不完全是政策造成的，但有政策因素。不能说政府控制不住。前年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去年是几种差价拉开。今年就提出了价格改革出台不出台的问题。可见，政策是重要因素。票子到底占多大比重。借外债、“超分配”是一九九〇年以后的问题。借外债，一九九〇年后可能速度低。是怕将来低，现在就低，还是现在高将来低好。

借外债是偿还问题。我不是说没有“超分配”，而是把“超分配”说得这么悬乎，是否从实际出发。

既然决定借外债，就应当借了用，用就是“超分配”，这有什么问题？一九八五年外汇用得正当，我承认。一九八〇年没有什么外汇结存，负十亿美元。一九八六年底结存七亿美元，五年增加十七亿美元。

把“超分配”说得很重，传得很广，需要澄清。外汇结存增加十七亿美元，反而说把外汇消耗光了，不符合实际。“超分配”一词是我第一次用，受了南斯拉夫久拉诺维奇的影响。因为经济学家不同意，后来不用了。现在都出来了，成了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总根子了。

如果说“超分配”也要列出哪些是正常的。借外债就是“超分配”而“超分配”为什么成了问题呢。借二百亿美元，就是八百亿元人民币，这不应当成为问题。借外债，“超分配”，与经济困难有什么关系。不借外债不是困难更大嘛！

票子，有没有过去通货不足的问题。一九八一年书记处研究室有个材料，说票子发多少。陈云同志说，手存现金，并不构成问题。通货不足问题还存在不存在。

物价上涨究竟与票子有多大关系。

虽然国内分配超过了国内生产，但借了外债，这也是一种分析方法。说用得正当，可以。

票子问题我也承认。在政协讲大体是适度的，可能多了一点。但到底多了多少，不能说多得不得了啦。没有量的分析，问题怎么能够解决。

现在有一种悲观情绪，对几年改革发生了动摇。不是说不正视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对你（马洪同志）一个人。现在搞法好，还是过去搞法好？说国家财政困难，你把预算外都统算起来，预算外一千六百亿元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这样分析问题。说基础工业投资不够，什么时候有现在这么多。讲比例关系，也要看到什么时候都不如现在好。钢一年增加三百万吨，煤什么时候搞过这么多。有很多问题，要承认，但要有一个基点，没有基点要出大问题。

现在问题是思想很不统一。

我是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对马洪同志一人。现在说“超分配”的空气正在发展，必须同这种空气划清界限。首先国务院要统一思想。

正视问题，采取措施解决，但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否则会迷失方向。

有一个严重程度的认识，是前进中的问题，还是多年来积累结果的集中暴露。这个不能含糊。对形势如没有一个清醒看法，就会乱套。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必须有统一看法。存在对形势如何分析和看法的问题。我很闭塞，但也听到不少议论。你们了解情况不会比我少。如果确实是多年失误的总爆发，那就得改弦更张，不能继续走下去嘛。

几年经济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预算内预算外四千亿元，内债外债也成问题了，还款还可以再借嘛。要分析，不分析不得了。不管问题有多少，都可以同八年前比一下。我在政协讲，形势大好，问题不少。

“超分配”就是多年失误的爆发。一千多亿元“超分配”，寅吃卯粮，那就只有勒紧裤带。如果说有“超分配”，没有实现的购买力，也就是一两百亿元。为什么我这样不感兴趣，就是没同多年失误的观点划清界限，说我们是虚假繁荣。

今天讲措施，根本问题还是落实省长会议的措施。是落实的问题。不要给人的印象，刚开了会，又出了问题。

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多年失误的暴露。关键是落实省长会议的措施，不是又出了什么新问题。

票子要注意，但究竟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谁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少发票子情况就一定好。发票子要谁批准，谁能掌握得了，农产品该收购你不收购，行吗？

消费基金控制是个大问题。用什么办法好？简单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建立在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基础上。

注释

1. 巴山轮会议，指 1985 年 9 月 2 日至 7 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联合召开的“宏观经济国际讨论会”，有 30 多位中外知名经济学家参加，重点讨论了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防止通货膨胀等问题。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从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又称“巴山轮会议”。会后，赵紫阳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参加会议的 11 位外国经济学家。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一、对经济形势的估计

对目前经济形势应该如何估计呢？概括地说，就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这个估计既不很乐观也不悲观，是实事求是的。形势大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问题不少，但也不能看得过于严重，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要在肯定大好形势的前提下，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贯彻年初省长会议的决定，我们的经济就可以继续得到稳定发展，不会出大的问题；如果今年一点小的牺牲都不愿意做，把时机失掉了，那明年的困难将会加大，大好形势的继续发展将会遇到困难。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几年进行大的调整，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请各地方、各部门以大局为重。

二、关于压缩财政支出和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

今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出路何在？

第一，必须把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至一九八五年超高速带来的开支大盘子压下来。超高速带来高支出，带来一个讲阔气、讲排场、大手大脚的

* 这是赵紫阳在他主持召开的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良风气，压缩空气首先要把这个压缩下来。各部门、各地方可以认真统计一下，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你们的财政支出增加了多少？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必须压下来，早压早主动。现在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只有一、两百亿元，而各项增加的支出加起来多达几百亿元，这种作法很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压缩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压缩行政费。现在我们行政费的支出增加很多，各种会议、各种旅游团到处都是，铺张浪费特别严重，而且互相攀比，好像各个单位都富得很。这种不正之风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政府就不能成为廉洁政府。把钱都用在行政费支出上，我们还搞不搞经济建设？当然基本建设搞多了也要压。财政部门要认真核算一下，以一九八三年的开支为基数，计算出每年的合理增长，对不正常增长的部分不能承认。这个问题要引起各地方、各部门的注意。

第二，真正把增产节约运动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大中型企业一是搞得不活，二是蕴藏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激励企业职工去挖掘潜力的政策和制度。今后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一个大的转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几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就会增加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今后的重点应放在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问题上，对大中型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一些小企业一租赁，效益马上就上来了，税收也增加了。石油、煤炭、铁道等行业实行包干办法以后，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证明各方面潜力都很大。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问题。但是，利弊相较，利大于弊。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有步骤地实行，不要一哄而起。这件事搞好了，将对实现“七五”计划起很大的作用，也会把改革向前推进一步。

三、关于制止乱摊派、乱涨价问题

一月省长会议上讲了要搞活企业、保护企业，但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地方基本建设不压，把发行的债券转到企业，各种摊派也很多，这就谈不上把企业搞活，使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乱涨价问题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现在钢材、木材、水泥、有色金属、化纤原材料，还有电力、运

输等，乱涨价的现象相当严重。生产资料乱涨价，会使加工工业的负担超前加重。这就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再一个就是迫使加工企业的产品也涨价。中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垄断的，生产资料的涨价引起加工工业的涨价是必然的。实行价格双轨制后，容易搞鬼，因此必须进行监督和控制，使这种情况不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有的钢铁厂不执行国家的合同制度，调拨任务不完成就去卖高价，国家一定要调拨，还得另给他好处。要研究制定一些监督办法。对企业，一是把它搞活，保护它的合法利益；二是它违法一定要给予制裁，这样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善于经营的守法的企业家。违法就必须制裁，不能迁就姑息，必须强调守法。不这样，我们的改革就会受到干扰。这一点要向下面讲清楚，并研究制定出监督、制裁的措施，做到违法必究。

四、这次人代会议讨论中涉及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特别是要使企业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思想上还不通，甚至还把它和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和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现在重申：（一）各地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通知执行，不能有任何动摇、犹豫和观望。（二）要使不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更多地接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让他们清楚为什么必须这样办。我们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去做，做的效果好了，就会获得更多同志的了解和支持。

第二，关于村民委员会的问题。村民委员会这个组织放在哪里好？我主张放在自然村，不要放到大队一级。南方自然村虽然小一点，还是有个自然村，北方就更没有问题了。农民对村的观念很强，再说村里防火、防盗、种树护林、修房屋、修道路，将来还要设各种基金、搞各种互助性活动，总得有个自治组织来协调。村民委员会设在自然村，乡政府可以考虑在大队一级设代表机关，一个人带一、二个助手，算乡政府的派遣机关，负责征粮、计划生育等工作。这就解决了乡政府下边没腿的问题，又不必增加很多编制。这是个人建议，供各地同志研究。

五、关于外贸问题

一季度外贸出口的情况很好，全国出口创汇八十三亿美元，比去年增加的幅度相当大。广东省一季度完成了十四亿美元，全年预计可以搞到五十亿美元。各地也都认为今年出口形势很好，出口创汇可以超过去年。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日本、台湾、新加坡、南朝鲜货币升值，在国际市场上给中国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二是我们这几年搞了一些鼓励出口的政策调动了外贸出口的积极性；三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多出口。为了解决好因多出口而增加的亏损问题，前天我和经贸部等单位的同志开会研究出以下办法：（一）超额出口部分的外汇“倒三七”分成，各地多出口部分的亏损自己解决，但是多创汇的70%归你。留成外汇按季度结算，按比例归你的你就可以使用。（二）用这些外汇可以进口一些能够弥补亏损的生产资料，但不能进口生活消费品。（三）在超额留用的外汇中，国家按批准的换汇成本买一部分。看来今年如果我们搞得好的话，有可能出现外贸顺差。总之，计划、外贸、财政、银行等部门要协同动作，互相支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把今年的外贸工作搞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 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今天我和卡瓦科·席尔瓦¹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热烈祝贺两国政府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开辟了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的前景。

在中英两国政府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又就解决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为在当今世界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树立了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联合声明》解决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同时也为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澳门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也博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联合声明》的签署，是中葡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都能以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为重，并从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充满了认真和合作的精神。对于席尔瓦总理本人对促成协议达成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表示高度赞赏！对于在中葡会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葡萄牙朋友和中国同事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也是完全行得通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遵循这一方针，为全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协议是中葡双方经过认真谈判达成的，它体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确信中葡双方对这一协议将会全面和认真地贯彻执行，希望广大澳门同胞和各界人士同心协力，为促进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及其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 卡瓦科·席尔瓦(Aníbal António Cavaco Silva, 1939-), 生于葡萄牙南部的阿尔加维地区。时任葡萄牙政府总理。先后任葡议会议员, 葡萄牙财政和计划部长, 社民党主席, 葡萄牙总统。

2. 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时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理的卡瓦科·席尔瓦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一致认为, 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 有利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为此, 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 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 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 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方针, 对澳门执行如下的基本政策: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 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除外交和国防

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 (三)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担任主要职务的官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澳门任职的中国籍和葡籍及其它外籍公务（包括警务）人员可以留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任用或聘请葡籍和其它外籍人士担任某些公职。
- (四) 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澳门居民和其它人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和迁徙、罢工、选择职业、学术研究、宗教信仰和通信以及财产所有权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 (五)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
- (六)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同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
- (七)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签发出入澳门的旅行证件。
- (八) 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资金进出自由。澳门元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
- (九) 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税。
- (十)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 (十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和区徽。
- (十二) 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五十年内不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葡萄牙共和国政府负责澳门的行

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一九九九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关于澳门土地契约和其它有关事项，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同意，上述各项声明和作为本联合声明组成部分的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七、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批准书将在北京互换。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葡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赵紫阳(签字)

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尼巴尔·安东尼奥·卡瓦科·席尔瓦(签字)

在上海市调研时谈深化企业改革等问题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当前要普遍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并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搞活大中型企业，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势在必行

和全国一样，这几年上海有很大变化，大家都反映形势很好，令人振奋。但是也要清楚地看到我们前进中存在的困难，看到完成今年任务的艰巨性。要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缓解存在的困难，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出路就在于要真正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作为国民经济骨干的大中型企业搞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前一段许多小企业实行承包、租赁以后，效益很快就大为提高，税收利润也大幅度上升；几个实行投入产出包干的行业，也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些都充分证明企业的潜力确实很大。现在大中型企业搞得不活，蕴藏的巨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主要是激励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没有解决或没有真正落实。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不能再靠国家减税让利，而是要引导企业向内部挖潜。为了改善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看来实行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势在必行。通过改革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促使企业上质量、上水平，调整产品结构，降低物资消耗，增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消

化能力。这样，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都能够得到兼顾。这不仅对当前有利，而且也是今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把工作做细，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计算好经济技术指标，签订好合同。要根据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不强求一律。要注意存利除弊，搞好配套改革，加强宏观管理，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要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关系问题

在明确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后，还要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问题，把职工和经营者的利益同企业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目前一些企业采取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含量包干、计件工资等具体办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并使它不断趋于完善。总的原则是工资奖金的增长应同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要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防止消费基金的膨胀。

各地应撤销行政性公司解放企业

为了搞活企业，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解决企业“婆婆”多的问题，上海市从去年起，就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陆续清理撤销了全市的行政性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下放权力，减少层次，搞活企业的要求。上海市的这一经验应当在全国推广。各地的行政性公司应予撤销，要把企业解放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城市政府各管理局的职能也应当转变，要努力为企业服务，搞好规划、协调、监督等工作，不要去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要切实检查纠正层层截留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力的现象，使企业真正能够实现责、权、利的结合。

厂长负责制应大胆探索不断完善

推行厂长负责制是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厂长负责制的通知，把这一工作搞好。厂长负责制是一件新事物，应当在实践中大胆探索，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形式。只要实践证明是好的，就应当予以支持并帮助改进。但不论什么形式，都要体现两条原则；一是厂长对工厂负全面责任；二是企业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目前上海和其它城市实行的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等形式，有利于厂长把长期目标和短期行为统一起来，效果是好的。

企业之间要注意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大型企业要带动中小企业，形成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经济联合体或企业集团。对跨地区、跨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联合企业或企业集团，要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在上海，在其它城市中，也可以对一些重要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实行市计划的单列。这是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宏观管理、搞活大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样做，能够冲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发展横向联合和专业化协作，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市和内地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发挥优势，搞好内地初级产品的加工增值，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家多创外汇。希望所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双增双节”和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为完成今年的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 三十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在你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深入改革，坚持开放，搞好服务，为促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做出新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计划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上海时同安志文、柳随年同志一路上议论，有了一些思路，要点是：

一、我们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

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经济活动要建立在等价交换上。我们的计划也要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这样就把有计划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了，有别于过去的产品经济。过去我们搞的不是商品关系，而是调拨关系，这是一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大家都想少调出、多调入。因为不是等价交换关系，不等价多调出就吃亏。我们过去理解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一种计划经济，没有把协作计划作为计划的重要内容，而是认为通过调拨才是计划。

斯大林晚年发现了一条规律，就是农民同工人、城市的经济联系，等价交换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实际上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不论国家订货还是地区协作都要体现等价交换，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有的地区可能调出多一些，调入少一些，但目标是等价交换。国家除了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十二条意见》汇报时的讲话。

保留必要的订货以外，其余的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地区之间的交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企业联合来实现。

能够把这个问题弄通了，计划的天地也就打开了，同过去的计划模式脱钩了。这个观点在文件中要写得突出点。现在价格体系不合理，可以不用等价交换的说法，用商品交换，用这种思想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计划是无偿调拨，市场就是等价交换。

二、实行分层次计划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不发达的大国，地区大、发展很不平衡、信息很不灵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中国的计划必须是分层次的。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要把这种情况划分清楚。有些事情，过去中央根本不该管，管长了都变成习惯，改起来很困难。例如西藏需要的消费品，本来可以到四川去交换，很长一个时期通过商业部调拨，西藏用上海货，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还有把上海货运到新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其实除了粮食等重要消费品外，现在不存在安排市场的问题。有夹克的穿夹克，没有夹克的穿西装。不必哪个地区都得调西装、调夹克。

中央管得那么多、管得那么细，只能起坏作用，不能起好作用，乱点鸳鸯谱。

这几年，我们对地方政府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权限，一直没有定下来。现在看，对地方一级的作用要肯定，要规定方向。

中国地域广阔、商品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不管经济不行。要把计划调拨逐步变成地方之间的贸易，要大力提倡地区之间的对销贸易、换货贸易以及资金技术的联合。可以由地方签订合同，有短期合同、长期合同、五年协定或十年协定，这都是计划。这样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能把横向的经济联合打通。

我们老讲合理流向，通过调拨就没有合理流向。搞协议、交流这样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合理化，各地区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山西过去认为搞煤吃亏，现在通过搞煤什么都有。不挖煤，去搞提高轻工业，只能越搞越糟糕。

搞调拨制度，一层层把东西调上来，一层层把东西分下去，人们的观念就不同，他就同你争。一搞协作，观念就改变，就不会同你争，这样，透明度也高了。

国家计委不要只搞国家安排的那一块，而要鼓励、促进、保护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换。这样做，能源、原材料产业和沿海加工区，就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联合和交流解决互利的问题。

现在地区之间的协作贸易正在发展，上海有个很大的办公室。要把这种协作看作是计划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计委就要对它加以支持和保护。

在投资方面，过去我们老是想中央搞基础，地方搞加工。这样地方越积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就越落后。现在看，中央不能把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包起来，可适当集中搞一些，同时拿出一部分投资用以扶持和补贴地方，鼓励地方搞原材料和能源建设。地方的能源、交通建设也靠地方搞。有本事多搞，没本事少搞。这也解决了省一级的自我约束问题。

采取高度集中的办法解决不了能源交通问题，都把它放开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把权责利和权责害统一起来，有的是权责利，有的是权责害。搞好搞坏由你负责，要加重地方的责任。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要把很大部分放给省市，在这基础上，国家搞好重点建设。

三、关于投资体制改革问题

搞基本建设基金制，这个我赞成。今后国家可以不向部门分投资，统统放到投资公司，给它下达任务，给你多少投资，你给增加多少能力，然后由他们找地方、企业去谈。地方也可以搞投资公司。各搞各的。

基本建设的改革要联系招标投标制度的改革。招标投标现在看来效果很好，从鲁布革和水口电站招标看来，效果很好。问题就出在设计、施工单位属部门管，搞假招标。

是否搞一个监督部门，克服这种舞弊现象，有没有办法把这种现象查出来。建行管这个事情行不行，是不是可以专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招标投标制。招标投标制必须在真正的竞争条件下进行。没有竞争的招标投标就只能是形式主义。

要组织好评标。评标由中间人士、公正人士参加，把全部资料公开，评定后在执行中监督。不许你搞假账。谁这样搞谁就是违法。如果把招标投标搞好，建筑费可节省三分之一，搞好了是很大的潜力。

整个基本建设要好好改革一下。要把现在的基本建筑队伍变成真正能打仗的队伍，老的建筑队伍可以另外解决。把年老、体弱的单独划出来，不要把它背在建筑队伍身上，把队伍拖得不能打仗。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一下解决不了，先解决这个问题。使队伍能够打仗，这个队伍就有生气。把施工队伍变成精明强干的，工期也能缩短，造价也能降低。

招标投标制要铁面无私，施工队伍要进行认真整顿，这样基本建设就可以面目一新。要把基本建设的招标投标和施工队伍的改革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这件事就由计委来抓。

四、关于改革中需要认识的几个问题

反思我们以前的改革，有几个问题要重新认识。

(一) 原来设想改革要有宽松的环境，看来这是幻想。环境宽松了，还改革干什么？短缺是体制上的弊病带来的，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病。不消除这些弊病，环境怎么能宽松呢？当然也不能搞得太紧。

(二) 市场的作用不要神化、不可理想化。商品经济不发达，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全国统一的市场，这是不可能的，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能主要靠竞争、靠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必须有政府的政策加以引导。国家对初级产品、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对这些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应当比对其它方面的影响要大些，这部分活动如果动荡不定，整个经济就会动荡不定。计委搞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文件，就要解决这一点。

(三) 价格问题。原来曾经想过要过这一关，二、三年过去后形成市场。这种想法是按照一般公式，联系实际不够。价格必须改进，但合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能够逐步形成，不可能集中二三年时间解决。我们只能

在市场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对价格各级政府要干预，在这方面要有立法。

五、关于企业承包问题

厂长租赁企业，权责利加风险这一点和过去不同，现在是厂长讲什么，工人就听什么，一下子就改变了工人吃大锅饭、依赖国家的观念。

厂长有了风险就有权威，从公家的官成了经营者了。

承包租赁问题的关键是：改变经营者在工人中间的看法。这事靠减税让利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是把企业中经营者的权威树立起来，经营者有了风险，权威就起来了。风险越大，经营者的权威就越高。

现在有一种观点不大恰当，老是要解决大型企业技术改造的自有资金问题，这个想法实际上行不通。大型企业的改造得有计划地进行。对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有一定的解释，全靠自有资金是不可能的。税后还贷是好的，可以约束自我的发展。这方面要好好算个账，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所得税让百分之三十，然后税后还贷。看看这样是否可以走得通。

企业承包包给谁的问题，不外乎包给厂长和劳动集体。

这次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来访，我问他们企业承包给集体，谁来签字，日夫科夫讲是厂长签字。

说承包给劳动集体实际上是一种概念束缚，怕讲承包给厂长就是资本主义。因此承包就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谁来签合同，出了问题以后谁来负责。

作为大的路子，十二条意见可以了。还有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思路的文件，把这两者配合起来，今后改革的路子大体就有了。

“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思路，还要专门讨论一次。至于今、明两年财政体制如何改、投资体制如何改，要拿出具体办法来。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久也将在十三大提出设想。怎么做好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部主持，好好讨论一番。今天我先谈点意见。

一、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具体表现，可以举出这么六条：（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了和发展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讲的人少了，报纸也不登了；（四）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软弱退让态度，党中央已经坚决果断地加以纠正；（六）全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虽然认识与理解的深度不尽相同，但是无可否认，全党思想更加清醒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总之，同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保证了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的好势头。

半年来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说明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决心下得正确，下得果断。如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迷失方向，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无法正常进行。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只有进行这场斗争，才能避免动乱，排除干扰，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和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点，通过近半年的实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点，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党中央确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开始，中央四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了这场斗争的指导方针、范围、重点和一系列政策界限、工作方法，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不搞，企业、机关、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等等。当时，有的同志怕扩大化，也有的同志觉得是“划框框”，怕走过场。现在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四号文件提出的政策起了指导斗争和稳定人心的作用，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绝不是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当前来说，前一段已经提出的任务，还有不少没有落实，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们的眼光还应该看得更远。小平同志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存在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进行几十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六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得非常透彻：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人们已经初步见到了社会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也不可

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日益显现，逐步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是应该做到和可能做到的。至于像去年冬天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局面，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必须指出，我们是在改革和开放的条件下做工作，不可能把人们封闭在温室里，不可能使人们不接触腐朽的丑恶的东西。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增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识别力、免疫力和抵制力，就必须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因此，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断引向深入，是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叫“深入”？深入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也不是要大家都去一字一句地抠理论概念，死记某些条文，不是要大家去搞形式主义，硬性规定用多少小时去搞政治学习。深入，就是要深入人脑，使绝大多数人都懂得，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必须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最要紧的。人们都知道吃饭穿衣的重要，因为衣食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是不可须臾或离的。现在要使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懂得，对于我们来说，四项基本原则正同布帛菽粟一样，也是不可须臾或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政治运动，必须靠正面教育。因此，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在正面教育中，要通过八年来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成果，生动地全面地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全国各族人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成绩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就会大大缩小。

弄清楚了什么叫做“深入”，紧接着就有一个如何深入即如何做好正面教育的问题。使正面教育真正深入到人的头脑中去，起作用，有效果，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人们所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写“大批判”文章比较顺手，但不善

于搞正面教育，不善于写深入人脑的文章。前一段有四、五篇文章反映不错，群众觉得文章读得下去，道理听得进去。这样的文章，效果就比干巴巴的党八股好。党八股，简单生硬的说教，好比广东人说的“水过鸭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们的头脑里去。据说有的同志抱怨文章没有人读，政治课没有人听。当然有个别的是立场问题，根本不听我们的。但总的说，这个问题，不能埋怨读者，埋怨学生，倒是值得我们有些作者和教师反思自省，从主题、内容，到材料、论证，乃至语言、篇幅，都要研究一番，看看到底为什么不能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过去我们宣传真理，唤醒和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今天我们有了执政的条件，应该把宣传真理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不应该做得更差。所谓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经济工作必须讲效益一样，宣传工作必须讲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熟悉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的、比较有水平的同志，到群众中去直接对话，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互相对话，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针对性，又生动活泼。然后加以选择，把好的、成功的对话的记录整理出来，在报刊上发表，效果也许会好一些。宣传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做，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应该尽可能抽点时间出来，到基层去，接触群众，对群众做点深入浅出的宣传工作。总之，要多想点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扎扎实实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让广大群众能够既从理论上、也能联系身边的实际生活，确确实实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今天我是提出任务，至于到底用些什么办法，把正面教育进行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请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责成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方面研究拿出一个意见来。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当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做好那些有错误的同志的工作，使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里，我不是指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已经开除出党，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但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是四号文件中讲到的：“有些同志持系统的错误观点，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这个问题，从组织

上说，当然一定要掌握好界限，核对清楚事实，还要允许本人申辩。另一方面，从有错误的同志本人来说，则应当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与帮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党纲党章。既然你违反了党纲党章，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承认错误、积极挽回影响吗？连个检讨也没有，这哪里还有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呢？这难道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吗？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党给了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的政策，有错误的同志应当接受这个政策，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起作用。坚持错误，于国于党，于民于己，都是无益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事情，不要企望一阵风过去之后就可以不了了之。有了错误，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能顶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先要把话说明白。

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整顿报刊，中央已有文件，要认真落实。从长远来说，还有个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要真正摆到各级党委和宣传理论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今天，我只着重讲两点，一是使正面教育深入人脑，二是继续教育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

二、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

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小平同志要我们开个会，组织写一些文章，为改革做好宣传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决定了党的宣传工作也必须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道理非常明白：改革，包括开放、搞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提出了改革，提出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现在连苏联都在改革。

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

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可是，在一部分干部中，却存在着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似乎一说改革开放，就可以不再注意四项基本原则；又似乎一说反自由化，改革开放就得“收”。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具体步骤上，有时某些方面加快一点，有时某些方面放慢一点，但从总体上说，无疑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根本不存在“收”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比如说：

——在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上，有的实际上认为现在经济形势很糟，是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搞乱了。

——对经济体制改革，有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的。有把厂长负责制看成是“取消党的领导”的。有把家庭联产承包看成是“破坏集体经济基础”的。还有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干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

——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小平同志讲了几次之后，这个问题澄清了。但仍然有把政治体制改革同否定党的领导划等号的。还有的对党政分开持怀疑态度，有的借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要求扩大政工机构，多设政工干部。一讲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也不敢说了。还有把正当的民主要求当成自由化的，甚至以此来压制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不正之风的正当批评。

——对开放也有一些议论，认为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有的把我们的对外政策歪曲成“过去东倒，现在西歪”。

当然，持以上观点的同志人数并不多，而且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改革是个新事物，有不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在改革的实践中，这些不同的认识是可以逐步趋于一致的。事实上，回想一下八年以来人们对改革的各种议论，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的认识都在提高，都在深化。但也不能不指出，尽管改革已进行了八年，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直到最近，也还有极个别的人说，“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现在反自由化，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有的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它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尽管这种论调只是极个别的，但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在宣传工作中也不能忽视。

前一段，为了解决当时的紧迫问题，较为集中地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必要的。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一切从事宣传、教育、理论、新闻工作的同志须知，排斥改革，实际上只能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同样，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只有牢

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才能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经济上的繁荣活跃互为条件，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要宣传这几年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发展。要宣传我们这几年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宣传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和稳定性。要宣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要宣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思想认识和承受能力。要宣传把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的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振兴的出路在于改革。

宣传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于写出多少文章（这一段报刊用于改革的篇幅并不算少），更重要的是用什么观点来分析问题。现在，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些同志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在经济理论工作中，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还相当严重，还束缚着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排除习惯势力的影响，打破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样，理论工作才能进步，才能指导实践。

不仅要宣传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十三大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应当为此做好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小平同志已同意今年“七一”重新发表他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学习，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个讲话和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上来。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同时要发表社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很敏感，要特别慎重，注意分寸，需要专门组织写几篇文章，供报刊刊用。

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的思

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关于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能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做理论工作，一定要学习、研究、领会、宣传八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新发展，这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努力，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一定要深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宣传，两点必须并重，不能偏废。具体办法，由中央宣传部研究，拿出方案来。

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一月至五月

一、为什么要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

一次在小平同志那里谈到，我们离十三大只有几个月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现在正在写，这个报告的基调，只能是一个改革的报告，不能是其他的报告，只能这样子，也必须这样子。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需要为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作一些必要的舆论准备。如果我们宣传的调子不注意衔接，宣传改革的气氛不那么浓厚，十三大报告拿出来时人们就感觉突然。因此，现在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改革，而且都提得很高，我们也认为这是应当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中国的改革在世界上引人注目，大家都在看中国怎么办。我们去年发生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组织一些文章，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这无疑都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不要因此就影响到我们对改革的宣传。因此，小平同志要我找宣传、理论、新闻、党校方面的同志开个会，把改革的宣传问题布置一下。这是小平同志交代的主要的一件事，一个任务。这就是这次讲话的背景，本来是专讲改革的。但是，鉴于去年发生自由化泛滥，我们正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而且有些认识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仍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做为一个天平的两端，此抑彼长，此长彼抑；这边高了那边低，那边高了这边低，没有把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如果这一次只讲改革，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

误解。事实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除了原来布置的任务，需要继续落实、抓紧进行以外，根据这几个月的情况，也需要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也讲了一段，然后重点讲关于改革的宣传问题。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正面教育如何深入。我们有一些同志习惯于搞运动，感觉不够热闹，不过瘾，有些同志有这么个感觉，这当然是不对的。那么，在大气候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主要是把深入的问题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既不能仅仅满足于过去这一段做的事情，又要防止别出心裁，比如说，要扩大领域，搞到经济领域，现行政策等等。因此，就需要宣传、理论等方面把思想统一到正面教育上来。不然的话，深入也不知道怎么深入，又不能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搞法，这件事无形之中也就会不了了之了。当然，深入的问题恐怕不会一下子就完全能够解决，这是个很长期的问题。

改革的宣传问题，是我讲话的重点，也是小平同志交代的。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改革的理论太落后于实践了。中国改革的步子不能算慢，但是理论、思想指导太落后于形势，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有一些相当旧的观点。经济理论方面一些陈旧的、僵化的、过时的观点，在我们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还相当地凝固。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么一种现象，广大基层的工作同志都知道怎样做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经济的振兴。但是，他们始终心里不够踏实。明明是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甚至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心里也始终不够踏实。这就是说，在理论上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使他们更加放心。一般来讲，我们这么大的一场改革，一开始就应该在理论战线破除一些旧东西，但破得很不够。过去，我们因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怎么搞，所以一直比较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实际行动上，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是对的，但是理论上造舆论不够。这一次反对自由化，问题就暴露得更清楚了，有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原来不讲话，一反自由化，他拿出的观点还是八年以前的旧观点。改革已搞了八年了，有一些人的观念还停止在八年以前原封未动。而且很多早已经过时的观点，苏联、东欧国家都已经抛弃的观点，

在我们这里竟然还有市场。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解决，不仅不能够推动改革前进，势必要起阻碍改革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理论工作方面，反僵化的问题，还很值得重视，不是说中国理论方面僵化的观点没有了。这个问题今天不展开讲，我只是提出这个任务，中国在理论上必须有所发展，不然的话，与我们这个大国、大党的地位不相称。但是，理论方面要想联系实际，进行大胆探索，回答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就非常必要。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我觉得各条战线都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坚持的问题，一个是改革的问题。不能只讲改革不讲坚持，也不能只讲坚持不讲改革。这个问题常常难以避免，但我们力求这一次把两者的关系讲得清楚一点。绝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看成天平的两端。如果看成是天平的两端，今天强调这一方面，以后势必会有一个时期又翻过来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经常存在这个问题，一讲坚持就忽略了改革。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党内进一步阐述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国治国之本；一是改革、开放、搞活，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两者缺一不可。有个别人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方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方法，只是“目”，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现在理论界有这个观点，这就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了。过去讲改革可以完全离开四个坚持；现在讲四个坚持了，好像改革、开放只是个方法，只是具体方针了，这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了根本错误的解释。我们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它必然是两个内容，没有改革、开放，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革极左路线口头上也在讲“四个坚持”，当然它达不到四个坚持的目的。

因此，不讲改革、开放不行。我们不是一般讲“社会主义的路线”，我们是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我们这条路线基本原则是四个坚持，总的方针、总的政策是改革，开放，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要提出来。只有一坚持，二改革，才能建立一个好的秩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包括政法战线。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纪要》时的讲话）

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时，有这样一种观点：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基本点看成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在我春节讲话后不久，就有人发起一次讨论会提出这种论点，其目的不外乎要贬低改革。打着四个坚持之旗帜，否定改革、开放之政策。就是要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向贬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所以文件中引话要注意。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我看就引到此为止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哪能说制定政策的基础不考虑改革，不根据改革？小平同志很明确地说，苏联改革要搞下去，对外政策势必要变。说明它的对外政策也得根据改革的发展来考虑嘛，要根据这个总的精神来看。如果把这些都孤立起来引来引去，不外乎就是有人要抓住所谓“之本”、“原则”，来否定改革，至少是贬低改革的意义。也可以说就是要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新的内容。这个苗头已经有了，我讲那一篇话（指五月十三日讲话）不是没有所感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整党总结时的讲话）

在我春节讲话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两个基本点之后，有人就不同意讲两个基本点，只同意讲一个基本点。我说，讲一个基本点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我们从来就是讲四个坚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哪里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也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说两个基本点提法不科学呀！那是借口，实际上就是要借反自由化把改革压得很低很低。没有改革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来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最初的稿子把四个坚持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写成两个东西，一个四个坚持，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即开放、改革。我提出意见，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也包括四个坚持在内的。现在一反自由化，又有人借反自由化贬低改革在我们国家的作用。我们一部分同志对改革缺乏热情，我不是说他有意反对，但缺乏热情。这是要走弯路的。所以在全面分析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不可讨论，怎么表述得更确切一些。但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借反自由化贬低改革、开放。照他们的提法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基本纲领，改革、开放是具体政策。不能这样说。改革只是具体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搞了八年岂不是白过了。有些事情现在下面非常敏感，下面搞了很多东西非常好，用这些办法经济就可以发展快，但是这些东西和传统的讲法不大适合，基层干部始终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摇摆、动摇。我在上海开了个厂长座谈会，大家一方面说这样好，一方面又怕变。他们比我们注意，天天看报纸上怎么提。这就说明我们理论上就事论事太多，破得不够。比如温州的情况，我也不主张讲什么“模式”，但是，温州这样做的结果使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反自由化以后在温州引起很大的震动，这就涉及几百万人的生活问题。改革问题，不仅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搞，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对改革的必要性更容易理解。苏联、捷克、保加利亚几十年应当说是平稳发展的，生产力有相当发展，人民生活有相当改善，他们现在都感到非改革不可，中国更应当思想解放一点吧！苏联的改革不像中国在人民中间这么有基础，戈尔巴乔夫经常讲人民中的因循守旧思想。我们过去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搞得饭都没得吃，还要什么因循守旧？城市人民也不那么因循守旧，二、三十年没有提高工资，房子越住越小。但在苏联是因循守旧的，他们还感觉到不改革不能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不要因为去年发生了一个自由化泛滥问题，而对我们整个八年来对“左”的遗毒的清除产生怀疑或放松。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绝不能影响了这条路线。总的来讲，我

们国家要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改革这么一条路线。当然，我们如不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改革就不可能为我们党所领导，就搞不下去，我认为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次捷克总理有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他们一九六八年的改革没有党的领导，当时杜布切克¹不行，为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所包围，改革要走到邪路上去。我认为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对自由化泛滥必须刹一下，风向变一变？因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都打着改革的旗帜，我们是要改革，他们是要把我们改革的方向引向邪路，所以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改革，不改革不行。所以反自由化绝不要使“左”的东西又滋长、复生。我认为自由化泛滥问题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进一步解决自由化问题就必须做为长期斗争，一个要靠教育，一个要靠工作。归根到底，如果人们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不能得到好处，生活的各方面不能得到改善，人们就不会拥护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们这种社会主义；也只有我们搞的这种社会主义提供的东西使人们切实得到好处，人们才会支持这种制度。这在我们国家是相当尖锐的问题，因为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确实给人们的好处还不是太多。当然这八年来给人们不少好处了，房子盖那么多，生活水平总的是提高了。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不要影响改革、开放前进。小平同志说，我们去年发生了风波现在扭转了，还有很多工作要继续做，但我们要逐步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到改革上来。归根到底，只有在改革、开放中间才能真正解决自由化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召集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邓力群等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

小平同志最近同捷克总理什特劳加尔²谈话很有新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小平同志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

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觉得这是很有新意的，很可以开窍的。总的讲，我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的标准很不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不重视，离开社会生产力，来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在我们党内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左”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与这个问题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怎么是社会主义呢？照马克思讲的，贫穷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但是后来我们理论上“左”的东西变成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的原则。按社会发展史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很落后，怎么能是社会主义？除了原始共产主义。所以，要使我们在贫穷的条件下，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必须带有若干的限制。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注意到我们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形式，目的是要很好地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这种制度终究站不住脚。这个话现在说不清楚，但是非常开窍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生产力的标准，可以制约很多“左”的东西，没有生产力的标准，“左”的东西就可以不受限制，推论下去，我们现在也可以搞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我们也是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只能说是初级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没有生产力的标准，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这就是主观随意性了，我要搞个什么制度就可以搞个什么制度，我要搞个社会主义，就可以搞个社会主义，我要搞个共产主义，就可以搞个共产主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召集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邓力群等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这段话（指小平同志同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小平同志自己改的话。原来记录得不完全，“真的搞社会主义”，后来他加了“了”，“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并且亲自加上了“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为什么要引小平同志这个话呢？我们要领会小平同志改革的思想，最近小平同志连续几次讲话，讲得相当深刻，他讲了够格不够格的问题，针对性很强，针对我们传统的理论。不应叫“传统”，应当说是后来附加的东西，

恐怕就是一些“左”的东西。好像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生产力的标志，就是一个公有制、分配。就是很穷、很穷，像尼雷尔他也说是社会主义，越搞越没有饭吃。几内亚杜尔说是搞社会主义，越搞越没有饭吃。其实我们过去那个搞法，后来极左那一套搞法，也就是这个搞法。本来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然的话，这种制度存在不下去，没有优越性。捷克总理讲，那就是没有吸引力。

社会主义要有吸引力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比较好讲，因为原来蒋介石³很糟糕，我们搞了几十年总比那时候好。这次捷克总理讲，过去奥匈帝国，真正的工业力量在捷克，既不在匈牙利，也不在奥地利，可是现在奥地利比他们高出一大截。什特劳加尔说，这有什么吸引力？我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能说比他们那个好呢？说不过去呀！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附加的问题太多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是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太多。马克思没有讲过，恩格斯也没有讲过，而我们附加了很多东西，并且把这些说成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属性。我觉得我们应当组织一些人好好清理一下，附加了哪些东西。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间附加的那就更多了。农村搞工业是资本主义，广东养鸭子是资本主义，说什么“鸭子吃掉了社会主义”。特别在经营管理方面，附加了很多根本不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包括计划经济怎么搞？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他有很多是战时经济的体制，我们把它作为计划经济的模式。什么都统制的经济一定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固有属性、固有特征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因为苏联建国以后，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面临的首先是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当然他就必须按照统的观点，也就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那个观点，拿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布置一切，还有什么一切。所以什么重工业、军事工业、什么高度集中、分配调拨，如果我们把这种制度就说成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希特勒岂不也成了社会主义，因为高度统制经济希特勒搞得最厉害。而且老实说，他这个计划的程度超过了苏联。同志们读过《第四帝国的崛起》吧，他有一个部长，那是真正物资分配专家。所有工厂材料调拨，都是他指挥的。哪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的数量，每天生产多少都由他指挥。他们的通讯、交通也发达，他是按照图表指挥的。

所以，到盟军占领德国以后不是出现混乱吗，又把这个人请出来，恢复鲁尔工业也是这个人来搞分配物资的，当然后来结束了这个统制经济。我们看过《阿信》，日本战时也是统制经济，也是配给制呀？东北被日本占领时期就是配给制，一个人几两高粱面、几两棒子面，也是统制经济。所以，我们如果把经济管理方面一些东西，很多战时经济的作法，对付帝国主义包围时的搞法，变成搞社会主义就得这个搞法，那就会大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主要就是讲我们对社会主义附加了很多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那个基本的定义。列宁曾经对此做过评价。我们中国要彻底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我看在经济建设方面最根本的原则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同西班牙工社党总书记谈话时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我们不能因为在思想理论战线一度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就认为我们主要的问题改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还是说这个话，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是根本不应当发生的，是可以避免的问题。现在我们态度一明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市场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当然，教育很重要。但是，基本上是一靠教育，二靠改革。没有改革是不行的。你没有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显示出来。反正就是两条：一条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坚定地改革。中国的改革绝不能降温。要说投鼠忌器，我们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说投自由化这个鼠，要切忌伤害改革这个器，要十分小心谨慎。

总之，第一是有一个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第二，改革、开放按照什么方向。从中国整个的改革来讲，我认为中国的阻力可能比苏联小。但是，决不可低估中国改革的阻力。老实说，我们的改革还刚刚开始，改革的路程远得很。改革过程中间，主要还是一个克服阻力的问题。而阻力

根本上是来源于习惯势力，来源于一些陈旧的观点。就是说，来自于“左”的东西。当然，我们随时都要注意排除在改革中间企图把改革拉向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一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对改革是一个很大的干扰。这个问题不能不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当泛滥的情况已经解决，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正如小平同志讲的，要照常进行下去。就还是首先要解决阻力的问题，同时要注意到排除干扰的问题。这样认识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绝不能那样看：就是自从去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以后，中国的主要倾向，我们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改变了。我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问题解决之后，还是要勇于改革，继续大胆地进行改革。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排除干扰。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提纲》时的讲话）

四、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问题

这场斗争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对我们的思想理论队伍的状况究竟应当怎么估计，这是我们今后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采取什么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对我们思想理论队伍怎么估计？看来大体上可以作这样的估计，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改变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和改变中国的四个坚持为己任的，我看还是极少数，这些人中有的恐怕很难教育过来了。第二种人，坚决反对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积极拥护过去“凡是”路线，拥护过去极左路线，尽管八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他闭起眼睛一概不看，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准备再干，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包括过去给林彪、“四人帮”写文章的人，大部分也不属于这种人，他当时是奉命写作的。第三种，现在能自觉地站到拥护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前列，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方法、武器，能研究、说明、解释我们国家新情况、新问题的，也不多。也就是延安时期毛主席讲的，中国如果有百把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加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有多少个真正能够站到中国国情这个土

地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积极热情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那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就大了，现在这样的同志实在太少。我相信，只要我们中央的指导思想正确，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一批同志出现，我们党有这个任务。要扩大这个队伍，要培养这个队伍。

在我们理论队伍中绝大多数，现在还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间，处在一个理论同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间。这些同志中间，我觉得这方面不足的人也是有的，那方面不足的人也是有的，都不是一贯正确。这方面不足，不外乎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认识不够，对新问题、新情况敏感不够，注意了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注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了解我们改革、开放、建设中的实际情况，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对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来说明一个两个问题。那方面不足，不外乎一部分理论工作同志虽然热心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并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们对严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太重视了。他懂得马克思讲过什么东西，但他对武器不太重视，或者想从世界其他地方找出什么新式武器，来解释我国目前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些同志探讨新问题的兴趣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注意我们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就够了，外国一些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有领导、有选择地加以吸收，洋为中用嘛。这两部分人占我们理论队伍的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好同志，现在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团结起来，互相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意见，吸收对方的长处，逐步消除鸿沟。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实现我们的新任务，认识我们的新情况，解决我们的新问题，那么我们中国的理论战线必将出现一个新局面。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实践是丰富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修养也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缺乏结合，或者是这样的结合不够，或者是那样的结合不够。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贯彻团结大多数的方针。不仅现在，而且今后也要这样。从事理论工作的，从事研究工作的，面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这么多新的问题，这么多新的情况，总的来说，还得允许探索，还得鼓励探索，还得鼓励提出新的见解，不如此，那就僵化，就不能进步了，我们改革出现的问题就始终

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概括，得到说明。我们有一些理论家搞来搞去最后跑到完全西化那一边去了，想拿西方的东西救中国，那是根本救不了的。另外一些同志越搞越固守到书本里面，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这两种情况都救不了中国，都不为中国所需要。大家都要提倡面向实际，理论修养不够的同志多读点马列主义，同时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要闭着眼睛去想美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英国怎么样。英国是英国，美国是美国，那里是那里，拿到中国不适用。你这个办法，在美国可以，摆到中国就不行。这一点，不是现在，一百多年了，这个路子走过了，走不通。另外，苏联那个路我们不能再走了，苏联他现在也不走了，不能走了。有了这么一条方针，我们这些同志同舟共济，很好地合作，发挥优点，互相求教，互相借鉴。正常的工作中间有一点争论，有一点不同的侧面，也有好处，也是允许的。探讨中间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外乎有的思想解放过头了，脱离了中国国情；也不外乎有的注意了根本的原则，但是对实际情况联系不够。不外乎这两方面嘛！思想解放过头了，思想解放还不够，这种情况会长期存在。甚至在某一个人身上有时都会存在两种状况。我就有这种情况，有时某一个问题的可能想得很天真，过头了；有时某一个问题的猛一听，就感到根本不行，那还能搞？过两天，想想，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搞。所以不要受外国人挑拨，划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很多都是认识上的问题嘛！特别是被奉为“开明派”的同志，不要自认为真正是开明派，那不一定。所以，同舟共济，互相补充很重要，我们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我们理论战线相当大一部分同志，引导到理论和中国建设改革丰富的实践相结合中去。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解决我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搞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符合这个要求的理论队伍为什么不能够出来呢？一是过去我们缺乏明确的观点去选择。选择是选择，用什么观点去选择？抱着自由化观点的人就去选择自由化的人；抱着理论僵化观点的人就选择思想僵化的人。当然，抱着正确观点的人就去选正确的人。反正什么人去

找什么人就是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脱颖而出的那些人才。他们写了一些文章，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大体上方向正确，而且有新意。这些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着重讲了一个培养理论队伍的问题。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又对改革、开放抱有热情的人。我为什么讲抱有热情？我不是说他对改革、开放马上就能回答什么问题，水平不高马上回答还回答不了，甚至还可能回答错了。但是他基本上立场正确，而又对改革、开放有热情，这些人就大有希望，就叫方向正确。毛主席过去讲过，我们中国人按一个人一个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可以把国民党打倒，关键就是我们方向正确。这一批人是大有希望的。现在我们真正要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我不认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就是要真正能统一这个思想，去物色、去发现这种人。首先是要理论队伍的组织者能够统一这个观点，各级党委理论队伍的组织者、各级宣传部门能真正本着这个观点去组织队伍。宣传部门如果是按照自由化的观点去组织队伍，也是可以组织起一批力量；“四人帮”也是可以组织一大批写作队伍，像“梁效”写作班子呀。我们现在如果还用那些早已陈旧了的理论家做基础，叫他去招兵买马，肯定招来一批对我们改革没有什么用的理论家。这些同志也很好，但是靠他解决问题是不行的，靠他没饭吃。这个话说的挖苦一点，也只能是在这个范围内讲。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讲，我看我们再过多少年，这支队伍还是要重新组织。一句话，真正按照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按照小平同志倡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含着大家智慧结晶的路线，去了解人，去衡量人，去组织队伍，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素质结构，然后才是年龄结构。现在来讲，第一位的不是年龄问题，第一位是挑选方向对头的人。在理论队伍中第一不是年龄，第一是方向搞对头，依靠他们就可以搞起个队伍。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整党总结时的讲话）

注释

1. 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 1921-1992), 生于斯洛伐克。1939年加入捷共, 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年9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9年12月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 1992年9月遇车祸身亡。

2. 什特劳加尔(Lubomír Štrougal, 1924-) 生于捷克州。时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总理。曾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 捷共中央书记, 政府副总理。

3.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 曾任黄埔军校校长, 北伐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 国民党总裁, 中华民国总统, 病逝于台北。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搞好智力开发^{*}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中央警卫团：

祝贺你们在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方面取得的好成绩。

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大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部队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在完成军政训练和保卫任务的前提下，积极搞好智力开发，组织广大指战员学科学、学文化、学习各种专业技术，不断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和科学文化素质，使重视知识、勤学上进在部队蔚然成风。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 这是赵紫阳祝贺中央警卫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取得好成绩的一封信。

在全国整党总结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对整党的估计。我完全同意薄老的分析。三年整党，取得了成绩。尽管有干扰，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现在整党告一段落，今后应转入经常的党的建设的工作。

第二点，今后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党的建设，任务很重，可以举出多少条，但归结起来是一条：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贯彻执行。

什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这两个基本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能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如果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必然得出排斥改革、否定开放、搞活的结论。能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如果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势必得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相反，丢掉自由化和僵化的观点，就必然得出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结论。无论缺了哪一条，都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路线，就必须不断地克服和排除自由化和僵化的影响和干扰。我们全党要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识别能力。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党的建设就必须保证这两个基本点。这应当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工作、纪律检查工作，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服务。这是一篇大文章，希望各级党委，各级组织、宣传、纪律检查部门，各级党校，认真做好这篇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大文章。如何围绕着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来进行党的建设，如何使我们党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前列，如何使我们党胜任愉快地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当然，不是这次会上就能系统地作出回答的，而是提出问题请大家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去努力。

第三点，就是如何在改革和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提高党的建设的水平。第二点讲的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问题；第三点讲的是党的建设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问题。

开放和不开放大不一样。封闭在温室里边做工作，比较容易，但温室里的花朵毕竟比较脆弱，不大容易经得起风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搞活，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的条件下去工作。所以，我在五月十三日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新的条件。经常有灰尘，就得经常扫地，但又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建设和改革都停下来去扫地。经常有腐蚀，经常拒腐蚀，而且应把拒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应该说，我们过去有搞运动的经验，但是，如何寓拒腐蚀于建设和改革之中，还知之不多。客观条件已经变了，不光是封闭变为开放，而且，许多改革已经出台或即将陆续出台，如党政分开，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改革人事制度，社会对话，社会监督，都将一一付诸实施，这都是我们做工作时必须考虑到的新环境、新条件，都要求我们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如何把整个建设和改革，同党的工作、党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民主监督、公开监督、

法制建设、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配起套来，综合治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搞好了，可以互为条件，走出一条不靠群众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来，这也需要大家去悉心探索。

第四点，谈谈干部工作。干部四化的方针是正确的。这几年，选拔年轻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休离休制度等等，成绩要充分肯定。回想一下，几年以前，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老化，在那种情况下，突出地提出干部年轻化，无疑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干部老化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当然，由于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也有缺点，如有一刀切的现象，对梯队配备注意不够，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的同时，有的对实际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重视不够。还有选拔干部的时候，有时只注意他本人优秀不优秀，忽视了在客观上有没有政绩。政绩的原则，应该是我们选拔领导干部的一个主要标志。还有对一些五十岁左右的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如何使之发挥作用，解决的也不够好。以上这些缺点，都需要克服。但不能因此而不充分肯定成绩。今后要继续抓紧领导班子的建设，既要注意稳定，加以充实、提高，也要作一些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同时注意保持稳定。总之，领导班子的建设，一定要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过去干部四化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坚持。今天不是改变这个方针的问题，而是要更好、更全面、更切实有效地执行这个方针。

关于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封信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为了做好经济法规的普及宣传，你们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讲授经济法课程，录制了教学片，这种办法很好。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搞好经济立法，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加强经济法包括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对于促使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在经济战线工作的同志，认真学习、掌握和执行经济法规，保障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发展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这一次我到东欧五国访问，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讲两个问题。

首先，东欧国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都希望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可能，如果要发展同东欧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发展恐怕不行。从现在我国外贸的格局来看，对日贸易在我们对外贸易总额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的外贸总额约六百亿美元，日本占了近一百四十亿美元。其次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苏联加上东欧所占的比例很小。另外，我们国家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出口有一定的限制，我们有很多东西出不去。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相当饱和了。但是，东欧也好，苏联也好，我们出口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如果想同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光出口，不进口，以此来弥补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贸易逆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是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对外经济问题上的必然反映。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百分之十四。将来我们国家恐怕也应当占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更多一点。东欧有些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当大。保加利亚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是通过外贸实现的。至于匈牙利那就更多了，约占百分之五十。捷克、民德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额还要扩大，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要扩大。作为方针来讲，我们的对外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第 342 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贸易的对象也要多样化。一是以日本、美国为一块；二是西欧为一块；恐怕另一头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还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我觉得对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恐怕不能再增加了，甚至还要逐步减少一点从日本的进口。因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使对日贸易平衡。我们与西欧的贸易比例是要扩大的，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现在还有一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占我们国家贸易的比例也要扩大。当然究竟能扩大多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如果说我们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的话，这就需要认真考虑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交往。鉴于我们的外汇长期紧缺，对外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有相当大的限制，所以我们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对我们来讲还是需要的。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我们向苏联、东欧国家出口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潜力。同时，鉴于我们外汇短缺的情况，将来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东西，应当更主要的是搞真正先进的技术，包括关键设备。当然，如果是借款，如世界银行贷款等，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说直接用我们国内的外汇，向西方国家进口，要主要进口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少用点外汇，可以减少我们的贸易逆差。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国内大量的技术改造项目，像一般工厂的技术改造，是不是应当更多地考虑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主要是引进一些关键性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你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找不到的。但是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设备，从总体来看，苏联和东欧国家比我们多数企业还是先进一些。很好的东西它没有，有些还不如我们现在的水平，因为它们封闭了许多年。捷克什特劳加尔访华时看到了一些地方，印象很深。回去以后真正成为“亲华派”了，天天讲中国怎么怎么好，甚至讲得有些过头。他在深圳不知看了一个什么电子工厂后说，他绝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先进的技术。他当着胡萨克¹的面讲，中国的电子工业非常先进，这些技术现在在东欧都没有。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在他那儿确实没有。但是传统工业的一些东西，它比我们先进。我认为这方面跟他们合作有很大的可能。所以我考虑我们大量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不是能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合作。通过这个合作来改造我们的企业，然后再把我们产品向东欧出口。虽然这样，他们的机械产品会向中国出的多一些。特别是一个民主德国，一个苏联，一个捷克，

至少这三个国家。另外波兰有些领域，保加利亚某些领域，匈牙利某些领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了。这个问题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几年来，从对西方开放以后，现在我们整个经济界，经济管理部门，包括企业，盲目地依赖西方的倾向非常严重。不管什么，只要是西方的就买。一说苏联、东欧国家的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一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外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工业基础的总体水平比较差，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有些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方针究竟怎么定，对哪些国家怎么搞，对哪些国家搞什么，应当认真地重新加以研究。具体讲，就是说哪一些我们可以从日本、美国进口，哪一些我们可以从欧洲、从苏联、东欧国家进口。这样，我们进口的路子就比较宽了。同时我们也应当研究我们能够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什么，哪一些能够向苏欧国家出口，这样我们的出口的路子也就比较宽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建立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之同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配合起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解放初期，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完全依靠苏联。近年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又完全跟西方发展经济联系。恐怕现在我们的对外经济战略也应当像外交战略一样，实行多元化的对外经济战略。不能够完全偏到西方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必要。这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在我国国内可是困难很大。即使方针定了以后，如果不系统地从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采取有效的办法，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现在从各单位来讲，都愿意同西方做生意。因为和西方做生意，可以到西方国家去看一看。如果到苏联，他们不大愿意去。现在东欧几个国家接受我们劳务出口，就是通过青工培训的形式，他们都愿意要，而且完全可以逐渐扩大，因为他们劳动力缺乏。我们的青年工人到他那儿去，他给我们训练人，同时使用我们的劳动力，这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他们的技术比我们高，等于帮助我们培训熟练工人。像民主德国，工厂管理很严格，这还是从原来德国的传统下来的。我专门见了我们在那里培训的青年，问他们在那儿干了半年以后的感受。他们讲，比我们的工厂厉害多了。但有一条，现在我们的青工都不愿意去那儿。因为到西方国家去挣点外汇就可以买彩电什么的，到东欧国家去没有。现在我们一些单位向东欧国家出口劳务，就向人家要外汇，结果没谈成。总之，我们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我们现在的确要从方针上、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解决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比如说，苏联、东欧国家与我们发展旅游的问题，我们长期也是没解决。原因是中国的旅游饭店不接受他们的游客。为什么不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外汇。当然，从旅游饭店来说也是有困难，因为他是借了外资办的。但是中国还有很多饭店不是借外资办的嘛。北京饭店就不是借外资办的，还有很多饭店也不是借外资办的。所以将来他们那里客人来，可以先到不是借外资办的旅游饭店里。如果这条路能打开，东欧国家那些人到别的国家旅游去不起，到中国可以旅游得起，他是很愿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条路一开，东欧国家加上苏联的游客会大量地到中国来旅游，我们可以增加一大批收入。

在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往来中，除了旅游之外，还有劳务出口的问题。劳动力在苏联和东欧比较缺乏，将来他们可能接受我们派青年到他那里进行培训。现在越南人在东欧国家有几十万。将来通过这种形式，对我们学习技术，青工培训还是很有利的。这一次我们铁道部有一部分人在民主德国的一个车辆厂进行青工培训。现在五个月过去了，效果很好。他们去了以后搞了五个月，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是知道了外国人生活好是干出来的，不是混出来的。这些青年人去了以后开始都吃不消，因为民主德国的劳动时间、劳动纪律、劳动质量检验制度比我们不知道严格多少，他们去了以后一开始都不行。当然与食物结构也有关系，吃不消。我专门问了带队的同志，究竟你们在民主德国劳动怎么样？他说，质量要求比我们严格多了，还有材料的节约。他说材料比中国不晓得节约多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现在都有决心回来搞个样版出来。

再一个问题，东欧几个国家非常明确，讲集约化，讲节约材料，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技术革命来节约原材料。在民主德国，它几年来基本上是材料不增加，能源不增加，每年保持3%的增长率。这值得我们学习。它的技术革命抓得很紧，他们上上下下的调子非常响，他们的特点是把改革和集约化、改革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他们吃了一个比较大的亏，就是经互会集团技术革命抓晚了，落后了。他们说没有估计到近一、二十年内，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步这么快，差距扩大了。所以现在他们把技术同改革联系得十分紧密。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保加利亚也好，民主德国更不用讲，都是如此。现在民德和联邦德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

个我们原来不知道。当然民德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搞好了，从联邦德国来讲，也是经济渗透，他们是有政治目的的。波兰也好，捷克也好，这次都在我们面前毫无顾虑地说，民德为什么经济发展好呢？就是因为联邦德国的帮助，他不说就是了。他们说，联邦德国大概一年给民德有二、三十亿马克的好处。包括贸易方面的照顾。保加利亚也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们比较注意同日本和联邦德国搞好经济合作。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²专门在车上问我与日本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问题。东欧国家也很重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技术。我看他们突出强调的一个是讲技术革命，一个是讲节约，节约材料。相应地，他们工厂的管理比我们的工厂好，恐怕比我们要高一个层次。所以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研究。通过承包制等多种形式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解决了以后，对工厂内部的管理水平还是要想办法提高。当然，如果没有解决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都躺在国家身上，它的内部管理也不可能搞好。这就是说，承包制搞好了，工厂管理水平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提高了，我们中国的工厂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从整体上来讲，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在同东欧国家的交往中间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就是把改革真正同效益，真正同推进技术革命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技术进步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虽然经常说，但并不落实。我们的科技革命的问题，技术进步的问题，也必须同我们各项改革的措施结合。所以，我们应当围绕着促进技术进步来制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当然也只能是逐渐的，要根据我们财力和可能承受的能力。但这个东西不能不及早抓。在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将有这个内容。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早抓，不认真抓，将来我们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相反还要扩大。的确有个中华民族将来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问题，搞不好将来就没有我们的地位了。现在经互会这方面的调子是非常高的，承认技术落后，狠抓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讲了。所以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将来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简单说，经济上的问题我就谈谈访问后有这么两点感觉，准备几个材料，然后国务院再去研究。

注释

1. 胡萨克(Gustáv Husák, 1913-1991), 生于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伐州, 时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曾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89年12月辞职, 后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1990年2月被开除。

2. 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1923-2014), 生于波兰卢布林省。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 大将军衔。曾任波军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 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90年被解职。

继续稳定物价 控制通货膨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五日

一、七月二日的讲话

物价局对今年以来涨价原因的分析是对的，提出的措施也是适宜的。去年物价调整对今年有“翘尾巴”影响，目前食品涨价主要是粮食问题；日用消费品涨价的原因是原材料涨价，而且产品又能卖出去。今年没有出台大的涨价项目，主要是市场自发涨价。市场物价上涨，工厂就要多发奖金，反过来又刺激物价上涨。现在看来既要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又要控制原材料的涨价，不能只抓中间，就物价论物价。

第一，对垄断性、紧缺性的商品涨价，如何制止，要制定出有效的办法，否则改革就会失败。监督管理要加强，依靠国家法律，加上群众的力量，不然的话，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第二，现在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互相转嫁涨价，这样做的结果，后果严重，不断地促使物价上涨。

第三，要研究价格与奖金的关系。涨价多了，企业为保护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设法多发奖金；多发奖金，刺激需求，又引起物价上涨。

第四，承包与监督的关系。承包以后，企业就会设法多搞钱，而涨价来钱最容易，所以必须堵住乱涨价的口子，没有监督措施不行。加上目前

* 这是赵紫阳 1987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5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讨论物价问题会议上的三次讲话。

法规还不健全，容易出现投机倒把。放开是对的，承包也是对的，但是要有监督措施。检查监督有利于促进宏观控制，限制承包以后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听说，现在有人倒卖锦纶丝袜，从国营商店买出来再卖高价，对这种行为要制止，对在农贸市场出售工业品超过国家规定价格的要取缔。

物价局认为，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供不应求。这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也不完全是供不应求的问题。改革当中要有限制和管理的措施，对消费基金要研究控制的办法。现在东欧各国主要是控制消费基金，因为他们的基建已经没有什么。南斯拉夫同志说，改革以后，群众收入增多了，消费基金膨胀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现在我们的不少工厂管理不严，松松垮垮，如何把劳动生产率搞上去，是个大问题。

对于消费基金，一要解决消费基金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二要克服平均主义。承包以后，怎样搞好消费基金的管理和控制，是个大问题。对先进企业怎么办，对落后企业怎么办，东欧各国改革一深入就碰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开始接触这个问题。最近，武汉派人到民德的工厂去，了解到外国人生活好是干出来的。民德的工厂劳动很紧张，我们有些工人去了吃不消。大家都说，中国工厂干活的节奏不行，民德工厂的劳动强度比我们高出一倍以上，他们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劳动得好，得到的好处就多。看来，工人的报酬要同劳动生产率拴在一起，劳动多的报酬多，劳动少的报酬低。我们的企业在承包以后，要解决劳动生产率与报酬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克服平均主义。企业税后还贷，有利于控制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对财政也有利。要逐步解决消费基金与劳动生产率挂钩的问题，逐步实现企业税后还贷。

必须加强监督，加强检查，监督检查要专业与群众相结合，要有强大的监督检查力量。在实行承包租赁以后，存在着某些商店降低服务质量、有些工厂偷工减料的问题，要有群众的监督。群众对涨价有意见，让涨价的部门来回答，如果说得清，群众会谅解；如果说不清，把价格降回去。加强管理和立法，是个长期的任务。东欧国家的法制很严格，我们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都比人家差。要制定一些办法，防止价格上涨，特别要防止垄断性的涨价。违反的要处分，严格监督检查，打击投机倒把。我们的方向是，既要放开搞活，又要加强监督。我们有党纪国法，应当管的事还

是必须管，党员乱涨价的要给予党纪处分。放任自流不得了。如果你涨我涨，大家一起涨，涨价后就多发奖金，这样循环下去真不得了。

稳定市场物价，除应急措施外，还要从根本上研究一下。当前，首先要把大城市的主要副食品价格稳住，宁可补贴一点。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农产品、副食品都有价格补贴，我们不补也不可能。同农民的关系，当然也要解决好。价格补贴是长期的，根据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多补一点或少补一点。副食品问题，实际上是粮食问题。要支持四川等主产区，给点议转平的粮食，给点补贴，多调点肉出来。总之，一是要贯彻稳定物价的救急措施，再是有关部门要好好研究一下长期的改革措施。东欧老百姓的生活好，但国家财政相当困难。匈牙利搞调节税、所得税，搞以增值税为中心的改革，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

要搞个界限，取缔暴利。一倒手就赚大钱，要取缔、限制。批发商店可以搞批发，零售商店不许搞批发、卖大户。要防止垄断，但不应否定承包。对生产资料要限价，反对垄断，加强监督。组织物价检查，要依靠群众。对于检举乱涨价的人，要给予奖励。为了加强监督检查力量，物价系统可以适当加点人。

二、七月二十日的讲话

现在对物价问题议论纷纷，特别是有些老同志担心物价出问题。因此，这件事情应提起我们注意。要不要以国务院负责同志名义发表公开的讲话，说明物价为什么上涨，政府的态度，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什么重大措施。

现在要坚决控制物价的不合理上涨，违反物价管理规定的人要惩治一批。要抓几个大单位、大户头，登报批评。

对投机倒把发财的人，已引起人们极大不满。“倒爷”已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现在看，对“倒爷”需要处理了。纯粹倒把的，从商店买出来转手就卖高价，这要禁止。有些紧缺的东西，就是不允许二道贩子插手。有些允许经营的，价格要严格管住。这种倒买倒卖的行为，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老百姓不满意的，生产这么多啤酒，但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北京啤酒都跑到外地去卖高价，然后进外地啤酒也是卖高价。这反映我们

主管部门信息不灵，缺乏有效措施和手段。这种现象应该管嘛，这同搞活没有矛盾嘛。凡是老百姓反映多的，政府应当直接干预。

现在改革的情况很好，唯一威胁是物价上涨。前几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我们出台了调价措施。今年我们没有出台什么调价措施，就涨开了。

现在一件事是物价上涨议论很多，第二是“倒爷”现象，对二道贩子大家意见很大。现在一些不合理的机会，造成很多人发大财，把改革的形象搞坏了。因此，政府应该发布公开制止滥涨价的告示，要指出这种滥涨价是破坏物价改革的行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企业承包以后，可能有些企业靠涨价获得高额利润。不要以为承包制搞下去就万事大吉，守法与违法是长期斗争。企业拼命赚钱就很容易走黑路，走黑路就坚决打击。对于那些搞活而走黑路的人不整，就不能鼓励人们去走正路而搞活。要立法，有法可依。要发表一个讲话出个安民告示，既要制止滥涨价，也要解决“倒爷”问题。政府公开发一个通告可以增加透明度，使群众了解物价问题，这也是政务公开。今后国家有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决策的事情，要交群众讨论。

此外，急需搞一个反垄断的措施。现在有些企业靠它垄断的地位提高价格。还要搞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组织，使消费者有说话的地方。现在部门基本上代表下属企业利益，不代表消费者利益。有一个代表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对话，不要什么都是政府出面。

下个决心，首先在北京整顿无证摊贩，搞他一个月，整顿市场以后不定期地突击检查。

我们现在说市场不发育，发育市场要加强市场管理。一方面搞活，一方面立规矩，加强管理，加强监督，二者不可偏废。

三、八月十五日的讲话

当前，乱涨价的问题很严重，群众街谈巷议，各方面反映较多。如果继续下去，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今后的改革，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要稳一下局势，刹一刹乱涨价之风。不稳一下，继续哄抬，物价上涨过多，引起群众不满，等到闹起来就得冻结物价，解冻以后，会涨得更多。

对今年物价上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但光这样简单地讲，还说不清问题，还要分析具体原因。今年的物价上涨有很多特点，有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问题。过去几年是国家调价的冲击波，带起了物价上涨，国家不主动调价，物价一般不上涨。今年情况不同，上半年我们在物价上没有什么动作，但是物价上涨的很厉害。我看，粮食涨价是带动物价上涨的很大因素，引起了肉、菜、蛋等副食品涨价。工业品涨价，有中间环节倒卖的问题。所以，对物价上涨只讲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还不够，除了解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问题之外，还要着重研究影响人民生活最大的食品价格问题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大城市要研究这个问题。

涨价原因，单纯就物价论物价是说不清楚的。从副食品讲，主要是从粮食来的。去年粮食市价上涨，必然影响今年副食品涨价。不少地方西瓜不少，价格也下不来，因为有个与粮食比价问题。有人说，宁肯不提工资，也不要涨价，这是办不到的。工人的生活要提高，农民的生活也要改善，而农业只靠劳动效率的提高，解决不了农民改善生活的需要，非涨点价弥补不可。要向群众讲清楚，粮价非提不可，农产品价格非涨不可，要发展工业，不支持农业不行。肉价不涨，国家每斤贴两角，当前是需要的，但不能持久，而且只能限于大城市。蛋也如此。北京蛋价低，外流就控制不住。

我们的价格相当一部分已放开，不是政府物价局能控制住的。放开的商品价格，也不要今天放，明天收，对其中的抬价问题，可作为投机倒把来干预。

对今年的零售物价水平，可能超过预计目标问题，可以讲三句话：对原定的控制目标不能松口，而且应继续要求大家积极按预定的目标去努力工作，控制物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稍一松口，就会涨得更多；各地情况不同，物价控制指标同年底的实际结果，不可能完全吻合，不会恰好不多不少，领导上对今年的物价要心中有数，现在就要开始研究，如果出现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原来的控制指标，如何向各方面说清楚。总之，要尽可能使人民群众对物价的反映少一些。

希望大城市从现在到明年春节做到：主要副食品和主要消费品不要缺货断档；价格不要暴涨，市场供应尽可能丰富一些。

蔬菜的价格补贴不要减少，国营菜场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少。从这两年放开菜价的情况看，放开了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比我们预料的难度要大得多。

关系人民生活的商品，如粮食、棉花，主要的生产资料，从中国的情况看，是否都要进入市场？值得考虑。看来还是要计划。既要有市场竞争机制，又要有干预措施。

为保持物价稳定，必须强化管理。我国市场发育还不健全。资本主义市场发育过程中，包括了健全管理措施。资本主义市场开始时也“无法无天”。我们要一方面搞活市场，一方面立规矩，加强监督管理，二者不可偏废。要找出管住与放活的比较好的结合点。

当前，有的人靠投机倒把、乱涨价发了大财，已引起人民不满。需要划清界限，进行处理。农产品远距离运销，有些是必要的。有的纯粹是投机倒把，内外勾结，紧俏商品卖大户，二道贩子卖高价。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紧俏产品要限制个体经营，如彩电、冰箱、自行车、毛线、啤酒、袜子等，不让小贩插手。对允许个体经营的，也要限制价格。

“倒爷”已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要引起注意。打击“倒爷”、整顿市场要首先从北京抓起，工商管理等部门要做好安排，武警部队要配合。清理无证商贩，搞好市场秩序。

要严禁乱涨价。乱涨价是破坏改革的行为。垄断性的行业涨价，承包企业涨价，你涨我也涨，这不行。承包后，守法、违法的斗争是长期的，监督是个大问题。管理与反管理的斗争不容忽视。物价检查是长期的任务。要号召群众监督。要抓紧案件处理。

明年的物价是继续稳定的方针，不是大调的方针。明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不超过百分之六，上半年看看票子和财政情况怎样，有些动作下半年再说，不要开年就涨价。

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正确的措施，但是避开价格改革，看来是不行的。承包后，价格可能不是向理顺的方向发展，很可能更趋扭曲。因此，在推行承包的同时，应考虑逐步把确实不合理的价格解决一下。同时，严格制止承包企业的涨价。

对农产品价格，明年还是采取微调的方针，以后几年做大的提高也不行。目前把粮食的生产收益用提价办法提到和经济作物、工副业收入一样

的水平，是难以办到的。如果把粮价提那么高，将来对整个经济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只能用征特产税的办法抵制某些农产品过高的收入。特产税收进来再补贴给种植业。

把粮价稳住，只作微调。粮价稳不住，吃的东西价格不稳定，会影响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棉花收购价格明年可以不动，再观察一下。农产品要以粮食价格为基点来考虑，如以其他经济作物和工副业的收入为基点，物价要起很大的变化，价格会抬得很高。

苧麻收购价格每斤三点五元，现在看还是高了，明年再降一些。

糖料提价不如采取价外补贴的办法好，影响小。国家拿四、五亿元，食糖价格可以暂时不动。

土地既然是生产资料，也就是商品，虽然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但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土地有转让、有市场，就要有价格，通过价格差别体现土地的质量。要研究一个既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在我们国家，要宣传什么叫奢侈品，要列出品种来。我们菜价敢动，奢侈品价格为什么不敢动？对电冰箱、空调器，要从价格上限制需求。严重供不应求的高档消费品，价格偏低，就会助长投机倒把。对严重供不应求的高档消费品，在调价上要勇敢点。不会因此推翻政府。巧克力糖价格是否便宜了？黄油等趁大家还没有普遍吃，把价格定高点。物价局要研究高档消费品价格的指导方针，要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限制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过多消费。

卷烟是中国的一大财源，要全面研究一下，要认真地当作一件事去搞。生产卷烟，技术、设备很简单，根本的是个利益关系问题，要协调好。卷烟划分销区的办法也要改，各方面支持一下。解决好这个问题，见效快，税收多。高级卷烟要通过提价限制消费。

名酒提价，不会有什么影响。

明年电价每度提价二分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这比现在各地五花八门的自行加价好。现在不少企业用电的电价实际上已经涨上去了，有的企业已经消化。正式提价，无非是企业增加负担不平衡。

民用电可以实行两种价格：规定用电限额，限额下的，即基本上不用家电的家庭，电价不提高；限额以上的，提价。这样，可以体现一个抑富扶贫的政策。凡是买不起电视、冰箱的家庭，电费不涨价。超额用电的家庭，超过用电的家庭，超过的部分，每度加二分。超过再多的多加价，甚至可以累进加价到几倍。这也是一种价格改革，是发展中国家也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价格改革，要提出这个原则，既要发展商品经济，也不要把一些保护低收入家庭的政策改掉了。群众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开，在这个过程中，价格政策要体现保护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要采取说提价一律都提价，说补贴一律都补贴的办法。

总的讲，明年物价不可能有新的方针，大体上还是今年的办法。因为，要把物价完全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在中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宜采取对物价一下子大幅度上调的做法，我们要做到在物价改革中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要明确地告诉群众，物价要涨一点，但是生活水平不会下降。我们不能给群众这样的信息：物价可以不涨，生活可以提高。这两个都要，是办不到的。从方针上讲：一是物价还要有所上涨；二是人民不会因物价上涨而生活降低。中国不存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形势。我们控制物价比他们容易。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从全社会讲，群众的收入增加幅度高于物价上涨，今年也是这个趋势。但是收入增加不平衡，苦乐不均，有的增加多，有的少，而且不合理，处理的办法也不好。

对于物价问题，除了讲明年怎么办之外，还要研究根本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问题上统一认识。例如，我们多年怕轮番涨价，农产品提了价，必然要影响工业品价格上涨，这个是否叫轮番涨价？要解放一点思想。对物价与工资挂钩的问题，是否我们顾虑多了一些。由于迟迟不拿出办法，各单位就“自谋出路”，钱也没有少花。

就联合国“五十亿人口日”发表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

朋友们：

今天已经有五十亿人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全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联合国发起的“五十亿人口日”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重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发展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坚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相协调，以求得迅速摆脱贫困状态，使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家庭富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建立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制定有关法规，制定人口发展计划，制定人口发展方针政策，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向广大育龄夫妇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社会性服务，加速科学技术研究，推动全社会和各有关部门关心和支持计划生育工作。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的。我们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了国强民富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自觉按照政策要求实行计划生育。实践证明，我国一方面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一方面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明显延长。这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管控制

我国人口增长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的总数控制在十二亿左右的要求是有希望达到的。

值得重视的是，世界人口增长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

人口的过快增长将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制定和执行适合自己国情的人口政策和计划是必要的。当然，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首先必须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应当承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妥善有效的人口政策，以及为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做的努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已经而且愿意继续同世界各国一起，为稳定世界人口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深信，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不断提高，依靠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正确有效地解决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计划体制改革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资体制，二是投资体制。最根本的还是物资体制。

沈阳电缆厂与沈阳冶炼厂只有一墙之隔，但电缆厂用的铜只有1%是沈冶供给的，其余99%是从外地运来的。这种计划有什么优越性？我们的计划能这么搞吗？指令性计划现在都在搞“三角阵”，请房维中同志研究解决一下。像这两个厂的问题，沈阳冶炼厂发多少吨货到沈阳电缆厂，开个收据。拿这个收据到国家计委、物资局报账，可减少周转环节，为什么就行不通？现在有一千多个大型企业，它们的计划内物资供应，能不能作一张大表。有些是企业之间愿意干的，上面行不通。只要上面愿意作这笔账，全国就可节省很多运力。

在物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前，供应的方法也可改一改。要研究一下，能不能不搞实物分配。石家庄放开钢材市场的办法，为什么在全国不能用？都是一样的办法，一样的道理，不只是一个城市用，全国都可用这个办法。我说的这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补贴的问题，你能分钢材就能分补贴嘛，有什么复杂的？这样做就把品种问题彻底解决了。补贴完后，你需要什么品种到市场上去买就是了。譬如说全国有多少计划调拨的钢材，统统都放到市场上去。分配就分钱，不分钢材了，大家都到市场上去买钢材。这对企业来说不就稍好一点吗？物资部门还是要从钢材厂拿钢材。对钢材来说

* 这是赵紫阳在发展企业集团和横向经济联合座谈会上的讲话。

它是两个渠道，一个上市，一个是交给物资部门。你物资部门分给哪个省，就把钱补给哪个省，分给哪个企业就把钱补贴哪个企业。这样品种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们对钢厂怎么办呢？统统按市场价折算。譬如说你这个钢厂，我给你调拨计划，矽钢片多少吨，什么钢材多少吨，到时候，你交了我什么东西，这个价钱都要折算一下。规定你这种价钱比较高的钢材要交多少吨，你不交，你交另外的钢材，也可以，我给你收下来，但是你同时要交我多少钱。内部分配的利益关系和价格问题是两个渠道，不要搞一个。不是实物形态，而是货币形态。你们对钢厂的钢材调拨都按市场价格结算，与用户的关系就是补现金，而不交实物。现金按市场价格结算。实物通过市场投放。你不是有品种、价格嘛。比如说，普钢 1600 元一吨，这是市场价，牌价是 700 元一吨，到时候你交我普通钢，我给你 700 元。你交我好的钢，交一种市场价是 2000 元的钢，你少交了一吨普通钢，多交了一吨优质钢，比如说是 2400 元，那我要补你多少呢？补你 400 元。因为那一个市场价 1600 元，这个市场价 2400 元。这样，钢厂就要算算账了。我把好钢材都留下，我卖了钱，最后还得交你。这里头的关系，就是说你按计划交货，如果是以次充好的话，同时要补贴，这个钱就可以从财政方面扣掉。这样你才能够按计划去分配。你首先要把跟企业的关系这一头搞清楚，由国家订货这一部分，都不得按市场价格算账。它交你什么东西，你给企业分配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关系是统统经过市场交易，这也是一种关系。

我认为，现在大中城市不能这么搞，问题在你物资局，而不在大中城市。你给各个部门分配的物资，都不给地方，这个账根本不在地方，你现在叫地方把物资放开，地方无法跟各部物资部门结算。将来你可以在几个大城市，把所有分配给各部门的物资统统扣掉它，跟各部门讲清楚，你在上海用的物资我包了，然后我再来办站。这样，联合的机构就可以办通了。因为它这个物资渠道有物资部门分的，有各部门分的，你叫上海来搞，而且是只拨少数钢材给他，他就不愿意搞，品种问题他也调剂不了。根本问题在物资局，而不在地方。因此，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全国打破城市这个框框，全国都搞；第二个方案就是到几个城市去搞，由国家部委带头到几个城市去搞，先搞三个市，由国家物资局和地方物资部门联合

起来搞。各部的物资都扣掉它。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个利益关系没有理顺，你必须理顺这里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得通。

能不能考虑把各级物资部门加强，把各部的物资权取消，搞生产资料批发公司，紧缺物资就由这个系统凭票供应，按照中央计划和地方计划发票，定量供应。我看，各部的这个权是非削弱不可。把各部的物资分配统统集中到生产资料商业系统，这样仓库肯定会少一些，中转环节少了，物资流通就加快了。要加强中心城市的物资贸易，你们再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是赞成把石家庄的办法和这个办法统一考虑。这样，到省、市设批发站就好办了，各部都不管了嘛。现在先抓钢材，钢材能搞得通，其它也好办了。

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时候，隆重召开了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英模代表和全军指战员致以节日慰问！

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我军建军的唯一宗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勋。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继续保持英雄本色，为反对侵略，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军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军队，不愧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愧是人民利益的英勇保卫者，不愧是光荣伟大的军队。

伟大的军队造就伟大的战士。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同志，是全军英模和先进集体的优秀代表。你们在保卫边境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在抢险救灾中舍身拼搏，在科研和教学中勇攀高峰，在教育训练中勤学苦练，在生产、施工、后勤保障中埋头苦干。你们的岗位各不相同，但在你们的身上同样闪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压倒一切困难的英

* 这是赵紫阳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雄气概。你们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楷模。

任何民族要振兴，社会要变革，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强大精神力量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推动历史前进。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创新事业，更需要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精神的作用。因为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困难的克服，都离不开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我们提倡勤劳致富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贬低先进分子的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种精神的发扬，正是实现共同富裕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我们鼓励搞活经济和尊重自主权，但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削弱严明的纪律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只有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守法制纪律的自觉性，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同志们，你们之所以是英雄、是模范，就因为你们用实际行动，率先体现了这种革命精神。中央军委表彰你们，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就是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全军、全社会去。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总方针，不能没有这种精神。在加快改革的今天，召开这个大会，提倡这种精神，意义就特别重大。

国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保障。我们要在全社会进行国防教育，使全体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关心、尊重和爱护人民子弟兵，从各个方面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要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团结和军民团结。

社会主义时代应当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同志们走在了前头，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光荣称号，为祖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迎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家计委要成为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

“七五”后三年计划体制改革，题目是好的，思路也对，但要深入一层。所提的意见，有了措施的就可以做了，没有措施的要进一步研究。有些问题要具体化。计委要好好务虚。

有一个大的问题，宏观调控措施应由谁负责，主管者是谁？现在计委说话不灵，大部分放在财经领导小组，但财经小组只是协调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不是系统地搞宏观管理。原来想成立财经办公室，后来成立经济调节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计委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你们应认真讨论。要敞开思想，“大鸣大放”，进行辩论，在十三大前拿出个具体方案来。过去传统的计委不能搞了，要下决心只管大的，不管小的，这就有个小的放给谁、大的怎么管的问题。一九八〇年我就讲计委应管大事，不要管小事。计委要成为管宏观经济的部门，必须掌握一定的手段，包括掌握经济参数、经济杠杆，势必银行、财政都到你那里。最近苏联搞一个经济委员会，由国家计委主席担任主席，财政部、物资供应委员会、物价委员会、科委、劳动部、统计局的第一把手参加，负责协调各部门在改革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解决改革进程中的问题。

宏观调控措施的提出、协调和执行，总要有一个部门来管。像现在这样临时性的协调，是不行的。国家调控要系统，要有调控数据、调控经验。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七五”后三年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意见》汇报后的讲话。

将来宏观调控是不是放在计委那里。现在的计委不是计划委员会，是计划部，委员都是部内委员，每个专业局都替专业部说话。你们那个机构就不是管大事的机构。计划体制要改革，计划机构性质、计划工作方法、计委内部机构设置、计划观念都要改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计划改革有了方案，计划机构、计划观念改变了，宏观控制职能才能交给计委。现在的计委，宏观控制职能不能交，交给你了，还要为你过去那一套服务。苏联成立经济委员会，协调改革中的问题。将来体改委搞调研、设计方案，实际的宏观调控和改革的实施方案交给计委。

建国初期的计委，不存在宏观协调问题，因为当时是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我曾讲过，整个体制改革就是改高度集中的体制。计委还是集中的那一套。我说过“改革在前进，计委在后退”。计委没法综合平衡，改革应当首先改革计划体制。计划改革，务虚还不够。你们不要等革你，应当研究怎么革，主动地积极地提出在新情况下计委成为什么机关，起什么作用，即计委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组织机构应当怎么改。前年指令性计划革了一大块以后，计委就不好过了，那确实是很大一个改革。现在的计委不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很难在宏观上发挥调节作用。要起作用，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归根结底，是解决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问题。现在直接控制少了，将来还要少。计委应当管整个经济的计划，不是只管直接计划的计委。

汇报中讲地区协作，改变调拨办法，要提出怎样才能体现这一方针。我曾说，上海与四川进行协作，进行横向交流就是最重要的计划。这个观念要解决。斯大林说过，城乡交流中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是商品交换。计划只能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计划就是商品交换的计划。就拿全民所有制来说，宝钢和四川一个县办的造纸厂，都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在层次上相差很大，这相当复杂。

像这样复杂的层次用什么办法联系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商品交换。中国现在的商品交换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存在，云南个别地方还以买卖为耻。国家计划如何引导市场、组织市场、管理市场、调控市场是个大学问，但非这样做不可。

改革模式，首先要考虑计划模式。计划还要有，是宏观管理的方式。我倾向于搞个组织机构管宏观，就是计划委员会这个形式，有关管经济手段的部门、综合部门参加，把计划制定同运用经济参数、实现计划结合起来，一些问题就在这个层次上解决，解决不了的再提交国务院。

分层次管理是对的，但要具体化，搞实施细则。单列的省辖市也要算一层，也应写上。关于民用电价问题，我看可以实行两种价格。对家庭用电规定个限额，超过这个限额的加价，对超过很多的，电价可翻番。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这个办法，这是扶贫抑富。用一度电涨价，用一百度电也涨价，这不合理。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一点社会保障措施，就是保护低收入。把低收入的人稳定下来，有些商品提价也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不至于矛盾激化。现在说提价就都提，对贫困户没有照顾，这样不行。

关于反垄断、反封锁问题。能不能搞一个反垄断、反封锁法。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哪些能反，哪些暂时还不能反。应区别对待，笼统地提没有用，不加区别也不行。

搞稳一点 收紧一点*

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

一、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八八年计划安排总的思路是对的。赞成计委的精神，搞稳一点，收紧一点。原则上同意按这个思路去办。明年的货币、财政要从紧安排，基本建设要收紧，价格和工资要有一点办法，城市供应要有具体措施。

二、要压缩财政开支。估计明年企业承包会发挥作用，把货币、财政从紧，不会对明年的生产发展速度影响很大。财政部的同志要研究，除了经济建设支出，整个财政开支怎么能压下来。现在所有国家机关、群众团体都在搞公费旅游，招待所都成了旅游接待点。伙食费搞得很高，钱是从哪里来的？公费旅游，愈演愈烈，就没有办法解决？北京市反映，今年春节发实物是国家机关带的头。国家机关发实物，有的相当出格。各个部门都要查一查发了多少实物。各单位要限期自报，实物发了多少，钱发了多少，实报的出个账单就完了，对于以多报少的单位要追究责任。国务院追查这件事有好处，可以防止今年第四季度再发生这种事，国家机关就是不能搞这个。今天没有到会的单位，由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他们。

三、要改革信贷制度，促进企业压缩库存和改善经营管理。超储的钢材由物资部门强制收购能否落实，如果能落实，银行对超储的企业应停止贷款。关键是用什么价格来算账。如果允许库存钢材按市场价出售，每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计划安排汇报时关于 1988 年经济工作思路的讲话。

吨可赚八百元，可能会刺激企业继续增加库存。目前全国至少超储钢材一千万吨，要研究为什么超储那么多。现在钢材市场上，大路货有货有价无人买，又不愿降价，因为一降价就发生亏损。库存物资报损，财政、银行都不愿意负担，只好存在那里。现在流动资金制度问题很大，机制不灵。要运用信贷进行宏观控制，信贷制度必须改革。要核定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超过的银行就减少贷款。对经营不好的或流动资金使用不合理的企业，可以拒绝贷款，这个权交给银行。当然银行工作要改进。促使企业提高效益，可以从流动资金做起，这比笼统地抽紧银根好。现在银行搞压缩流动资金，是运动式的。今年又放松了，对乡镇企业贷款是要多少给多少。最近林重庚说：你们抽紧银根很有效，现在为什么又放松了。银行信贷方面，基本建设贷款就是一定的额度，主要是流动资金贷款问题。现在企业向银行贷款很容易，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今后对仓库损失定个基数，由企业自负盈亏，承包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承包不仅要承包产量和税利，而且要承包资金、库存和还贷。处理得好的，利益归企业；处理得不好的，由企业自己补亏。这方面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压缩库存。

四、要压建设总规模。重点建设、技术改造都要缩小一点。现在的建设总规模仍然偏大，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看不到在压缩规模。这是造成经济紧张的根本原因。

五、对今年物价上涨要认真进行分析。前几年物价上涨是国家调价带来的，今年物价上涨有很多特点，国家基本上没有调价，而物价上涨了。物价和票子有关系，但有时少发了，物价也上涨，有时多发了，物价又没涨。今年物价上涨，主要是粮价上涨带来猪肉、蔬菜价格上涨。粮价上涨又是什么问题，除了歉收以外，还有没有措施上的问题？作为物价方针，已很明确，明年不可能有多少新的方针。物价每年总得涨一点，完全不动物价做不到，因为价格还要调整。当然中国的物价不宜上升很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在物价上升的情况下，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不能降低。从整个社会来讲，这几年群众总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问题是苦乐不均，有的降低了。中国不存在匈牙利、波兰那种情况，他们过去生活提得太高了，今天通过涨价往下降。我们不是这种情况。明年物价要上升一些，人民生活也还是要提高的，不能因物价上涨而影响生活。物价

上涨，工资问题怎么解决，要找一条出路。今年物价上涨，不仅是总供给、总需求问题。人们对物价最敏感的是菜篮子，物价平均上升百分之六，一到菜篮子就是百分之十以上。总的要控制需求，但还应该着重研究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物价指数。工业品涨价，很大一部分是商店把商品卖给小贩，小贩去涨价。化肥也是这种情况。要采取措施，稳定人民生活，特别是大城市职工的生活。

六、工资要有个章法。工资方面，除存在消费膨胀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没个章法，钱没少花，问题没解决。今后工厂企业就是搞计件工资，劳动生产率高的工资就高，搞计件就不再搞奖金。如果确定了这一条，剩下的就是如何完善定额问题。现在实行奖金税，规定三个月以上征税，效益差的企业也想办法发三个月奖金，这不如计件合理。如果物价上涨率平均每年在两位数以下，工厂企业就靠计件来补偿。国家机关工资也得搞个办法，不一定年年变，总之是步步高。我们不敢采取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办法，至少得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没有个具体办法，最后是由各单位自谋出路，钱并没少花。

七、钢厂要按需生产，大路货钢材要降价出售。究竟库存钢材是些什么品种？如果企业继续生产大路货，钢材库存积压问题就解决不了。库存的大路货钢材要降价，扩大销路，大路货钢材的销路不解决，库存压不下来。前两年“盘条”钢紧张，一放开问题就解决了。当然，要增加薄板的生产能力并不容易，得搞建设。解决钢材库存问题要专门开会，研究到底超储原因是什么，从哪里着手解决。市场多余的品种，钢铁企业就可以少生产甚至不生产。

八、明年的有些工作要从今年后四个月就抓起。控制基本建设，控制信贷，控制财政支出，现在就要采取措施。还要考虑第四季度会出现什么问题。已经提出的政策措施，第四季度就要体现出来。

在改革中加强对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这个材料建议印发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志一阅。其中提到的许多国营企业团体不执行国家政策的问题，确实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大问题。能否保证改革、开放不出现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因此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对部门、地方、企业团体执行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督。请纪云同志就此问题找一些同志议一下，提出办法，由国务院讨论一次。

* 这是赵紫阳就路透社记者谈驻京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对某些国营企业不执行国家政策感到惊讶所作的批语。

立足国情 面向未来

制定我国长远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一

在分析我们国家的情况和问题时，思想要解放一些。过去我们一讲矛盾就说人口多，建设和消费是很大的矛盾，基本矛盾是不是就是人口多？从全国来说消费量是很大，但人均消费基数很低，工资很低，这应该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中国建设和消费的矛盾原因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因为人口多、消费基数大？从现实情况看，恰恰是人口少的地区更困难，人口多的地方并不一定很困难，像温州地区、珠江三角洲并不困难嘛。按省讲，浙江每平方公里人口最多，但浙江并不困难；西北人口少，不是很困难吗？当然，我并不主张人口多，我是要大家分析一下，真正的矛盾是不是就在于人口多。我们常说中国人口多，人口多是因为国家大的关系嘛，如果把我国国家分成 20 个国家，人口不就少了？那样是不是就会好了？说人口多道理上总不那么讲得过去。人口多是从北京这里说，全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加在一起有 12 亿，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大嘛。要按人口密度说，中国并不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很大，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也很大，荷兰人口密度也不比我们小。从我们自己说，按省分的话也不见得人口就很多。目前很多矛盾是中国发展阶段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益很差，我觉得我们过去没有着重从这方面来揭露矛盾。

* 这是赵紫阳在讨论 2000 年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仅仅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特别是说中国消费量大，这都是传统的看法，这么说中国落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中国的局面就无法改变了？归结到人口多，消费量大，这没有道理。如果只有三亿人，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建设浪费很大，同样消费和建设的矛盾仍难以解决。要是我们经济效益好的话，就是有 20 亿人也没有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人口总量的多少，而是人均经济效益如何。我们人口多，如果人均经济效益好，那么加在一起我们的效益就非常高，一个人能提高一块钱效益，全国就是 10 亿元。人口多、消费大，建设与消费的矛盾很难解决，这是传统的说法，我也常跟外国人这么说，听起来有道理，但是经不起分析。

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这与我们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系。当然，我们的效益还不是很差的，有些发展中国家搞了工业化反而更困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用农业来补贴工业的亏损，我们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现在有些国家不搞工业化日子还能过下去，一搞工业化，国营的都亏损，搞得老百姓更加困难，像非洲，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问题，有些工业化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造成更大的消耗。

我认为，我们分析问题时要破除一些框框，要研究一下这种说法是不是真正有道理，不要因为是多年的说法我们也就跟着说。要分析原因究竟在哪里。要说人口多是个大包袱，包袱究竟在哪里呢？我看就在于劳动生产率低，浪费大。要说中国人口多，吃粮食多，但是按人来说，一个人一年也就是吃 800 斤粮食，还是很低嘛。现在我们消费还是以人为单位消费的嘛，怎么能说消费基数大呢？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人口多，需要几千亿斤粮食，而是出在一个人平均只有 800 斤粮食，问题出在这儿，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一下。

另外，我认为对有利条件分析得太不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中国搞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优势是什么。我看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人预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变化。回忆一下，一九七九年时对一些问题的预计是什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情况没有预计到。在这次十三大报告里我将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们的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大缓解了，很多变化是过去不能想象的。包括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城乡有现在这样的繁荣景象吗？那时候我们拼了老命，把什么都拿出来搞了建设，有现在这么大规模吗？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建设规模好，就算是压掉30%，中国还是繁荣兴盛。压掉30%的建设规模，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更好了。这种形势是从哪里来的呢？靠政策。过去我看过一本书，作者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不决定于资源，不决定于人口，也不决定于是岛国还是内陆，根本决定于两条：一是人的素质，二是社会结构。我认为很有道理。世界上各类国家都有发展得快的，也都有发展得慢的；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有发展快的，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有发展快的；岛国有发展快的，内陆国家也有发展快的，像瑞士就完全是内陆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发展快的，像美国；但是世界上真正发展快的恰恰有许多是资源缺乏的国家，而且发展非常快。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优势，大家的注意力不要老集中在人口多上。要看到我们主要的劣势是人的素质和社会结构问题。中国的条件应该说不是很差的，我们的祖先找到这块地方不愿离开有它一定的道理。你们说人多消费量大，其实我们消费量小，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把所有人的消费加起来当然多了，1000人总比100人消费得多，100人总比10个人消费得多，这是个总量的问题。但是家难当不难当不决定于总量，而是决定于按人均所能供给的数量，富和穷也决定于这一点。要使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人思想为之一震，要解放一些，真正找到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过去的看法要研究一下是否科学，是否能够真正站得住。我们对自己的有利条件认识得还很少；我们应该从九年的发展中得到启发。我不赞成毫无根据地唱高调，但我们需要真正认识我们国家，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我总觉得我们过去的一些说法不科学。从我们自身分析也看得很清楚。分省来讲，人少的地方不一定好过，人多的地方不一定难过。当然，这么说不是提倡增加人口，而是分析问题究竟在哪里。

二

我们的工业化该怎么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好好回顾一下，中国工业产值达到了国民总产值的70%，可中国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工业效益太低。任何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必然同时减少农业人口，这就是富裕的表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唯独我们工业搞了那么多，农业人口却没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浪费太大，从建国开始，建设用了那么多钱，究竟提供的效益怎么样？我说中国建设和消费的矛盾不是人口多了，首先是建设搞得不好，没有提供必要的效益，把老百姓的钱拿来，铺了那么大摊子，结果没有提供什么效益。如果建设提供了效益，就应该是建设和消费的矛盾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把那么多钱拿来搞了无效劳动，这都是过去的问题了。主要还是结构的问题，钱拿来了，集中了资金，可没发挥作用。相当一部分钱等于拿了去打水漂了。建设搞了，但没有提供多少物质的东西，没有真正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也没有得到消费上的好处。这是问题的要害，是造成现在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极其尖锐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为什么矛盾尖锐？就是浪费，劳动生产率很低，造成建设资金困难，不仅资金困难，还使我们发展了工业却不能减少农业人口。工业多了，工业产值多了，农业人口还是不能减多少，效益低是主要原因。

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到二〇〇〇年还有十三年，还来得及研究。要有点新观念，新思维。什么是新思维？就是认真地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两种做法，应该给我们一些启发，很多问题应该使我们重新加以认识。过去广东汕头简直没有出路，按过去那样搞法，他们悲观极了。那里五十年代支部书记就带头绝育，就是怕人口增长。当然现在也要节育，可是现在汕头地区就充满信心，因为有门路了，就不觉得人口多了，反而外地人大量的到那里去，梅县地区有人就到汕头平原去。过去珠江三角洲的人口也是多，现在韶关的人口还大量到那里去，反而是人口少的地方到人口多的地方去谋生。当然中国是一个整体，沿海发达与后方支持有关系，但这恐怕只是一个因素，这说明并不是人口多了就不能发展。这件事可以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的做法是农村劳动力不准出来，还要城市劳动力下放，结果就那么一点地，劳动力都压在那里，劳动力多了并没有多生产东西，其它的又不让搞。我们现在总的讲还是就业的人太少了。有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主张这么搞，像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搞起来，马上就有大量的盲流人口进

城，这些盲流人口不管怎样还能在那里活下去，这说明城市里还能养活一些人，这些人不是靠偷盗，不是靠政府救济，像巴基斯坦卡拉奇，就有许多盲流人口。这些人由盲流睡大街，到盖一座小房子，然后就站住脚，就业了。墨西哥城这个过程最明显。这说明按我们现在的城市工业，还有些就业的机会，但由于人为地限制，能就业的没有就业，所以城市里物价居高不下。蔬菜那么贵，无外乎种得少，一些卖菜的不能进城。当然，还要想办法使城市秩序不乱，但这说明城镇还有一些就业机会没有开发。现在城市就业人员比过去多多了，北京市流动人口有多少？（答：120万）妇联搞的家庭服务员就有好多！这些人实际都在城市就业了。我觉得我们讲效益不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高效益就要搞大工厂，现在的效益高低不在于是大、是中还是小，不管是国营还是集体，效益高的都是有竞争机制的，有竞争机制者效益高，无竞争机制者效益低。我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国家的优势、劣势、优点、缺点、主要矛盾好好研究一下，一般的传统的说法经不住检验。

就像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耕地、水源、森林和某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严重地制约经济的发展”的说法，我们要分析。我们资源是不丰富，但就当前经济发展来说是不是就这么一个问题？苏联耕地很多，到现在他粮食没有过关；我国有的地区水源也不一定很缺乏，可是工业为什么上不去？有资源的地方也没有搞起来。我们煤炭资源丰富，可过去也是长期闹煤荒，后来我们把丰富的煤炭资源同丰富的劳动力一结合，煤就缓和了，从这里得到什么启发？我们不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但也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要再讲资源丰富，但也不能说今天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就是资源贫乏。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觉得经济上不去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资源问题，长期看，可能有资源的因素，但当前，资源还不是主要问题。要就资源来讲，西北地下资源还是未知数，谁知道资源怎样？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搞清楚了吗？资源丰富、人员稀少的地方经济很难搞，根本是人的问题。现在到一个地方认真搞得话，都会感到是领导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我这次到了额济纳旗，额济纳旗一万四千人，1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么大的地方，比浙江省面积还大，搞不上去，就是人的问题。

三

农业问题，是眼前的事，也是长远的事。只要把两条搞好了，还可以上一个台阶。一个是农用塑料薄膜，一个是复合肥料。长期看，还有科技进步、生物工程等，真正对目前生产有效的，是上面两个问题。农用薄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效，薄膜一盖，少浇一次水。印度粮食怎么过关的？就是一场“绿色革命”。中国粮食在六十年代上了一个台阶，就是矮化种植，也是“绿色革命”。我曾经说过，真正的“绿色革命”起源于中国，我们过去搞矮化，比菲律宾早。要下功夫搞复合肥，当然氮肥也要搞。复合肥要列入计划，坚韧不拔地采取些措施，把它搞上去。最好搞煤化工，用煤作原料。现在我们不讲具体项目要认真考虑一下复合肥的问题。本世纪靠得住的还是这个，生物工程十年之内难出个新品种。这次我到河西走廊访问农户，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有一个青年举着手喊“多给薄膜”，其他农民也跟着喊。投资一亩地原来是20元，现在40元他们也干。农业生产向这方面倾斜，粮食生产肯定会上个台阶。磷氨、硝酸磷氨都要上。用煤来搞氮肥便宜吗？（答：不便宜。）我们原来搞合成氨都是用煤的。要认真研究一下，本世纪能够有效的因素有这两个：一个复合肥，一个薄膜。不要一般说一说，要真正列入计划，从“七五”后三年开始抓，与民德或联邦德国长期合作，搞煤化工，搞合成氨，另外搞薄膜。下决心把它抓上去，肯定会见效。

除了政策之外，措施上要抓紧。有了薄膜，棉花种植面积会大大扩大。新疆这几年不错，调了36亿斤粮食出来。我在天水见到一个家庭工厂专收废薄膜，500元一吨，然后搞原料出售，每吨1300元，除了成本，每吨赚300元，这个人发大财了。中国把废旧原料的回收作为乡镇企业的一条出路，前途无量。“星火”计划可以把废料废品的研究利用包括在内，乡镇企业搞废料的再加工，给乡镇企业开辟一条路子，这样可以减少污染，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又是一条就业的路子。这就要发挥中国人多的特点，让人们来搞。这件事让国营搞成本就高，农民搞就可以发财，要把技术交给乡镇企业，让他们因地制宜，既节约资源，又解决就业问题，一举两得。

四

中国的能源主要是煤，因此，中国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当然也应尽量改变。要使以煤为主要燃料的情况下环境不过分恶化，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神（木）府（谷）的煤开采出来，沿海大城市都用神（木）府（谷）的煤，环境就可以大改变，因为它含硫很少，在1%以下，储量又很丰富。中国开发的天然气，要大部分用于工业原料，而不是烧掉，天然气化工比煤化工好。在能源结构上做大文章很困难，要研究如何减少煤的污染，这应成为到二〇〇〇年科研的一个重大课题。水煤浆还是有希望的，要研究燃烧技术，选择一些好的煤种，加以治理，减少大气污染，这比改变能源结构容易，投资要少。在煤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就真正立足我们自己的资源，包括将来出口、交换。充分、合理地利用煤，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问题。因为说到底，我们的资源优势，一个是有色金属，一个是煤。

五

关于突出抓好机械基础零部件和电子元器件、基础技术和基础工艺、基础原材料和基础机械的问题，这几年我们一讲机械工业就讲这些问题，但一直很难落实，是不是政策上有问题？任务是对的，要有一些政策来促进实现。凡是经常讲而又上不去的问题，凡是经济工作中急需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我们政策有问题。要认真加以解决。

六

关于推行住宅商品化问题，最近看了一个材料，我写了几句话送给陈俊生同志了。说北京有人转手买卖住宅居住权，发了大财，能有人出高价买房子，说明我们原来的售价太低了。对转价买卖居住权的不要马上干预，终究是件好事，不是坏事。全国其它城市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找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好事，北京有人经营房地产了。专业户有钱，我们直接卖给他，可以回笼一部分货币。将来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卖给发了大财的，一种是解决一般的住房户。

七

煤层气搞塑料是一个大事情。我国木材、钢材不够，天然气可能是丰富的，搞了煤层气就搞塑料，缓解木材、钢材的短缺，用地下木材代替地上木材。我们技术能突破，设备自造，投资也不一定很大。乙烯现在已经能生产 120 万吨了。煤层气搞塑料是个大事，应该作为一个大的方针。

八

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离开本地区劳务出口值得总结，现在看来，劳务出口在贫困地区是带头的东西。甘肃定西是 20 万人，也是这个地区培养人才、广开眼界、积累资金的一个好办法。劳动人事部应该有计划地在这方面进行投资、训练人员。这些地方劳动力多，应该出一些能干的建筑行业的包工头。贫困地区 4000 万人，2000 万劳动力，这 2000 万中出去 200 万劳动力就可以了，经济就会起变化。这是合理流动。

九

关于规模经济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个第三产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轻纺工业的问题，还有一个乡镇企业的问题，它造成了一种欣欣向荣、大家都有用武之地的局面。关于我们投资的重点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政策上要把这些问题的关系恰当地说清楚。比如说规模的问题，有一些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有一些规模大了反而不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争取有骨干，又有广泛性。没有面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充分就业，没有这些，我们就又走到老路上去了。

对这个问题看怎么个说法。我们这几年，虽然面上发展了，但是重点并没有削弱，按绝对值说，重点都加强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进一步加强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目前这种局面，支持轻工业、纺织工业、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商业，现在不加强重点没有后劲，但是加强重点绝不是孤立的。如果说这个不能搞，那个不能搞，过分地反对盲目性，我看不行。就是说，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总的方针里来讲，孤立地讲搞重工业、搞原材料工业、搞基础工业，恐怕是不行的，这不一定是我们的全面

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的关系你们要写得很清楚，不一定这样写，但精神应该是这样的。

计委在看法上总是看到他自己投资的那一块，他能调拨的那一块，老想讲他的那个东西，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如果这样，就会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杨培新有一个说法，他说你们又要搞重点建设了，一搞重点建设就该收了，这话当然不对，但是确实有一个拿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搞的问题。我们要维持这样的局面必须加强哪些东西，加强那些东西必须和什么东西相配合，采取一个较为全面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新的发展战略实际上没有影响基础设施，总的来讲，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在加快。它说明了一个关系，没有基础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重点工业的发展，但是没有重点工业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倾斜，也很难支持整个经济的繁荣。但是倾斜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倾斜的东西必须是大家来搞，大家来搞很重要。如果倾斜的东西只能国家来搞，或者只能由西部来搞东部不能搞，那是不行的。

十

关于我国的东西部关系，我们要提倡东西部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主要是由东西部自己来搞。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是符合我们的发展战略的，是符合整体利益的。过去我们无非是这样，就是从东边调消费品到西边来，从西边调原材料到东边去，但是由于通过国家无偿调拨，把两边的积极性都搞掉了。它虽然也是要解决东西部关系，但是它是通过调拨国家统收统支的办法，结果两边都没有积极性。现在东西部自己搞，都建立在自己需要的基础上，目前这种形势还在发展。比如说现在宁夏、甘肃都从东部吸收很多资金。这种流动是完全符合我们计划要求的，但是它不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调拨的形式出现的，是互利的形式，这样的关系更牢固。所以我这次在宁夏讲了一个观点，他们老问我“国家什么时候把重点转移到西部？”我说现在什么叫把重点转到西部？让国家转，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没有多大可能，主要就是要通过你们东西部交流，通过互利的形式来转。就是通过东部开发西部，通过西部供应东部，这样西部就不会讲什么我原材料不

给你、我自己要搞加工了，因为他需要东部的资金、技术。所以，我们国家将来要引导东部的资金向西部流动，要注意引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说，上海要到西部搞投资，那我国国家给你加一点钱，你出一点钱，西部自己愿意搞，三家来搞。我们国家的钱很少，要加强引导。比如说，我们国家要在西部搞一个什么项目，就请西部到东部、南部筹集资金去，组织一些资金，我国家再加上一块，这样三方联合，国家一块，当地一块，东部一块，资金、材料大家分。这样搞就减少了矛盾，这样做是增加计划性。尽可能少搞调拨，东部调给西部、西部调给东部，两家都不落好，两家都不买账。我们全国的大计划要建立在东西部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要在开放的基础上、在东西部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上来解决计划问题，这样就真正有了地方计划。我们要真正改变过去的那种计划方式，就是说，要改变那种你们要搞我就退出，我要搞你们就不要沾边，国家就是国家的、地方就是地方的、你们合作的就是你们合作的这种计划方式；现在我们要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策，我的钱就用在合理地推动联合上来，推动地区之间的合作上来，这样我们的计划作用就会加强。如果我们还是采取板块的办法，越搞我们计划的作用就会越减小。东西部关系我们要考虑，实际上现在是在发展，将来沿海必须要考虑他的原材料问题。我们有政策，另外还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引导，不是由自己来包办，而是用资金来引导。在计划工作中，现在价格问题没有解决就分材料，谁来投资谁分材料。所以计划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个办法，就是要建立在商品交换和地区交流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国家计划的作用就加强了。

十一

这个报告是专家讨论以后提出的，根据今天大家议的，再作进一步地修改，然后再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讨论一下，看这些提法怎么样。我想对二〇〇〇年的几件大事展望一下是有必要的，然后再组织讨论一下应怎么搞法，怎么才能实现的问题。

我总觉得这个报告里还缺点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发展战略，这里面还缺一个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很够。乡镇企业先都是家庭工业，搞起来以后再雇几个人，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这次我看了几个地方，有些问题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事情那么一搞就解决那么大的问题？这次我去看了宁夏西海固，那是个很穷的地方，它那里有一个村发了财，开始发的是树苗的财，有几个专业户，带头搞树苗，一家搞树苗发了财，带起全村搞树苗，全村都发了财。这两年树苗不行了，大家就又都去搞烧瓦，因为大家富了以后，还没有条件盖砖房，就先盖瓦房，结果烧瓦的赚了钱。第一个发财是发树苗财，第二个发财是发烧瓦的财，至于第三个是发什么财就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农民由穷到不穷，每个人增加十块钱，每个人都要增加一点消费，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市场，就会缺很多东西。它那个地方，只要有一台手扶拖拉机每年可以赚六千元钱，这说明运输的市场很大。他那个村有八十多部拖拉机，我就找了几个，他们烧砖瓦和运输都很赚钱，但是一到农忙就不干了，我问为什么农忙都不干了？他们说农忙庄稼没人收；我问为什么不雇人？他说也雇人，但是雇多了不行，雇多了要钱很多；我说你算账嘛，你搞运输一天可以赚二十元，雇工充其量八元钱，赚二十元钱开支八元钱不是很合算吗？你为什么不搞呢？他说那也合算，可是雇人麻烦，到哪里去雇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的。在农民生活改善了以后，可以增加很多就业的机会，增加很多收入的机会。我原来以为温州还有些特殊性，现在看来，这些发展快的地方都是向温州的方向发展，过上两年都是那个样子，都是那种方式，就是从农村个体户搞起，那些落后的地方都是从商业、运输开始，然后搞加工。像温州那个地方，有的是从搞钮扣开始，富了以后自己形成一个购买市场，然后发展别的；再富了以后就向外面的市场发展，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不懂商品经济的人都不明白，他到底是从哪里搞的那么多钱？实际上是他积累滚动发展起来的。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完全懂得。所以说是一活百活，人也聪明了，能人也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依托什么，特别是这么多人口怎么转上工业化，是个大问题，仅仅靠国家办些工厂就转上工业化是不行的。要走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商品经济发展了，什么都有了，有经商的，有服务行业，然后发展到工业。很多东西都有一个过程，都是先从商业变为工业，特别是中国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先搞运输。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加以帮助、引导，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缩短技术很差、资金积累很慢的过程。

现在下面谈问题都不一样了，我这次到甘肃谈问题，李子奇和贾志杰¹同志给我汇报工作，讲来讲去，他们落到一句话，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呢？就是有七十万人的傻呆占很大比例的地方，确实没有办法，其它的地方他们觉得都有办法。这就涉及一个本质的问题了，还是人的因素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注释

1. 贾志杰（1935—），吉林扶余人。时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后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湖北省委书记。

让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农村 商品经济中起带头作用*

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

今天主要是和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你们有些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没有见过面。现在送给你们一个称号叫做“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我们过去叫干部，什么“企业领导干部”，现在有个称号叫“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跟干部有什么不同？当然企业家也是干部，但是干部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可能是厂长，可能是经理，可能还是将来的董事长。但是董事长、经理、厂长不一定是企业家。不是说当厂长就是企业家。所以什么是企业家，还应当把它推敲一下。我想，“家”就是专家。什么是“企业家”？就是善于经营管理企业的专家。什么叫“农民企业家”？就是这些专家不是来自什么专门学校，也不是从大工厂派下来的，而是土生土长，从农村干部中成长起来的。我认为“企业家”这个称号是个很好的称号，光荣的称号，但不是所有的乡镇企业的厂长都是企业家，也不是所有的只要搞了工业的就是企业家，或只要搞了企业的就是企业家。所以，我们说他不是“官”，不是做官的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干部。当然，刚才说了，我们原来的厂长，原来的经理，也就是原来的干部，可以变为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也是干部。乡镇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但是干部不等于就是企业家。我想明确这一点很有好处。这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企业家，就必须是善于经营管理，经营管理企业有方的人，这样的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全国十位最佳农民企业家鲁冠球、肖水根、常宗林、禹作敏、区鉴泉、卢志民、李桂莲、武吉龙、周作亮、郭建民时的谈话。

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企业家，才能配得上这个“企业家”的称号。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现在我们要发展农村经济，要繁荣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迫切需要大批的农民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这样说，农民企业家的涌现，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没有大批的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农民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出来，所以能够涌现，就是由于繁荣了农村经济，是因为有了发展商品生产这样一个方针才应运而生的。如果没有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方针，没有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方针，那么这些企业家就出不来了。你们在座的二十年以前都不是企业家吧？都不可能是企业家。因为那时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是时势造英雄。有这么一个条件，有这么一个环境，就可以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做农村才能够富裕，农民怎么才能够富裕？就是必须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农民才能够富起来。你们刚才讲了很多例子，你看你们现在所有这些工厂的工人的工资都比城市的工人高，有一些比城里大学的副教授还高，我们大学的副教授平均约二百块钱。我们机关里边，司局长没有二百块，才一百多。所以要富的话，就得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什么呢？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可以搞。什么是第一产业，当然第一产业也包括农业中间某些企业，比如你办了养殖场，那也是一个企业吧。养殖场、养虾场、养牛场，这当然是企业了。另外就是采矿、挖煤、淘金，这都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是加工，农村以农业为原料的加工也好，以矿产为原料的加工也好，都是第二产业；还有第三产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开旅馆办旅游都是第三产业。为什么说搞一、二、三产业呢？因为各地条件不同，有些地方能搞第一产业，有些地方能搞第二产业，有些地方能搞第三产业。有些地方一、二、三产业都可以搞。在每一个产业里边，门类很多。第一产业有农业，有矿业，有畜牧业；采矿也有各种各样的，有挖煤的，有淘金的，有搞有色金属的，等等；第二产业就是加工，有轻工业，有重工业；第三产业也很多，运输、交通、商业、服务行业等。因为我们中国人口比较多，按人平均，不能说我们资源很丰富。但是现在我们农村里头，很多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很多

可以开发的资源没有开发。当然有些资源的开发是容易的，有些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那就先从容易的地方搞起，积累资金，然后再去开发，有个先后。总之，待开发的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的资源，或者没有合理开发的资源还很多，不是说中国农村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干了，一、二、三产业这个路子宽得很。

现在我们农村里头，出现了一种情况，叫“专业村”。一个村都是搞这种产品的。为什么出现专业村？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种资源，人们还不会利用，突然有两个能人发现了这个资源，他一搞发了财，赚了钱，其他家家户户都学着干，你干我也干，你怎么干我也怎么干，一个村都干这种东西。干起来以后，有了积累了，这一种资源可能又不行了，但他有了钱，然后就可以转移，看市场什么东西有出路他就搞什么。我这个意思是说，门路是很广的。当然不能照搬，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原来搞农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影响农业。我们中国农村这么多人，一个人只平均有两亩土地，如果都去搞两亩地，肯定富不了。你怎么能富？提高粮价也富不了，你能提高多少粮价？一块钱一斤，一亩地也不过是一千块。现在如果提高到每斤一块钱，城市里还吃得起呀？农村里猪也养不起。所以中国没有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农业转到一、二、三产业上去，农村经济难以活跃，农民也难以致富。

我们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农村相当多的劳动力，逐步地转到工业、商业、运输业，转到二、三产业上去。你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它富了，结果农业人口还占百分之七、八十。哪个国家只要很富，你去问他吧，他的农民就一定很少。农民少不一定粮食少，这就是你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农民富了，农村经济活跃了，一个人可以种一百个人的土地，搞农业这个人也富了。一个人种一百个人的地，和一个人种两亩地，你看不一样吧，你搞两亩怎么也富不了嘛。你要搞一百亩，像你们那个大邱庄就更厉害了，十六个人每人平均三百亩，他不就富起来了？就按他说的算吧，他的劳动生产率也相当高。所以在中国这是个历史任务。我们真正完成工业化，要包括这个含义。工业化只是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结果大量的人口还在农村种地，搞饭吃，还不行。过去毛主席有个话就是说“八亿人口搞饭吃”，这肯定是个贫穷的表现。搞来

搞去，你肚子还吃不饱，连买食用油的钱都没有，这怎么行？所以真正工业化，不能离开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应该是一个概念。而真正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使农村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有这个方针，鼓励支持农村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地由直接从事农业，转为从事其他行业，包括劳动力外流我们都赞成。在贫困的地方，当地一下子也不知道干什么，有些资源可以利用，他没有资金和技术去开发，他也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先搞劳务。比如说，在山东牟平现在从外边去了多少人呢？二千多人，一个人再养一个人就是四千人，等于四千人是你到你们那里谋生的。你那里（问禹作敏¹）有没有外来人呢？有三千人，等于六千人。他们搞上几年，就有了资本。有了资本了，他也有可能回到老家去，脑子也转变了。还有一个，关系也拉上了，就有了协作关系，等于培养能人。所以，我到了宁夏的西海固，这个地方非常困难，去年有十几万人出去到外地，原来都是没办法的。还有甘肃定西，二十万人出去搞。我是说，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不是要强调固定在那块土地上，把几万、几亿的劳动力固定在小片的土地上，要鼓励转到别的方面去，包括转到外地，只要有出路就好。浙江不是有好多人到外地去呀？温州人到外边做衣服，到外边修理什么东西，他们起了个很好的作用，外地都学会了。最近我到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县去，他们说原来是浙江人到那里去做衣服，现在他们当地人也学会做衣服了。我们有这个方针，也有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讲的，没有利用的可以利用，或者是已经利用的没有充分利用，或者利用的不大合理。尽管我们资源不是很丰富，但是没有利用、没有充分利用的，还有很多，有待利用。有了这个方针，也有这种可能。但是，究竟能不能利用呢？能不能搞起来呢？关键是有没有善于经营、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才。

农村有本事的人，在农村里原来是干部也好，原来不是干部也好，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人，善于支持这些人，鼓励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在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农村资源，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上，起个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先是带头搞起来，搞好，然后一带一大片。带头、骨干，引路的嘛，开创一条路子。就使我们原来农村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单纯的农业，转上农工商、建运服这么一条多种经营、商品经济的道路。为开创这个路，起个带头作用，引导的作用。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完成

这个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农民企业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方针、任务，这样一个条件下，已经有了农民企业家一批一批涌现和成长出来的这种空前有利的条件。这一些人出来以后，完全可以大有用武之地。要把农民企业家同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历史任务联系起来。

我们的农民企业家，现在多数经营集体的企业。也有一些是经营个体的企业，有些企业还比较大，将来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个体企业，实际上是私人企业，这都是允许的。经营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生产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在我们国家是允许的，是合法的，也是应当受到鼓励的。当然我们国家将来有些已不是一个家庭规模的个体企业，而实际上是一种私营企业，就是说他雇相当一些工人，是他自己的企业，那当然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我们也应当是允许的，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活跃农村经济，他同样起积极的作用。虽然他是私营企业，但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它同过去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企业不同，它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私营企业，当然只能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作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一部分私营企业，这种企业实际上也是起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些也不排斥，因为它这个经济不是孤立的，它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私营企业，企业家，他们的素质也不一样。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些企业家，他们很多人首先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想为我们国家现代化尽一份力量，这和过去资本家不一样。他们同工人的关系也不一样，现在这样一些私营企业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完全可以尊重工人主人翁的地位，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尊重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所以说这样一些企业家，我们完全能够使他们正确处理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就是守法经营，遵守法律，为国家多做贡献。他们把企业办好，向国家多提供税利，向社会多提供商品。当然他们合法的利益，合法的利润，个人的收入，我们要保证，这是合法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角度来处理他的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个守法经营，不逃避税收，有个正确地处理同工人的关系等等问题。刚才我讲的，完全

可以使我们国家出现这种私营企业的企业家，他能够尊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尊重工人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一方面国家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合法收入，另外我们也应当鼓励他们、推动他们能把更多的收入转向再投资，不要把自己所应得的利润统统消费掉。而他把利润转到投资，转到固定资产，实际上就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商品服务了。

当然，经营集体企业的企业家，或者个体的企业家，或者是股份制的企业家，也都有个如何对待国家，如何对待企业，如何对待职工，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如何对待自己，就是说，自己以什么样的境界，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经营企业，也有这么一个问题。经营私营企业，我想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同国家保证他的合法利益，保证他的合法收入，并不矛盾。我们国家是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你们最近开这个会，开得很不错，希望今后能够对全国各个地方的企业家起一个很大的鼓舞作用，使我们在农村有经营才能的人变为农民企业家。为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使农村富起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这个会应当并一定可以起这个作用。你们是最优的十个农民企业家，希望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实际行动，通过你们榜样的作用，使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更好地成长起来。

注释

1. 禹作敏(1930—1999)，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人。时任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曾任村党支部书记，获天津市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因犯窝藏、非法拘禁等罪被判刑。

关于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

一、关于海南省的机构问题

海南建省搞个什么样的机构，要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出发，应成为全国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党的十三大以后，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工作就要开始，海南是新建省，又要搞特区，机构设置要突破现有省、自治区的机构设置，也要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精干、有效一些。绝不能照搬现在的办法。一条要坚持党政分开，一条要坚持政企分开。机构要搞小一点，多搞些经济实体。可搞若干个开发公司，给它以较大的经营权力，政府不要干预。要搞小政府，大社会。王全国¹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很好的意见。贺光辉同志帮助研究一下。

二、关于撤销自治州问题

为了适应建立经济特区的需要，中央已决定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自治县，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一定要落实到县。自治州撤销后，通什市的房子不要随便占用。保亭县机关不要往通什市搬。市里有些房子可以做为旅游宾馆，有些可以办学校，也可以给科技人员住。通什市地处黎族聚居区，交通方便，气候好，可以发展为旅游城市。

* 这是赵紫阳与许士杰、梁湘等研究海南省筹备工作时的谈话。

三、关于海南的经济开发问题

海南建省后，经济开发要加快进行。原则上可以仿照现有经济特区的政策，有一些比现有经济特区还要放宽。

海南开发、建设要一块一块地搞，先搞几块。大块中也可以划分小块。先从沿海开始，不要全岛全面铺开。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发，都是先从边上开始的，如美国、加拿大都是从东到西发展的。这一边搞完再搞那一边。切忌全面开花，到处铺摊子。

搞开发公司，也要按几块分别来设立。开发公司可以是自己办的，也可以是中外合资办的，也可以是外资独资办的。开发公司一定要和政府分开，这要立法。我们开始搞经济特区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海南开发建设资金，主要靠外资。第一，主要靠吸引港澳投资；第二，要比现在特区的政策放得更宽一些。当然对国内其他省市到海南投资也要鼓励，但更多的是吸引外资，吸引港澳的资金。要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可以做房地产生意，首先是政府把土地收上来，级差地租归政府。这是海南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也要允许外商来经营房地产业。政府把土地收过来后，谁开发就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谁，期限可以长一些，比如三十年，五十年也可以。他开发好了，谁来建厂他再把使用权转让给谁。当然他自己建厂也可以。也允许他把使用权拿到外国银行抵押。大体上按照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办。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做好。

海南吸引外资，要有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优惠、更开放的政策，外资、外贸、外汇、关税等等，要通盘研究一下。要制定几项开放、搞活的基本原则，明年人大审议建省议案时，一起审议通过。国务院要搞一个海南省开放、搞活、实行特殊政策的条例，现在就着手搞。海南建省筹备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同时搞，然后综合起来，协调各有关部门意见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东西，经国务院批准，从明年开始实行。有些事现在就可以先试着办。

海南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这是个关键问题。建省筹备组要抓紧研究制定吸引大陆上更多的科技人才去的政策。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可以吸收一些。要盖一些房子，为科技人员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明年人大一通过海南开放、搞活的政策，可能愿去海南的人会多起来。

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调人去，一定要过滤，党政干部要尽量少从外地调人，主要是更多地吸引科技人员进去，参加开发、建设。

四、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问题

中央确定许士杰²、梁湘、姚文绪、孟庆平、王越丰³五位同志组成筹备组。许士杰为组长，梁湘为副组长。你们既要大胆工作，又要谨慎。要互相支持，互相尊重，要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开辟一条好的路子。

建省的筹备工作现在就开始进行，实际工作要抓紧开展，与外商也可以接洽。重大事情由筹备组决策。行政区党委、政府的工作在筹备组的领导下，照常运转。筹备组的日常工作姚文绪同志多管一些。筹备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国务院办的，由陈俊生同志负责联系。

注释

1. 王全国(1919-2015)，湖北襄阳人。时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广东省建委、计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湖北省委书记。

2. 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曾任澄海县委书记，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3. 王越丰(1930-1999)，海南琼中人，黎族。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成员。曾任白沙县委书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副书记、州长，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

尊敬的阿卜杜斯·萨拉姆¹先生，朋友们、同志们：

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三世界科学院是在萨拉姆先生等人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几年来，它为发展第三世界的科学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萨拉姆先生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国家召开。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在一起讨论科学发展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力量的发展壮大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九年来，中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国际科学界的支持，中外科技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将继续保持和发展这种合作。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科学界的著名学者、知名人士，他们关心第三世界科学的发展，共同参加讨论。我希望，这次大会不仅是一次在科学事业方面推动南南合作的大会，而且是一次促进南北合作的大会。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科学院建立以后，我们为朋友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得还不够。旧中国长期受人欺辱，经济上贫困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得了今天的发展，因而最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心情。即使将来中国发达了，也不会

忘记第三世界的朋友。我们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精神，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加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

我们将继续实行面向全世界的对外开放政策，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我衷心地希望，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科学界的朋友们，和我国科学界进一步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促进各国科学的发展，无疑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希望，这次大会为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注释

1. 阿卜杜斯·萨拉姆 (Mohammad Abdus Salam, 1926-1996), 巴基斯坦物理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3年创建第三世界科学院。

使创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润生、拓彬、岚清¹同志并纪云同志：

此件对农副产品出口的情况、分析和建议值得一看。前几年曾提出过沿海搞创汇农业，搞贸、工、农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似应作为整个农副产品出口的一个战略方针。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和国内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矛盾。实现这一方针，必须把促进换汇农业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规模经营)作为重大措施，使换汇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导。以农业为原料的制成品出口，也应按此方针进行。此事涉及外贸及农业整个布局，希望组织人共同探讨，提出实施方案。以上请酌。抄计委、财经小组。

注释

1. 李岚清(1932—)，江苏镇江人。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外经贸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我国农副产品出口的情况、问题和对策”一文的批语。

在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主席先生、各位议员、各位来宾：

在“世界五十亿人口日”的警钟敲过两个月后的今天，亚洲各国的议员们风尘仆仆，聚首北京，商讨人口和发展问题。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第二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国议员、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来宾、专家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各位议员先生，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而人口问题与这两者均有密切的联系。

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兴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人口问题解决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各国目前的社会发展，还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正确处理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代政治家议事日程上一项紧迫的重大的议题。

在世界人口问题上，亚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世界五十亿人口中，有二十八亿多生活在亚洲地区，几乎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近二十年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亚洲地区已成为世所公认的经济增长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的不少国家，推行控制人口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生育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还没有遏止，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也很繁重。亚洲人口很快就要达到三十亿，多数国家正面临着人口生育高峰。如不立即采取对策，这一地区的人口将更加膨胀，给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地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是亚洲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三十八年中，我国大陆人口由五点四亿增加到十点六亿，几乎翻了一番。在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上，养育着世界上近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使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从自己国情的实际出发，采取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与参加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不仅是为了我国的富强、民族的繁荣和家庭的幸福，而且会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人口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议员先生们，亚洲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对人类的发展曾经做出过光辉的贡献。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亚洲人口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亚洲各国政府、各国议会、民间团体和亚洲人民的共同努力。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的成立，促使更多亚洲国家的议员们认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加强了各国议员在人口和发展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愿意继续同亚洲各国和世界上其他关心人口问题的国家加强合作，继续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为稳定亚洲和世界人口，为亚洲和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

预祝大会成功！

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布罗考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改革的步子肯定会加快而决不会放慢

布罗考(以下简称布)问：赵总理，现在人们都估计，在将要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您将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我想问一下，十三大之后中国前进的步伐将会加速，还是放慢，还是跟现在一样？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答：十三大的主题是改革。会议将总结我国九年来改革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并且要指明今后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将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前进，改革的步子肯定会比现在快，而绝不会放慢。我们没有理由放慢，因为几年来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民得到了利益，人民衷心拥护改革。所以，改革不应该、也不会放慢。中国的发展只有靠改革，别无他路。如果中国不进步，不能较快地发展，地球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对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言行都要批评

布：邓小平主任曾说过，现在要依靠年轻一点的人来领导中国。邓主任曾批评一些僵化的思想。但是，当有人批评僵化思想，批评领导的某些政策时，党却对他们进行惩罚。这是为什么？

赵：我想，你讲的是我们今年春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知道，我们经常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改革开放，有一个按照什么方向去改革的问题。保守的、僵化的、不赞成改革开放的思想当然要批评。但是，对那种想把改革开放引向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也要批评，因为这都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不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保持安定团结，国家和社会就会动乱。如果天天动乱，连安定的条件都没有，你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发展？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取得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能否排除来自保守的、僵化的思想的干扰，同时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排除来自右的方面，就是要使改革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那种干扰。

中国青年对党的政策认识越来越清楚

布：总理先生，中国的年轻人过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近又看到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被镇压。你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在年轻人中的影响会削弱？

赵：这取决于我们党所奉行的政策能不能取得成果。今年春天，我们开始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青年中确实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我要告诉记者先生，从这半年多的变化看，青年人比刚开始时理解得深了些。伴随着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国青年将会越来越认识清楚，只有按照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排除保守僵化的倾向，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胜利。我对中国的青年是有充分信心的，正同我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充分信心一样。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但党员要遵守党规

布：请问，中国公民有哪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赵：中国的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规定。如果你有兴趣，可

以送你一本中国的宪法。当然，宪法的实施还需要制订很多具体的法律。我们这方面现在还有缺欠，就是还不够健全。我们近几年来正在做健全法制的工作。我们在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应该说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今后还将为此做出努力。政治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

布：请问，十三大以后，是否可能释放那些因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被关进监狱的人？

赵：据我所知，没有因这种情况而被捕或被关进监狱的人，没有因为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批评党的领导人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不存在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触犯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仅仅是批评了领导人，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事。

你大概听说过我们中国有一位方励之先生吧。

方励之教授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前几年，他一直在许多场合，包括在大学的讲台上，批评中国政府和党的政策，也涉及到中国的领导人。但是，他现在仍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从事科研工作。不久前，他出国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最近还接受了台湾来的两位记者的采访。他到现在也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继续是党员了。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仍然受到尊重，仍然在一定的岗位上发挥他的才能。这个例子是不是把你提的问题说明白了呢？

最近，我们有几个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了党籍，还有几个党员被劝退党。是不是美国有些人把这看成是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镇压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党员和公民不同。既然是一个政党，就会有它的党章和党纲。即便不叫党章、党纲，也会有它的规矩。既然参加了这个党，就要遵守这个党的党章、党纲，遵守党的规矩。如果一个党员本身又是作家、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将像对待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尊重他，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同时，他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又要求他遵守党纲、党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请他不要当党员。我想他有自由，有遵守或不遵守党纲、党章的自由；我们党也有自由，就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留在党内的自由。他们虽然离开了

党，但作为知识分子，依然会受到尊重，依然可以在一定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他们的才能。我想这不能叫镇压。

我们绝不去做不利于两伊和解的事情

布：总理，美国政府对向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感到非常担忧。中国是否向伊朗出售了蚕式导弹？

赵：我们多次声明过，中国没有向伊朗出售武器，自然也不会出售导弹。我们一直在为尽快结束两伊战争而努力，我们绝不做不利于两伊和解的事情。你知道，世界上军火市场很复杂，一个国家只要有钱，肯出好价钱，找到获得武器的渠道是不会有困难的。至于世界上哪个国家向伊朗出售的武器最多，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布：总理先生，我希望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的政策是不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但是伊朗有可能通过国际军火市场得到中国的蚕式导弹？

赵：这个我不敢保证。中国同不少国家有军品贸易。我并不相信有人所说的伊朗的导弹是中国制造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的反应，我们正在努力防止今后中国出口的武器通过别的途径转到两伊。

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

布：总理先生，中美十五年前发表了“上海公报”。中美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十五年后，你认为中美关系应该在哪些领域得到改善，你对中美关系的哪些问题感到担忧？

赵：自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发表以来，应该说，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近几年来，关系比较平静，在有些领域有发展。我们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得到发展。

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始终是个很大的阴影，

不知道哪一天会出什么事。我们希望中美双方共同遵守已经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有关原则，排除这个障碍，消除这个障碍，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还有一个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还在不断酝酿搞保护主义的贸易立法。另外，虽然美国对向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有所放松，但限制仍然很多。在这方面，也希望美国继续做出努力，使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方面，我们两国在有些问题上有共同点，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主张通过磋商增进了解，逐步扩大共同点，减少分歧。

中苏政治关系改善取决三大障碍消除

布：总理先生，有人说，中国同苏联就要改善关系了。您是否相信苏联人？

赵：应该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在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人员往来方面有了一些改善。我看，因为对双方都有好处，中苏关系今后在这些领域还会继续得到改善。另外，我们双方已经恢复了边界谈判。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但迄今，总的看来，进展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变化。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取决于其他，而取决于三大障碍¹能不能消除。

我们希望美苏双方改善关系减少对抗

布：看来，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比较热乎起来，您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赵：我们对美苏原则上达成中导协议是欢迎的。我们希望美苏改善关系。它们双方改善关系，减少对抗，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不担忧。

我们的政策是努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

布：总理先生，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导层没有妇女？

赵：我的印象是，中国各级干部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并不算特别小。当然，妇女在各级领导层中的人数所以比较少，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恐怕还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和文化条件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的政策是，在各级政府机构里努力选拔、培养妇女干部。

城市计划生育已有好的基础，困难在农村

布：赵总理，您最近说，在控制人口方面中国似乎打输了一仗。你们在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方面，是否还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赵：我不知道记者先生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没有说过中国计划生育失败了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是说过，中国将进入一个生育高峰，这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上讲的。我国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人口增长比较快。当时出生的人现在正在进入结婚生育期，所以，中国将出现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在我们的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人口增长率比较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计划生育的困难在农村，尤其是在比较偏僻的农村。那里还存在多胎、早婚、早育的问题。在那里，从根本上说，从长远说，是整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问题。

美国国会有人说，中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采取严厉措施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农民这么多，如果依靠强迫命令就能把计划生育搞起来，那简直是神话。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美国公众致以良好的祝愿，并祝你们主办的《中国电视周》节目取得成功。

注释

1.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70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阿富汗。这就是当时中国所说的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从1982年起，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

在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一起召开，这很好。把经济工作的部署同改革的部署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经验。同时，如何把经济发展同改革结合在一起，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也准备讲一讲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经济工作的部署，要考虑到改革的内容和改革的部署；改革的部署，也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工作的部署，两者相互结合，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这样，效果会好一些，也容易全面一些。我下面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方针问题

关于明年发展经济的方针、经济工作的一些重大措施和明年计划的安排，姚依林同志在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报告；关于明年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李铁映¹同志在会上也作了报告。这两个报告都讲得很好。最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讨论了明年的经济工作。总的认为，明年必须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并且要突出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要从紧，要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同时，要保持生产的稳定增长。对此，依林同志在报告中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明年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是，落实和完善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以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挖掘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在计划体制、物

资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方面，都要进行必要的配套改革。总的来讲，明年就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同志们讨论中间反映一些顾虑，集中起来有三点：第一，担心承受能力有问题，主要是讲省、市、自治区的承受能力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年出台的财政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的改革，都要加重地方的负担。地方能不能承受得了，主要是一个财力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要挖地方一块，投资体制改革要甩到地方一块，外贸体制改革要让地方代理一块。挖一块、甩一块、代理一块，都要地方拿钱，“三管齐下”，地方感觉承受不了。二是明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面比较多，步子也不小。再加上政治体制要改革，国家机关机构要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明年要换届。大家感到经济、政治任务都比较繁重，而且变动比较大，所以担心承受能力问题。第二，担心明年生产萎缩。财政从紧、信贷从紧后，担心会发生类似一九八六年上半年生产下降的问题。第三，担心地方负担加重后，势必要转嫁给企业，结果使企业也加重了负担，把正在搞活的企业搞死。这些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需要引起中央、国务院以及综合部门的注意。但是，我们认为，总的来讲，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当前各种条件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也有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是有条件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当然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和仔细考虑大家的意见，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地方承受不起，生产萎缩，或企业丧失活力的情况。这次会议讲的，还不算最后定。但我要打个招呼，看来计划和改革的盘子大的变动恐怕不可能，因为有很多方面制约着。大势已定，也只能如此了，大家要作好思想准备。这次会议定的盘子，同志们回去要向党委和政府汇报，认真研究落实，在思想上、工作上有个准备。我们也要认真研究同志们的意见，看哪些需要重新斟酌。等到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以后，准备把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后定案。

二、关于物价问题

物价问题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群

众对此反映很大。城市、农村，机关、事业单位，反映都比较强烈。农民主要是对化肥、农用薄膜等乱涨价反映大，城市居民主要是对副食品、蔬菜和一部分工业品涨价反映大。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今年的物价上涨与往年不同。往年物价上涨，主要是国家调价，进行价格的结构调整带来的。今年物价上涨，是在国家的调价措施基本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几年来没有过的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所以明年稳定经济，首先是要稳定物价。各种稳定经济的措施，要围绕稳定物价进行。改革也必须有利于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是稳定经济的重点。

今年物价为什么上涨这么多？原因大体有三个。一是票子发多了一些。前几年票子发得比较多，主要是为了适应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流通领域扩大而发生的。几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商品经济扩大了，货币流转速度放慢，货币需要量就要增加。因此，前几年票子多发，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当然也多了一些。但究竟多了多少，这个账也算不清楚。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一个月就发了100亿元，那是多了。去年下半年票子发放也偏松了一点，但总的看问题还不大。今年的情况就不同了。今年多发票子是在金融改革、拆借融资的步子加快，票子周转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发生的。据统计，今年资金拆借将达到500亿元。我们今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12%多一点，物价上涨6%多一些，而今年的货币发行却超过了这两者之和，将增长20%以上。显然票子发多了。再加上前几年有些多发的票子还没“消化”完。前几年，除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容纳了增发的货币和物价上涨“消化”了一部分外，还多下来一些票子。现在的情况同产品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的那几年，同银行没有进行改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不能再多发票子，今后要严格按照货币发行的规律去办。二是供给不足。今年物价上涨，是蔬菜和副食品带的头，大体上占物价上涨的60%。而副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上涨，带动了副食品价格上涨。蔬菜价格上涨，除了受粮食、生产资料涨价影响外，今年还受倒春寒影响。当然，蔬菜工作上也是有些问题的。从这几年的经验看，蔬菜有蔬菜的规律，用一般对待小商品的办法对待蔬菜是不行的，关键是抓好增加蔬菜的供应。三是掌握紧

俏的、重要物资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和国营企业哄抬物价，扰乱市场。这是个新的问题，从去年以来这点越来越看得清楚。今年物价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粮价上涨，一方面是粮食不足，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国营公司抬价抢购有很大关系，引起了“玉米大战”、“薯干大战”等。在钢材、有色金属和铁路运价等方面也发生过类似问题。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垄断性企业的行为，因为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很大。如果他们有越轨行为，干扰就非常大。许多地方反映农民根本买不到平价化肥。各地回去要认真查一查化肥渠道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货源中有一部分是高价，但统配、挂钩的化肥是平价，为什么化肥转到农民手里都成了高价？这说明中间盘剥太多。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就不能稳定。还有外贸部门收购哄抬物价，它也是垄断企业。湖南的苎麻价格就是外贸部门抢购抬起来的，还有兔毛也是这样。国际市场销售好的时候，兔毛抬到每斤八十元，现在降到二、三十元。豫东、皖北白薯干，去年抢购的价格比大米都贵，结果造成仓库大量积压。抬价抢购农产品，还给农民一个很不正确的信号，引导农民盲目扩大某种作物的面积；产品多起来以后，又来一个压价收购。这样，不仅扰乱了市场，而且对生产破坏极大。

对物价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第一，要控制票子的发行。第二，搞好工农业生产，增加蔬菜、副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供应。第三，坚决同垄断性企业扰乱市场、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这不是一般的党风不正问题，而是扰乱市场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查处，追究法律责任。

从长远看，今后稳定物价的方针也有三条：第一，一定要避免或基本避免通货膨胀，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当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长期实行紧缩政策，总搞紧缩不行。一个时期膨胀得多了一些，就必须紧缩一下，明年就要这样办。就是说，货币发行要适度，既不能搞通货膨胀，又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有步骤地进行物价改革。总的来讲，物价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不行。当然，明年物价不能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因为今年物价上涨，票子又发这么多，经济不太稳定，人心有点浮动。但从长期来讲，不搞物价改革不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这一关必须过。今后进行物价改革，总会有一部分价格上涨，但基本上是属于结构性的价格调整，与通货膨胀是两回事。当然，上涨幅度要控制，究竟控制到什么水平，是一个课题，要很好研究。第三，找出一种生活指数与工资挂钩的办法，物价上涨就相应给以补偿，使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降低。怎么挂法比较复杂，如果找不到一条出路，对物价改革牵制就太大。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因此群众特别敏感，领导上决心也不好下，一讲改革就感到物价非改不可，一考虑到群众承受能力又不敢出台。实行挂钩补偿的办法，就解决了这个矛盾。需要研究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只要物价是结构性改革，不是通货膨胀，同工资进行某种形式挂钩，是没有大的风险的。

当前，要采取措施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重点要放在对垄断行业和国营企业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上。要系统研究如何反对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和利用放开搞活以后的权力，依靠掌握的重要的紧俏的生产资料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行为。要制定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措施，要立法，严惩违法者。根据我国的情况，生产资料，特别是一些紧俏的重要生产资料，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不会是很短的时间，在这样一些领域如何搞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来，这种生产资料搞活同一般商品的搞活不能是一样的，对于重要的紧俏的生产资料，只能形成国家管理、领导下的生产资料市场。要按这个方向搞，而不能按一般自由议价那种市场的办法去搞。我们原来设想，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采取放和改相结合，计划外的放，计划内的改，使两个价格逐步接近。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大现实，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况。如果那些重要的紧俏的上游产品价格经常处在动荡之中，那么中游和下游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稳定。看来，在市场问题上，上游、中游、下游产品不应一个样。重要的生产资料将来恐怕还是可以实行两种价格，但两种价格都应置于国家的规定与参预之下，而不是一个计划价格，一个自由价格。具体说，就是一个是计划价格；一个是优待价格，即比较高的价格。至于高多少合适？这要看货源等方面的情况。总之，要使企业有利可图，有兴趣生产。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必须公开进入市场，只能在市场上成交。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将来都要通过市场成交，这才真正叫做有组织的市场。这里面可以分三种情况：第一种，

是国家规定价格，包括国家限价；第二种是最紧张的产品实行“发粮票”，或者是采取石家庄的办法；第三种是有一些确实是供求缓和的，可以议价。但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叫做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乱涨价、变相涨价和中间盘剥。

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对今年总的经济形势应该怎样看的问题。应当说，今年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不稳定因素，物价上涨较多，票子多发了一些。但判断形势，不能只看这些。不要一说涨价，就认为形势不好，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峻。从宏观上看，今年工农业生产都是好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2%以上，农业情况也比较好，粮食总产量估计接近八千亿斤，棉花、油料也获得丰收。今年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高水平，可超过300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都是增加的。估计年底外汇储备可达到25亿美元以上。我们的外汇结存一九八〇年还是负数，从一九八一年开始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三年增加到80多亿美元。以后两三年外汇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去年年底外汇结存剩下14.7亿美元，今年又开始回升。今后我们还要逐渐积累一些。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搞建设，不可能储备得太多。

从总体来讲，我们的问题终究是大好形势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当然，对目前出现的问题，不引起严重注意，不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是不对的。

三、关于控制货币投放问题

明年要实行从紧的信贷政策。由于今年的票子多发了一些，明年货币投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的水平，是合适的。如果明年经济增长8%，物价上涨6%，明年货币投放就应略低于14%。这种货币投放是与明年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相适应的。工作做得好，不应该对生产建设有大的影响。关键是银行工作要改进，要做好。第一，融资、拆借和储蓄还有很大潜力。这个工作搞好了，就不会发生一九八六年第一季度企业之间经济往来开白条、互相拖欠的情况。第二，一定要在信贷结构调整上下功夫。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行银行机制还不适应这一

要求，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改善信贷结构。应该贷的贷，不应该贷的不贷。坚决改变过去那种要放松时就一律放松，要收紧时就一律收紧的状况。银行信贷政策和信贷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关系极大。银行怎么搞，今年、明年一定要当作大问题，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切实改进。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定要压缩预算外投资，基本建设也好，技术改造也好，都要压计划外、预算外投资。在流动资金方面，要压缩积压物资和长线生产所占用的资金。明年的信贷工作要与生产建设和产品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促短线、压长线。长线要限产，流动资金要减少，对适销对路的产品则要支持。生产工作要抓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计委、经委都要抓调整，银行工作一定要跟上。这样，对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保证国内外市场所需产品的生产，提高经济效益，都有好处。总的来讲，要保预算内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保必需的流动资金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压缩预算外投资，压缩积压物资和长线产品生产占用的流动资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希望各地党委、政府帮助银行研究出办法。要改变过去那种你让我支持就多发票子，你不让我多发票子就一律紧缩的作法。

乡镇企业必须逐步地、有计划地发展，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方针。不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无法转移。没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没有农业的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经营，就没有现代化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面貌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所以，乡镇企业应当发展，但要稳步前进。这几年发展速度过高，每年增长30-40%。速度过高以后，不仅资金、电力、材料等方面承受不了，而且也不容易把经营管理搞好，把产品质量搞好。我们认为，今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从全国来说每年增长15-20%可能比较合适。这几年信贷一松，乡镇企业就高速发展；信贷一紧，乡镇企业就停步不前。这种状况不行，必须给它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条件。目前乡镇企业占用的资金过多，必须适当压缩和控制。

总之，只要做好了工作，实现货币投放略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的水平，生产也不会萎缩，而且经济效益肯定会有改善，适销对路产品就会增产，库存积压就会下降，长线产品、盲目生产也会改变，预算外投资也会减少。这样制约因素就会变成积极因素。

过去国家搞建设，资金主要靠财政，现在已经主要靠银行了，今后将越来越依靠银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此，今后建设工作能否搞得好的，能否顺利发展，银行工作抓得好不好，关系很大。

四、关于增加生产和改善供给问题

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从根本上来讲，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改善供给去解决。明年的工业生产速度，高了低了都不好。今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偏高，明年大体在 10% 左右比较适当，计划指标定的是 8%，大家努力去完成。明年在工业生产上要着重抓两条：一是落实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样很多问题都可解决，企业活了，效益和积极性就都有了。二是制止生产资料乱涨价。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事情就好办了。当然原材料供应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明年的生产还有一个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要促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限制和停产长线产品，这些都要下些功夫。明年财政、信贷要实行紧缩，要把这个限制因素变成促进因素，紧缩一下，促进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问题，除了大力抓好粮食生产以外，要注意搞好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这几年城市经常发生“菜篮子”问题，影响很大。我看，解决城市的蔬菜问题，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大路菜，一个是多样化。大路菜要保证供应，并且价格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实行多样化，把精菜、细菜放开，搞自由议价。看来，城市蔬菜采取完全放开的办法不行。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议一议，我们总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的。大路菜，看来基本上还是要实行计划生产，安排播种面积，进行等价交换，签订合同，保证上市，使大城市居民都能吃上大路菜。有了这一条，其他细菜、鲜菜、大棚菜价格高了，也有话讲了。收入多的家庭，大饭店，可以多吃细菜、鲜菜；低收入的人，主要吃大路菜。副食品生产，主要是粮食问题。现在猪肉紧张，我看这是暂时现象，估计明年下半年情况会逐步好转。国务院已下决心年内净进口 1000 万吨粮食，今年农业的情况也比较好。粮食情况长期可能是偏紧的，但只要安排得好，紧张的情况会逐步缓和下来。现在是暂时困难，忍受一下就是了。有的地方恢复了猪肉凭票供应，这也是暂时的，主要是

防止城市猪肉外流，不会又进入凭票时代，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粮食生产必须继续抓紧，千方百计争取有个好收成。明年一定要把化肥、农用薄膜、柴油、农药的供应搞好，把价格降下来，消除中间盘剥。这是关系工农联盟的问题，从上到下要把它当成个大事。农民对这件事意见太大了。现在农民所以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认为是不等价的交换。化肥、薄膜、柴油等乱涨价，问题主要是出在中间环节上，谁经手都想抓一把，形成“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今年发生的，要认真去检查，严重的要追查责任。明年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这种行为。

在外贸上，总的来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出口的大好形势。明年我看形势也会是好的。由于日元升值，台湾、南朝鲜、新加坡货币升值，给我们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出口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开拓市场都要抓紧，不要丢掉这个机会。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要抓好外贸出口工作。最近广东等地区搞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发展很快，这是一种好的形式，大有发展前途。沿海有条件的地方如何迎接这种新的形势，要很好研究，提出对策。

我们要增加出口，而某些产品国内市场又紧张。这样，国内、国外市场就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这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关于农副产品出口方针问题，统计局搞的一个材料写得很好。我们过去出口主要靠农副产品，大约占出口总额的23%。加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则占全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出口的农副产品大都是低档的东西，数量很大，创汇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多创汇就要多出口，多出口就同国内市场发生矛盾。这里就提出了农副产品的出口方针问题。农副产品出口，总的来说，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努力上档次，因此需要发展创汇农业。要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考虑，从外贸需要出发，来考虑加工，再考虑加工需要的农副产品原料。过去我说过搞“贸工农”，现在不少地方叫创汇农业。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质量、在花色品种和上档次上做文章，创汇也必然会多。在沿海地区这应作为整个农副产品出口的一个战略方针。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和国内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矛盾。实现这一方针必须把促进创汇农业的现代化作为重大措施，使创汇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

的先导。所谓现代农业，我看有两条，一条是搞规模经营，包括实行机械化；一条是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沿海地区要注意发展创汇农业，内地有些具备条件的城市，也可以搞。采取一切措施，多出口，多创汇。

五、关于控制建设规模问题

当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干扰因素：一是一些国营垄断性的行业和企业哄抬物价；二是预算外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控制建设规模的重点，是控制预算外投资的规模。这个问题年年讲，但年年解决不了。发展下去，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是预算外投资控制不了，继续膨胀，而必要的一些重点建设还继续搞，这样两者加在一起，就造成建设规模更加膨胀，超过了国力的可能，难以为继，最后有可能被迫进行大调整。二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压不下去，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只好压缩计划内的，伤筋动骨，结果重点建设规模越来越小，搞不下去。这样，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同加工工业的比例就越来越失调，没有后劲，最后有可能造成经济萎缩。现在，已经有这样一种苗头。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已是一种顽症，是稳定经济的一个主要威胁。这次，同志们反映了很多矛盾和困难。我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找到出路。全国要保重点建设，银行信贷要控制，矛盾如何解决？看来要从银行信贷结构上去研究这个问题。银行的资金中，应当从短期资金中转变一部分作为长期资金，用于支持重点建设，支持计划内的建设。这样，一则使重点建设资金有了保证，二则可对预算外建设进行釜底抽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重点建设、预算内建设压缩得越多，反而给预算外建设投资创造更加膨胀的条件。因此，可以考虑，今后国家要向银行发放建设债券。银行的资金包括存款，必须拿出一定的比例购买建设债券。当然，这里需要研究解决财政的贴息问题。过去也曾经考虑由银行向社会发行债券，但由于债券利息高，少发一点问题不大，发行多了势必与储蓄打架，竞相抬高利息。所以，根本的办法，是银行要购买债券。今后，基本建设要实行基金制，基金来源有两个：一是财政方面划出一部分财源作为基本建设基金；二是银行购买建设债券。请大

家再进一步研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就开始实行。

再有，现在城市建设摊子也太大，标准太高。从京、津、沪三大市一直到县城、集镇，建设规模都很大。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和适应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重视城市建设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摊子太大，要求太多，标准太高，互相攀比，搞形式主义。这是不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过去，在这方面补一补课是需要的，但像现在这样铺开大搞不行。要解决城市建设规模过大的问题，必须严禁摊派。国务院已发文件作了明确规定，立了规矩，就要执行。现在摊派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主要是检查不严，处理不力。“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个口号，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好多事可以发动人民去做，但是不能以此为借口来随便摊钱、摊物。所以，解决预算外建设摊子过大的问题，就是两条：第一，银行要购买建设债券，用于重点建设，减少用于一般加工工业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资金；第二，严禁城市搞摊派，适当缩小城市建设规模。

六、关于控制消费基金问题

在压缩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必须注意控制消费基金的膨胀和解决消费超前的问题。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工资奖金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前几年带有还账的性质，今后就必须注意控制了。消费基金膨胀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中很容易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必然要影响改革。不仅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最近，卡达尔²同志在匈牙利国会上有篇讲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自从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来，实际上一直在我们制度中存在着一种自然错误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先炫耀成果，规定发展年金、补贴，还实行免费教育，全民公费医疗，等等。其实我们尚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我们的许诺不能百分之百的兑现。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也是这方面的好例子。我们在进行各种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然后去执行。‘支出’部分我们总是能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收入’部分则不是这样。其后果是我们的消费和分配总是高于实际生产。多年来情况就是这样。看来，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薄弱点。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

去了。”他们这个教训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南斯拉夫所遇到的困难，匈牙利所遇到的困难，都与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这几年，我们年年注意控制消费基金，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办法。平均主义的办法，控制严了，生产消极；控制松了，财政吃不消。今后，我们基本上要推行计件工资、定额工资，推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等。这样有一些企业虽然工资奖金可能高一些，但这是效益高、劳动生产率高带来的。实行这种办法，可以避免平均主义，国家、企业、职工都从挖掘潜力，增加效益中得到好处，社会财富也会大大增加。

在消费基金里面，还有个消费结构的问题，有个高档消费品的供求平衡的问题。中国十亿人口，消费结构包括衣、食、住、行都应当有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国策，如果没有一个长远方针，再盲目搞下去，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持久的，也是行不通的。就拿啤酒来说，西方国家人们普遍喝。中国几年以前只有100万吨啤酒，现在已搞到600万吨，正在建设的还有300万吨。如果大家都喝啤酒，并由城市向农村扩展，那粮食消耗量就会大大增加。现在一年光啤酒消耗粮食就将近100万吨。还有，中国人以后都放开吃猪肉，那猪饲料的消耗也受不了。生活好了，大家穿衣服都穿纯羊毛织物，国家也受不了。中国的消费结构怎么改变，值得研究。虽然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但这个趋势值得注意。应当看到，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仿照西方的模式可能是一个趋势。但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人均只有800斤粮食，按照西方的消费模式，一个人就要有2000斤粮食。那怎么行呢？我国的食物结构、穿衣结构、住房结构，都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定了这么一个国策以后，还应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加以引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只能按照小康水平来设计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对高档消费品，要通过征消费税等方式加以限制。住房问题要好好研究，住房改革，实行房屋商品化，应当积极有步骤地进行。这对引导大家把钱用在住房建设上，改变消费早熟、消费超前的情况很有好处。

此外，还有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税收问题，要认真研究。在我国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是合法的，允许其发展，但对他们的收入必须用税收来调节。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我们

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调节政策。现在对一些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没有很好地执行税收政策。所以，大家不满意，感觉不大公道。这一方面是平均主义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现在确实出现了不公正，需要通过税收等经济杠杆加以调节。这也是合理的，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七、关于明年的改革部署问题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入，重点是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现在经委正在制定一个实行承包制的条例，征求大家意见，将来修改以后要颁发。我们要按这个条例，进一步地完善承包制，逐步使它制度化。实行承包经营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包括防止企业短期行为的问题，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承包经营者的待遇问题，经营者、经营集团同职工的关系问题等，我们要进一步解决。当然，不可能完全规范化，不一定是一种模式。但是，总是要逐步制度化。实行承包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明年生产能不能搞好，效益能不能上去，财政收入能不能增加，关键要看承包经营责任制能否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落实。我认为，明年是我们的企业通过承包制发挥效益的时候，将会把企业存在的巨大潜力挖出来。

物资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由各个条条管物资统一到一个物资管理委员会来管。当然，这首先是统配物资。只要有了这样一步，才能够进一步搞国家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市场；没有这一步，搞起来就非常困难。石家庄的经验为什么这样难推广，原因就在这里。这样做看来好像是更加集中，实际上更加集中是为了创造形成国家管理下的生产资料市场的条件。这个问题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有些顾虑。这一改革，我们的意见是坚定不移，而且要加快。为了稳妥起见，省这一级可以暂缓改，不忙动，中央各部先动。第一要坚决搞，第二步子要加快。所有你们反映的那些顾虑，只有通过加快改革才能解决。

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三个问题：基金制、投资公司、招标制。大家对投资公司的问题讲了不少意见。这个问题，看来需要好好研究。究竟投资

公司怎么搞，各种关系怎么搞，我看不外乎三种情况：弄清楚了，就坚决干；研究不那么清楚，明年可以先试点，在一两个领域，或者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省、市试点；现在投资公司还没有章法，其他的还按原来的部门先安排明年计划。

外贸体制改革，明年就是在三个行业试点，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这要坚决搞。面上，主要是完善承包，尽量减少补贴，控制换汇成本。另外，原来由国家统一进口的那部分物资要甩到地方一部分。这个问题，大家感到比较困难。我们也担心如甩得不恰当，会向企业转嫁负担，引起涨价。现在有两个“甩”：一个是原来由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中甩一部分给地方；一个是物资进口甩一部分给地方。看来，不甩给地方是不行的。甩多少，还要研究一下。

财政体制改革，一是把今年向地方借的钱，做为明年中央财政收入的基数。同时，要划分税收。这是个重大改革，势在必行。二是明年要继续开展“双增双节”运动，而且要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年第四季度的收入要抓紧，开支要压缩，不能等到明年；货币投放，今年第四季度也要从紧安排。

总的来看，十三大以后各项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明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新的形势下迈出重要一步，任务相当繁重，各地要切实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妥善安排，精心指导，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明年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搞得更好。

注释

1. 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曾任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兼海城县委书记，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卡达尔(Kádár János, 1912—1989)，生于今克罗地亚里耶卡市，1931年加入匈共。时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政府总理。曾任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 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今晚，我们在这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向全体劳动者和一切爱国人士，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来宾和驻华使节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以来，在深化企业改革和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农业呈现丰收年景，城乡市场日趋活跃。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充分挖掘潜力，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我们要把“双增双节”运动深入、持久、扎实地开展下去，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消费基金膨胀，千方百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年初以来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行之有效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排除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我们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教育继续引向深入。

当前，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奋战在各条战线上，争取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将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大会将对九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同时把群众普遍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议程。我们深信，这次大会必将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值得庆贺的是，继香港问题解决之后，澳门问题也通过谈判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并在此之前实现“三通”。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放宽到大陆探亲旅游的限制，这将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骨肉团聚的愿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我们反对军备竞赛，欢迎美苏达成销毁中程核武器的原则协议，希望它们认真做到，并继续大幅度裁减各类军备，以减少对各国安全的威胁。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各国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互利合作。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主张采用和平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我们将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边，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竭尽自己的努力。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周年，

为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干杯！

给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在中国记协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特致以热烈的祝贺！五十年来，中国记协和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希望你们进一步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搞好新闻改革，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充分发挥新闻工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坚持全面宣传两个基本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党政分开*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党政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

这次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十三大报告》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全会讨论两个文件之前，我想作几点说明。

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无例外地都提出要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看来，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在党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是搞得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撇开中央一级、地方各级的情况不说，至少在基层，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一直是搞行政首长负责制，企事业单位的党委则同我们的机关党委差不多，行使保证监督的职能。而我们，除了在解放初期，在东北和其它某些地区，曾经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实行过一段厂长负责制以外，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所以，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子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现在提出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党政分开，有中央、地方、基层等几个层次的内容。（1）党中央，要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即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方面实行领导，并向中央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应在执行党中央统一路线和国家统一政令的前提下，在本地区实行政治领导，具体规定了五条职责¹。（3）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打算有意识地推到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加考虑。（4）企业党委，一律起监督保证作用；事业单位的党委，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执行，逐步转变职能，起监督保证作用。看来，中央一级，困难不大。现在党中央并没有什么与政府对口的工业部、财贸部、文教部等，今后要做的，是把政府各部的党组逐步撤销，国务院提请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决策的议题不再经过中央书记处“过滤”，同时注意改进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地方各级，过去设立了一些与政府对口的机构，而且还配了一些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常委、文教常委等等，包揽政府的工作比中央多，实行党政分开的工作量就比中央大。但是，既然中央一级可以实行党政分开，地方上就不应该有什么党政分不开的理由。问题在于基层，过去配了那么多的专职党务干部，包揽了那么多的行政事务，要转过来，就得有很坚决的态度，做很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转变过去那种党委包揽一切的老习惯、老传统。在步骤上，企业党委应该坚决地、主动地转到执行保证监督的职能方面来，以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保证厂长负责制和经理负责制的顺利推行，不能犹犹豫豫，动动摇摇；学校、研究所党委的职能转变，步子应该稳妥，但方向也必须明确。

我们许多同志在党政分开问题上之所以存有某些顾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党政分开的好处没有多少体会。好处讲多了，顾虑就会减少。希望大家在全会上多议一议党政分开的好处。我在这里也着重讲一下党政分开的好处。我想至少可以讲四条：

第一，党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并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领导者直接包揽被领导者的事情，是把自己降低到被领导者的地位。党委包揽政府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政府；包揽企业事务，就把自己变成了企业。党是政治领导者，应当做政治领导的工作。分钱，分物，定项目，批条子，这些都应该是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党委直接出面干预，不仅不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也使自己放弃了自己应起的作用。领导，一定要很冷静，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能陷到事务堆里。成天陷在琐细的事务之中，不可能真正成为好的领导。这里有个放心不放心的问题。有人认为把工作交给政府不放心，怕抓不好，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许多同志今天当书记，明天当市长，不是照样抓了工作？如果书记不管具体事务，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倒是有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屁股坐在具体事务堆上，看问题就有局限性。

第二，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党委就应该把自身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善于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别的方面的工作，有政府，有人大，有各种社会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在做，应当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党的工作、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委责无旁贷，其它各种组织无法替代。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使我们党胜任愉快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如何使我们党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使党在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是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的群众工作，必须由各级党委亲自抓，而且必须认真抓好，千万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第三，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各种社会成员当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决不能无视它们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就要协调。政府固然要协调各种利益、各种矛盾；党委更要善于做协调工作。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中，就有一条叫做“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

党委自己包办了政府的工作，又包办了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的工作，什么都是党委自己决定、自己执行，就使党委变成了当事人的一方，毫无回旋余地，实际上使自己丧失了本来应该具有的协调矛盾的资格。

第四，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为了提高效率，必须强化行政系统，但也唯其如此，必须加强监督。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你自己包揽了行政工作，就失掉了监督行政的资格。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中，克服官僚主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委包办行政工作，自己就会成为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相反，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不管日常行政工作，就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

我就讲这四条道理。这四条道理，都说明了一点：党政分开的方向必须明确。为了不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为了使党委具有协调各方和监督行政的作用，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都必须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至于具体的形式、方法，那是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在实践中探索。干部配备，那是根据党政工作的具体特点如何适当调整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党政不分的理由。如果从上到下，大家都认识到党政必须分开的道理，都认真地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党政分开是可以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付诸实施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它各项措施也就能够较为顺利而又平稳地逐步展开。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

当然，对党政不分这种状况，要作历史的分析，不能简单化。过去采用这种体制，有过去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这种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强化的，是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把各种组织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战争年代的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群众运动的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建设的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不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形势、任务起了变化，领导体制就不能固守原来的那种方式，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实行党政分开，也要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千万不要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千万不能这样。相反，要使大家认识到，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是因为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发展

了，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注释

1. 省、市、县地方党委的五条职责是：（1）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2）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3）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4）向地方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5）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见《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附录

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
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宗旨、目标和内容

1、改革的宗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改革的长远目标：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改革的近期目标：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以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4、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1）党政分开和完善党内制度；（2）权力下放；（3）机构改革；（4）人事制度改革；（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7）加强法制建设。

二、党政分开

1、党的领导作用：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的领导，并向国家机

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党政分开不是降低和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政分开，有利于提高党的决策水平，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利于发挥党的“协调各方”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党的监督职能。实行党政分开，是党的领导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坚定而又稳妥地进行这项改革。

3、调整工作关系：（1）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央财经小组、外事小组、政法委（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仍保留，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2）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有关议题，不再经由中央书记处审议，直接提请政治局或常委会决策。

4、改革党的组织形式：（1）各级党委不设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2）撤销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3）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党政工作的不同特点，调整领导干部的配备，并精简各级党委机构，减少专职党务干部。（4）企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原则上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逐步向少设或不设专职机构和尽量少配脱产干部的方向过渡。

5、关于党组：政府各部（厅、局）的党组原则上都应撤销。具体实施时，先撤经济部门的党组。至于政府文教部门、公安司法部门和法院、检察院的党组，如条件不成熟，也可以暂保留一段时间，待条件成熟时再撤。为协调党员代表在人大中的活动，应考虑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党组。

6、中央、地方、基层的党政关系：（1）党政分开，精简机构，调整干部，中央、地方、基层各级都要进行，但它们的职能并不完全相同。（2）党中央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3）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应在执

行党中央路线和保证国家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实行政治领导。它们的职责是：执行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关系。它们应该抓方针性政策性的大事和党的建设，不应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它们与同级地方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应当因地制宜，在实践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逐步形成相应的规范。（4）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涉及面太大，可以有意识地放一放，待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考虑。这样有利于稳定农村局面。（5）企业党委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起保证监督作用，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的党委也应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职能，起保证监督作用。

三、党的制度建设

1、理顺中央领导机构的内部关系：（1）十三大后，党的日常决策职能由政治局的常委会行使。书记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不再召开决策性的例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中央委员会通过。书记处人数要精干，尽量避免与政府交叉。（2）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对政治局授权处理的日常工作和需要紧急处置的问题进行决策。一般每周召开一次例会。（3）政治局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人事问题，并听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地方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也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2、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全会每年召开一至二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听取和审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决定大政方针。

3、关于代表大会常任制：党的八大曾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这是个好办法。在和平条件下，五年开会一次很难发挥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作用。但目前条件不具备。将来可考虑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每届代表一经选出，任期五年，在任期内如有必要，即可召开会议，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定重大事宜。

4、关于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一九八二年明确指出，

设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经过十至十五年取消。如何逐步实现这个设想，请中顾委提出方案。

5、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后，法纪和政纪案件分别由国家司法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处理，纪委应集中力量抓好党纪、党风。各级纪委常驻各部门的纪检组原则上可以撤销。请中纪委提出改革方案。

6、加强党的制度建设：（1）进一步明确，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要向选举它的代表大会或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执行其决定。（2）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健全党内的表决制度和选举制度，制订维护集体领导的具体制度，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实行必要的纪律制约和民主监督。（3）制订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具体办法和纪检工作规则。（4）党的重大决策要听取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要提高党的领导机关活动对党员的开放程度，及时向全党通报情况，并逐步形成制度。

四、权力下放

1、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凡是适于下边管的事，都应由下边去决定和执行；适于地方管的事，交给地方去管；适于企事业单位管的事，交给企事业管；适于群众组织和群众自己管的事，由它们自己管。

2、重点是扩大企业和中心城市的权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政企分开，企业的自主权应当进一步落实。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作用将显著提高。因此，下放权力必须以扩大企业和中心城市的权力为重点。凡是规定下放到城市和企业的权力，一律不得截留。这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必要措施。

3、相应改革规章制度：下放权力，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可能通过一个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各级各部门都应从全局出发，结合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意见，逐项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制度。

五、机构改革

1、机构改革的原则和实施：机构改革应同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并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为关键。这项工作应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展开，但不应强求上下“机构对口”。现在就要抓紧研究和设计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经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后组织实施。

2、妥善处理机构变动中的人员安排：机构改革要做到工作能正常运转，人员有妥善安排。从总体看，现有人员主要是结构和分布不合理，业务素质不够高；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人员太多，综合、监督、调节、信息、咨询、法律等部门和某些企事业单位则需要增员。应抓紧转移人员，合理调整分布，同时抓紧做好人员转移前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以减缓改革过程中的困难，使现有人员各得其所。今后，各级政府应及时公布准备增员的部门和单位名单，凡自愿转入这些部门和单位工作的人员，都有权前往这些部门应聘或应试，原单位不得留难。

3、建立对机构和编制的约束机制：为了防止机构和编制的再度膨胀，必须严格实行定编定员的制度，并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行政经费进行“硬约束”。

4、逐步建立行政工作的合理规范，提高工作效率：改革机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建立行政工作的合理规范和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职责，以及办事程序，都要用行政法规和制度明确下来。必须层层建立责任制，特别是强化行政首长负责制，改变实际上无人承担责任而又效率不高的状况。

六、人事制度改革

1、加快领导干部年轻化：首先是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年轻化，为此，建议在十三大和十四大之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选举，进一步实行新老交替。

2、着手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 设立国家人事部，主管起草国家公务员法规和提出各种配套措施，负责职位调查和分类，组织国家公务员

考试，并直接管理一定层次的高级公务员。(2) 尽快制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先在国务院各部门和部分省市人民政府试行。待条件成熟后，由全国人大修改通过，正式颁布《国家公务员法》。(3) 选调一批有现代管理知识、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同志，在北京和若干城市筹建有权威、有水平的国家行政学院。

3、实行人事分类管理：(1) 党务系统人员，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2) 政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各级党委推荐，按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3) 业务类的国家公务员，由政府人事部门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或《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4) 对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人员，实行类似国家公务员的管理制度。(5) 对其他各类人员，应充分体现各类人员的具体特点，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据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4、促进人员合理流动：实行人事分类管理，需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需要制定一些具体规定，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逐步放开人员流动，并使企业、教育、科技、文艺工作者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先流动起来。

5、实行任期制：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在任期内，无特殊理由，一般不调离或交流。任职期满，没有继续当选，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应根据本人实际条件，能上能下，改做其他工作；其中符合公务员条件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公务员系列。任职期满，没有继续当选，而又到了退休年龄的，同其他国家公务员一样，严格实行退休制。

6、改革退休制度：现行的退休制度弊病不少，需要结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和建立社会统筹退休基金，尽快制定互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

七、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1、协商对话的主要原则：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的情况要让人民群众知道，重大的决策要由人民群众参加讨论。

2、建立协商对话的制度：当前要办的，是制定具体的办法和规定，明确哪些重大的情况，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知道；哪些重大的决

策，通过什么形式，让人民群众参加讨论；哪些问题，在什么范围、什么层次征得人民群众同意后才作决定。例如可考虑规定：（1）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常委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除特殊事项外，及时向全国公布；（2）物价政策及分配政策的重大变动，要同可能波及利益的那部分群众协商；（3）城市公用事业的重点投资项目，可由该市公民或人大代表投票公决；（4）企事业单位福利基金的分配原则，可由本单位职工讨论决定。此外，还可以考虑逐步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主要领导人同某些基层单位（工厂、商店、学校等）定期联系并同基层群众进行对话恳谈的制度，等等。

3、沟通协商对话渠道：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都应是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同时，还要注意开辟新的渠道，包括组织一些受到群众信任的、新的代表人物开展协商对话。

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1、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办得到的事做起：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根本在于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这方面的工作，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有秩序、有步骤、扎扎实实地进行，不宜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

2、改进人大工作：（1）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这一工作，从七届人大起，就要开始着手。（2）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3）适当增加非共产党员在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中的比例。

3、更好地协调政府与人大的关系：（1）各级党委及其常委会有责任协调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在各级人大常委内部有必要设立党组。重要的问题先在党内统一思想，避免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带到人大去。（2）制定党员代表和委员在人大活动的具体规定，明确哪类问题党员代表必须按党的决定表态，哪类问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4、制定保障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法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具体的制度和法规。应抓紧制定若干有关保障

公民权利和公民申诉的法规，争取在七届人大期间（1988—1993）陆续颁布实施。

5、改进选举制度：（1）各类选举原则上均应依法实行差额选举。（2）不再层层下达代表结构比例的指标，提名和选举均以地区为主，辅之以界别（由法定的团体提名和选出）。明确规定上届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可担任下届的当然代表（例如上届政治局委员可担任下届党代会代表，上届委员长、副委员长可担任下届人大代表等）。（3）改进介绍候选人的制度。

6、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民主监督：制定具体的法规和制度，完善党内民主监督以及社会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政策持续稳定的重要措施。

7、完善政治协商制度：（1）加强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并逐步制度化。（2）人民政协可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人大或政府提出建议案。

8、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体制：（1）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也要理顺，使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工会，今后应在代表群众方面起更大作用。（2）有同志建议，将来的方向，除共青团仍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外，对其他群众团体实行以本系统垂直领导为主的体制。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论定，可以暂且放一放。（3）现在群众团体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它们与各自代表的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联系，积极参与管理、监督和协商对话等各种活动。因此，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而不是放在领导机关。（4）科协、文联、作协等团体的全国性组织，与其要它们起领导机关的作用，不如让它们起某种类似联谊会的作用。这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九、加强法制建设

1、用法制保障和推进改革：法制健全，是我们治理国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宪依法。要经常加强法制教育，使每个公民包括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都懂得，遵守法律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当

前，特别要强调使法制成为改革的保障，并且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走上制度化。

2、政法工作体制改革：（1）在政法体制上也要实行党政分开。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2）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员会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构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3）明确规定各级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延长法官、检察官的任期，规定在任期内无违法行为和重大过失不得免职或调离，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国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这是加强法制所必须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4）改变国家包办律师事务的现状，制定律师活动的有关法律或条例，推动律师事务的开展，完善辩护制度。

3、抓紧行政立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立法的工作量很大。同加强行政立法相适应，还要加强行政法庭的建设。

4、近期要制定的法规：除经济法规外，主要有《国家机关编制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新闻和出版法》、《社团法》、《游行集会法》、《律师事务法》等等。如条件不具备，也可考虑先制定条例。除法律外，还有许多规章制度也要尽快制定，不一一列举。

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把握的一些原则

1、保证安定团结：在我国，安定团结是顺利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条件，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办不成。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和妥善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可失去警惕，今后很长时期内，专政的职能不可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都应当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

2、兴利除弊，发扬优势：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注意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一定要克服，但不能丢掉我们好的东西，特别是不能丢掉我们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问题比较快，决定了就办的优势。

3、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应由中央统一部署，慎重从事。当然，事前考虑再周全，也难免出点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靠坚定不移地排除阻力，推进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制度来解决，决不能退回去。

4、不要一刀切：各级各地情况不同，改革的方向应当明确，具体措施应当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应采取更为稳妥和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军队的改革部署由中央军委另行决定。

5、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一些改革，如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需要从上至下进行；也有一些改革，中央确定大的原则后，地方、基层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不搞一刀切，例如地方和基层的党政分开，领导干部年轻化，加强基层民主与开展协商对话等等。这样有利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带个好头，中央带个好头，十分重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积极地投身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十一、其他几个重要问题

1、改革的大体进程：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必然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道，配起套来。

2、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政治体制改革很敏感，宣传性的报纸必须同中央的提法保持一致。但学术刊物、内部刊物应该搞得活跃些，组织一些专门问题的讨论，这对发展理论和指导实践有利。

3、党章和法律的修改：中央办公厅已牵头起草了一份部分修改党章某些条款的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内容，还涉及某些立法的修改，建议由人大法工委牵头，组织研究。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我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报告。

一、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了七次全会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和开放，加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 这是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把向十三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时，邓小平就曾经评价说，十三大报告着重阐明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一年零七个月以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十三大报告不仅要管一届，而且要管长远。这个报告所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设想、党的建设、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胜利等等重要思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大会，共九年时间。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九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者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十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还有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也有了改善。

——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城市新就业的劳动力达到七千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八千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了非农产业。

——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局面。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显著改变，逐步转上大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应当说，这九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同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中，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九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

改革和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

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九年之所以不平凡，所以举世瞩目，就是因为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是在这个时期产生

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基础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奠定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推进建设与改革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的结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健康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进一步积累了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正面教育和正确批评来反对错误思想的经验。在全面改革的深刻变革中，保持安定团结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逐步发展。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人民政治生活日趋活跃。爱国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各民族的兄弟团结更加巩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进展。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展开。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九年制义务教育正在逐步实施。

——国防建设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在裁军百万的同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步，防卫作战能力有了新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抢险救灾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

——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

同志们！九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

线。这条路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九年来的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请允许我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感谢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支持。一切亲身经历这九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的历史性变化感到自豪。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比预料的多。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还有不少失误。新旧体制正在交替，许多制度尚不健全，各方面的管理和监督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尚未根本缓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僵化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特别是对不少环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一定要正视它，努力去消除它，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我们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必须警醒起来，团结一致，奋起直追。

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们要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正确解决这个任务，将有力地促进全党团结和党与各族人民的团结，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

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哪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呢？

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必须始终不渝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

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

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

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在初级阶段，不安定因素甚多，维护安定团结尤为重要。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要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同时也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

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现在，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它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基础落后的国家，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无疑是一项宏伟壮丽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

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保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

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为此，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一)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离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不可能在有限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不可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前进。不改变设计落后、装备陈旧、工艺粗糙、管理松懈的状况，工业和其它部门的发展也难以为继。产品水平低，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不仅糟蹋资源，不能缓解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站不住脚。尤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急起直追，就无法缩短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一切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

加速科技进步，应当立足我国实际，放眼世界，选准发展方向和重点。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国民经济。要着重推进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现代化，使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机械制造等重点产业主干部分的技术面貌有明显改善；积极推广普遍适用的科技成果，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继续实施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计划。与此同时，要组织精干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高技术研究，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大力发展软科学。必须加快改革，形成科技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增强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应用科技成果的动力和压力，推动技术市场的发展和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进程，缩短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建设的周期。要继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同国内的科学技术研究密切结合，切实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建议国务院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合理组织全国科技力量，通力协作，尽快实施。

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按照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克服教育脱离实际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必须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充分发挥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一切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优异成绩的人们都要给予奖励。必须下极大的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努力建设起一支素质优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在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的作用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国际人才交流的工作。

（二）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稳定发展，必须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适当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合理掌握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使之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做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审时度势，自觉地及时地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衡，以经常性的小调整来避免比例严重失调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大调整。对目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种种挥霍浪费、奢侈成风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制止。对今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趋势，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加以控制。

经济总量平衡同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才能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这个问题越往前去会越加突出，这是因为：第一，在向小康水平前进的过程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对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要求愈益迫切，居民对档次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大，选择性明显增强，所有这一切都对产业结构

的改造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第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扩大商品出口的需要，也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造。因此，能否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我国国内市场广阔，传统产业存在着很大的发展余地；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又为我们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要把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好结合起来，以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和发展我国传统产业为重点，同时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根据这样的考虑，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坚持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同时，充分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和通信业；努力振兴机械、电子工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装备；以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建筑业，使它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要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否则经济发展没有后劲。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不能孤立进行，要同其它方面的发展相协调。在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上，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要给予必要的支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符合这些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增强它们的发展活力，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要发挥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作用，而且要依靠国家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并运用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进行干预和调节，以改革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发展为改革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这样，就有可能把发展和改革、计划和市场、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并在计划工作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这里有必要着重讲一讲关系建设和改革全局的极端重要的农业问题。农业的稳定增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还比较落后，发展还很不稳定，加强农业建设尤为迫切和重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争取在今后十多年内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这是实现到本世纪末战略目标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又必须继续合理调整城乡经济布局 and 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并且把它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鼓励兼业经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提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逐步达到合理的经营规模。要注意城乡改革的配套，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应当增加农业投入，地方财力要更多地用于农业，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防治水旱灾害，改善农业的基础条件。积极加强土地管理，努力抑制耕地大面积减少的现象。要大力增加化肥、塑料薄膜、农药、柴油和农业机械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加强对农业的物质支持。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积极运用科技成果，努力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在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对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别是食物结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节，使之同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和生产水平相适应。总的来说，我国农村还处在开发时期，许多资源还没有合理利用，潜力很大，农林牧副渔各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前景都是十分广阔的。

（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的优势，积极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业和产品，大力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合理安排出口商品结构，多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以争取出口贸易较快地持续增长。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发展劳务出口和技术出口，努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进口的重点要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上。凡是适宜于国内生产的重大设备和其它产品，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做到立足于国内。积极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国产化进程。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

对于国外资金的利用，要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物资配套能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大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要进一步健全涉外经济立法，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正确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同志们！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我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必须看到，我国人口基数大，现在又正值生育高峰，计划生育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否则势必影响既定奋斗目标的实现。必须强调优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同时，还要注意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向，及时采取正确的对策。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工业、国防科技战线的广大职工，顾全国家建设大局，努力支持和参加经济建设，同时在推进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应当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的国防观念。今后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国防技术，改善部队装备，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同时，改革的部署和实施又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样，就能够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必须加深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科学理解。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并在实践中限制其消极作用。过去的许多做法，如直接向企业下达过多的指令性指标，实行统购统销和供给制式的分配，有的是在建国初期国内国际环境中为加快奠定工业化基础而采取的，有的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改革就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总之，我们已经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全党同志应该进一步提高和统一认识，更加坚定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

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

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经营，一般也不适宜由国家直接经营，硬要这样做，只能窒息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决不会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只会使企业更加生气蓬勃，使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形式，可以依产业性质、企业规模、技术特点而有所不同。无论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都要通过竞争产生合格的经营者，以企业经营成果包括资产增殖作为奖罚经营者的主要依据，促进大批精明强干、勇于开拓的企业家在市场竞

争的风浪中涌现出来；都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完善企业内部各种经济责任制，整顿劳动纪律，严格科学管理；都要注意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和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相统一，形成经营者和生产者相互依靠密切合作的新型关系。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

(二) 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

横向经济联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和企业群体、企业集团的兴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要因势利导，在深化改革中继续加以推进。

企业之间的联合，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应当坚决抛弃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观念，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状态，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合理的流动与重新组合。应当主要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商品为龙头，以促进科研和生产的联合为重点，积极发展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以适应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要把联合的决策权交给企业，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防止采取行政办法拼凑各种行政性公司。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把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建设成为多功能的、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城市也一定要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并敞开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不仅为本城市服务，还要为周围农村服务，为它所联系的整个经济区服务。

(三) 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

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进行价格改革要同调整收入政策相配合，保证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在改革中下降，并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积极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商品流通组织、外贸组织、金融组织和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促进市场发育。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严格执行市场管理法规，形成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宏观调节与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离开了宏观调节，市场会乱，企业也会乱。但是，采用原有的直接管理方式，对生产要素实行调拨分配，企业没有自主权，市场难以形成，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也无法建立和发展。因此，必须从有利于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出发，加快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银行在宏观经济调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货币流通规律适当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以中央银行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发展多种金融机构，运用多种方式和多种金融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以推动经济的协调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根据公平税负、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

在一定时期，国家对极少数重点建设工程和特殊企业，以及某些重要而又短缺的商品，仍需保持必要的直接控制，但也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进控制方式。

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并加强司法、严肃执法。对企业、市

场和各经济部门，都要实行必要的监督、管理，整顿和加强财经纪律，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的全局利益。

（五）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业。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应当切实保护国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

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当前分配中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互相攀比，必须继续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加以克服。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在严格质量管理和定额管理的前提下，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

消费的增长持续超过生产的增长，是改革初期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它影响经济稳定，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给改革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消费膨胀势必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活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要坚决防止消费膨胀，保证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率不超过可分配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奖金的增长率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企业自我约束的机制，同时在宏观上建立一套有效的调节制度和办法。

深化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当前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企业产品质量低劣。必须认识，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好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民族的素质。各部门、各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都要为不断提高我国产品质量而努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要革除或矫正生产关系中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又要培育和建立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新组织、新机制和新规范。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种种矛盾和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改革的深化将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更为深刻的调整，不可能没有阻力。我们是在经济环境还不宽松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这又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我们经验不足，在指导工作上也难免有失误。干部队伍的素质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还不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立足于现实条件，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确定改革重点，分阶段配套进行，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

（一）实行党政分开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近几年来，我们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它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不同，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党中央应就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推荐人员出任最高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省、市、县地方党委，应在执行中央路线和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对本地区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它们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保证国务院和上级政府指示在本地区的实施；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向地方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协调本地区各种组织的活动。它们与同级地方政权机关的关系，应在实践中探索，逐步形成规范和制度。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可以在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解决。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

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指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自身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党政不分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二）进一步下放权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途径是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应当在其它方面进一步实行。

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责任是提出大政方针和进行监督。在政府同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上，要按照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将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事业单位，逐步做到各单位的事情由各单

位自己管，政府的责任是按照法规政策为企业服务并进行监督。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地方、部门和单位，都要树立全局观念，严格依照法规和政策办事。为了使企业具有充分活力，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下放权力必须以扩大中心城市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为重点。凡是规定下放到城市和企事业的权力，各中间层次一律不得截留。这是打破条块分割的重要措施。

下放权力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的改革，各级各部门都要结合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的意见，逐项做出具体规定。

（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

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依然严重地存在着。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历史的原因，我们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都将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应该看到，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也是形成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建议国务院立即着手制定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方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后付诸实施。

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要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要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清理整顿所有行政性公司和近几年升格的机构，撤销因人设事的机构，裁减人浮于事部门的人员。

为了保证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认真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要做到工作能正常运转，人员有妥善安排。从总体上说，这次机构改革在人员问题上要解决的，主要是调整结构，提高素质。要把人员的调整 and 培训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分步骤地将一部分人员调整到需要加强的国家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

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要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用法律手段和预算手段控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要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要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它违法违纪行为。

（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提高，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近年来，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是，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这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依照法定程序向人大推荐各级政务类公务员的候选人，监督管理政务类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应当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他们的岗位职责有明确规范，对他们的考核按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他们的升降奖惩应以工作实绩为主要依据；他们的训练、工资、福利和退休的权利由法律保障。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有利于造就德才兼备的政务活动家和行政管理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国家行政管理的稳定性。建立和完善这样一种制度，需

要相当长的过程。当前要抓紧制定国家公务员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组建国家公务员管理机构，筹办国家行政学院。

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同时，还要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对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主要有：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级党委管理；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无论实行哪种管理制度，都要贯彻和体现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管理，为优秀企业家和各种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企业人事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应当适应这种形势，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使新的企业人事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竞争机制还应当引入对其他专业人员的管理。各行各业，都要按照各种人才成长的不同规律，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使各种专门家和事业家能够成批涌现并且迅速成长为各方面的骨干和中坚。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破除论资排辈等压抑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陈腐观念。这样，人尽其才，各展所长，大家都有奔头，增强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就有了希望。

（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

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这部分群众同那部分群众之间，具体利益和具体意见不尽相同，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因此，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当前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它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近年来，各级人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后应继续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要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与群众的联系，使人大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并受到人民的监督。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要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人民政协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历来是党和政府联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

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近年来，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选举制度还不够健全，已有的制度也还没有全面有效地贯彻。今后应当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要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办法。实践证明，在选举各种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硬性规定候选人的结构比例，不利于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为了使候选人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今后除继续坚持按地区选举的制度外，可以辅之以按界别选举和其他方式产生部分代表的办法。

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目前，侵犯群众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必须指出，在一些部门和基层单位中，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仍然存在。为了破除这种状况赖以存在的条件，应当制定促进人员合理流动的法规，建立劳动仲裁制度，积极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化。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教育全党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好民族工作。

（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们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一方面，应当加强立法工作，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又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这种状况，要做历史的分析。这种体制，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前进了，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在新旧体制交替期间，特别要注意防止工作上的脱节和磨擦。各项改革都要注重试验，鼓励探索，注意找到切实的过渡措施和办法，做到循序渐进。各地条件和情况不同，改革不能“一刀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改革，应当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军队的改革已取得重大成效。军队情况与地方不同，改革部署由中央军委另行研究和决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有限的。但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逐步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全党同志都应积极的姿态，投身到这场改革中去。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并且以自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带个好头。

六、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经受了长期斗争锻炼的坚强的党。为了胜利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艰巨复杂的任务，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责任，我们必须研究新的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转变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观念和做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问题，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当体现这个指导思想。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必须全面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校，应当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经常地深入地向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以党的基本路线统一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使广大共产党员都成为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先锋战士，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模范。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必须改革，克服形式主义，讲求实效。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状态，禁止人们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潮，更不能回避人们在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抛弃空洞乏味的党八股，用群众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真正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这是件好事情，是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我们要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且努力创造适应新形势的各种有效形式和具体途径，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激励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热情和献身精神，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来。

干部队伍的素质对于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相适应，我们党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坚持革命化，最重要

的是看他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应当重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即忠诚于党的路线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而不能重用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缺乏热情和责任心的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要看实绩，要以此为标准，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必须大胆起用那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实际贡献，得到群众承认和信任的干部。对其中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敢于压重担子。要爱护和支持在改革中勇于探索、创新的干部，允许他们犯错误，帮助他们不断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样做，才能使各级领导机构充满活力。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当前的重点是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年轻化，建议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也要年轻化，但不能机械地要求省、地、县、基层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逐级递减。领导班子内部的年龄结构，要注意梯次配备。坚持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注意不同工作岗位的不同要求。这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很有成绩，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今后要继续充实、提高，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注意稳定。

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主要是：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受到党纪处分。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直接参与的机会。

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人民产生的危害也比执政以前大得多。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党的路线和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过去那种高指标、瞎指挥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动辄批斗等恶劣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积极地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表现了很大的实干精神和创造力量。就这些方面而论，应该如实肯定，现在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加强了。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实行党政分开，还将进一步防止党内官僚主义的滋生，使党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坚强力量。现在广大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是少数党员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干扰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败坏党的声誉。这是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后，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党是完全必要的。前几年的整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必须指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一段时间的整顿解决所有的问题。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出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应该作这样的估计：从总体上讲，我们党是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的，是有力量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但也必须估计到，会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几年来，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执法犯法、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泄漏国家机密和经济情报、违反外事纪律、任人唯亲、打击报告、道德败坏等现象在某些共产党员中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就会使整个党衰败。对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首先要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但经验证明，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

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绝不能姑息养奸。

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地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长期以来，我们在吸收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忽视质量的倾向，有一部分党员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条件。因此，从严治党，除了必须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经常地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队伍。是党员，就必须符合党员标准，严格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对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党员，特别是担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订立更加严格的规矩。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要经受牺牲个人生命的考验；今天，必须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共产党员同非党员相比，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共产党员的称号之所以光荣，就在这个地方。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当然不能要求非党群众做到，但党员必须做到。如果不能做到，不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经过教育，仍不能改正的，就要劝他们退党，或者从党内除名。劝退和除名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对离开党的队伍的人，各级党组织仍然应当热诚地团结他们，不得歧视打击。他们还可以做一个好公民，有什么长处还可以发挥出来，有些人还可以继续担任适当的领导干部。我们还要把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不断吸收到党内来。扶正才能压邪。应当积极地及时地表彰有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党的任务的好同志。所有这些，都要作为基层党组织主要的经常工作来做，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地处置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指导基层组织做好这些工作。这些经常性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为我们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们

一定要适应这一伟大的变革，把我们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设好。这样，我们党就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七、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展现了新的前景。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与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

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当时，我们之所以必须把阶级斗争摆在中心的位置上，那是因为只有首先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使劳动人民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不受剥削，才能解放生产力，现在不同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直接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一句话，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

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因为当代中国，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赞成改革开放的；固守僵化观念的人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极少数。但是在我们党内，认识上的偏差是会经常发生的。同一个人，在一种情况下有这方面的片面性，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能有另一方面的片面性。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偏差和片面性的产生，说到底，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克服的根本办法，是引导大家面向现代

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口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很多，尤其需要全党同志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和认识，同心协力地开拓前进。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生动活跃，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定兴旺发达。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党正处在新老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大批新同志加入党的队伍，大批新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这样的时刻，认清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向全党提出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并且建设一支包括大批新生力量的富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意义更为迫切，更为深远。

同志们！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让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大陆同胞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事业是走向未来的事业。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中华民族的振兴，美好未来的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归根到底，要靠广大青年继往开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美苏最近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达成这种原则协议仅仅是朝着裁减军备迈出的第一步。军备竞赛远未停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存在着升级的危险。国际形势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曾经震撼世界，增强了世界进步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科学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我们还要为夺取第二步、第三步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我们坚定地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和李鹏、乔石¹、启立、依林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在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时讲几句话。

首先，我们感谢全会的信任，同时也深深感到，把我们五个人放在这样的岗位上，我们的责任是很重的。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党的历史这么长，而且在国际上又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相形之下，我们这几个人的份量显然是太单薄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全会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郑重选择，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全会和政治局的领导下，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坚决执行十三大规定的任务。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革命家，我们的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彭真²同志等其他几位老同志都健在，他们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的财富，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他们的指教和帮助。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小平同志。十三大通过的报告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专门讲了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确实，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过历史考验并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所公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小平同志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但实际上是小平同志在掌舵。今后小平同志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小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继续在重大关头掌舵。政治局常委认为：今后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仍然可以召集我们开会。我们恳切地向全

会和小平同志提出这个请求，因为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我相信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热烈鼓掌）好！我们这个请求得到了全会的热烈赞同，我们把它看成是对政治局常委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支持。

同志们！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是，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条路线，已经为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九年和以前的二十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我们对这条路线充满了信心。有这条路线和没有这条路线是根本不同的。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走下去。这条路线所指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引我们前进的、长期起作用的航标。只要我们牢牢掌握这条路线，我看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在这条路线基础上形成的团结，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团结，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乃至全党四千六百万党员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胜的保证。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地团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切切实实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经验不足，可以学习。有阻力，或者是很大的阻力，也可以克服。改革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建设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样，再过五年，到了十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确实完成了党的十三大所托付的任务！

注释

1. 乔石（1924-2015），浙江定海人，原名蒋志彤，生于上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中联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原名傅懋恭。1923年入党，曾任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长、城工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们对外国记者关于十三大的报道是满意的

美国记者：请谈谈对记者有关十三大报道的评价。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我们是满意的，报道基本上是积极的。国外反应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我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对国家的情况是清楚的；二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三是说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将会继续下去。这个评价不高，也不很低。谢谢你们！

日本记者：在您的报告中，为什么外交问题只讲那么一小段？

赵：我的报告已经有三万五千字，外交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加进去，还可以加五千字。如果那样，我的报告在一个上午是做不完的。

记者：对日中关系你有何评论？

赵：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是良好的，在良好的大前提下当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希望日本方面能为此作出努力。总之，主流是好的。

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来分析中国局势， 将会不断犯错误

外国记者：你是否认为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

赵：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我已注意到，我们这次大会前，一些国外政论家、新闻界的朋友，已经因此犯过错误。这次参加大会的一千九百多人，全体举手通过了我的报告，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弃权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能说明我们有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吗？如果说一千九百多人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举手赞成我的报告，岂不是又合二而一了吗？当然，中国有十亿人口，有四千六百多万党员，不可能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搞自由化的人，但在骨干分子中间没有保守派、极左派之分。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分析。

外国记者：在中国，是否对不同意见有自由？

赵：有自由，但是没有绝对自由，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自由。你出国不是还要持有护照吗？你也没有绝对自由嘛。（大厅里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赵（介绍南斯拉夫记者后）：你们作了大量报道，是客观的、友谊的。

南斯拉夫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赵：我先讲。我们在搞改革，你们国家也在搞改革。我们国家同许多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就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解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的报告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讲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的方案，你们的最佳方案和我们的最佳方案不一定一样。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交流，但是都不能照搬。祝你们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

南斯拉夫记者：我们南斯拉夫记者向你祝贺你的报告和你担任总书记。你当选总书记后，准备完成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什么？

赵：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新的政治局和新的书记

处如何进行工作。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式工作，因而需要具体研究一下。这是我们要做的头一件工作。

美国国会中一些人经常大喊人权， 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符合人权吗？

美国记者：最近中美关系有点问题，遇到了西藏问题。你对中美关系如何看法？

赵：有个问题总使我迷惑不解：美国国会中一些经常大喊人权的人，为什么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是符合人权的吗？我希望你回去把我这个问题向你们国会的有关人士提出来。（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美国记者：我回去后一定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外国记者：请你谈谈中日关系。

赵：中日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我祝贺竹下登先生就任总裁，希望有机会同他见面。

苏联记者：我们是来报道十三大的。

赵：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北京过得怎样？

苏联记者：过得很好。

赵：我想我刚才对南斯拉夫同志讲的那些话，同样可以对你们说。祝你们改革成功。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

日本记者：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现在穿的双排扣的西装很漂亮，是在国内做的还是国外做的？

赵：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我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就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而且很漂亮，这样可以推动中国服装向你们国家出口。（全场活跃）你看，李鹏、胡启立同志穿的西装也都是中国做的，都很漂亮。

荷兰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的改革快，您对此怎样看？

赵：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改革不可能一样。我们没有同苏联在改革上发起竞赛，不准备在改革上同苏联比谁快谁慢。各国都应当按自己国内实际情况办事。我们很重视苏联的改革。

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同志把《新的长征》的作者索尔兹伯里介绍给赵紫阳。）

赵：我们认识，我们约好要在十一月五日见面，你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作为记者来见我。朋友之间可以随便交谈。

索尔兹伯里：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过去在四川工作时，四川人有句话说，“要吃粮，找紫阳。”现在你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中国人民将用什么话来概括你的工作？

赵：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是有信心的。我在报告中讲过，我们现在的改革比原来设想的时间要长一些。我刚刚在一中全会上讲，我们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要努力工作，再过五年，希望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能够说，我们完成了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

（新闻中心的同志介绍苏联记者。）

赵：好，你们在北京常驻的有几位？这次派来采访大会的有几位？

苏联记者：常驻的有七人，这次又派来四个人。

赵：那加起来有十多人。

苏联记者：对。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天天都有关于中共十三大的报道。

赵：你们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谢谢你们！

香港记者：十三大对统一祖国有什么贡献？

赵：我已经注意到国外有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将作为今后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将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于解除香港人民的疑虑；将有利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

日本记者：毛泽东说中国解放前有三座大山，请问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有几座大山？

赵：我没有统计。请你帮我统计后告诉我，我将表示感谢。

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进一步加强， 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

英国记者：您现在当选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防力量将加强？

赵：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会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你知道吗，中国已经单方面裁减了一百万军队，我们大量的军工企业都转为生产民用产品。我们国防现代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质量上，这要依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香港记者：香港是否可以直选选举？

赵：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已多次讲过，讲得很清楚，香港人民都知道，今天没有必要再说。这个问题要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基本法中解决。

联邦德国记者：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就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 但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工作做好

香港记者：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请你谈谈你的感想。

赵：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外国记者：最近美国关于人们所说的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有很多不好听的言词，你有什么看法？

赵：不仅是言词不好听，而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想把加剧海湾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不公正的。

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

外国记者：最近我听到，中国许多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赵：这个问题应当这么说，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改革九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价也确实上涨了。人民希望有这样的总理：只提高工资，而不涨物价，甚至降低物价。看来，我这任总理是做不到了，希望下一任总理做得比我好一些。

现在中国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

香港记者：我们是香港记者……

赵：你们香港记者来了多少人？

香港记者：有五十多。请问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

赵：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

赵：你们总是喜欢分第一项第二项，不能分的。经济体制改革明年主要是增强企业活力。我向你们透露一个信息：明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很可能通过企业法。

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 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

台湾记者皮介行：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

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到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地看一看。大陆这三十八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

皮介行：赞成、赞成。

北京记者：我们去台湾采访，你批准吗？

赵：我们方面毫无问题。你们要去我都批准。可惜光我批准没有用。

中国的政治气候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香港记者：有人比喻说你们的冬天来得快，去得也快。

赵：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如果指政治气候，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记者：这次政治局中为什么没有妇女？

赵：我们大家都希望女同志能参加政治局，但没有能推选出来。这并不是我们调整了妇女政策。

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外国记者：明年开人代会，谁将担任总理的职务？

赵：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换届。国务院的人事，将由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把人大当成橡皮图章吗？我们今后要尊重人大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能随便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不准备等到明年七届人大，而在最近即将召开的

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职。我将提出一个代总理的人选。我的提名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但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比我年轻。

保加利亚记者：你访问东欧五国以后，有什么感想？

赵：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很好，党的关系都恢复了。可以说，进入了全面友好发展的阶段。我对东欧几国的访问都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你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我们搞得好。向你们学习。

美国记者：胡耀邦已经被选进政治局，他将负责什么工作？

赵：我们还没开会嘛！刚才我说了，我们将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如何工作。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

外国记者：现在你们搞改革，有些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赶不上，差距大了一些。你们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走路也总是先迈一条腿嘛！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这次会议即将结束，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比原来预想的要顺利。之所以开得顺利，是因为在十三大前，开过一次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当时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所要采取的措施向大家谈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人家主要对明年中央向地方借款打入财政基数后还要实行分税制，意见比较多，感到承受不了。会后我们作了研究，接受各地同志的意见，确定明年暂不实行分税制。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依林同志和我都讲了全国的经济情况，讲了为什么必须实行进一步稳定经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回去传达以后，使各地的同志对全国的大局有了理解，因而对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方针容易接受。这次会上，大家又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央和国务院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要再认真研究。但总的来讲，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动，需要调整和照顾的，只能是少数地区的小量问题，请大家对此做好精神准备。明年的盘子，不论地方也好，企业也好，基本上是可以承受的。任务带回去，大家努力完成。

我同意会上许多同志的分析，如果我们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去办，明年的经济形势肯定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会因此而出现生产萎缩、滑坡的现象。实行这一方针以后，可以预期，第一，明年的经济会

进一步稳定；第二，会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经济效益会进一步提高。“双增双节”，今年才实行一年，还有很大的潜力，明年要继续深入开展。还必须看到，承包经营责任制今年刚刚推行，明年进一步加以完善，它的作用将有力地显示出来。可以说，明年将是承包经营责任制进一步完善的一年，经济效益进一步显示的一年。所以，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明年的经济工作方针，是积极的方针。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工作，使中央的方针真正落实，以促进明年经济形势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第二点，发展农业问题

在十三大期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讲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意见。经济要稳定，首先农业要稳定，要把发展农业摆到重要位置上。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大家对农业的认识更深入了。农业问题，既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一阵子出现卖粮难，就过分乐观；也不要因为当前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猪肉、食糖比较紧张一点就悲观起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解决农业问题，需要增加投入，增加支农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后国家应当尽力增加一些农业的投资，地方上的财力也应当主要用到这方面来。我多次讲过，在农业上，一个化肥，一个农用薄膜，一个柴油，这三条对增产有很现实的作用。从科技上讲，还有推广良种，采用先进技术，改进耕作制度等，增产的作用都很显著。但是对这个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下子增加很多投资和物资方面。这个问题，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解决。就拿化肥和农膜等农用物资来看，近年来国家鼓励生产，发展很快；从国外进口也成倍增加，但毕竟国内扩大生产能力要有个过程，国际市场的容量也有限。国内生产也好，进口也好，都只能逐年增加，不能刮风，大上大下，大出大进。

解决农业问题究竟靠什么，我们应当很好地回顾一下历史经验。我们不能再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业的指导思想上去。现在，有这么一点苗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那时当省委书记、当省长的，每年到北京开会都是争投资，争水利，搞来搞去，跳不出圈子。当然，投资是需

要的，水利也是要搞的。但解决农业问题，除了要增加投入以外，还要讲另外一面。根据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农业问题，如果不建筑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不建筑在农业本身的活力上，那是没有前途的。在讨论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任仲夷同志提出，价值规律讲得少了。我看要讲价值规律，首先要在农业上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价值规律，离开经济手段，是不行的。农业现在出现的问题怎么看，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需要大家很好地研究一下。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基本经验，我们必须继续记取和遵循。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情况所以好，也是同过去二十多年的基础分不开的，不能只归结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它与过去多年搞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等都有关系。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的农业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出现了新的停滞的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绝不能忘了这个基本经验。农业要上一个新台阶，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有物质条件保证，但同时必须有好的政策，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有活力。我们应当根据历史经验，认真分析一下现实，展望一下将来，研究今后的措施。

农业要有活力，必须研究解决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当前农产品的价格不合理，不动是不行的。但目前不能大动，只能在国家、社会能承受的条件下有步骤进行。同工业品价格的结构调整不一样，农副产品价格的问题，特别是副食品价格的调整，涉及到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农副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无利就不生产；要提价，使农民有积极性，城市居民又负担不起，要相应普遍提高工资，国家又没有那么大的财力，问题就卡在这里。看来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的价格在相当长时期都只能是“双轨制”，要想粮食价格全部放开，恐怕近几年还不行。现在，粮食还得一部分合同订购（当然合同订购也要体现等价交换的要求），另外一部分放开。大城市的蔬菜也不能完全放开，大路菜要有计划生产，同时要兴建一些贮存设施。农副产品价格的变动影响城市的问题，如果只靠国家提工资发补贴，就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我们要总结一下经验，研究一些新的办法。在工厂里，能否主要靠承包制、计件工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等措施，来增加职工的收入，国家只相应把工资调节税、奖金税放宽一些，增

加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这几年广东就是这样，副食品涨价，工人完全从增加的收入中消化了，并没有反映承受不了。剩下的主要是机关、学校、医院和一部分没有额外收入的科学研究单位，全国算起来大概有两千万人左右，也可以研究一下。能不能把开会、公费旅游、买高档家俱等方面的钱节省下来，适当增发一部分奖金或生活补贴，帮助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解决生活困难。这样办，财政上也用不着多拿钱，少数单位收入少的，国家再帮助一下，困难也就解决了，而且工厂职工也不会攀比，能与工厂脱钩。采取这种办法后知识分子待遇低、生活困难的问题，也可以缓解。大家可以研究一下，用这个办法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困难，利弊如何，能不能这样搞？研究清楚以后，再制订一些具体办法，经过批准实行。总之，要找到一条出路才行。

现在有些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像京、津、沪的郊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农业不振，靠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些地方已经有60-70%的农民去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收入相当高，而搞农业的，一家承包几亩地，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农产品价格再提高几倍也不行。实践证明，这些地方如果不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生产专业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这条路子不走，这些地方的农业就成为附带性质的，土地就会丢荒，农业就会丧失活力。像珠江三角洲、苏南等地，搞粮食成为搞工副业的额外负担，主要劳力去搞工副业，剩余劳力去应付一下农业，或雇请外地的劳力种地。当然，在其他地方不存在这种形势。过去我们实行联产承包，搞大包干，土地划到一家一户去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那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现在全国大多数地方也是这样的。但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有些能够开矿的地区，60-70%的劳力都转到第二、三产业上去了，如果不搞规模经营，那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北京市郊区的顺义县，实行了规模经营、生产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大为提高，粮食增产了一亿多斤，一些直接经营农业的人的收入高于搞工副业的，农民从不愿种地转变为要多种地。这说明像这样一些地方，解决规模经营的问题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应摆到议事日程上。这次我在广东与南海县平州等地的同志座谈。这里主要是水田，比北方复杂一些，他们也说，这个问题不解

决，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就无法前进。看来，根本是一个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解决规模经营后，就有条件解决了。当然，规模经营的大小要因地制宜，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承包给农场、专业队，也可以承包给专业大户。具备了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摸索一些经验。

为了调节种粮食和种其他作物的经济利益关系，除了价格以外，还可以考虑运用其它经济手段。在广东南海县，我就讲过，可以征特产税。种粮食的，与种经济作物、种农村特产的，收入差距过大，需要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一下。我看像特产税这样的小税，就留给地方，留给县、乡，用于发展农业，发展粮食或补偿价差。地方也有积极性。

第三点，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

十三大报告中突出地讲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赞成，国内外反映也相当强烈，但工作量很大，到了下面，思想也比较复杂。希望各地在这个问题上，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各级干部的思想搞清楚了，认识提高了，把这件事搞好，就一定会发生很好的作用。如果有一些同志的思想不通，憋着劲，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发生。因此，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好。

党政分开的具体行动，当前主要是在企业里要进一步解决厂长负责制与党委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机制、领导体制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就要解决企业领导体制各个方面的关系，不仅有厂长与党委书记的关系，还有与工会的关系等，这些都需要妥善处理好。厂长负责制，也不能完全是厂长个人说了算，一点监督都没有。这些既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也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承包制的情况下，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企业究竟怎么搞好，在明年人代会通过企业法以前，各地要好好调查研究，工作上要抓落实。

第四点，党风、社会风气问题

这次十三大报告以后，有两种反映，一方面反映对这个问题还讲得不够，抓党风的决心还不够大，措施不力；另一方面更多的认为，这次对几年好转也不敢提了，对能不能解决党风、社会风气的问题表示担心。在起草报告期间，我也感到党的建设部分难度最大，一些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党风问题，包括社会风气问题非抓不可。我提议，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下点功夫，组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去抓党风。整顿党风，不仅有个决心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把我们的认识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科学的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完全沿用老办法效果也不好。当前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容易滋生坏的作风，腐败的现象，但绝对不允许它在我国泛滥起来。现在的确有这种苗头，而且来势很猛，值得我们重视。用过去那种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恐怕也不能奏效。中央书记处、组织部、党校和各省市的同志，都要把它当成一个重大问题，用很大的力量去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在搞活经济的条件下，防止不正之风的泛滥，还得科学分析，综合治理。

解决党风问题，要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加强教育和监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如何减少滋生这些不正之风的温床的问题。例如过去上大学，走后门很严重，谁能上，谁不能上，机会不均等。改革招生制度以后，主要看考分，好坏你考试就是了，这样舞弊也大为减少了。又如在房屋分配上，如果真正实行住宅商品化，不靠内部分配，不靠批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会大大减少。在烟台、蚌埠实行房屋商品化试点的地方，都有人退多占用的房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房屋商品化对引导改变消费结构，对克服不正之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意义很大，希望各地把它摆在一定的地位。这就是说，我们解决党风、社会风气问题，还要注意如何堵塞漏洞，减少滋生这些坏东西的土壤。当然，有的可以马上减少，有的要逐渐减少，要长期做工作。

总之，党风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很重要的改革，解决它不简单是有无决心的问题，还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把它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第五点，沿海地区要迎接新形势

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元贬值，日元、南朝鲜货币升值，台湾货币升值，给沿海一些地区确实带来一个机会。这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带。珠江三角洲地靠港澳，闽南金三角以及浙江面临台湾，都有许多有利条件。当前确实有一个新机会，大量的货单转到香港，香港劳力不够，厂房不够，生产力不够，根本承受不了，于是又大量向外转，首先是转到珠江三角洲。随着台湾海峡形势的变化，台湾的资金、订货也可能往福建、浙江一带转。我们要注意迎接这一形势。我们已经向广东、福建的同志打了招呼，这里向长江三角洲的同志也打个招呼，大家要研究对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们应当很好研究外贸发展战略。最近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¹同志建议，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支援基础设施建设，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路。我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目前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占相当大一部分。我国最大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这个资源在广大农村。我们的优势不仅在于人多，最主要的是工资低。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就具有极大的竞争力。我国沿海地区人多地少，资源不丰富，如果不走出一条路，要富起来就很困难。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领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首先从沿海地区开始，将来乡镇企业可能在全国的出口中占很大比重。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在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也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西欧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是这样。所以，迎接新的形势，要研究这个战略问题。将来在沿海地区，一个是乡镇企业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个是发展创汇农业，两个方面同时并进，就可能使沿海地区大为改观。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潜力，都有一些试点的经验。今后应当作为一个课题，很好加以研究。

注释

1. 王建(1954-),北京人。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被授予“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被评为“1988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

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¹时的谈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索尔兹伯里(以下简称索):你们的十三大开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现在你们是新的领导人,在新的时期,用新的思想、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我是非常高兴的,你和我都有同样看法吧!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国内对我们这个会议看来很满意。国外的反映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在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表述了在这个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一条路线,当然十三大对这条路线的表述更完整、更明确了。

这条路线在我们国家产生了这样大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原来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这条路线为什么使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问题就在于这条路线符合中国的国情。坦率地跟你这位老朋友再说一遍,开始的时候,我们搞改革开放,并没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并不是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出发去改革去开放的。我们是从实际出发的,从实际出发搞改革带来了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毛主席的实践论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完整地提出了三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希望全党同志考虑任何问题只能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毛泽东同志的行动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贯彻到他的晚期，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毛主席的行动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你已经知道我国农村改革是从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我们的工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开始的时候，这些做法都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来源于基层，来源于人民的创造。三中全会并没有具体地讲到这些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只是一条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效果看，尊重群众的创造，一切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符合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因此当基层出现了包产到户这些办法以后，我们不是像过去那样，马上简单地把它否定掉。这些办法，群众中的这种创造实践，在60年代初也出现过，那时就叫做联产到户，各地都出现过，工厂也出现过自负盈亏，也出现过工厂要重视利润。但是，当时我们的思想路线不对头，把这些都做为修正主义压下去了。批判了这些东西。这一次就不同。1978年以后出现了这些办法，我们采取的态度与1962年就不同了，我们很重视这些新生的事物，我们要看一看这些办法的效果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到了这些做法对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很有好处，我们就把它肯定下来。那时我们还没有预料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给农村带来这样大的改变，对农业生产带来这样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只提出，包产到户只在1亿人口的地区，交通条件比较差，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先搞，为什么呢？就是还想再看一看。我们当时并没有在全国马上推广它，而是说，究竟怎么搞好，请各地干部群众自己去创造，去选择。当时有人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说，可以。结果联产责任制效果很好。这样，我们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推行开了。当然具体形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一开始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但是农民和干部都不愿意说它是包产到户，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我所工作过的四川省，下面也叫做包产到组。名义上说，只有养花的、养鱼的专业户搞了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普遍地搞了包产到户。我给先生介绍这段历史，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那么农

村出现的这种改革，城市的改革，都不可能受到我们的重视，可以说根本就发现不了，更谈不到发展了。小平同志在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上是有很伟大功劳的。

我国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一部分农民脱离开土地，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叫做乡镇企业。比如浙江温州搞的乡镇企业，各地方也搞乡镇企业。这个，开始也是少数人搞，以后效果很好，我们看准了它的经验，就把它全面推广开。人民中的这种创造，被我们承认，被我们推广，得到这么大的好效果，在起初我们又是看得不那么很清楚。以后工业也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生事物，比如合股、租赁、债券，我们也都是经过这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人民群众在那里创造，我们先看一段，看准了就加以推广。

国外有人说，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国内的人很支持这种改革，但是心里不是很踏实，都说效果不错，但是解释不清楚，在理论上说不清楚。十三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分阐述，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以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普遍的赞成，我想原因就是这样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几十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即从实践出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步是群众在那里创造，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第三步是我们总结了群众的这些创造，加以推广，并完善了我们的概念，完善了我们的理论。这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实践再到理论的过程。这个理论对我们今后的实践会起很大的作用。我希望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反映出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经过的这个过程。

索：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你刚才介绍的情况，你把中国的改革作了简明的介绍、解释。当时（指1960年）你们的情况很困难，农民就提出联产责任制，这个办法本来很好的，但是毛泽东不赞成。七十年代末，中国民谣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你们碰到同样的状况，为什么就能很快肯定群众创造的联产责任制呢？请再谈谈你的感受。

赵：我个人是相信这套东西的。因为50年代、60年代，我在广东工作，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九五八年我们搞大跃进，失败了。失败以后，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农民为了渡过这段困难，自己想出办法，就叫做联

产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结果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都恢复得快，农民生活都好一些。当时为了渡过这个困难，我是赞成这个办法的，但是当时觉得包产到户这个提法太危险了，我就把它改了个名字，叫做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一九六二年秋在北戴河开会，我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中说，联系产量田间管理责任制，是人民公社的高级管理形式。起草文件以后，我送给陈伯达²看，我问陈伯达，这个文件行不行，他不置可否。他说，最后看毛主席怎么说吧。当时类似的这种做法，许多地方都有，安徽叫责任田，所有搞责任田的，情况都比较好，死人都少。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毛主席否定了它，否定了包产到户，批评“三自一包”。我幸运，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是我在广东不得不停止这个办法。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一听到安徽搞包产到户效果好就深信不疑。为什么呢？就是上边说过的，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听到小平同志，听到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要从社会效果出发这样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联产责任制效果很好，我过去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一听说安徽这样搞，我就放心地在四川搞了联产责任制。至于农村的改革为什么先在安徽、四川搞开？因为1962年曾希圣在安徽那里搞过联产责任制，我在广东也搞过，所以安徽、四川这两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我说的这段历史，杜导正³同志也清楚，当时他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

索：我也可以作证明，因为我在沿长征路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能不能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当中，现在中国农民生活是最宽松的？

赵：这个，还要研究一下。中国唐朝有个“贞观之治”。听说那一段农民生活不错，当然还要研究。但是从清朝中期以来，中国的农民生活，现在可以说是最好的。还有一段，就是土改到初级社那一段，中国农民生活是不错的。现在你到农村去问，解放以来什么时候生活最好？农民都说，现在生活最好，另外就是互助组、初级社那一段好。现在可以肯定，中国农民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是最好的。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作为领导人敢不敢承认事实，敢不敢承认事实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否符合你的主观愿望，四川老百姓对我印象比较好，除了联产责任制以外，还有一件事……

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的实事求是。当时中国党内另外一些人，要按照欧洲的办法搞，结果那套办法不行。

赵：噢！噢！

索：毛泽东这么聪明，为什么到他晚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走到另一面去，为什么呢？

赵：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做了很好的回答。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加工的产品好不好，首先取决于材料来源。还有就是加工的能力。毛到了晚年，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情况很难反映到他那里。50年代毛主席除实地考察外，还做到了好话要听，不好的话也听，后期他就不行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党内的关系太紧张了。所有向上反映情况的，都要考虑毛主席想要听什么，不想听什么。所以我们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党政要分开，搞社会民主，首先要解决党内的民主制度问题。搞政治体制改革，发扬党内外民主，我们这样做时，尽管可能会不那么方便，但是可以避免大的失误。

毛主席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这些观点都是很对的，但是毛主席晚期，因为党内生活不正常，虽然他自己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的行动和这些道理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很多，因为我是远距离的，中央其他的老同志看得比我可能更清楚些，但是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当时对我来说，感受也是很深的。

一九六一年春天，国民经济很困难，毛主席找我，我说了几件事，他都赞成。我说征购粮的问题，农民是希望一头搞死，一头搞活，意思是国家征购的数字是死的，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国家要多少定下来，别的归他们自己支配。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农民希望定下来，是这样”。我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的人希望国家要他上缴多少粮食、多少东西也定下来，毛主席也同意。那个时候正在搞食堂化，食堂浪费很大，农民又吃不好，拼命吃。我举例：小孩子闹肚子，不吃饭少吃饭，他爸爸揍小孩，说饭是公家的，吃饭不要钱。我说农民自己在家吃得好，毛主席当时也同意。所以毛主席的晚期，主要是完全不了解情况。有人说，当时毛主席对国内的情况没有对国外的情况了解得多。

索：我向中国很多老同志了解过，他们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错误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比如食堂，比如人民公社。

赵：毛主席打了二十二年仗，他指导战后中国的建设和工作的时候，往往使用战争时期的办法，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战争的时候，开始的红军，后来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当时是不谈物质利益的，也不可能谈物质利益，但是仗打得很好，所以毛主席非常相信供给制，非常相信思想工作，不相信物质利益。再者，毛主席过去指挥战争，主要运用了运动的战术，部队经常转移，毛主席战后搞建设，也搞过几次大转移。开始建设内地，不建设沿海地区，而中国那时是沿海地区发达，他却要在内地搞。一九五七年以后又要搞沿海建设，把内地的经济向沿海转移。一九六四年又要备战，又把经济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就这么来回调屁股，调了几次，损失非常大。

索：是这样，现在内地还有许多山洞。

赵：毛主席是很讲辩证法，但他的后期形而上学很多。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战争时期得不到什么外援，他都提力争外援。建国后他反倒提出自力更生是绝对的，谁要利用一点外援，谁就是修正主义。一九六二年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说：“不吃进口粮，不搞修正主义”。本来我们可以进一点粮食，中国的劳力很多，搞经济作物要靠劳力，经济收入比较高，都搞粮食，把经济作物给搞掉了，得不偿失。

索：我觉得毛主席尽管有缺点，但是也有很好的优点。一个是对邓小平，开始让邓小平当秘书长，后来又当总书记，“文革”后期，周恩来病危的时候，又把他重用起来。

赵：毛主席对邓小平有过很高的评价，但是毛主席始终坚信自己路线的正确。他看出来，如果让邓小平主持工作下去，他的路线就贯彻不下去，所以起用了一段邓，马上又批判他。我虽然和毛主席接触少，因为地位关系，但是我坚信毛主席不是个人品质上的问题。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天，他都认为自己的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悲剧。

索：我与邓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接触了他的材料，邓小平与毛主席的后期正好相反。邓小平的后期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一切看效果，我这个说法对吗？

赵：对。邓多次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讲到邓小平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给我们讲，我现在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但是总是80多岁的人了，再过几年，如果我思想糊涂了再退，那就不好了。我们说，你现在身体还好，可以多搞几年。邓坚持说，正因为我现在还不糊涂，我退下来有好处。

索：我觉得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我希望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记住这个事情。世界上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可以退，但是总认为别人没有我办得好。

赵：1963年毛主席跟我说过，说他见过几个大人物，这些大人物的名气可大了。当然这个请你写书的时候不要写进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见到孙中山了，他觉得孙中山老是那么干巴巴的几条。人到了晚年，是他声誉最高的时候，也往往是他最脱离实际的时候。

索：我作为记者，见过许多重要人物，比如丘吉尔，战争时期他了不起，战后选举的时候他落选了。后来又把他选上来了，但是他能力和精力都不行了，但是他又不下。邓小平正是在他晚年，失去他灵敏的思维以前，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把重担子交给像你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你们有能力，干劲充沛，我祝贺你们成功。

赵：你沿着长征路线走了一趟，这不仅仅是你的体力好，而是你怀着一颗对中国人民炽热的心。这条路我都没有走过。

索：我写长征是因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光看书是不行的，所以我要爬红军爬过的山，趟红军趟过的河流。路上我和夫人在一块，当时比较困难，我夫人说，我们可能走不到头就会死在长征路上，结果很好，一路上她根本没有害病。现在全世界在注视着你们新的长征，新的进展。你们现在的长征和过去不同，新长征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和计算机打交道。我相信你们会成功，当然也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你们已经有思想准备。你们说，你们要成功要上百年的时间。你们有宏伟的计划，你们是无私的，都是为人民做事情，这都非常好。

赵：在北京工作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大多数，我不是说全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利益，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有了这样基本的一条，还不够，还得加一条，就是求实精神。光有为

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还不行。如果光有为人民谋福利不谋私利这一条，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对头，同样地也可能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你立场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利益，这当然不行。一定要有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再加上一个求实的精神。我的信心就是建筑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从一九七八年工作到今天，九年来总的看我们的事情办得是好的。但是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国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至于十三大以后，我们的前景是什么？总的说有两条：第一我们有希望，第二前进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问题肯定不少。但是我们不谋私利，又能够做到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想我们不至于出现了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当然我们对困难已经作了充分估计。有了这两条，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想清楚。我这个人是在顺台阶被提上来的，20岁当县委书记，20岁多一点当地委书记，以后在省委、在中央。几十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辨别是非并不是非常困难。未来我们肯定会碰到困难，但肯定可以解决。11月2日晚上我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国家虽有变化、有成就，但困难还很多。我说了两条：第一我们在前进当中，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原来的基础差，困难很多，这一点我们宁肯估计得多一点有好处，我们还可能出现曲折，但总的说我们有信心。你写《长征》那本书中有一段“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近日，《美洲华侨日报》说，我作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历程中的新觉醒。我很赞成这个话。我告诉先生，国内人民，大学生，对我这个报告最满意的是，我这个报告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听了比较踏实。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大学生对十三大报告有这么大的兴趣。有人说，反自由化后中国大学生对政治淡漠，现在看来不对。十三大期间，学生看电视，听我那个报告的情况，是很动人的。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胜利三十八年了，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现在我们确实悟出一些新的东西，人民也悟出许多新的东西，包括大学生。现在对中央谈什么问题，什么正确的，什么错误的，什么是符合实际的，他们心中有数。

索：我非常高兴你提到大学生，我们接触到中国许多大学生，包括留美的学生。你们留美大学生是优秀的青年，他们很用功，很爱国，关心国

内形势，对美国学生很有影响。我想这些青年回来后，能不能找到发挥才能的场所。今天我看到《中国日报》，讲一些单位不要大学生，他们认为这些人格格不入。……

赵：我了解的情况是：（1）女大学生很多单位不要，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2）学校的结构有些不合理。教改包括这个内容：理科多，工科少，理科基础知识是好的，但接受单位希望工科。留学的也是理科多工科少。大部分高材生都是搞理科。今后为了四化，理科也要，但更多地是应用。教育结构存在问题，还未解决，要逐步解决。工厂要中级人才，大专学生多、中级科技人员少，大学生到工厂去，往往从事中专工作，浪费了。教育和科技改革，要与现代化建设结合。

索：你们的教育投资不大。你们的超导了不起，走在世界前列。你们的教育投资比例小，美国教育投资很大。

赵：我同意，国内也是这样，民主党派经常提意见，每次人代会我都挨批评，但是这几年我们投资教育的经费还是有很大增加。我们的基础教育要注意。不久前我批了一个文件，支持超导的研究。但是中国教育的投资是廉价的，我们只要你们十分之一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你们十分之十的结果。

我和你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国庆，第二次是十三大。祝你健康，祝你写作成功，再见。

注释

1. 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 1908-1993），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生于明尼阿波利斯。曾任合众社驻莫斯科记者，《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等，获普利策奖。

2.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建相。1927年入党，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中科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刑。

3. 杜导正（1923-），山西定襄人。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新华社河北和广东分社社长、国内部主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致陈守一¹教授的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

守一同志：

十月二十三日来信阅悉。获知《中国现代生活法律百科知识》即将问世，甚为高兴。该书作者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对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您年事已高，仍在不辞辛劳培养研究生，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尽力，令人钦佩。来信中要我题写书名，因我从不题词、题字，未能从命，请予原谅。

敬颂

教安！

注释

1. 陈守一(1906-1995)，江苏邳州人。1927年入党，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曾任司法部五司司长、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北京法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关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关于对“两权分离”的理解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两权分离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企业能不能有充分的活力。我们提出两权分离的目的是扩大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权力，不是为了扩大、强化资产所有权对企业承包的制约。一部分同志认为，企业作为法人，不能没有所有权，两权分离妨碍了企业的自主权，似乎这个提法比原来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提法后退了。另一些同志想强化资产所有权对企业的干预，比如想建立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董事会作为资产所有的代表者，不仅要分红利，而且还要负责资产的经营。这两种想法，问题都出在对两权分离的出发点和目的的理解上。我们强调两权分离的出发点、目的，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讲得很清楚。过去说全民资产必须全民管理，全民管理不能由全体老百姓都参加，只有国家代表去管理，因此，就带来了全民所有、国家管理的问题。讲两权分离，就是说不能国家管理，而要经营权、管理权下放。经营权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我们对经营权应广义的理解，不能作狭义的理解。狭义的理解，经营权就是经营权，就是日常管理，具体的经营活动。这样理解不完整、不全面。广义的

^{*} 这是赵紫阳召集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座谈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的讲话摘要。

理解，就是像马克思那样，把经营权同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作为同一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是占有者”，“所有权留在贷款人手中，而对货币的支配则转到产业资本家手中。”过去地主出租土地这点表现得最明显，土地所有权归地主，而怎么种，包括转让就归承租者。马克思还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的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马克思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我们搞的一些股份制企业，持股者都是单纯的所有者。入了股，到企业按股分红就是了，或者是按股分产品。所有者对企业有一些制约，但制约不能过大，不能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

我们实行两权分离应坚持两条：第一，不改变所有权。这不是说不实行所有制的多种形式了，而是说我们重点不在改变企业的所有权。不是说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就把所有权也交给企业。有些同志想变国家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比如有的主张全国只保留几千个国营大企业就行了，其余的可以拍卖或转让。沿海有的地方对少量的小企业可以试一试，但全国不能那么搞。如果大量的企业转为私人的，出现很多百万富翁，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社会就不得安宁。在今天，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如出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的矛盾，那是经受不了的。如果那样，很可能物极必反，现行的政策也坚持不下去。有的经济学家只讲效率，而政治家就要审时度势，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考虑。关键还是在于解决经营权的问题。

第二，这种所有权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单纯的所有权。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要强化企业在经营上的责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企业是资产的占有者、使用者、支配者。当然，要保证所有者的利益。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办法，它交税就是了；如果是承包制，按合同交钱就是了；如果股份制，就按股份分红利、分产品。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如何活动，如何发展和扩大，资产所有者不应过多地干预，而应由经营者

去做。当然，资产所有者要有干预，要有监督，但不能强化所有权，不能使资产所有者成为实质上的法人。如果那样，我们的整个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就要改变。多年来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就是，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如果强化资产的所有权，使所有者成为法人。企业的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法人等等，就不能成立。企业资产的使用，资产的转移包括相互参股，相互投资，相互组合，都可以由经营者去做。比如大企业可以收购小企业，可以租赁小企业，可以承包小企业，也可以向小企业参股；反过来，小的也可以搞大的。当然拍卖应经过资产所有者的同意。现在，上述的几种资产转移形式已经出现，这对发展企业之间的联合非常有利。我们应当大力提倡通过股份的形式、租赁的形式、拍卖的形式、承包的形式，发展企业之间的经济联合。联合老是松散的，老是“三不变”也不行，不进则退。对企业联合、企业集团都要进一步促进它，在条件具备时，要逐步改变“三不变”的状况，让企业能够向外扩展，给企业一个发展余地。当然，这种改变是在承认利益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的。所以当前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正确理解“两权分离”问题。否则有些人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顾虑。

承包制是目前我国实行“两权分离”的最可行的一种形式。承包制落实了，企业的经营权落实了，经济效益才可能提高，企业相互之间的联合也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吉林省的经验值得重视。吉林省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搞承包制。搞到现在五年了，效益显著。过去吉林是补贴省，工业管理非常落后，现在它的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几个亿，工业生产、管理水平都大为提高，进步很快。一些同志现在所担心的问题，他们都在实践中解决了。今天印发赵修¹同志的调查报告是介绍吉林省如何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厂内银行”作用的，这个材料写得好。企业内部管理如果真正按这个经验去办，厂内各种经济关系都通过厂内银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来实现等量劳动交换，什么平均主义，什么吃大锅饭等弊病都能较好地得到解决。真正按这个经验搞，就把企业的各种基础工作带起来了，将极大地推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经济核算和企业的科学管理，使承包制显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

有人说承包制不规范，怎么不规范？我们前几年把利润变成税收，现

在又回来了，是利税并存。将来要把利润部分一分为二，一部分为税收，一部分为利润，具体办法还可以研究，但现在不要变。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完善，就规范化了。

把利改税变为利税并存，还有一个好处，现在企业处在条件不均等的情况下，通过承包可缓解这种不均等。这个企业利润比较高，承包基数就高一点，国家分成多一些；那个企业亏损，承包基数就低一些。如果现在让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那就涉及到价格体系、计划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问题，目前很难很快解决。如果继续吃大锅饭，继续搞平均主义，企业也不会去挖掘潜力。企业不去挖掘潜力，外部条件就始终不具备。而承包经营责任制把企业推上自负盈亏的轨道，使企业想办法挖掘潜力，这样，企业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好一些。这样也给我们以时间，使我们逐步理顺企业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是互为条件的，不可能突然有一天出现一个好的环境，等是等不来良好环境的。承包制就是把企业推向自负盈亏的重要一步。农村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农村刚开始承包时，也是外部条件不平等。通过联产承包，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情况就逐步好起来，就为农副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如果当时我们不搞承包制，等待农副产品价格放开，那么，等到现在农村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变化。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考虑，承包制都不会加大改革的难度。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使改革迈出一大步。

现在有一种提法，说企业承包后容易出现短期行为，这不对。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不承包就没有短期行为，似乎承包后反而有了短期行为。应当说企业的经营权越充分，短期行为就会越少。企业的经营权越不充分，职工仍然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短期行为就越严重。现在的承包还不能完全解决企业不重视长期行为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承包制，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行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关键在于承包制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政策。如果政策是长期的，企业就会有长期打算；如果把承包作为权宜之计，政策摇摇摆摆，企业当然会有短期行为。解决企业长期行为、短期行为的问题，一定要明确承包制是方向，要长期坚持下去，是要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我们不要把承包制同股份制、租赁制对立起来，可以容纳、兼容并蓄。不搞承包制，根本出不了企业家。承包制进一步完善之后，

才有可能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企业行为也才会好一些。国家对企业要有监督、制约，但企业的短期行为完全靠外部来监督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目前搞理论的、搞实际工作的，都应集中力量去完善承包制，发展承包制。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可以互相结合。实现企业之间的联合，这可能就是中国式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一条路子。这里有很多关系要研究。第一，关于与所有者的关系问题。可以成立个机构，如国营资产管理部、管理局管理国营企业的资产，大企业还可以派专员，这方面的形式可以研究，可以创造。总之，所有者不能干涉太多，不能妨碍厂里的经营权。第二，关于与职工关系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应该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过去就发生过对由企业家承包和全员承包的关系的理解问题，有些同志主张全员承包，感到这样做是社会主义性质，好像企业家承包似乎性质就变了。我们认为，谁承包都一样，主要是要使工人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石家庄棉纺四厂是经营者承包以后，再向职工作治厂方案报告，职工投了信任票，他再干。吉林推广的一种办法也很好，主管部门向社会招标，筛选留下三个厂长候选人，然后把这三个人推荐给职工代表大会，最后由职代会决定接受谁。在此基础上，再搞一个全厂风险承包，搞好了全厂职工都有利，搞不好要减发或停发工资。这样做，效果也好。乡镇企业搞得比较活，最重要的是政府机构对它们干预少，企业自负盈亏的观念比较强，一句话，它们基本上是自负盈亏的体制。将来我们可以把一些小企业的所有权转到县、转到区，这样做就是使所有权具体化了，有利于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第三，厂长与集体决策的关系问题。厂长也不能事事个人说了算，大事还要集体决策，大企业尤其如此。我看可以搞个管理委员会，但不要在厂长之上再搞个企业委会。管理委员会可以有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参加，集思广益。第四，承包以后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要进一步研究。一些中小企业，最好是党委书记由选举产生，选上谁是谁，谁当选就给谁一定的待遇。

完善、发展承包制，还要研究发包单位和承包市场问题。可以设想，一是在财政部门里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就代表国有资产；二是以市或县为单位，设立一个承包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管投标、招标、发包，而且还管协调承包中间出现的分歧。这个委员会是市或县政

府领导下的机构，是一个有权威的协调部门，和资产所有者是两回事。要研究一下承包市场问题，要创造一个市场条件。有了承包市场，就有了媒介，谁想承包企业，谁想找承包者，可以到这里来登记。市场可以推荐一些企业家，但也要担保。这样，企业家就有了“俱乐部”，企业家集团的形成也有了一个条件。也可以通过企业家协会来搞承包市场。可以先在几个城市试点，创造经验。

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法(草案)》 的修改问题

党的十三大以后，很多东西都明确了。大的原则应当反映到《企业法》中去，当然，不成熟的不要写进去。要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袁宝华、安志文、宋汝芬²同志参加，把《企业法》再改一遍。要反映十三大的精神，反映企业承包发展的新情况。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想必须写进《企业法》的总则，如果不明确规定这一条，企业法就失去了灵魂。《企业法》必须反映新的东西，同时要注意和防止有哪些写法将来可能会限制承包制的发展，限制改革的深化。《企业法》一定要明确地体现承包制，体现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应起保证监督作用，支持厂长负起全面领导责任的内容可以写得原则一些。争取最近修改好，明年提请人大审议通过。

注释

1. 赵修(1921-1992)，河北井陘人，原名赵辛酉。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湖北省副省长，武钢党委第二书记，农业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

2. 宋汝芬(1922-2014)，山东烟台人。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曾任北京市地方工业局局长、计委副主任、建委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党外人士 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今年三月我出席了全国政协的常委会议，讲过一次话。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看这八个月形势的发展同那时的预料是吻合的。那时有个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干扰的问题，这八个月中，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健康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更加牢固了；改革也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发展了，更深化了。整个来讲，我们改革的步伐不仅没有放慢，而是加快了，有些改革今年已经出了效果，明年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最近我们党召开了十三大，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开放，透明度较大，在座的一些老朋友还亲自列席了大会，其他朋友也通过电视、报纸、广播，了解了大会。老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提出来。这样，大家讲，大家听，大家议，直接对话，比一个人讲许多人听好得多。

多党合作是我们的优点，统一战线会更加牢固发展

大家讲了许多好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十三大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对爱国统一战线当然也会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对政协的工作，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肯定会有深刻的影响。十三大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意味着什么？这是个大题目，很值得深入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要研究，请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来研究。总而言之，十三大将意味着我们的统一战线会更加牢固，更加发展。两面旗帜：一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一面是祖国统一和振兴

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我们的统一战线肯定不会削弱，不会萎缩，相反，团结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团结一定会越来越亲密。

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兴利除弊。弊端，要除；优势，要发扬。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都是我们的优点、长处，应当在兴利除弊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且逐步走上制度化的道路。具体怎么做，如何逐步形成更规范的制度，如何赋予好的形式以更充实的内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首先是集思广益，然后分别轻重缓急，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

教育科技事业发展会迈出较大步子，但资金短缺是一大问题

十三大以后，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会迈出较大的步子，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之间的关系会处理得更协调一些。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当然，这要靠经济界和教育界、科技界共同努力，大家都来促进。

教育的重要性，十三大讲得很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经费怎么样？我想讲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我们的教育经费确实不够用，这是事实。第二，我们的教育经费确实在逐年增长，而且它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这也是事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年年如此。一九七八年，国家财政总支出是一千一百一十一亿元，一九八六年，国家财政总支出是二千三百三十亿元，九年增长了一点一倍。列入国家预算的教育部门事业费开支（不包括各地方、各部门、企业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一九七八年是六十五亿，去年是二百一十四亿，九年增长了二点三倍。一九七八年，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去年占百分之九点二。有些同志和朋友经常为教育费用呼吁，我们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也理解教育界的困难。我现在说一说这几年教育费支出的实际情况，是希望同志们也了解政府已经做了的事情和政府的困难。资金短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将来很长时期内估计也不会富裕到哪里去。工业，农业，交通，通讯，市政建设，到处都是资金短缺。教育经费在总开支中的比例由百分之六上升为百分之九，实际上就意味着其它方面开支的相对压缩。今后，政府还是要尽力增拨教育经费，

做到逐年有所增长，并且尽量使增长的幅度继续大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但是，要求更高，是办不到的。今天我专门说一下这件事，希望大家理解国家的全面状况和实际困难。我是要辞去总理的职务了，希望大家将来还能理解新总理的困难。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很多，包括工资，职称，住房等等。过去几年，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近期可以做的事，国务院有个初步考虑。过两天，可以请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讲一讲，通通气。

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在十三大报告中，把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这个论断，是从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在祖国边疆比较贫困的地区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得出来的。

今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一方面在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继续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强自身的活力：一是加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和经济管理、科技人才；二是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走改革、开放之路，逐步改变封闭状态，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发挥本地区的优势，加强同其它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迅速提高生产力；三是继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不断巩固发展本地区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最近西藏极少数人配合在国外的达赖集团煽动民族分裂情绪，成为西藏地区不安定的因素。国外宗教敌对势力在内地一些地方的渗透，也影响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对于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的宗教活动，我

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坚决反对，并且依法严肃处理。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什么改变。坚持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也是国家的法律，不需要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做好台胞探亲接待工作，促进“三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台湾当局最近采取放宽台胞来大陆探亲的措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影响和台湾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通商问题也或迟或早会提上日程。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台湾来大陆探亲的接待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助于沟通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联系，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信任感和向心力，而且对促进“三通”、实现和平统一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听说一些民主党派中央已经要求各级组织和成员认真做好有关接待工作，这很好。这方面党外朋友都是有着自己的优势，你们在接待中遇到什么困难，可请台胞探亲所到地的统战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十三大制定的宏伟目标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也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重道远，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

给《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经济日报社：

在《经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时候，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坚持改革，不断创新，把这张报纸办得更有生气，更有深度，更有特色，为宣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贺信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国家体委转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开幕的时候，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体育爱好者以及为这次体育盛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前来参观盛会的朋友们、同胞们表示热诚的欢迎！

我希望今后在全国更加广泛展开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加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预祝第六届全运会获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赵紫阳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总结实践经验

提高贯彻十三大精神的自觉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江西要走改革开放之路。江西是个内陆省，离沿海比较远。如你们说的，信息不那么灵通，商品经济观念、市场观念，不像沿海地区那么强，要差一点。这次要利用传达党的十三大精神的机会，好好地把干部的认识提高一下。要有针对性，明确在江西干部思想上主要应该解决几个什么问题。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不是很短的时间，不是一阵风。要有针对性地来传达、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看看在江西干部中间应当主要解决几个什么问题，抓住这几个问题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结合总结回顾改革九年来的工作，结合干部自己的经验，有的搞得好的，有的搞得差的，每个地区都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一些教训。结合这些，使干部思想能够进一步解放。

我们走改革、开放的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原来就很明确的，而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的。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那时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提出来，承包制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农村包产到户也不是很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搞

^{*} 这是赵紫阳在井冈山听取江西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修改六十条，把反对包产到户改为不要包产到户。但是我们跟过去不同，我们有个正确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就是对凡是群众中间出现的东西，我们都不轻易否定，先看一看怎么样。好，我们就承认它；不好，我们就改正。在群众中间，比如说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农村也出现过许多好东西。广东就搞了联产责任制，叫田间管理联产责任制，那时有意识地说是田间管理。在安徽搞了责任田。当时这些对农民渡过困难，都有好的效果。还有更多的地方搞包产到组，也取得了效果。但是那时候我们思想路线不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时候从“左”的观点出发，都把它否定了，作为错误的东西批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农村这个路子我们提倡由各个地方自己去走。一开始说边远山区可以包产到户，以后讲在一亿人口的困难地区可以搞，以后说除了少数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一般都可以搞。给群众一个选择的机会，给各级干部一个选择的机会，最后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好，在三年时间内，农村以联产、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这场改革，就基本上在全国推开了。以后承包又进入了城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虽然提得比较早，但是当时提这个初级阶段，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像并不是很明确。我们那时候进行的许多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也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就去改革。九年来，主要是根据一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都承认它，都允许试验，允许探索，实践证明好的都允许推广。我们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我们这些办法都是有效果的，人民都看到了，得到了好处，大家都觉得好，拥护这些办法。但是另一方面，过去并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这个水平上，因此一边做，一边还不那么踏实，很多干部心里不那么踏实，经不起风吹草动。有些比较谨慎的同志还与这些办法保持一定距离。现在我们经过九年，十三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为什么这套办法、这套政策能在中国发生这么好的作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就是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必须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方针，这样的路线。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情况那就不同了。我们在十三大总结了九年来丰富的实践丰富的经

验，在认识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用这个认识去武装全党同志，改革开放就更加自觉了，精神状态就不同了。我们应该把十三大总结出来的东西，有力地去指导中国的实践，有力地去促进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全国都应该这么做的。就江西来讲，更有这个必要。江西的同志讲，更加需要在干部中间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方针的教育。当然，你们说的从外地请进来，本省到外地学习等等都有必要。我看你们自己中间，干部中间，就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把正面的反面的、成功的和不那么成功的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干部的思想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就会再实现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我想这对今后江西的工作会有很大的意义，也会发现很多的干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开发江西丰富的优势资源。尤其是农业资源，当然矿产资源也是很丰富的。你们的农业资源，在周围这几个省份中，是比较突出的。包括木竹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水面等等，总之，相对来讲，你们人口比较少，面积比较大，资源比较丰富。你们的弱点，主要在资金、技术、交通、信息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要走这样的路子，就是利用你们的资源优势，同沿海地区进行合作，他们需要你们的资源，你们利用这些资源同外地合作，来克服技术方面、资金方面、管理方面以及信息等方面的不足。江西不是沿海，但是靠近沿海，附近有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还有上海，你们是他们的腹地，是比较近的腹地，合作比较有利，有很多好的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沿海省份实行开放，实行大胆的开放政策，与沿海发展经济技术合作，把你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对资源的开发，通过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转化为对资源的开发。凡是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都有一个资源开发的问题，都有一个资金、技术、管理的问题，资金积累的问题。要通过合作的形式吸收外来的资金，吸收外来的技术。通过合作来积累资金，有了资金就可以扩大开发。我看确立这个思想很重要。如果拒绝同外面合作，光依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积累资金，这个时间恐怕就拖得比较长。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如果说，利用自己的资源，吸引外来资金、外来技术进行开发，那么，开发资源的资金可更多地依靠外地。你们自己的资金，恐怕还要用在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多考虑改善投资环境。如果你电

也没有，交通也不通，运费很贵，虽然你的资源很丰富，也不一定就有很大吸引力。

第三，讲讲承包引进竞争机制的问题。我们在北京进一步研究过这个问题，工业企业的承包看来不是短期的。这几年，对这个问题有些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经过几年反复看来看去，中国还得要走这条路。像农村一样，过去曾经讲过“包”字进城，看来还要这么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承包制这个办法，是在目前我们市场调节、市场环境、市场条件并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能够把企业推向自负盈亏的比较可行的办法。而企业只要走上自负盈亏这条路（当然是相对的，相对的自负盈亏），企业的潜力就可以挖掘出来。我们现在的国营企业，各个层次的国营企业，大家公认潜力大，甚至越是落后的企业潜力越大，越是亏损的企业潜力越大。就像我们开始搞农业承包一样，潜力是很大的。这个潜力之所以不能挖掘出来，就是因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统收统支。只要能把企业推向承包这样一条路，在几年之内，企业效益就会有明显的提高。比如，吉林省，全省工业搞承包，连续搞了五年。这个省过去的工业管理、工业效益在全国的位置都是很靠后的，经济效益不好，管理不好。搞了五年承包以后，经济效益连续提高，在全国各个省份中，除了广东因为有出口、来料加工等等以外，以一个省为单位来讲，连续五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的，就是吉林。吉林过去是个补贴省，财政不能自立，五年实行承包以来，几乎每年都增加几个亿。现在他们的经济效益在全国的位置大大靠前了，吉林的财政早已经不需要国家补贴了。这说明，承包是大面积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办法。

在我们的国家，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当然，我们只有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真正提高；但是，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提高，我们根本就无力去形成这个新的经济体制。你财政很困难，价格改革不敢进行，那你怎么样去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所以我觉得企业搞承包经营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形成的，有利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有利于加快结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农村的经验很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农村突出是解决一个大锅饭，当时农村改革也没

有想到其它的问题。当然，现在的农村改革远远不是仅仅一个家庭联产承包的问题。农副产品价格的放开，农副产品市场条件的形成，都是因为先有了承包制。将来工业也是这样的结果。实行了承包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了承包，效果是很好的。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这就有利于克服承包中间某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国家对企业搞了承包制，不等于说企业内部的管理就搞好了，但是这为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提供了动力，提供了条件。所以我们有了承包制，还必须进一步解决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就是各个环节的经济核算，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基础工作，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这样，就有可能使多年来管理落后的企业很快改变面貌。首钢承包制的效果所以特别明显，这与首钢内部管理原来基础就比较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首钢过去的企业管理虽然比较好，但整个企业缺乏活力，到后来有了承包制，企业活力增加了，加上他们原来管理的基础比较好，因此首钢的效益就特别明显。这说明，搞了承包制，还要解决好内部的管理。我们要利用承包制来促进企业内部的管理。

在这里我说两个情况你们可注意一下。吉林这几年要企业搞了厂内银行，有二百个企业搞得非常好。他们省的人大主任赵修同志写了份材料，《人民日报》海外版登了，昨天广播了。这个材料我看过，并批复了。厂内银行过去我听说过。从吉林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如果真正去搞，认真去搞，这个厂内银行的办法对推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实行核算制有极大的作用。厂内各个环节人与人之间，班组与班组之间，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之间，基本上是一个等量劳动的交换。搞厂内银行，通过内部价格的结算，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克服大锅饭，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第二个情况是石家庄有一个工厂，搞满负荷工作法。这个厂的厂长很有点头脑，他这个满负荷工作法基本上集中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集其之大成，而且参照了中国的特点，现在有很多人去参观。满负荷工作法，很适合现在的情况，有利于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包括设备潜力。最近经委总结了，认为很值得提倡。

所以，承包引进竞争机制，有了这个条件以后，将促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从现在看，厂内银行和满负荷工作法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估计承

包制完全落实之后，对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这就包括企业之间相互承包，企业之间相互租赁，企业之间相互参股，企业之间相互有偿转让财产，或者就叫兼并，一般就是兼并体制、兼并机制，这样，我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慢慢地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经济上的合同联合、合同关系，或合同协作关系，它就触动了企业的所有权的问题。所以参股呀，承包呀，租赁呀，这对今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有很大的推动。吉林承包搞得比较早，现在它已经这样开始了。比如吉林化工厂，就把吉林市和外地的很多小的化工厂和它搞到一起了。这些小的厂子，原来有的是县的厂子，有的是别的市的厂子，现在都作为股份和它搞在一起。它是新的组合，优化组合，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条块关系的问题，其意义是很大的。所以人们讲，承包制，股份制，还有什么租赁制，这都不矛盾。只要经营权真正落实到企业，企业之间相互关系就会多样化，就丰富多彩了。看来中国企业的社会化问题可能从承包制开始，从承包制突破。

我顺便说一说，北京理论界搞研究工作的人已经接触了两个问题。承包制搞了以后发生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同志说搞承包制是企业所有权的倒退，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讲企业所有权，企业是法人，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后来我们说两权分离，我们这个承包制就是根据两权分离，好像财产所有权跟企业没有关系了，财产所有权是政府的，经营权是企业的，这样一搞，是不是企业自主权反而缩小了。这是一种认识。还有一种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就是过分强化企业所有权，想把经营权缩得很小。一些大的权力都要集中到董事会手里，在厂长之上还要设立一个有着至高权威的一个董事会机构。看来这种意见并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所有权，而是为了扩大、强化经营权。是强化企业的经营权，而不是强化国家财产所有权。不是用国家的财产所有权来制约、限制企业的经营权。要明确这一点。将来这个所谓经营权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包括财产的占有权，财产的支配权，财产的使用权。而所有权则是单纯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将来主要的就是分配关系，分红利，拿股息，股金分红，或者按股分成等等，法人仍然是企业，厂长仍然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个问题，你们下面不一定接触到，但它

在北京各方面的认识曾经有一段不是那么一致。这个问题不明确，就失去了我们强调的两权分离的原来的用意。

总得来讲，承包制还是开始，它需要充实、完善、丰富、发展。我们搞经济的同志，大家应当对承包制进行很好的研究，不断地总结经验，注意承包制在实践中间的发展，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它在两三年内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明显的效益。刚才，你们讲的是明年，可能还不止明年，恐怕在几年之内可能对我们的工业，并且不仅仅是工业，还包括商业、交通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缓解各方面的矛盾，改善我们整个经济环境，克服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紧张因素，减少我们在改革中、前进中的困难，都会有好处。现在北京组织一些同志正在研究《企业法》，想把这些重要问题，近年来关于承包制的发展，特别是两权分离的思想，以及承包制的原则，承包制大的方面的改革，在《企业法》中有所反映。使这个《企业法》能反映我们两年来在工业改革方面取得的新的经验。

关于一九八八年经济体制改革和 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明年的改革问题主要是工资、物价、大企业搞活方面。总的是巩固、消化，需要做些补充，解决一点突出的矛盾。比如房租改革明年就不能迈大步，只能试点。明年改革主要解决改革中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解决当前改革中冒出的新问题。

改革要存利除弊，因势利导。明年企业搞活方面也不迈大步子。但大企业要搞活，它们的税负比中小企业、集体企业重，任务也压得重。某些行业要解决点问题，如纺织行业的问题要解决一下。可否大企业搞活一点，小企业多收一点税，双方就接近些了。

对银行省市行的职权要划分一下，中央管哪些，地方管哪些。现在银行都是国家的，但地方不管银行，所以它拼命向银行要钱，或者自己搞信用社。地方没有框框，没有笼子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挂钩，中国这么大，完全没有地方利益不行，各省都搞省银行也不行。要想办法让地方自己管住金融笼子，地方有资金，也就有笼子，他会按这个框框用钱，也不会搞银行以外的东西了。把储蓄划分一下，哪些地方用，哪些中央用，开始给地方的笼子可以小一点。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体改委等单位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的讲话要点。

固定资产投资要甩一些到利用外资上去。真正看准了的项目，去借外债搞。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和平果铝矿可以借外资搞。上游搞好了，下游的发电能力就可以提高。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能否有个办法变成地方自己的要求，不光是我们要求地方控制。全国各地联合起来对付你北京，你不好办。

铁路包干的问题还值得研究，怎么包法？如果铁路包干，钱是它的了，就不听你了，你要修的路他不修。修哪条，不修哪条，由不得你。所以铁路的投入产出怎么包，要计委研究。可否按项目包？包营运？不要笼统地上交利润都包干。

企业的工资同效益挂钩的问题要慎重。如果百分之四十的企业工资实行挂钩，其余百分之六十的企业就要攀比，就会顶不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总工资水平必然都要上去。百分之十五的企业试点，影响还不大，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就挡不住了。在宏观经济讨论会上，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赞成我们搞工资与税利挂钩。企业搞工资挂钩，工资上去了，机关事业单位也就要求加工资，轮流加钱，物价就上涨，物价上涨又要求加工资。这样不行，这个问题你们好好讨论清楚。

明年工资总额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企业间工资可以有差别。现在搞来搞去只搞了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在企业内部恐怕大都还是大锅饭。工厂管理人员的工资不能工厂自己定，特别是工厂领导人的工资要由上面定。

现在职工收入增加了，生活提高了，可还是不满意，主要是工资分配不公平。工资应该有差别，不能平均主义；但又不能太悬殊，这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工资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要解决。南美国家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但收入悬殊，所以有不满情绪。启立同志介绍一本书《日本高速增长的社会问题》，值得一看。日本经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上反倒有不满，甚至有点动乱。这也是由于分配不公。生活都提高了，也可以有一片不满声，“不平则鸣”！

明年企业奖金就按四个月为限，超过照收奖金税。企业内部合理分配。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哪个企业工资特别高，我想主要是有失业后备军，它有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来决定。

钢材专卖，叫不叫专卖？可以叫国家加价订货，强制收购。你们再研究，反正不能把价格好处让中间人拿去。

地方企业不及时结汇，钱反正还在，只是我们没有拿到。当然要抓紧让他们结汇。

看来，物价问题，其实是生产资料价格问题，特别是钢材问题。工资问题，是机关、知识分子问题，还有企业和效益挂钩问题。挂钩试点，可以，但不宜扩大，否则工资水平、消费控制不住。

对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把在广东和到这儿看了以后的一些想法一起谈一下，基本的想法是一句话，我们要把沿海这片地方甩到国际市场上去，靠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小康也好，现代化也好，都要以对外贸易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经济要依靠对外贸易，我国还是个经济弱国，整个中国发展贸易立国、贸易兴国，可能还不行，但沿海地区完全有这个可能。广义来讲是沿海，也可能讲是二亿人口。以前我们讲的都是讲城市人口，现在看来不只是城市，包括沿海的农民，农民中要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转出来搞二、三产业。沿海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民转向二、三产业，完全靠国内市场是不可能的，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哪些矛盾无法解决呢？首先是原料无法解决，而且同中部、西部地区的矛盾非常尖锐。原料问题、市场问题都无法解决。中国要兴旺发达，不挤上国际市场，不在国际市场占据应该占的份额，这不行。如果沿海地区把二、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转向二、三产业，相当部分需要靠外向型经济，依靠国际市场，靠国际市场养活自己，那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如果将来整个沿海地区城市加农村，依靠国内的原料加工，占领国内市场这个路子是走不通的。因为整个国内的原料很不够，市场也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把沿海地区二、三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转到外向型这样一个轨道上去，那就

^{*} 这是赵紫阳在苏州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好处，不仅可以同中部、西部地区减少矛盾，而且势必要把中西部的经济带上去。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刚才我讲的是必要性，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对我们十分有利。有没有可能？我看是很可能的。根据最近的情况看，也是非常可能的。就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这种农业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依靠国外市场，依靠国内和国外进口原料，然后我们自己加工，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等于劳务输出，是可能的。整个国际市场上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劳动密集型商品，或者劳动密集加知识密集。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国际市场是有的，总有相当数量的这种商品。当然，所谓劳动密集是相对的，现在的劳动密集与上个世纪的劳动密集不一样，下一个世纪的劳动密集商品和现在也不一样，在成本构成中，终究有一个商品劳务费用比例较高。生产这一部分商品，谁能够具备条件？首先是要劳动力便宜，谁的劳动力便宜，谁就具备条件。当然，这种劳动力，光便宜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素质、技术、管理，能生产出质量比较好的产品。这个条件我们差一些，但差一些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依靠乡镇企业这种灵活的机制。这一部分企业是在竞争环境下产生的，因此它的机制也适合竞争的环境。我们乡镇企业有这个条件，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完全有条件使我国的劳动力尤其是沿海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既是费用廉价的，又是有技术水平的劳动大军。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比韩国、香港差，更不应该比马来西亚和泰国差，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最大的问题还是制度、体制问题。我们能不能转到这个轨道上去，能不能适应这个条件，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体制的限制很大，所以需要很好地研究体制，现在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我们费用是很低的，如果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它的机制也是好的，将来会出现很多很会经营的人才、企业家。现在我们整个体制特别是出口贸易体制，问题比较突出。刚才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也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比较好，需要很好地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一点，总之我们会逐步改善的，总会把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但不可能一个早晨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只要在三个问题上解决了，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这个思路

是完全可能的。一是廉价劳动力，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二是比较好的企业机制，包括管理、劳动力素质；三是整个进出口贸易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最大，影响最大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好，沿海的劳动力在国际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总之，主题就是如何搞好沿海地区，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现在这种机会，利用我们的优势，加快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也有意义，特别是“一国两制”的问题。如果我们沿海有几块地方，不要说有两亿人口，一亿人口，就是有五、六千万人口，经济真正搞得比较好，对我们解除香港人的疑虑，非常有好处。对实现祖国统一，解决台湾问题，也非常有好处。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我说的还不是台湾当局，主要是中间人士，甚至赞同统一的人，也认为统一时机不成熟，主要是经济差别太大。只有等到将来经济差距缩小了，就为统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一定条件。台湾只有两千万人口，我们大陆上如果有五、六千万人口不要说接近台湾的水平，只要发展确实比较快，那统一中的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就可以减少台湾人的顾虑。这在政治上，对实现祖国统一，不论是解决香港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都有好处。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

这两天讨论对需不需要这样做，可能性怎么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政策上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还要回到北京去研究，现在《纪要》主要是把江苏和浙江两个省提的意见写进去，究竟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到北京还要进行研究。

现在长江和珠江两个三角洲地区都是外贸比较多的，今年发展比较快，但出口额也才占这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所以潜力很大。沿海地区如果搞到百分之五十就很可观了，世界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国出口额将来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那沿海地区就必须百分之五十以上。关键是原料，还有一个是市场。市场就决定于你的竞争力如何。另外就是进口原料，正因为你的原料必须进口，进口以后再出口，所以你就有点本事，没有本事进口原料，吃国内的低价原料来出口，这不是本事，而且这个时代也没有了。过去沿海主要靠内地的低价初级产品，经过加工卖出高价。现在有些原料比国外价格还高。进口材料——出口创汇——再

进口，如果这条路走通了，这个路子就非常宽广了。所以在沿海可以用周转外汇的形式，大进大出，一定要给许多方便和条件。沿海地区外贸体制如何改革，你们研究一下如何写法。现在这个写法比较碎，没有一个纲。外贸体制改革，关键是要真正下放权力，要使这个地方进出非常方便。当然要下放权力，要使进出非常方便，又不要发生问题，这就必须解决一个自负盈亏的问题，有了正确地解决自负盈亏的办法，有个制约。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写进去。不下放权力、放开经营，来去就很不方便，就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多的条件也不能利用。放开经营，乡镇企业也好，一个公司也好，它要进什么货，出什么货，它就可以立即拍板，不是半年，而是一两个月要进的东西能进，要出的东西能出。沿海地区如果不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对外贸易就发展不起来。改革外贸体制在我国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个早晨就解决，但我们总得按这个方向来解决问题。当前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可以列出来，可以带回北京去讨论。

现在已经证明，沿海经济发展对带动内地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连劳动力都转移出来了，沿海地区的劳务不是直接出国，是变为物品出国，内地的劳务直接“出口”，也可以到沿海地区来。

从国际市场来看，我们实行这个设想有三个依据，第一是和平环境；第二是我们制定了长期开放的政策；第三，资本主义市场虽然动荡不稳定，但是从总体来讲，资本主义经济还会取得一定的增长，这是大趋势。我国在国际上贸易份额占得太少了，只要我们有本事，就是国际经济没有大的增长，靠我们劳动力的便宜，靠我们的技术素质，我们应当占到一定的份额。美国人讲我们出口得太多了，我讲我们中国出口货物只占美国进口货物的百分之二，我们中国在美国贸易额中应当占多少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出口份额没有占多少，不应该只看增长多少，而应该看到我国还没有达到应该占的份额。香港、台湾这些地方原来就是靠它的低成本，当然他们也有个条件，就是质量和管理。但首先是劳务费用低。日本在币值升值以前，劳务成本一直比美国低，所以有巨大的竞争力，当然它现在币值升高了，这是另外一码事。

我们的乡镇企业要和科学技术结合这个论点没有写进去。乡镇企业机

制好，如果把科技力量和灵活的机制结合起来，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增强。一方面我们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非常需要科技，科技单位与乡镇企业结合更容易些。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研究。乡镇企业也是公有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潜力？现在乡政府同企业的关系究竟是不是搞得很好了？需要很好地研究。乡镇企业的经济负担要制度化，不能是想派多少，就派多少。比如说国家收多少税，乡里头收多少？你要企业交的就是那么一块，我的财产给你了，你赚了利润的多少给我，剩下的对企业恐怕就不能够干预了，企业的事情就不要干涉了，真正使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这才真正是法人。既然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这个企业和各个企业之间，将来就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组合形式。譬如说，股份制，将来有一天就可能表现为：没有哪一个说，你这个企业归哪一个乡，就没这么回事儿。至于说企业里头有你乡里头多少股份，还有另外一个乡有多少股份，还有国营企业多少股份，甚至还可能有外国人多少股份。要突破这个障碍，给它开这个路，让它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样企业慢慢就离开了地区、政府，股份制将来恐怕是乡镇企业的一种主要形式。企业必须有兼并的机制，我能够把你买过来，你合到我这儿，才有生产社会化，企业结构就合理了。将来也可能有那么一天，我们真正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公司，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国营公司，而是某些在乡镇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很有可能。和一些乡镇企业厂长一谈话，就感到他们不简单，头脑不一样，想法不一样。

我们资源丰富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第二，可以说煤炭是丰富的；第三，石头是丰富的。中国应当下决心，建筑材料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第一个是有煤，这三年是中国建设规模最大的三年。水泥是特别紧张，但还是缓和了。你们浙江为什么不可以下点力气，把石头搞出去，就是下决心搞石头，花岗岩、水泥、陶瓷。所以我们中国要发挥煤的优势，一个煤直接出口，一个把煤变成载体出口。中国煤是丰富的，长期来讲，中国的电不应当是紧张的。有煤就有电。电要靠自己。耕地资源我们比澳大利亚差多了，澳大利亚多少人口啊？一千六百万人口，七百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十一亿人口。总而言之，工业收入多了，农业就好办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阶段，都是依靠殖民地来解决原料和农产品，典型

是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出口的东西越来越多，依靠第三世界的原料和农副产品，除了石油以外，依赖的程度比原来小多了。为什么他把农副产品的出价压得那么低呢？欧洲现在的黄油为什么堆积如山呢？资金多啊，科技发达啊！所以现在没有饭吃的还是第三世界。只要农村工业多了，二、三产业多了，农业肯定会兴旺的，通过税收也可以，通过上缴利润也可以，支持农业发展，总之那时就好办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吗？苏锡常地区的企业都希望和上海联合，例如昆山那个地方，都希望同上海联系。由于上海客户好，信息好，外贸也有本事。总而言之，上海这个码头，有两百多年了，它同国际市场的联系、经验、信息、交通、知识，它应当为长江三角洲进入国际市场服务。当然像那样上海就繁荣了，上海市绝不是你自己六百万人口的那个上海，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但现在这个行政区划、利益关系，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当然我们今天的行政区划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计划是切块的，以省为单位来计划的。现在这些地方都跟上海联系了，江苏、浙江的利益确实是会受影响的。那天浙江嘉兴的同志讲，基本上两条，计划内的通过杭州，计划外的通过上海。两个账户，两个户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从上海出口，客观上非常有利，由于人为的行政区划、行政体制的关系受到限制，这也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这是体制的必然。你到上海就是一个观点，到杭州又是一个观点，这是自然的，这有个利益关系。怎么样才能协调利益，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像苏锡常，像杭嘉湖，要按口岸有利，大量商品应通过上海走，应当纳入上海的外贸体制。当然，江苏、浙江怎么办？是不是上海和两三个省，整个搞个外贸联合体、联合公司，解决这一带农副产品出口问题，及整个出口问题。外汇怎么分？这种形式可不可行？我没有很好考虑。总之，现在这个问题，企业通过上海口岸，大量搞来料加工，特别是进料、出料，从上海进，这些企业加工后再出口。但是如果江苏、浙江离开了这一块，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这不是简单的利益问题，这是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协调，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且听下回分解。要解决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轨道上去，必须解决口岸如何为这些地方服务的问题。

如果上海有十亿美元的外汇，就把外汇调剂稍微放开些。深圳的外汇

市场是放开调剂的，最近下跌，现在已经降到六元一角兑一美元，他现在不是没有外汇，是没有人民币。

外向型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是这么两种说法：一个叫做进口替代型，一个叫出口导向型。什么叫进口替代型？就是借外债发展自己的工业，减少对国外的进口。比如说，墨西哥、巴西和拉美这些国家，还有东欧这些国家。我们中国现在也还是这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出口导向型，一个日本，一个韩国，一个台湾地区，基本上都可以把它们列入出口导向型。虽然情况不完全相同，看来借外汇发展工业的路子，进口替代，好像往往不如出口导向型。这是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个东西还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国家恐怕两个都要搞。有的地区，大的重型的工业当然还是要搞，另外一个，能够出口还是尽量出口。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就是两种策略：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一般搞出口导向经济轻型的多，进口替代型重型的多。

外贸体制必须要搞活，以进口原料出口的必须要搞活，将来我们要大进大出，没有一个非常灵活、非常灵敏的体制，确实是很难适应，一个进不来，一个出不去。

这次江苏、浙江两个省的意见，包括地委、市委的意见，很重要的就是，主张外贸改革实行包干制。包干以后，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是中央调节，企业自负盈亏，这是一种思路。或者是规定不同的换汇成本，或者是增加一部分调节税，或者增加海关税。譬如说，换汇成本比较高的，你还得给补贴。这是一种。这一种形式的好处是离将来的规范化可能比较接近，但是很难避免地区与地区之间打仗。要搞一个调节手段，没有半年是出不来的。今年发生的问题，明年才搞调节税。包干这个办法，可能将来不是那么规范，但是有可能比较早一点走进自负盈亏。地区一自负盈亏，它势必往下放，不然它自负盈亏怎么负？最后还得给企业定个规矩，你这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利润比较多，我给你外汇留成就少。你这个企业出口成本比较高，而且必须，我就给你外汇多留一点。大体上像我们现在搞企业承包。通过这种办法，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使企业的差别平衡了。有可能是这个结果。当然，从形式上看来，好像是有点不那么规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你们省、地区的同志都主张包。通过包干使利益协调，基本上和现在的承包制差不多。包干的结果实际上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

同的外汇待遇，不同的换汇率。这个办法看起来不太合理，但可能比较简便易行，因为这是个经验的方法。在我们目前全国各种统计、资料、信息都不那么有把握的情况下，在全国规定一些调节手段，譬如不同的换汇率，现在又讲搞不同的税收调节，结果地方与地方之间怎么样？要想出办法加以解决。

江浙的优势，那不用讲，不管外贸体制改革用什么方案，都会使沿海大发展，内地搞不起，内地最后没有办法就势必要和沿海联合，这是必然趋势。我们去年曾在青岛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案，沿海都是占便宜的。至于说差别嘛，恐怕将来包干以后还会有所不同，不过换汇成本比较低的，今后可能要外汇要得多一点。凡是换汇成本比较高的，像西南、西北，那些地方恐怕就基本上不能再上缴了，他自己补也不够。外贸包干，关键一个是基数，一个是增长部分要研究个好的办法。这个定下来之后，对企业来讲是自负盈亏的体制，政策就是这样了。企业和企业之间上下之间就不可能吃大锅饭了。这跟我们乡镇企业包干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要说不合理，确实是不那么太合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目前这个办法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现在也无力继续下去。假如明年我们大家都继续搞出口，究竟中央财政要补贴多少？要说中央不补贴，要控制补贴，马上外汇就没有了。我去年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青岛找了好几个人，还带来几个人，设想了一种方案，下决心今年搞，搞来搞去出不了台。原来说今年出台，今年到十二月一看不行了，各地方都心里没有底。今年不搞了，明年不搞了。现在搞来搞去搞了三个公司。我现在听这三个公司讲，这个搞法也不行。但是如果真正包，尽管多少不合理，我想它至少有几个好处：第一，中央财政不再补贴；第二，出口积极性不会受影响；第三，首先地方上要讲究经营。总的来讲，省里抓，它就好比中央抓成本要下降。如果把企业再搞得落实一点，如果再搞代理制，这个潜力就很大。外贸企业的创汇成本潜力大。快交货，早交货就多收汇。

你们这里把文件修改好后送到北京，再请国务院讨论决定。

以改革总揽全局*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今天的会议打算这样开，我先讲几句，然后主要是李鹏同志讲话，最后请万里同志和其他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都讲一讲。

我简单地讲三点意见。

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经同意。大家也都知道，人大常委会已经决定，由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就由李鹏同志全面领导。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国务院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但是，我认为李鹏同志领导国务院工作是胜任的。同志们知道，在十三大以前，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一些老同志反复酝酿，大家都认为李鹏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国务院在他主持下是能够做好工作的。党中央的态度是全力支持国务院主动开展工作，希望国务院的同志

* 这是赵紫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召开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在十三大胜利召开后，中央决定赵紫阳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这是他在国务院总理工作交接会上的临别讲话。他在讲话中总结了在国务院领导岗位上八年工作体会，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改革总揽全局”。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总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不能把改革和各项日常工作平摆起来，必须把握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内在联系，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才能高屋建瓴，在整个国务院工作以至国家建设中掌握主动权。”这是他对八年来在国务院工作的科学总结和心血结晶，对治国理政有着深远、重要的指导意义。

们大胆放手地履行职权。我也希望国务院的全体同志都在李鹏同志领导下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把国务院的工作做好。

第三点，今天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¹的同志都在座，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改革。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总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

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认为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对不对？也对，但是看来，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更带有根本性，更尖锐。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科技进步不解决，经济效益不提高，国家和人民就富不起来。当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很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对发展生产和提高效益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如果在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没有很高的觉悟，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被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要解决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这两个问题，传统的路子走不通，非对现行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不可。所以，“七五”计划讲了，在“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十三大报告也讲了，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根本上说要靠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只有着眼于改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较为准确地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也只有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带动各项工作更好地前进。因此，我认为，不能把改革和各项日常工作平摆起来，必须把握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内在联系，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才能高屋建瓴，在整个国务院的工作以至整个国家的建设中掌握主动权。

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

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勇于开拓的精神。小平同志经常提醒我们，改革要有勇气。要不怕承担某种风险，及时作出决断，不然就会久拖不决，贻误时机。当然，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反复论证，体察一切情况，力求搞得准确、周到一些，尽量减少失误，减少震动。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这个办法不行，用另一个办法去改，这个部署不行，用另一个部署去改，坚定不移，不断前进。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至机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要改革能够一步一步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项工作就都有了希望，我们就有可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胜利。因为这是我在国务院工作中多次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所以今天着重说明一下。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十三大精神，通过对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将会更加统一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的认识。过去对有些问题是知其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出发，就可以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结合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和这几年改革的实践学好十三大文件，就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执行得更有效。

注释

1. 国务院全体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组成，由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二）部署国务院的重要工作。国务院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接见第八期体改研究班学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明年体改内容是丰富的，步子也不小。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以及今年国务院自北戴河会议以来做出的明年改革的部署，步子不小，是多方面的。最近国外对我们改革有误解，说我们改革停顿，这不符合实际。我们改革有些未按原来的设想进行，主要是价格问题。价格是整个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价格改革的过程可能要长些。现在已看得很清楚，这里不仅有价格改革为其它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还有其它改革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原来想先搞价格改革，以为价格改革搞好了，形成市场条件，其它改革就迎刃而解。这不符合实际。价格改革与其它改革渗透在一起，由浅到深，贯穿其中，是这样一个过程。仅仅看今年没有大的价格改革出台，明年也没有大的价格改革出台，就认为我们改革迟缓下来、停滞下来，这不符合我们的实际。

明年改革有许多方面。告诉大家一件事，外贸体制改革已经定下来，要迈一大步。国务院李鹏同志主持定下来明年一月份开省长会，外贸也要走包干的路，通过包干，使外贸一直到今天还是吃大锅饭的情况有个大的改变。同一九七八年相比，我国吃大锅饭的体制已有相当大的改变，虽然不平衡，有的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有的大锅饭改成小锅饭，有的大大锅饭改成小大锅饭，这也比吃大锅饭好。但外贸全国一口大锅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所谓对外开放，很重要的是要加强和扩大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

* 体改研究班是国家体改委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

的联系，这就要通过外贸。现在外贸有很多严重的弊病，质量差，交货不及时，货不对路，浪费，信息不灵，不讲究做生意等等，根子就是吃大锅饭。这次十三大对外贸体制讲了四句话，实际是五句，有一句不好公开讲。四句话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产销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是统一对外。关键是前两句，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外贸不放开经营，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但要放开经营，一放开就出现多头对外，削价竞争，水货充斥，最后大家都搞不好。现在，哪一年外贸出口多一些，财政就吃不消，哪一年外贸出口少一些，财政就好一些，但外汇就困难。外汇和财政是跷跷板，这几年我们就在跷跷板上过日子。企业在改进外贸经营，提高外贸质量上有极大潜力，关键是外贸机制不行。想来想去，现在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外贸包干。中央对地方包干，地方与企业包干，大体上还是农村承包的路。中国已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子，在许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解决自负盈亏比较好的形式是包干。包干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陷，但有利于解决吃大锅饭。有了这一条，许多情况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许多问题就可以在变化中解决。外贸不搞包干，仍然吃大锅饭，这样下去不行。我一到北京，国务院最先讨论的问题就是外贸体制，因为要开放，搞来搞去找不出一条路子。现在找到了，明年下决心搞外贸包干，不是三个公司试点，是全面包干。明年一月份就开省长会，现在正在研究方案，初步听到反映各省都赞成。这是很大一步，明年不一定见很大效果，二、三年后会见很大效果，不仅是创汇数量，还有出口质量。这样，开放这一头就会搞得很好。

其它方面的改革，如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也是很大的问题。物资体制改革明年这一步走好了，就会在中国找到生产资料市场的路子。明年成效不一定明显，但为今后的生产资料市场创造了条件。还有如工资制度、劳动制度都在改。要循序渐进、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总的方针是全面推进改革。至于哪一年走哪一步，走多大步子，放在什么位置上，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总之，现在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外国人说，中国石头已经摸到了，怎么还不过河。我们改革有蓝图，目标是明确的，方针是明确的，具体路子怎么走，要靠实践。关起门来靠电子计算机搞出完整方案，中国做不到，哪个国家也做不到。改革总目标十三大已经明确了。

明年改革要把进一步完善发展企业经营机制作为重点。现在看得很清

楚，在全国目前这个条件下，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入、完善、发展可以进行，当然要相应搞些外部配套改革。在一段时间里，整个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要把企业搞活，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这样讲的。把企业搞活，应当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当然，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实践。增强企业活力是中国改革的着眼点，也是目的，在最近几年要抓住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抓好了，就有可能为其他改革提供条件。农村就是这样。现在农村改革与五、六年前大不相同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面临着大量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条件。当时是从包产到户入手，家庭经营开始。但这样搞的结果恰恰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兴起，为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现在我们的企业一般来讲都有很大的潜力，外国人看了都是这样评价：原来以为中国企业的厂房、设备都很落后，看后认为设备很不错，技术力量不差，但效益太低，这是普遍问题。台湾、韩国都有这个看法，认为企业装备比他们十年前好得多，但效益很差，浪费太大。前不久我去浙江嘉兴，沈祖伦¹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他接待了許多人，都反映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太差。中国的问题单纯从管理上去解决不行，基本问题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没有竞争机制，许多老大难问题解决不了。我在农村干了许多年，农村多年来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撒化肥在田边上，不撒在庄稼窝里，锄草不锄干净，多锄几遍可多得工分。实行联产承包制，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要抓住这个问题搞好企业。搞活企业必须有外部配套，但同时也要看到，企业搞活了将为整个改革创造条件，许多困难可以缓解。改革中很大困难是财政问题，现在如果一年能多搞二百亿元，许多改革如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就容易了。关键是把企业搞活，企业效益提高了，财政就好了，市场也好了，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改革中的矛盾。今后几年紧紧抓住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不放，把企业搞活，就可以出效益、出商品、出人才、出经验，带动整个改革前进。

企业经营机制怎么改，主要是通过完善、发展承包制入手，这个问题也是几年来反复实践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最可贵的是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框框。我们有两条，第一条，

我们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第二条，是从实际出发。我对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过，有了这两条，我们就无往而不胜。目前我们困难不少，但信心很足，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两点上。实践证明是好的就干，不好的就不干，没有任何框框。当然，能否想出更理想的办法，要实践。承包有许多好的经验，在实践中还会有许多新的创造，如吉林就有许多新创造。吉林搞承包制时间最长，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搞，开始时我们不大赞成，他坚持搞，现在搞得好，搞得正确，我们就学习。承包制要搞清几个问题：

第一，承包制的理论根据。搞承包制不是从理论根据开始搞起，是从实践开始搞起的。现在找到了理论根据，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也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根据，要明确这一点。现在理论界，各个方面看法不一致，这不要紧。社会主义民主嘛，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是总的要向这个方向去。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个理论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如果提出的理论和办法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而是把企业这几年已有的自主权拿上来，那就是背道而驰了。因为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把企业搞活。原来基本模式是：因为是全民所有制，所以一切由政府直接管理。现在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能由政府管理，而要让企业自己来管理，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根据。不是强化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是强化企业经营权。要明确企业是法人，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能越搞企业的法人地位越不明确，不能变成财产所有者是法人，政府是法人，企业是雇员，那就把改革方向颠倒了。改革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过去一些人不赞成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权不能放下去。现在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又讲经营权不能搞得太大。通过强化财产所有权，为财产所有者过多干预企业找出理论根据，这不是两权分离的初衷。因此发生什么是所有权，什么是经营权的问题，不能拿过去资本主义时代家族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模式来看所有权。而要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特别是股份制出现后的所有权形式。最近查了书，马克思早就说过，自从大公司特别是股份制出现后，财产的所有权是单纯的财产所有，经营权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应按照马克思说的来理解所有权和经营权。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企业财产是国家所有，企业代表

者即厂长的经营权应包括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还要加上个处置权。有人怕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影响国家固定资产。其实越是经营权落实，企业越会爱护公共财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讲，企业短期行为是经营权不落实带来的，是我们政策一年一变造成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把经营权真正落实到企业，当然国家可成立一个机构对国家财产进行监督、管理，按规定收取一定收益。但不能干预企业经营，不能成为一个权威很大，过多干涉企业的机构。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以后企业一家一户，企业财产经营有的发展，有的破产，生产要素如何组合，资金如何流动？要走农村的路子，首先将经营权落实到企业，这样必然会发生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租赁、相互承包、相互参股、买卖设备、财产转让，就会出现企业组织结构改革，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企业之间相互租赁、承包、设备相互转让，当然要有一定手续。农村也是走这条路，先搞承包责任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出现规模经济。这个过程相当快，七、八年时间就出现了。承包、租赁、参股可兼容并蓄，可以相互融合，而不是相互排斥。

第二，企业承包要引入竞争机制。这个意义很大。我们对其意义现在还估计不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还看不太清楚。它对企业人事制度、人的观念、人才培养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对这个问题要重视，抓紧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因势利导，推动它向纵深发展，形成制度。将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会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可以设想，全国企业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势必会扩展到其他事业单位，如科技等事业单位，以后机关推行公务员制，企业搞竞争机制，这两块一搞，中国的人事制度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在很大范围内出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我国过去的僵化机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才不能脱颖而出，大大影响干部质量。这个问题是从企业承包这一具体事情上开始突破的。你不愿意承包，我来承包，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承包本身的意义。

第三，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承包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后，为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提供了条件，但不能代替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首钢承包制搞得好的，出了那么大效益，重要原因是厂里历来管理基础好，与承包一

结合，就显示了很大效益。现在许多企业内部管理很糟糕，要通过承包制把内部管理扎扎实实搞上去，最近我们批转传阅了两个文件，宣传了两个典型：一是吉林的厂内银行，二是石家庄塑料一厂的满负荷工作法。总而言之，不论用这种办法还是那种办法，都是要把企业内部管理搞上去。这样企业内部的改革如工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就有了条件。将来工资、劳动制度不能全国一个样。必须根据每个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当然现在一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企业之间会攀比，但必须要从观念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收入水平有高有低。

总之，承包制将来要发挥的积极作用，将要显示出的效益会很大。承包今年刚刚开始，不是所有企业实行了这个办法。已经实行的企业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发展。用三年时间，理出个头绪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三年时间锲而不舍，把企业机制搞好，相应地把其他改革搞上去。我想整个改革形势将会出现很好的局面。

注释

1. 沈祖伦(1931-)，浙江宁波人。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曾任绍兴市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省长。

下决心把住房制度改革搞好*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住房制度改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

现在许多城市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物价问题，第二是房子问题，或者说第一是房子问题，第二是物价问题。有些城市的住房问题已成为群众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焦点，也是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上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从长期来说，房子问题比物价问题还严重。房子问题无非是分配不公，再一个是房子太少。我们一下子不可能建那么多房子，如果住房能进入商品化轨道，就从经济上有了制约。愿意多住房的就多花钱，愿意多要钱的就少住房。这个路子一走，不仅可以正确引导和调节消费，促进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在经济上有很大意义，而且，在住房这个领域的不正之风也会大大减少，人们在这方面的不满情绪会大大缓解，这在政治上有很大意义。这方面原来讲得不够。

二、住房制度改革要列入计划分期分批完成

这项改革，如果自愿的就搞，不愿搞的就不搞，或者开始积极，一算账就不搞了，那就拖得时间很长，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开始时搞些试点是需要的，大体上摸出路数了，就要有计划地搞。从明年开始，不能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住房制度改革问题时的讲话要点。

再像原来的讲法搞试点，而是要分期分批地搞，分几年完成。今年多少，明年多少，大后天多少，全国多少城市，分几批，都列上名单。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研究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这项改革大概需要多少钱，银行需要安排多少贷款，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分担多少，都列入计划，然后坚决干。中央要拿钱，地方也要拿钱。改革嘛，总得出钱嘛，一点不出恐怕不行。你同意也得搞，不同意也得搞，列入计划，按计划实行。总之，住房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越早越好，晚了不利。价格改革放缓了，住房改革不能又像搞又像不搞。经过前一段住房改革试点，看来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困难比原来想的要少一些，现在要下决心来搞，积极地搞。

除了上面讲的把城市分几批，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以外，有些办法全国各个城市都可以先行一步。第一，像沈阳那样，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先搞，全市搞与企业自己搞并不矛盾，不管城市什么时候搞，企业都可以搞。第二，新房新租，新房新办法。第三，老房超标加租。超标准就要按照规定加租，如果超过了规定标准，又不严格执行，等于是空的。第四，类似天津那样集资建房预售。还可以深入研究一下，还有哪些其他办法可以普遍先搞。

住房改革，不管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只要全国都动员起来，人们观念就会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觉得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势来临。北京现在还没有改，老百姓就在议论这个问题了。最近我听到有的人说，他们单位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有人原来机关里分配给他两间房子，叫他退另外两间房子，他坚决不退，想两边占。现在他提出来，在机关附近只要很小的房子，而且把原来的房子退了。为什么呢？他说看来房租很快要变了，要那么大的房子，将来一提高房租，我交不起，以后再附近去找房子找不到了，现在干脆在附近找个房子，哪怕小一点，一劳永逸。因此，只要搞起来，人们的观念就开始变化，就会考虑这些问题，这对抑制走后门，抵制多要房很有作用。

三、住房制度改革要促进个人买房

住房制度改革要坚持多住房的多付钱，少住房的得好处。改革不能促进个人买房，不能推动住房商品化，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住房少、领住

房券多的让不让沉淀，给不给兑现，这个问题要解决。改革没有一点震动也是不行的。提租以后超支很多的搞点“减免补”我也赞成，但如果各地怕人家反对，这个照顾，那个照顾，“减免补”很多，而分不到房子、住房少的，发了住房券又怕他沉淀，这样一搞，住房多的照顾，住房少的吃亏，那还有什么动力？住房券沉淀就是为了留作买房子，不沉淀人家怎么买房子？那就让政府赶快给我分房子吧。住房券限制一下，只能用于交新增加房租或买房，不让流通是可以的，不让沉淀、不让兑现是没有道理的。这么大的改革，国家一毛不拔是不行的。价格改革一搞几十个亿，住房改革一个钱不拿能行吗？当然我们要尽量缓解困难。但如果搞来搞去没有什么改革味道，有其名无其实，最后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没有意义，就是不能促进住房商品化，不能用经济机制来使人们不多住房。这个问题要注意。

四、私房缓一步改革要抓紧研究解决办法

关于私房问题，我原来也讲过暂不考虑，但你不考虑也得考虑。因为公房一提高房租，私房就要提高房租，私房一提高房租，职工就要多交钱，能给补贴？现在怕把问题搞复杂，可以缓一步。一时不动可以，将来不动是不行的。不动有一系列问题。私房为什么要往后推一点时间呢？因为负担比较大。有两部分人参加住房改革是要真刀真枪拿钱的，要增加投放的。一是住私房的职工，二是家住农村的职工。住公房的职工提高工资，他们也要提高，但住私房的不交租金，家在农村的职工在城里住单身宿舍，交的房租很少，发出去的钱不能通过交租金收回来。除了这两个部分，其它都是钱能不能转换过来的问题，是一年转回来，还是两年转回来的问题。这个单位与那个单位，企业与机关，机关、企业与社会之间，都是这种性质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周转中间的问题，只要好好研究一套科学结算办法，是可以解决的。上面讲的这两个部分人，全国共五千万职工，小城市可以自己解决，大中城市不能一下子解决，要逐年解决。看来，将来要通过卖旧房回收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少数企业住私房职工比较集中的外，其余都是分散的，不是集中的。私房原来房租高，一般每平方米在三角以上，现在企业就负担了一些钱，职工自己也负担一部分，以后可以逐年解决，企业分散消化。企业住私房职工比较集中的，国家可以帮助解决困难。

五、要制定政策加快现有旧住房的出售

住房改革的资金，只要算大账能转得过来就可以。我认为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宏观上这个手发出去那个手收回来。房子是国家建的，房租是国家收的，这边发补贴那边把房租收回来，这边建了房子那边卖出去把钱收回来。运转中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要亏一部分，或者叫沉淀。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的潜力就是出售旧房。现在一大批旧房放着，卖出去可回收一大笔资金，这个钱为什么不赚？财政拿很多钱有困难，银行贷款太多也不行，要抓住出售旧房这个环节。要使财政负担不太重而加速这项改革，要好好研究一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把旧房卖出去。出售房子，一要给优惠政策，二要提高房租，三要提供银行贷款，有这几条就能推动了。房租一提高，他就会算账，是交房租合算还是买房合算。不搞改革，不提高房租他就不会买。一平方米每月才花一角多钱房租，住得挺好，当然不愿意买。只有提高房租才能促进买房。卖旧房子价格不要定得太低，但定高了老百姓承受不了，就卖不出去，适当定得低一点，卖了它，并没有损失。吉林省四平市原来卖的价钱太低了一点，当时定的是按三、三、四的比例出售旧房，个人只负担百分之三十，从长远看不合适。那时租金没有提高，价格高了没有人买，租金一提高，房子价格高一点也会有人买。另外，如没有银行贷款，要出售旧房只能压低价格，提供了银行贷款，旧房价格就不必压得太低，职工可以申请贷款，分期付款，就能负担得了。现在要着眼于让职工拿一部分现金出来，按你们算的，出售旧房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元，付现金打四十元，二十三亿平方米旧房出售就是九百多亿现金，有一半出售就是四百多亿元，再少一半也有二百多亿元。这二百多亿元现金，是从群众消费基金中拿出来的，这是房改的一大笔资金来源。有了这笔钱，整个房改中的资金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按你们算的，全国住公房职工房改需要二百五十亿元，出售旧房，加上每年建成的新房卖出去一部分，回收一批资金，再就是银行给予贷款，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适当给予补贴，我看这是比较现实的路子。我们研究政策的着眼点，要放在如何能加快旧房出售，把整个住房改革转动起来。

从个人来算账，旧房平均每平方米一百二十元。当然这是平均数，有的太差的，一百二十元没有人要，质量好的可以卖二百元以上。一套五十平方米的住房就是六千元，先付三千元或再少一点，其余申请银行贷款，分期付款。如果不买房而是租房子住，提高房租以后，即使算他一平方米增加八角，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增加房租四十元，一年要多交租金近五百元，十年就要多交五千元。把房子买下来只多拿一千元，过几年房子是他自己的了，得到个房子所有权。买房以后，照样发住房券给他，双职工一年算他五百元，如果买一套旧房先付三千元，当年实际只拿二千五百元，其余三千元，分五年还的话每年六百元，用住房券顶上以后，自己一年只拿一百元，以后自己负担一点维修费，根据财力再搞点改造。要造成一个与其多交房租不如买房的环境。提租以后，对买房的给予优惠政策，好好宣传一下，会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一次付三千元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一时拿不出，但不少家庭一、二千元钱不算一回事，自己的储蓄拿出来，亲友再借一点就解决了。有一对青年医生最近结婚，我问他们花多少钱，他们说一共五千元，两个人凑了三千元，双方父母各拿一千元。当然结婚同时买房子可能有困难，存三年钱再买也可以。有的今年买，有的明年买，有的后年买。旧房一律出售，一批批卖，分期分批卖，分几年出卖完。你住的有优先购买权，价格优待，提供贷款，如果住户不愿买，要允许别人买。这样来推动旧房出售。

新房出售也不可忽视。新房出售是回收资金的问题。现在房管局的房子基本是旧房，新房一个是在企业，一个是在机关。新房如按每平方米二百五十元的价格出售，五十平方米的一套房子是一万二千五百元，价格不高，等于交二十年的房租。自己先付一部分，其他向银行贷款，分期付款，偿还后房子归他。实行长期贷款好处很多。一是使人买得起，二是房子一买下来，就欠了国家的账，欠上十五年、二十年，就得还账，每月工资、奖金得先还了贷款以后才能安排别的用场，就不搞“超前消费”了。

这些还不是真正的住房商品化，还有一种完全商品化的。华侨、万元户、个体户、还有的人得了几万元奖金要买房，那些都采取另外的形式，通过自由市场，议价出售高价房。

六、下决心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现在我们说的改革还是初步的，还不可能为建筑业带来多少活力。一平方米造价一千多元，卖二三百元目前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要通过土地有偿使用等办法逐步解决。目前我们主要从分配领域来解决，搞得合理一些，发生的变化会很大的。一是多住房的多付款，住房少的多收入；二是使消费结构合理化。只要把大量的消费基金转到住房方面来，就可能出现很多健康现象。

通过这项改革把住房不合理造成的社会不满大大缓解，这个意义极大。既然这样，步子要加快。办法可以多种多样，进一步完善，但步子要加快。要改革就有风险，一点风险不担，搞来搞去，什么棱角都磨掉了，改与不改差不多，空转空改，最后变成空的了，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是一项较大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有限制的、有目标的价格和工资的改革。只是为了怕连锁反应，限制一下，提高房租以后发住房券，不发人民币，只能用于交租或买房。如果同有关部门一商量，这也不行，那也不保险，都空对空来搞，大概也就改不了什么东西了。

住房制度要改革，就得付一点代价，这种代价最终当然财政要承担一点。按照分级负担的办法，我看也不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还要以旧房出售来缓解这个矛盾。再一个就是银行提供优惠贷款，银行要支持这件大事情。反正信贷就这么多，这里用了，那里就少用嘛。比较来讲，用到这里比较合理。应当说，住房改革在全部改革里面意义甚大，而所付代价看来比较小。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风险，也不是不付一点代价，但比较来讲，风险和代价较小，而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大。要下决心搞好这项改革。今天定一下方针，具体怎么搞，请国务院再研究。

给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 新的动力和新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特区可以多办些独资企业。从现在的情况看，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恐怕得老老实实地向外方人员学习，主要学习他们那一套管理办法，并加以研究。

保税仓库有利于搞大进大出，加速资金周转，应该好好研究。如果货物进出口大进大出先交税，后退税，企业就要背利息；而大进大出不交税，大有好处，企业可以不背利息，节省了资金。我看这个办法不仅适用“三资”企业，国内企业也可以推广，这是一条路子。

福建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吸引台资，你们要好好研究。如果将来引进二、三十亿美元，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合资企业要给外商管理权，或委托他们管理。如台湾商人跟我们搞合资，虽然他们的技术、设备不是非常先进，但是管理比我们好。现在外国人、华侨、台湾人来我们这里考察，得出的结论都认为，我们的设备并不是太差，规模也相当可观，主要是经营管理吃大锅饭。他们认为，如果用他们先进的管理方法，让他们来管理，效益可以提高 50% 以上，产品质量也可以大大提高。特别是台湾在这方面经验多。从台湾的发展历史看，他们基本上是在技术很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家的。

台湾在 50 年代、60 年代也还是很落后的，但在 70 年代后期搞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厂。70 年代他们因陋就简，搞了大量出口。出口赚了钱，回过头来搞技术改造。即使搞了技术改造，他们的技术设备在今天也还不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是很先进。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多钱，关键的问题在管理，我们还不很懂得管理。当然引进设备，搞技术改造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最合算的办法还是要靠提高管理水平，所以，“三资”企业要给外商管理权。对合资企业我们特别要重视管理问题，要尊重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管，甚至可以采取承包的办法。我们国内不是搞承包了吗？为什么对外商就不行？不要搞什么以你为主还是以我为主。这样就搞不好，搞不好还是我们吃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合资企业搞好。要让外商按照国际惯例来管理，不要使他们那一套管理办法到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开发区、特区从根本上来讲，要摆脱国内这套体制。我们既然尊重外商的管理经验，就应当尊重他们的管理工作，老老实实地学。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考虑这个问题。

特区的体制要研究，特别是深圳和厦门。但是不是直接归中央？深圳曾经有人提出，要把特区办成中央、国务院的特区。这个办法不好，你们这次没有提（王建双¹：我们还是要接受省委的领导。）但是我看这两个特区的管理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就是说省里的各个部门、条条不要管它们，也就是实行计划单列。单列后，厦门还是福建的一部分，深圳也还是广东的一部分，但中央各种计划都单独切一块给他们，在这一块里头怎么搞，由特区政府自己负责。也就是给一个笼子，只要不超出国家计划，在这个笼子里面怎么跳，不要去管他。至少两个地方，一是厦门，一是深圳，珠海和汕头都小了点。你们写个报告嘛。省里意见怎样？（陈光毅²：我们同意，已经有报告了。）研究过吗？（张戈³：国家计委的意见认为现在要求单列的地方太多了。）他们两个是特区嘛，可以先实行。我看计划单列没问题。这两个特区搞计划单列，中央切块，有利于它们搞活，跳出现行体制之外。我看原则上可以同意。

国际金融可以搞，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些，还需要好好研究。特区外资银行搞汇率浮动、银行挂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看只能搞外汇调剂市场。在特区的外资银行、合资银行、中央银行可以互相拆借、业务交叉。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都可以搞，但不能一开始都像国际市场那样搞法，放得那么开。要做到可进可退，有管理、有控制、有领导。回去再研究一下，拿出个办法来。

你们要求今后厦门全岛逐步成为免税区，我看厦门与深圳不同，四周是海，比较便于管理。我看第一是海南，第二是厦门，第三是深圳。你们可创造条件，能搞就搞。二线要管住，岸上设关，海上巡逻。防止水货，防止套汇。

自由港的概念搞清楚了没有？我们已经用经济特区这个概念，还要不要用自由港这个概念？我并不是说不要自由港，外国人来投资并不一定看你是不是自由港，而是看你的政策怎么样。经济特区的概念我们也可以丰富，可以发展。外国很多用的是“加工区”，台湾也是用“加工区”，它们也没有都用自由港。厦门特区是要更特一点。经济特区搞了几年，已打下基础，证明是成功的。现在我们的特区，应该更加开放，搞得更活，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更好地促进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使它在引进外资方面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个我看没有问题。

总的来说，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深圳、厦门几个特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初具规模，而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很有利的形势，日元升值，韩国、台湾货币升值，港币也肯定要升值，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遇。我们整个沿海地区都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促进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经济特区应该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搞活，使特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能够有更大的吸引力。要给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新的动力和新的条件。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发挥和增强沿海经济特区的吸引力。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原则上讲应该给予支持。明年春天的沿海开放会议要研究这个问题。一月份要开一次利用外资会议，二月份开一次沿海开放会议，着重解决沿海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特区的问题也要列入会议内容。经济特区的工作要进一步给政策，进一步跳出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具有吸引力，给它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活力。这才能适应目前国际上有利的机遇，也才能适应我们整个沿海一线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经济特区不是要起带头作用、起“窗口”作用吗？我们整个沿海开放层次，第一是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牵头的。整个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区处于领头地位。对于具体问题，哪些能搞，哪些不能搞，搞到什么程度，要进行研究。你们可以再搞个方案，省市搞个报告，提出今后进

一步开放的意见，其中有些深圳特区也可以实行。有些东西很多地区都可以实行，如外汇调剂、土地有偿转让，沿海地区，至少开发区、开放地区也可以这么干。

我感到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我们要鼓励外商到经济特区以及开放地区办独资企业，要有个积极态度，要看得远一些。对中外合资企业，一定要使它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办企业，来管理企业，一定要给它这个自主权。因此，对合资企业，一定要尊重外方的管理权，这样做对我们还是利多弊少。这方面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我们所以要引进它，主要是以往我们对管理重视不够，只重视投资多少，设备多少。我们多年来实行产品经济，实行产品高度集中管理，整个管理和国际先进管理差距很大。特别是经济特区，由于它可以摆脱、跳出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完全应该这样做。就是其他地区，不是经济特区，甚至不是开放区，只要是合资企业，我们就要尊重它们。至少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我看完全应该做到。这样搞，效益可以明显高出一大截，可以为我国改革企业管理，提供一个榜样。在这方面，你们厦门解放一下思想。合资经营也可以搞承包，让外商承包，让外国企业家承包，或者委托给他，什么形式都可以研究。我们中方不强调再设副总经理，或暂不设中方副总经理，以调动外方经理的积极性。

管理权里面很重要的是人事管理。现在合资企业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企业不能向社会招工，不能辞退工人，因此劳动纪律很难整顿。你们特区与开放地区，要创造这个条件，要允许企业向社会招工，辞退解雇工人，搞社会保险，这样对合资企业和我们国内企业都有好处。要解决人员完全流动，职工、技术人员、干部都可以流动。这个条件不给外商，他们管理就很难。当然，我们的工会组织维护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将来劳资发生纠纷先调解，调解不了再由法院来判断。在法律方面，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一是立法不健全，二是过于原则，三是有法不能执行。总的一句话，现在我们要使外商按照国际惯例来管理企业。要给这个条件，这不仅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他也才会来，来了工厂才能办好，才能出效益；没有给他这个条件，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办特区就是要引进资金、管理经验和技能，而不是为了好看。

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是个重要问题。我们职工队伍素质与一些国家比，如比联邦德国差很多。我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管理经验。有几个外籍华人到浙江考察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你们工厂有这么好的厂房，有这么好的设备，有较多的技术人员，但管理相当糟，他们说，如果让我们来管理，不再增加什么投资，就可以提高 50% 以上的劳动效率。他们认为浙江还是个“未曾开发的金矿”。可见，我们现在企业的潜力还大得很，关键就是管理不行。我看了台湾发展史，他们开始搞进口替代，但失败了，后来转向出口导向。为了出口，也搞了一些技术改造，主要是充分利用原来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因陋就简，突出了管理，投入不多，结果很快就发展起来，然后反过来引进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工业，提高产品出口等级。沿海经济特区可搞些高技术，但当前大量的的是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的产品。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水平还是很高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能达到我们国家水平的还不多。新加坡李光耀就想借用中国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科学家。香港也很羡慕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我在今年三月人大会议期间，接见香港各界人士时，讲了两句话，在香港反映非常好。我说大陆的优势，一是科技开发能力；二是生产能力比较强；香港的优势是信息、管理经验和销售网络比较好。香港可以和内地的科技开发力量相结合，我们两个优势加在一起，一起向外挤，共存共荣。我们是个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当大，科技力量也相当强，关键还是管理。我们多年来实行产品经济，加上封闭状态，对外信息、贸易网络非常差，对这个问题我们恰恰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弥补，发挥我们的优势，取长补短。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要把重点放在引进设备，而应该放在引进国外的管理。要把重点引向直接投资。借款搞企业，我看将来会困难重重。当然，不是不要借款，而是不要借那么多。借款利息相当高，而且我们没有多少国际货币知识。我们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应该在政策上、特别是在管理上多下功夫，给外商管理权，吸引他来投资，多办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解决管理问题。另外，还要通过改革，使科技力量能用上去，使科技围绕产品出口，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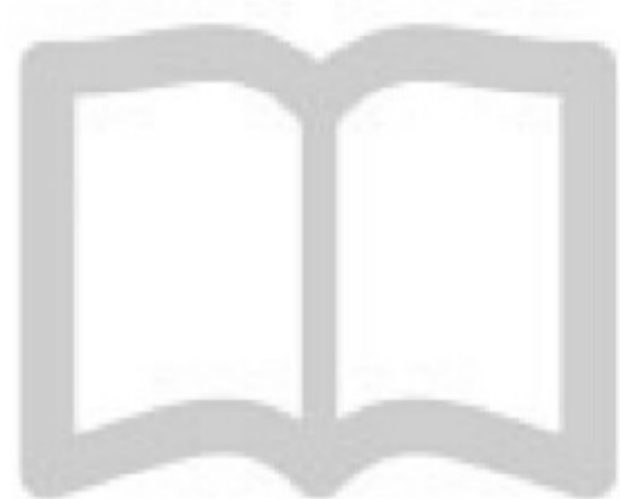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我为什么说不要借很多钱搞企业呢，一个是货币问题，另外你借了钱，他要稳收利息，你的厂搞好搞坏它不管，我们国内办事又慢，借了钱再来谈判买设备，设备引进了，国内还要有配套资金，这样搞来搞去，三、四年还搞不起来。现在国际上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以前更新周期是几十年，后来变成十几年，几年，趋势是越来越快。我们花了好多钱买设备，等到搞起来，技术又落后了。我们国内，包括经济特区，对世界上这种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很不适应。外商合资、独资企业就没有这个问题。外商信息很灵，我们把管理权给他，他很快就能反映出来。所以在沿海的政策上，我们宁可在吸引外资问题上从各方面解决吸引力问题，而不要我们直接借那么多外债搞企业。要有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你们要求进一步解决政策问题的方向是对的。现在，我们的职工队伍还不适应严格的管理。很多地方外国人管理可以，我们一管就不行了。我们现在需要利用外资企业的条件来严格训练职工。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小商店、小工厂改革慢了一些。大企业两权分离好办，小企业两权分离就比较麻烦。小的工业、小的商业、服务业可以招标采购。把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拍卖出去，收回的钱拿来增强大企业，搞技术改造。这是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来搞合资企业需要配套资金，就把一些小企业卖出去，用来增加配套资金。小企业服务态度好，可以解决很多矛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两权分离问题，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后，小企业在过去资本主义一开始也并不是就两权分离，是自己经营，所有权是老板的，或者一个老板一个经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后来到了办股份公司，产权就分散了，决定企业命运的还是企业家。小企业我看可以个人经营。还有一种是大中型企业，我看在特区里，可以实行股份制。你们厦华公司经营得很好，就可以卖股份，本地的、外地的、个人的都可以买。小企业拍卖，大企业实行股份制，逐步创造一个全社会人才可以流动的环境。人才搞活了，科技也要搞活。

我就讲这些。总之，你们的汇报方向是对的，我原则上支持，具体问题我们带回去研究。

注释

1. 王建双(1936-), 福建同安人。时任厦门市委书记, 曾任福建省工业厅厅长, 省委组织部长, 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2. 陈光毅(1933-), 福建莆田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 曾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 福建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
3. 张戈, 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一九八八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党对于具体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讲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我们学习十三大文件的重点应当放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更加提高执行十三大路线的自觉性。作为十三大的标志，我们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经过实践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九年，我们的政策收到很大的效果，这是全党都认识到的，外国是这样评价，党内也是这样反映。但是过去没有提高到理性上去认识。十三大报告中，经过理论的概括，使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理性认识，反过来还要用这些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我这次到江西、福建去，看到这方面好是好一些，但还有很大的问题，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建国四十周年成就展览搞不搞可以研究一下。成果都摆在那里还展览什么？不展览人家也知道。搞展览花费很多的气力，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又不生动活泼，一展览就拔高，拔高就不那么可靠。因为展览就是为了说明成果嘛！今后，图虚名的东西少搞，不是十分必需的东西不要搞。

建国四十周年纪念也要本着改革的精神。当然，四十周年要纪念，不纪念不行，怎么纪念法可以研究。四十周年党史展览也不要搞。那不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反而好搞，倒是“文化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1988 年全国思想宣传工作安排时的讲话。

大革命”以前的是非不好搞。四十周年纪念要改革，规模不宜过大，要避免形式主义。扎扎实实，生动活泼，规模不要太大。总的来说是中调处理，高调低调都不好，也就是说要适度。

最近香港报纸透露两个人要当政协委员，说什么“又要放宽了”。对安排刘宾雁等人当政协委员，不要节外生枝，原来是政协委员的不要取消，原来不是政协委员的也不要安排。外国把这些事都作为对某些人的态度，对这些敏感的东西，我们尽量地不要再增加热度。这几个人能不能当党员是另外一个问题，吴祖光本来就是政协委员，不当党员了，还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

对文艺界的方针问题，建议经过考虑以后要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我有个基本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这样的方针才能够持久。真正要管的话，管大的。什么具体作品，具体剧目，具体电影都要少介入，具体人的问题也要少介入。当然，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但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看，这方面的领导工作，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经验是成功的。只要基本上在政治上不反党，不是为了颠覆我们政权的，其他事不要管，也不轻易表扬，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

我主张今后搞两套演出团体。一套是由国家搞的少数重点演出团体，这类演出团体要代表国家的艺术水平。这类团要少而精，是高层次的，不靠营业性收入，由国家高价养起来，列入计划。在这些团里，国家的演员要有代表国家的样子。演员如果打算在这些团里呆下去，就要守规矩，不能到社会上搞第二职业。这些人工资待遇可以很高。逢年过节，有重要的外宾时拿出传统节目，这是代表中国的，很严肃的节目。人员公开招考、聘任，演员到这里来工资可以增加，但要守这里的规矩。工资谁也没法比，你要比你我也去唱唱嘛！

其他的文艺团体可以不搞国营的，自由组合。社会上的文艺团体，什么派都可以，歌星也好，一边唱一边跳迪斯科也可以，老百姓对它没有兴趣了，它就没有市场了。中国的事情就是你越管他越想看，越说这个不能看他越看。你不管它，人们就不看了。社会上的文艺团体，完全由政府去管，党委和宣传部门一概不管。政府部门则依法审查，什么戏要禁演，只

要不犯法一概不管，至于能不能卖到票，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也不管。

现在这个办法不行，国家演出团体的名演员待遇很低，结果很多名演员就到社会上去演格调很低的东西，叫做“走穴”，影响很不好。演格调低的东西民间剧团可以，但国家演出团体和演员则不行。我们必须有开放的那一面，同时也要有严肃的那一面。完全搞得那么严是不行的，不适应我们今后的情况，统统自流地搞也不行。对文艺团体的改革要有宽有严，完全是社会方面办的看来可以放宽。

其他的文艺团体，比如电影制片厂、电视节目要不要这样搞也要研究。总之，要宽就统统放宽不行，要严就统统很严也不行。像经济工作搞双轨制那样，文化工作恐怕也得搞双轨制。这样一来群众也不怪罪我们了。现在一演坏电影，群众就说政府也不管一管，党委到哪里去了？一管，就有哪些应该管、哪些不应该管的问题。老实说我们对这些东西是外行。我多次讲过，我不是内行，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在有些问题上群众可以反映我们不够开放，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封建传统很厉害。有一些东西确实也很有问题，这些都让文艺界自己去争论，让文艺评论家自己去评论，党不要轻易介入，党要管大的方面。总的是少管、少介入。

文艺界、小说界都应采取这个方针。琼瑶小说在台湾热过一段，然后转到大陆，一开始很热，现在看过瘾了，就没有人看了。其实，言情小说中国过去就有，什么《啼笑因缘》啦，三十年代也是很热的，但都是热了一阵子，就消失了。这类事情也少管它。什么是黄色，什么不是黄色，有些界限很难分。当然很明显的不行。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认真研究一下多少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看采取这么个方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宣传思想小组好好研究，提出报告，提交常委讨论。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

去年十一月下旬以来，我和一些同志先后到沿海地区数省市进行调查，看到各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尤其是外商前来投资的大量增加，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势头。大量事实说明，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个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可能大大提高一步。

一、有利的机遇和我们的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劳动费用条件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从亚太地区看，早期是从美国向日本转移，以后又向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转移。那两次转移，我们国家还没有对外开放。现在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移。日元升值、台币升值等因素，更加推动了 this 转移的过程。订货单和工厂，都在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外转移。转到哪里去？当然是转到劳动费用低廉

* 这是赵紫阳多次到沿海有关省市现场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报告。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新形势下，掌握战略机遇，推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强国富民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于1988年1月23日立即在此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的地方。中国沿海地区应当是很有吸引力的。这里劳动力费用低廉，素质比较高，交通方便，基础设施也比较好，特别是科技开发能力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强。这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大批外资吸引进来。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机遇。

目前国际经济活动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发达国家股市下跌，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萧条和衰退，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减小，但我们的出口商品多属中低档，受影响比较小；二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日元升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这个转移过程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错过了几次发展良机，这次不应再错过。我们做工作要有紧迫感。

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地区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要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

如果我国沿海这一片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还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能够真正走到国际市场上去显身手、找出路，真正转到外向型经济的轨道上来，那么，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另外，说到祖国统一问题，香港、台湾有些人总是讲经济差距，说台湾人均三千七百美元，大陆才四五百美元。我想，中国这么大，都搞得很快很富不容易，但是，首先搞好一块或几块地方是可能的。我们如果在沿海有一块地方，哪怕几千万人口的一块地方，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达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就好说了。人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有优越性。由此可见，推动沿海地区转上外向型经济轨道，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实现这个发展战略，要把握住几个要点。首先，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然参加国际交换，就要研究我们当前能够拿什么东西和人家交换？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国不是资源大国，但是我们有几种资源是真正

丰富的，一是人力，二是石头、砂子，三是煤炭。我们的人力资源不但非常丰富，而且费用低廉，劳力素质比较好。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能够长时间保持竞争力。“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是一种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应当积极发展。我们的煤多，可以发电。沿海地区要把电力建设搞上去，为兴办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能源条件。我们既有丰富的费用低廉的劳动力，又有煤炭和砂石，这就可以大力兴办建材工业，这也是一项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建材出口竞争力比较强，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沿海地区的广大农村，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努力把创汇农业搞上去。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经济特区、中心城市和某些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搞些高技术产业。但从当前总的情况来看，大量的还是要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如搞电脑软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不用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地进行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方当前的条件。

其次，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沿海地区的加工工业，如果只靠国内的原材料，它的发展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的自然资源、原材料资源不能说很贫乏，但是按人口平均起来并不丰富，不能再用“地大物博”的说法自我陶醉。随着沿海地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就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大进必须大出，不能大进小出，更不能只进不出，否则外汇就不能平衡，循环不过来。要鼓励地方把留成外汇用作周转外汇，大力开展“进料加工”。对“进料加工”要按规定给予优惠待遇，还可以在指定地区建立保税仓库，以方便“进料加工”业务的开展。当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发展替代进口的元配件生产和原材料工业，以提高增值量和出口产品的等级。

还有一条，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即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一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投资，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外商会主动关心、产品质量，关心、技术的更新，关心企业管理和产品销路，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总之，沿海地区当前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首先注重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多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工业要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同时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兴办“三资”企业，尽快转上外向型经济的轨道。按照这个设想，我国沿海地区有可能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较快地发展起来。

二、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

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对原来的外贸体制进行改革，为地方和企业创造一个随时能进能出的环境和条件。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现行外贸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吃大锅饭。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就可以发挥出很大的潜力。现在，好像仍有不少人觉得，大锅饭还可以继续吃下去，问题不大，反正已经吃了三十多年了，再吃几年也无妨。没有紧迫感。三年以前，我们就下决心要改革外贸体制。改来改去改不了。一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顾虑那个顾虑都来了。其结果，外贸方面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外贸不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就无法前进，路子将越走越窄。

在改革问题上，我们是要谨慎、慎重。我们够谨慎的了。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讲，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冒风险。当然，我也不主张冒险主义。但是，老这样犹豫来犹豫去，“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是什么事

情也办不成的，把时机都耽误过去了。要有一点决断。在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上，如果不下决心前进，今年不搞，明年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明年不改，后年还是这个问题。再吃上三年大锅饭，外贸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浪费严重、交货不及时、产销不见面、换汇成本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不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我在十三大报告中说了四句话：“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实际上还有一句话没有写上，就是“统一对外”。因为对外不好讲。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放开经营。自负盈亏是基础。只有自负盈亏问题解决了，才好放开经营。没有自负盈亏就不敢放。放了，抬价收购，亏损都到北京报账，不得了。没有自负盈亏，放开了就要大乱。香港市场上水货一再冲击，在那里看中国人的笑话多了。做到了自负盈亏，才好搞代理出口，也才能真正搞工贸联营。自负盈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这样的改革、那样的改革都无法很好地进行。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解决了放开经营的问题，产销才能结合，工厂才能在国际市场的较量中得到锻炼，逐步适应国际市场上的千变万化。我们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看盲目性的一面往往多一点，对放开经营的好处往往认识不够；地方的同志都希望放开经营，却不大重视或不大愿意自负盈亏。我看大家都要加深对改革外贸体制重大意义的理解，克服各自认识上的片面性，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能够及时地大进大出，创造条件。

我们是在国内价格体系很不合理、换汇成本很不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外贸改革最卡壳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现实条件下，要提出一个好的自负盈亏的方案是很不容易的。我从浙江到江苏，听到要求包干的呼声很高。包干的具体方案需要好好研究，但这种办法恐怕是目前惟一可行的一种办法，比较简便易行。它的好处是：第一，把地方和企业初步推上了自负盈亏的轨道。现在地方没有降低换汇成本的积极性，大家都吃大锅饭，最后到中央报账。中央要外汇，就得负责亏损；要减少亏损，他就不出口，就减少外汇。他两手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包干以后，县长也好，省长也好，就要关心他的外贸亏损了。同时，这样也可以使地

方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中央财政的负担不用再大量增加了。第三，出口积极性不会受影响。把这项工作做得扎实一点，潜力大得很。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核定基数。从中央来讲，当然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各种因素，力求把基数订得合理一些。从各地来讲，要准备出点高价买个好政策，要勇于承担任务，要打一点积极性在里头。又要包干，又要中央让一块，不行。要包干，就要准备承担任务。地方的同志不要只考虑现在那个基数，要往前看，看到自己那里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如果总是斤斤计较包干基数，这个事就搞不成。搞不成以后，一拖几年，再吃几年大锅饭，我们国家就会再一次地贻误时机，最后大家都得做检讨。

与外贸有关的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建议各地要尽可能挤出一些留成外汇，用于周转外汇。当然，中央也可以拨一些外汇给地方作为周转。这是解决大进大出所需外汇流动资金的有效办法。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在广东搞过。当时我请叶老（季壮）¹支持，要了三千万美元给广州周转使用，以进养出，一年可以周转四次，这三千万就等于一亿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广东靠这个解决了大问题。那时非常困难，我就找香港的华润公司，问他们外贸到底有什么窍门。他们讲来讲去，我听了就叫以进养出。我还给中央写过关于外贸以进养出的报告，说明把外汇拿来作流动资金是合算的。现在沿海各省市的周转外汇，一年是应该能够周转四次、三次的。要说不能周转那么多次，那是工作问题，当然还有政策、体制问题。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改革中解决。比如上海，如果能拿出四亿美元作周转外汇，一年周转四次就等于十六亿美元。每年进口十六亿美元的原料，年年在那里周转，那不得了，进料加工、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也就可以搞活了。

第二，要建立农副产品风险基金。沿海地区的经济要更加密切地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就有一个如何缓解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的问题。国际市场上有几种东西的需求和价格是经常大起大落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吞吐体制”。大落的时候仍要收购，保持一定的库存；大起的时候就抛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必须有一点吞吐库存。这样国内的价格可以适当稳定。有些东西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外贸要加强出口控制。不能在国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抬价抢购；国际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停止执行合同。这样

一个鞭子，一个斧头，少了就赶，多了就砍，搞得农民不知所措，碰上了就发大财，碰不上就倒霉。这对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纲领中，就提出要建立初级产品基金，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我们在制订农村政策时，也要考虑这一条。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完全靠国家给恐怕不行。要动员农民参加保险。这样一个“储备基金”建立起来之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就可以大大加强。

三、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

沿海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产品要打进国际市场，原有的一套体制是不适应的，原来的那种企业机制也不行。一定要认真解决政策、体制和企业机制方面的问题。我们政策的着眼点，应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潜力挖掘出来，让大家紧张紧张地去干事，各方面都围绕着产品打进国际市场而积极工作。这样，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才有希望。

这几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机制，潜力无限。反过来，机制不好，必然困难重重。中国人很聪明，过去的问题是让不好的机制把人们捆住了。从前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后来从实践中懂得了这一点。近两年，我们在改善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上做了很多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还要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地方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小企业比作猴子，提出要让老虎下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全盘活起来。应当继续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大中型企业要想搞得很活是困难的。而小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机制非常好，一开始就搞得很活。现在看，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将会有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乡镇企业一出生，就有一个自负盈亏的体制。它是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竞争得好的才能发展，竞争得不好要改行，再不好就得关门。它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特别强。它经营灵活，架子小，具有应变能力，服务态度好，交货期短，外贸企业就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外商也愿意与乡镇企业合作。一般说来，乡镇企业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人员，他们是认

真地干满八小时的，是满负荷运转的。由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一般都关心技术进步，注重开发新产品。乡镇企业的这种机制，对于生产出口商品，是很有利的。它不仅适合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非常适合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最近几年，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乡镇企业已形成很大一片，朝气蓬勃，发展非常迅速。许多乡镇企业是在很简陋的条件下搞起来的。现在改变了模样。在苏州吴江县，我看了一个纺织厂，用的是瑞士产的先进设备。不少工厂盖了新厂房。就乡镇企业的厂房设备来讲，与我们的国营工厂相比并不逊色。一九八六年，全国乡镇企业直接出口创汇达四十六亿美元，一九八七年达七、八十亿美元。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在沿海地区出口创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直线上升，苏州地区已占了百分之十五，珠江三角洲估计约占百分之二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上外向型轨道，增加出口创汇的新的生力军。

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第一，必须继续发扬勤俭节约、因陋就简的精神。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期，资金不足，不要急于铺新摊子。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进口原料，进口零部件，搞加工、组装。产品打出去了，积累了资金，赚取了外汇，再置办一些新设备和基础设施。这样往前滚动发展。有的材料说，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强烈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意识；二是从因陋就简做起，在原有简陋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延伸和拓展；三是有一支廉价而且素质较好的劳动大军；四是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依靠国外。这些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其中的大部分可供我们借鉴。我们的乡镇企业也要立足于现有的基础，把产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

第二，劳动大军要保持素质高、费用低的优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素质和劳动费用的高低。现在我们的竞争能力，与劳动费用的低廉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工人的工资低，但劳动生产率也低，算总账生产成本并不很低，其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还比较差，管理水平太低。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加强职工培训，努力提高职工素质。乡镇企业的效益增加了，要相应地提高工人工资，但切不可提得太高。否则劳动力费用低的优势就要丧失，生产劳动密集型

产品就要发生困难。当前只有保持费用低而素质高的劳动大军，我们才有希望更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并立于不败之地。

四、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

沿海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必须下大工夫加强企业经营管理。长期以来，不少工厂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的检查监督马马虎虎，钱和物资的管理十分混乱。总之，企业经营管理落后，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方面造成的浪费大得惊人。比之国外，我们的设备是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管理上的差距，比设备上的差距更大。我们的企业劳动费用低、技术开发能力强、厂房设备条件好等许多优势，往往都被管理落后抵消了。很多外国人到中国看了以后，都讲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你们的设备这样好，这样多；一是没有想到你们的管理这样落后，效益这样差。我们有些工厂的设备，如果放到香港、台湾资本家手里，不晓得要多赚多少钱。这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改进和加强管理方面，各地出现了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在实行承包的基础上，搞全面质量管理，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等，都是成功的，应当在更大范围内介绍和推广这类好的经验。

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必须下决心搞承包。承包以后，两权才能真正分离，厂长的经营权才能真正加强。承包以后，多余人员就要处理，有些可以由社会另行安排。工厂真正需要的人，可以公开招考录用。如果能这样办，企业效益就将大为提高。当然，一开始不一定所有的厂都这样办，可以一批一批的搞。我在沈阳找厂长座谈，发现厂长的承包风险越大，权威就越高。有些厂里的厂长为什么没有权威，工人不听他的话，原因是他没有任何风险。企业搞得好坏，与厂长个人的利害没有多大关系。厂长本人责任感不强，工人也觉得你根本没有必要管我，你管我干什么！承包的企业就不同了。有个从营口来的副厂长承包了沈阳的工厂，他一上阵就规定工人怎么干、厂长怎么干。他对工人说，工厂搞不好，我全家出路就完了，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现在不只是为国家干，也是为我

们自己干。这样一来，工人都觉得应当服从厂长的管理，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还有个油泵厂，本来非常破烂，根本不像个工厂的样子。后来租赁了，管理迅速得到改善，由亏变盈。工人说，现在工厂是租赁的，厂长责任大，搞不好他自己要赔本，千万不能马虎。总之可以看出，厂长的责任越大、权威越高，管理越能得到改进和加强。有的地方在承包中推行集体风险办法，招标承包，搞好了大家得利，搞不好全体都有风险，每个工人都要少得奖金、福利。这样，你干不好要影响我，我干不好影响你，互相影响，大家一条船。总之，一承包，许多具体的管理经验就产生出来了，管理水平随之得到提高。现在不论是先进厂、落后厂都有很大潜力，问题就在经营管理上需要有个机制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非干不可，义无反顾，非办好不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承包可以带来这样一个机制。

每个企业究竟用什么办法把管理搞好，可以在实践中创造。原则是要能人治厂。谁有办法把工厂管理好，给国家和职工都能带来利益，谁就来治这个厂。中国人可以，外国人也可以；本地人可以，外地人也可以；大企业来治小企业也可以，小企业来治大企业也可以。办法就是承包、租赁、参股等等。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企业一下子都这样搞，可以一批一批消化。能先搞好三分之一，就势如破竹了。

在“三资企业”中，要让外商直接管理。其中独资企业有个好处，即都由外商直接管理。独资企业只要产品是出口的，其他一般都好说。它一兴办，就要交土地占用费，我们的劳动力增加就业，国家得到税收，一批职工得到训练，很合算嘛。我们又不用还债，不用承担经营风险，有什么不好？所以，对独资企业没有理由特别从严。过去我们对独资项目卡得太死，应当放得开些。

合资、合作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也应让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管理为主，让他们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所谓国际惯例，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包括在社会上公开招工，按照合同和规定辞退工人等等。总之一要创造一个使外国企业家能够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管理企业的环境。投资环境好不好，最主要的是看投资者能不能赚钱。为此，关键的一条是让外商直接管理企业，尊重他们的管理权。不要非得争那个“共同管理权”，绝不要把扯皮体制带进合资、合作企业。我们应当利用外商管理企业的机

会，老老实实学他几年，等我们有了经验就好办了。中方的合法利益当然要维护，但不必现在去争那个管理权。外商把企业管好了，多出口，多赚钱，我们也能分到应得到的一份嘛。

过去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就是认为让外商管理企业就是丧失主权。这种观念必须转变。请外国人管理，替我们赚钱，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世界上跨国界聘用职业经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发展趋势。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也不一定都是本国人。一九八二年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公司合办的新联合汽车公司，总经理是日本人。英国钢铁公司一九八一年后聘请的总经理是美国人。西方国家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在选聘经营者时，主要以才干为标准，而极少考虑国籍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办的合资企业，不能让外国企业家来管理呢？我们的国营企业，如武汉的柴油机厂，还可以请“洋厂长”格里希来管嘛，事实上他管得很成功。

合资、合作企业让有管理经验的外商直接管理，或由外商在国外聘请人才来管理，好处很多。一是可以摆脱国内旧体制的束缚，摆脱关系学的困扰，进行严格管理；二是他更关心产品质量、技术更新和国外销售市场，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使工厂出效益；三是他赚了钱，会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投资；四是可以为我们培养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五为我们训练工人队伍，提高工人的素质。总之，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想得开一点，应该有这个胸怀，虚心向别人学习，然后赶上去。

五、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

我们的科技力量是比较强的。从发展中国家来讲，有我们这样强的科技力量的国家还不多。经济上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上我们是超发展中国家。新加坡李光耀看到中国的科技力量这么强，羡慕得很。香港也很羡慕。与我们的科技力量相比，台湾不行，南朝鲜也不行，非洲就更不要比了。问题在于，由于政策上、体制上的原因，我们的这一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技力量带来的加快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要把

科技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通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关心科技进步；二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使科技更好地为生产、为产品出口服务。为此，要把科技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竞争做贡献。科技人员积极而有效的参与，对于实现沿海发展战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要改变一些科技人员看不起小企业，认为到乡镇企业去干有失身份的观念。其实，乡镇企业是最容易吸收科研成果的。科学技术与乡镇企业灵活的机制相结合，大有作为。

要打破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的现象。要把科研单位的利益与科研成果更紧密地挂起钩来，使科研单位能够依靠科研成果吃饭。这样就有竞争了。成果越好，越为社会需要，科研单位的日子就越好过。有人说，这样一来，大家都搞短期研究，不搞长期的了。这个不怕。现在短期性的成果也并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嘛。有一些带有长期性的课题，对国家或一个地方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长期科研课题，各级政府可列为计划内项目，给予特别重视和支持。谁来承担这样的重大课题，也要通过招标。

要允许科技人员直接办企业，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有一种人才搞科研很行，经营能力差，他们就可以专门搞科研，发挥自己的长处；还有一种人既有科研能力，又有经营能力，就可以去直接办企业。在研究中心、学校周围创办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办一些体现和运用科研成果的企业，对科研开发很有好处，对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有好处。

如何推动科技工作，并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这是一个大课题，中央和地方都应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六、既要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又要稳定全国经济

当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个是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一个是沿海同内地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妥善处理，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求得一个合理的“度”和最佳选择。

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同样搞得很快，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比较

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不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来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那是很可惜的，是个很大的损失。可是，从全国来说，又必须稳定经济。二者应该统一起来。

为此，首先要求沿海地区在采取进一步改革、开放措施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同全国稳定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摩擦，特别是涉及物价问题的时候，步子要稳一点，尽量减少对内地的冲击和影响。全国稳定经济要考虑到沿海，沿海的发展也要考虑到全国。

第二，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要避免和内地争原料、争市场，一定要努力做到“两头在外”，向外向型经济转化。沿海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做到“两头在外”，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沿海地区只要坚持这样做，到国际市场上去显身手，就和内地减少了矛盾。

第三，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尽可能不要采取借外债的形式，而要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兴办“三资”企业上，着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举借外债的总规模，对稳定经济有利，经济效益也好。特别是要尽量吸引外资到老企业来，把利用外资同改造老企业结合起来，用我们现有的厂房、设备，与外商搞合作经营，不要都另外铺新摊子。吸引外资改造我们的老企业，由于有原来的基础，外资主要用在关键设备、关键技术上，因而我方需要的配套资金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有利于国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总规模。另一方面，这些老企业的管理水平也能很快提高，事半功倍。沿海地区认真抓好这件事，同内地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同稳定经济也没有矛盾，只有好处。

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并让外商来管理，需要解决好对原有资产的合理评估、原有管理人员的精简、多余劳力的安置等问题。因此，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不仅可以节省配套资金，较快地提高老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必将促进我们企业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意义很大。应当在这方面摸索经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第四，沿海地区发展经济，要多从当地开辟资金来源。要开源节流，搞好双增双节，提高经济效益，这是最主要的。沿海地区有许多不便管理而又长期亏损的小商店、小工厂，已成为财政包袱，可以拍卖给集体、个人或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拍卖之后，这些小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水

平和经济效益会很快得到提高，国家也可以从中收回大批资金，然后用来进行重点建设，用来发展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对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是有利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也是一大财源。在沿海许多城镇，出卖旧房也可以筹集一大笔资金，并能促进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积极进行股份制试验，更多地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以扩大建设资金来源。

总之，沿海地区的发展，要按照上面的思路进行，主要是靠政策，靠好的机制，靠“两头在外”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不能指望国家给多少钱，也不应挤占内地的利益。不仅不应挤占内地，而且要带动、帮助内地经济的发展，并为全国稳定经济做出贡献。按照这个路子来搞，各种矛盾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注释

1. 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1925年入党，先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和长征。曾任右江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长，东北银行行长，东北人民政府财委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部长，国务院财办副主任。

对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逝世 发表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¹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做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注释

1. 蒋经国(1910-1988)，浙江奉化人，蒋介石长子。1925年赴苏联留学并加入中共，1937年回国。历任国民党江西赣县县长，赣州督察专员，中央青干校教育长，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1949年初赴台，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 汇报经济形势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九八七年有很多好的东西要好好总结一下

计委汇报中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几年存在的问题，可不可以说开始出现了缓解的趋势。货币、消费、工业增长、外贸增长，除了物价这一条外，整个情况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证明一九八七年的搞法是好的。继续这样搞下去，存在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切忌不要有了一个物价问题，就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搞宏观经济的，对物价问题必须正视，但物价的位置要放对。一九八七年的财政不错，工业也相当好，这同一九八五年的情况不同，那时靠大量进口原材料。一九八七年在进口大量压缩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速度是相当不错的，当然速度是否搞得过高了一些，有些市场紧缺的东西是否是出口多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这几年电是个很大的成绩。钢铁、有色金属这几年也不错，货币去年发行比前年好得多，当时估计去年是险象环生，结果去年出现了很多好的情况。速度很高，各种关系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前进，至少不是更加不合理。汇报中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应更加深入地分析各方面的关系是更加合理的。

稳定和速度是可以统一的，不是一讲稳定，经济就要萎缩。一九八七年应当给以信心。赞成汇报提纲中讲的，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有所作为的，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完，但都比上年有所改善。因此，一九八七年的经验应当给我们以信心，找到其中可贵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九八七年形势的总的指导思想。

有些问题想要一下子解决不可能，只能逐步解决。通货膨胀不是改革开放出来的，几十年就存在通货膨胀，当时是有钱买不到东西，还是需求大于供给，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当然这几年票子发的多了些也是事实。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没有通货膨胀，没有物资紧缺。一九八七年是重要的一年，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给我们以信心，可以从中找到解决重大矛盾的途径，如何总结一九八七年，这个题目要做半年。

二、我们对农业问题的两个观点

农业生产力发展本身有个制约的问题。《北京日报》有一篇文章，叫“一亩半地的思考”，连载了两天。关键是我们现在一个人只有一亩半地。这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另一个概念到二〇〇〇年时，每个人占有的粮食就是四百公斤，粮食产量要上两个台阶到一万亿斤。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矛盾，居民收入多了，就要吃的好一些，就必然超出一亩半地的负荷。从长远来考虑，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出个出路来。现在是温饱型的产业结构和要求富裕型的食品结构发生矛盾。北京市现在是一年一个人消费粮食一千二百五十斤，同过去比，动物蛋白一年增加了七十公斤的粮食消耗，而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最近《中国食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吃的选择”，讲这是强国利民的战略，专门讲食物结构。我们必须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食物结构。中国人必须接受这种选择，不能自流地发展。中国的问题一是计划生育，一是食品结构，难是难，但必须解决。把十亿人口带到哪里去，要设计一种食物结构，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日本人吃得很少，主要是吃鱼。有个材料说，猪肉一斤要四、五斤饲料，猪的动物蛋白比其它动物蛋白需要的饲料多出好几倍。还有材料说，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所需能量多十五倍。计划委员会考虑四个现代化，一个人口问题，一个食物结构，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中国食物价格太低不划算，动物蛋白应当贵一些，让居民去选择。中国的大豆问题应当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过去我们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现在产一千一百万吨。巴西原来是八十万吨，现在是一千五百万吨，美国产量也很多。中国大豆很多作为油料，很浪费。这是说对农业的观点。这几年出口问题与此无关，问题不在这里。这几年

在农业上主要是农村变为商品经济之后，我们对市场信息的反馈不够。猪的问题几上几下，有一个时候发生卖猪难，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猪的生产下降，下半年宣布了提价收购，城市给补贴。这样，养猪又多起来。这次我们对猪肉的问题反应慢了，一九八五年情况有好转，但当年冬天由于农业减产、粮价上涨，我们没有把猪的价格相应调整，南方有的地方收购仔猪二角一斤。我们当时有个想法，怕提了猪的价格影响物价上涨，想挺过去。其实如果解决点价格，生猪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下降，最后还不是提价了。粮食问题是二种因素加在一起，过去粮食几年丰收的积累，又加上我们有几年大量进口粮食，有些地方粮食仓库不够，这就发生卖粮难的问题。有些地方停止收购粮食，这时又减少了进口，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下来了。这几年农业上的问题基本上是农村已转向商品经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也可以说是违反价值规律受到的惩罚。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对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使我们心中有数，来改进宏观指导。表面上看都是些老问题，但这些都是新情况，不能够用老办法去解决。对于农业，从长远来看，要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对当前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我们要定一个长期政策，不能引导人们去多吃肉，房子也不能住得太宽，因此房租不能太低。

三、价格问题

去年我们价格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如果我们能够在食品价格上找到一个办法，就能够大大解决问题，因为食品占居民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农产品价格要逐步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农产品价格提高的情况下，要在食品的价格上找到一个办法。我们讲基本生活费和生活费指数挂钩，就是要同食品的价格指数挂钩。对食品价格上涨，国家要给予补偿，只要农村收购价提高，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要把这一点作为工资改革的一部分，当然是指定量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无限的，农产品之间有个相互比价的问题，大路菜要实行计划供应，粮食、肉、禽、蛋涨价要按定量给予

补偿。我们要规定个长期办法，搞它一、二十年。这样做，有利于我们调整工业品价格，大家就心中有数，人们的心里也不恐慌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销售价格也提高，然后给予补偿，这件事应该做，也能做到。这件事要下决心解决，这对稳定城市很有利。当然什么时候解决，从哪里解决，要做过细的研究，但作为原则，这一条要定下来。对物价问题我们过于谨慎，对于明显妨碍生产发展的该调的要调，不然生产下来了，你还得调，代价太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应该承认还在起作用，但要做具体分析，并不是价格上涨都是需求膨胀。糖由于价格太低，就刺激了浪费糖，另外也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不能只考虑物价，还要考虑生产。总的还是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方针。稳定物价必须建立在供给增加的基础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要分开来分析，有些物价指数上涨并不反映通货膨胀。比如，把暗补改为明补，暗补不反映物价，可是一改为明补，就反映到物价上，实际物价并没有上涨。对于物价的上涨，如果先没有措施，让它自发上涨有危险，如主动调整物价，问题就少得多。比如我们说百分之七物价上涨指数，如都是自由上涨，那后果是严重的。如果有百分之三到四是我们主动地去调整，问题就会少些。不敢主动地进行价格改革，最后是物价自由上涨。同生活费挂钩就是同食品挂钩，不要同其它工业品联系，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将来物价指数也要分开统计。

四、要更好地开展“双增双节”¹运动

请财政部、计委、经委要好好谈一谈。今年解决矛盾的出路，除了我们讲的稳定物价和同食品的价格挂钩外，就是要认真地搞好“双增双节”与企业承包相结合，在这方面真正收到效益，这对缓解矛盾会起大作用，我们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里。经委在二月份开一次企业承包制座谈会，我赞成。对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动大手术，要大刹一下，这对财政和信贷都有好处。各种集团购买力包括企业都要采取行政干预、严厉措施，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也可以少发票子，又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压缩集团购买力要雷厉风行，停止一年购置，沙发、空调不准买、房子不准改建。搞一年行政干预，狠一点。要树立起朴素节约的风气，这样一搞，今年的形势会更好。

五、要研究一下今年的出口

有些东西出口是否可以减少一点，国内市场紧缺的东西不能多出口。外贸不能硬要求出现顺差，平衡就可以了，纺织品要控制出口的总量。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内很紧张的东西就可以多进口一点或少出口一点，国内不太紧张的就多出口一些。考虑外贸时，不能只是考虑创汇，还要考虑国内市场需要。据海关报告，去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五十亿美元。

六、消费税是不是出台要再考虑一下

今年我们主要把物价挂钩搞好。再出台消费税对今年财政可能有利对今后可能不利。如烟加税，可能把生产搞下来，是不是现在把卷烟生产搞上去。我国的财政有一个很大的潜力，就是烟的生产，搞好了一年多增加几十亿元的财政收入是可能的，这比什么都有效。计划委员会应把卷烟作为重点建设来搞。酒的消费税我赞成搞，因为有个粮食问题，而且年轻人喝啤酒也不在乎几毛钱。主要是烟和彩电搞消费税我不赞成。

注释

1. “双增双节”即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给《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文汇报》社全体同志：

祝贺《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希望你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发扬好的传统，紧密联系广大知识分子和各界读者，把报纸办得更好，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外贸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十日

今天是我第一次和经贸部各专业总公司及工贸公司的同志们见面，我感到很高兴。

首先，我要说去年大家干得不错，工作很有成绩。去年，我们的出口情况很好，一些不必要的进口也得到了控制，外汇实现了平衡，并且略有节余。这是同志们包括地方的同志和生产企业努力的结果，也是外贸体制改革的结果。去年我们的外贸体制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但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主要是实行了包干制，虽然这个包干制还要进一步完善、深入、发展，但是实践证明包与不包大为不同。今年，我们的外贸体制要进一步改革，对外贸易要进一步发展，所以希望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志进一步努力，一定要使今年比去年做得更好。

第二，目前我们的外贸队伍有五十万人，这是我们国家从建国到现在几十年培养建立起来的一支队伍。总的来讲，我们这支队伍是好的，他们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们从事外贸工作的骨干和精华。今后，我们的外贸体制要改革，同时，我们这支队伍的经验和作用应该进一步发挥。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外贸体制，绝不会影响和削弱这支队伍的作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这支队伍更有用武之地，更能发挥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一是要搞外贸体制改革，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经贸部、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贸公司负责干部时的讲话。

这样我们的外贸工作才能真正做好。今后我们要对外开放，要使外贸有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最近我们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支队伍，就不能适应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这支队伍，即使体制改了，我们也会有很多困难。当然，没有新的体制，我们这支队伍不会有充分的用武之地，作用也不会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把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同外贸体制改革统一起来。我们这支队伍也应当在今后的体制改革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外贸体制改革。不改革我们就不能很好的迎接新的形势。其一，过去我们没有开放，我们出口仅仅是为了进口一些必不可少的商品，而现在我们要改革开放，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要不断密切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其二，国际市场是个竞争的市场，瞬息万变，如果我们长期实行那种封闭状况下形成的机制，高度集中，产销不见面，那就没有办法应付市场，就只能经营大路货，而且即使经营大路货也不可能把握有利条件和时机。因此必须解决放开经营、工贸结合、产销见面等问题，并相应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实践证明，如果不建立自负盈亏的机制，放开就乱。十三大报告中关于外贸体制改革讲了四句话，实际上是五句话，还有一句统一对外没有讲。这五句话中关键是两句，就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有了这两条，其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不改，我们不可能迎接新形势，也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方针政策。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也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所有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志应当勇于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为它终究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在对待改革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都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到大趋势。这样我们有可能在坚持改革中，经过几年的摸索，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路子。不改革，这个路子是出不来的，不准备在改革中去解决那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这条路子也是出不来的。经过了这个过程，这个路子就出来了，不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路子永远出不来。我们应当争取不花大的代价，但是一点代价都不花是不可能的。一碰到问题，就想回到老路上去，这是没有前途的，那只能在原地上打圈子，是不行的。我想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从事外贸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看到

了这一点。我也听说，我们各公司的同志都认识到了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都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这是很好的。

除了总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外，各个外贸公司也要改革，也要改进。改革的方向就是向综合性、多功能、国际化的大商社转变。将来我们经贸部的几个大公司，都应当变成像日本、南朝鲜那样的大商社、跨国公司，要走出去。当然这要经过一个过程，但我们的方向是要这样改，也要让这些公司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我们现在实行的承包制是体现这种办法的一个方式，我们还要对所有企业都实行承包，并进一步配套、完善、深入、发展。我想，首先是国家给公司充分的自主权，让它放手经营，同时让它自负盈亏。当然是在一定条件下自负盈亏，这要签订合同。各总公司应当有自己的利益，搞得好的就应当多得，搞得不好，就得自己负亏。在服从统一对外，统一协调，服从国家法令的情况下，公司之间还应当允许展开竞争，人才也应当竞争。所以我赞成专业公司逐步地把竞争机制引进公司内部，实行招标承包。不是说总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要通过招标确定，但是下边的人员应当通过招标确定。应当推行承包招标制，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我们外贸系统有很多能人，要给他们一个显身手的机会，创造一个能人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当然这要有领导地进行。所以今后要完善总公司承包制，总公司同国家承包以后，内部还要层层落实承包制，并在此前提下，引进一些竞争机制，以后还可以不断地把这种机制扩展开。这样我们的外贸企业就会面貌一新，人心就会振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使总公司逐步地把经营的注意力放到国外，而不是放到国内。要彻底改变我们所有总公司重点是在国内搞收购，而不是在国外搞经营的局面。当然这也要经过一个过程，但是必须这样做。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多少年来培养的这支队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在我们国家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在外贸体制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使他们大显身手，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应当是我们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我相信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这支队伍里能人多得很，关键是要把方针和指导思想搞明确。

向瑞士达沃斯一九八八年度 “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主席先生，感谢您周到的安排和友好的介绍。

我能够身在北京而“出席”万里之外的达沃斯会议，感到非常高兴。这件事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小了各国间的距离，而且人类的相互了解比过去更加容易了。

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指的是了解和被了解。正因为如此，你们的会议引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兴趣和关注。如果我的发言也能有助于增进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的了解，我将引为荣幸。

三个月以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的一把钥匙。我们把这次大会称为改革和开放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九年前开始的。九年中，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这次大会确定了进一步加快改革、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方针。大会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确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凡是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措施，都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都鼓励，都允许；凡是为发展我国商品经济所必需的手段，我们都不拒绝采取。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国内市

* 这是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一九八八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电视演说。

场——包括各种要素市场——的发育，加速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并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使我国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三大的路线，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因而是不可逆转的。

我想专门谈谈中国的对外开放。我们深知，在国内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交换，是我们的困难所在。因此，我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条是以经济体制改革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效益。过去九年是这样做了，已经初见成效，今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样做。一条是采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种格局，来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现在，在沿海地区，正在形成一条有一亿多人口的、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有富庶的农作物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群众文化技术水平比较高，熟练劳动力比较多。九年来，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这里还涌现出了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速度蓬勃发展。因而，这一地带更加具备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的条件。总之，中国的劳动费用比较低廉；在改革过程中生产效率正在日益提高；各种法规也在日趋完善。希望不要很久，人们就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带，是投入资金和技术的很有吸引力的场所。

我还想透露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已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现在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并且把它确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岛的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四分之三，地处湿热带，自然资源丰富，可以说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同其它经济特区比较，这里将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给国外企业家以更多的优惠和方便。我们正在为海南岛的开放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欢迎各国人士到海南岛来投资，来开发资源，来做包括地产生意在内的各种生意。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旅游。因为即使在达沃斯飞雪连天的严冬，海南岛也可以下海游泳，在海滩上享受阳光的沐浴。这也可以算是我对参加达沃斯会议的已经相识和尚待相识的朋友们的一个建议。

女士们和先生们，谢谢大家。

会议主持人、瑞士联邦前主席库尔特·福格勒问：中国是否打算在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经济合作中做到更加平衡？

赵紫阳说：我们对欧洲、美国和日本一视同仁。他们都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最有竞争力的伙伴是最有吸引力的伙伴。竞争力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包括投资多少，期限长短，利息高低，包括商品的质量、价格和交货期限，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的条件；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配额和关税，因为中国的支付能力不能不受到出口规模的制约。谁在竞争中得胜，谁就可以同中国做更多的生意。

中国的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说的原则，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于西欧，也适用于东欧和苏联；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整个北美和拉丁美洲；同样也适用于非洲和大洋洲。

福格勒问：为了完成其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工业的计划，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理政治环境，尤其在亚洲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您如何估价美苏关系最近的演变？这一演变对贵国的安全以及贵国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赵紫阳说：最近美苏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我认为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同持续许多年的严峻对抗相比较而言。同时，我认为，这是相当有限的一步，因为军备竞赛还未停止，“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因此，要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不能排除出现曲折。最近出现的这一缓和趋势，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推动的结果。要使形势进一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归根结底，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努力。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根本立场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美苏两国所采取的有利于缓和的措施，我们都是欢迎的。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要美国或苏联所采取的措施符合五项原则，就将有利于发展中美或中苏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从总体上说，中美关系在稳定发展，中苏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但是我想不必讳言，在中美关系上还不时出现一些问题，在中苏关系上迄今仍然存在着障碍。责任都不在中国。我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它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的三个公报。我也希望苏联在消除障碍方面做出它应有的努力。和平和主权太重要了。大家都来讲和平，尊重对方的主权，这个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

时间到了，请允许我“退席”。再见！

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

今天，中央请刚参加过省长会议的同志们来，见见面，听听大家的意见，中央的同志有什么要讲的也讲讲。

这一段，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了经济工作中一些重大的问题，主要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外贸体制改革、经济形势（包括物价和食品问题）等。在省长会议上，开始时纪云同志有个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报告；接着依林同志有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最后，李鹏同志作了总结。大体上，这个时期中央所议论的也就是他们讲的这些问题。

三月份还准备开一个关于开放地区的会，预定三月十五日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半年主要有这么些会议。

这几天同志们讨论了不少问题，有一些（如经济形势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政治局讨论。先听听各省的意见，然后再提到中央政治局讨论更好一些。

利用今天座谈的机会，我说一些意见，和同志们交换一下看法。

一、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了讨论并发了纪要。我在这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过一些话，各地流传很多记录稿，我本人没看，不清楚有多少，听说不少。正式的有一个东西，就是后来整理的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稿子。除了发政治局这个范围，各省、

各部都发了一份。开始，我把这个文件送给一些老同志看，送给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小平同志批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小平同志后来又就这个问题跟薄老讲了一些话，基本精神是希望加快，希望坚决搞，不要犹犹豫豫，不要再失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陈云同志也是很赞成的，我最近直接和他谈了一次，他认为“两头在外”，这样搞，好。先念同志不在家。彭真同志来电话说完全同意。我们在财经小组讨论时，大家对这个战略都同意。常委同志都赞成。据已经了解到的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是赞成的。在政治局还要再讨论一次。

如果外贸体制不改革，沿海发展战略最后将是一句空话。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外贸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所以，这次是当机立断。本来，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份以前，还只是说在三个外贸专业公司进行承包试点。后来因为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外贸体制就非改不可了。现在要下决心干。这次李鹏同志他们专门召开省长会议进行部署，就说明这是非常紧迫的。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以后，也有一些同志表现了这样那样的顾虑。有待澄清的大体上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

这次到会的一些内地省的负责同志提出，沿海本来搞得比较快，现在又要进一步开放，这不是锦上添花吗？现在需要雪里送炭啊！东部有个沿海战略，西边搞个什么战略？看来，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讲清楚。

我们说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涉及中国经济全局的战略，它决不仅仅关系到沿海地区，而是涉及到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国际经济局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机会，或者叫作机遇，使中国经济能够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在国际上进行商品交换。这样一种机会，当然全国各地都可以利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从客观可能性来讲，真正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的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既有沿海，又有内陆，纵深很大，幅员辽阔，在信息、基础设施、技术条件、管理经验以及国际联系等方面，各地差别很大。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整个中

国变成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变成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那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既没有那种条件，也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国沿海这一块，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甚至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是立足于国内，以国内市场为主。这两点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以整个国家为后盾支持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地区的发展反过来又帮助和促进内地，加快全国的四化建设。

另外，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为内地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有利条件，提供新的机会。这个战略决不仅仅是从沿海经济的发展来考虑的，而是从有利于全国的发展考虑的。最近，四川杨汝岱同志有篇讲话，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对四川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沿海发展了，不仅可以为内地让出原料、提供市场，而且可以逐步向内地转移资金和技术。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很对的。

长期以来东部与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东部基本上是一个加工工业区，原材料主要靠中部和西部提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因为种田的人少了，土地集中了，那些地方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沿海地区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假如让沿海地区农民办的二、三产业萎缩下来，让农民都再回去种田，那整个沿海地区、甚至全国就会发生一场危机。沿海地区大量乡镇企业兴起，大批农民转到二、三产业，土地开始出现规模经营，农村逐渐富裕起来，这都是新事物，是好现象。但是，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这个路子能不能一直走下去？它会带来什么问题？起初，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到沿海几个省市去考察的。考察的结论是，按原来的路子走下去，矛盾会越来越大。沿海地区人均占有的资源是很少的。它长期以来都是把内地的原材料运来，加工成产品以后再返销内地，也就是说市场和原料都建筑在内地。沿海的发展建立在内地长期提供初级原料的基础上。沿海有的地方原来说的“两头在外”，就是在省外、在内地，而不是在国际市场。保持这样一种格局，照这样发展下去，沿海可以小康，内地就很难小康。内地农民怎么办？如果每人只种那二亩地，是小康不了的。三亩地也小康不了。所以，照原来的路子走，我国只能有一部分地方达到小康，另一部分不能小康，就是这个结果。或者内地将来搞封锁，原料自己加工，市场

自己占有，那沿海怎么办呢？沿海就得回到原来的一人一亩半耕地上去，已经出现的好势头就不能再发展下去了。

所以，沿海地区必须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把“两头在外”的两头摆到国际市场上去，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实行大进大出。沿海恰恰有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样搞，搞得相当不错。有一个县主要靠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一年就创汇两亿多美元。沿海上亿人口的地区如能推到国际市场上去，必将为我国广大内地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余地。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沿海战略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如能行得通的话，将是保证我国进入小康水平的一个重大措施。

第二，我们的沿海战略和亚洲“四小”¹走过的路子是否一样。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沿海发展战略是采用亚洲“四小”在六七十年代用过的办法，未必行得通。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实行沿海发展战略的必要性，现在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可行性。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首先，不能说我们走的就是“四小”的路子，不能说我们要确定一个方针去学“四小”，他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我们的沿海发展战略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出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决不是模仿“四小”。亚洲“四小”的特点就是小，而我们的特点是大。他们是岛子或半岛，而我们总体上来讲主要是大陆。我们的情况和他们极不相同。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都比他们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搞的时候要强，用不着完全按他们的路子走。另外，也不可能完全按他们的路子走，这里面主要还有个社会制度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他们亲一些，他们之间好商量一些。有些发达国家把我国视为潜在的对手。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发慈悲，来支援中国四化建设。

但是，也不能说凡是“四小”用过的办法我们就不可用。“四小”发展外贸的许多方便条件，我们沿海地区也有。当前的机遇，和他们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遇到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小”发挥沿海优势，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是我们可以借鉴

的。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相当大的容纳量，而这种商品只有在劳动素质比较好、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地方才适于生产。光费用低不行，光素质高也不行，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优势。现在我们沿海地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劳动费用是很低的，素质也基本上是好的，而且还可以继续提高。有这些条件，中国沿海就可以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律，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从太平洋地区来讲，开始是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以后又从美国和日本向“四小”转移。现在又从日本、“四小”向外转移。小平同志说，这个机会我们不要再丢掉。如果我们反应不快，措施不得力，确有可能再次错过时机。

第三，有没有风险。

风险肯定是有的。有竞争就有风险，有机会就有风险，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机会。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商品有时销路好，有时销路差，不像过去我们的国内市场那样保险，生产好生产坏，销得出去销不出去，都照样有工资发。进入国际市场，对某些企业、某些商品来说，风险有时是很大的。国际经济如果出现衰退，我们肯定也会受影响。但是我相信，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不会有非常大的、承担不了的风险。为了减少大的风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建立风险基金和保险，在特别繁荣的时候积累一些东西，储备一些力量，以便在不景气的时候渡过困难。总而言之，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就不能怕冒风险。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从总体上来说，不会有很大的根本不能承受的风险。至于说假定打起世界大战来怎么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如不抓紧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将来真打起仗来岂不更被动。

第四，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与发展技术密集产业的关系问题。

沿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城市、国营企业当然要起骨干作用、带头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前一段在论述沿海发展战略时，我们所以要着重讲乡镇企业，是因为沿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要参加国际交换，乡镇企业无疑是主要形式，仅仅靠城市工业是不能解决这样一个战略问题的。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们最近多次讲到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从发展乡镇企业，从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上来讲的。由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所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将会有大批外资和这类企业向中国转移。我们两个月以前就这样讲，现在这个趋势比两个月以前更明显了。当然，我们绝不是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只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当然还有个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问题。凡有条件的企业，都要争取多出口高价值、高档次的商品。我们还要努力发挥中国科技开发能力强的优势，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开发高技术产品，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第五，加快发展和稳定经济的关系问题。

对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辩证地看。从总体上来讲，不发展，停滞不前，必定不能稳定。发展恰恰有利于稳定，而不是妨碍稳定。我们一些发展快的地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很好，社会也更安定，就是很好的证明。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总的来讲有利于全国的稳定。全国都搞得很快不可能，但我们要有意地让某些有条件的地方搞得快一些。执行稳定经济的总方针，本身必须考虑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准备承受一些冲击。从沿海地区来讲，应当主要靠政策、靠“两头在外”的优势，进行自我发展，尽量防止和避免对内地造成冲击。沿海地区的发展，指望国家给多少资金和外汇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应当对国家多做贡献。但是，属于放权方面的合理要求，国家应当积极给予解决。放权以后可能出点盲目性，不要把这类问题看得过重。只有积极性而完全没有任何盲目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不发生大的盲目性，有点小的盲目性随时加以纠正，就可以了。

实行沿海发展战略和改革外贸体制，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件事。改革外贸体制，是执行沿海发展战略的关键性条件。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使地方和企业能够很方便地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把政策调整到这样一个程度：使生产企业、出口企业和地方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能真正实行工贸结合、产销结合。要参加国际竞争，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解决外贸放开经营的问题，肯定来讲，这次机会还是要眼看着它丢掉。而放开经营是有危险的。过去搞过多次了，一放就乱，一放就发生抬价收购，削价竞销等问题。看来，关键是必须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放开经营。怎样解决自负盈亏的问题，可以设计出很多方案。前年夏天我在青岛专门用了一

个礼拜的时间，请一些人座谈讨论，搞了一个方案，看来挺好，但是未能行得通。有一些搞理论的同志也设计过这样那样的方案，看来实行的条件也不具备。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方案，再等三年也没有希望。

现在看来，在中国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包干。对包干的办法也可以挑出很多的缺陷，随便可以讲十条八条。但是能够比较好地把外贸推到自负盈亏轨道上的，现在只有这个可行的办法。既然找不到最理想的办法，还是要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土办法，不完善之处可以在实践中完善。为实行外贸包干，李鹏同志、依林同志、纪云同志做了很多工作，经贸部的同志也比较积极，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包干以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希望经贸部马不停蹄地继续抓紧，根据既要联合对外又要放开经营的原则，认真审查原来的规章制度，对不适应新形势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抓紧进行修改。如果只是包干下去就算了，停到这里，过去的规章制度都不变，很多妨碍放开经营的问题都不解决，那么，这个改革是不能成功的。审查修改规章制度这件事，估计要搞一到两年。两年内不解决，这个机会差不多就溜过去了。经贸部要组织一个班子，有关部门一起参加，同地方座谈，研究哪些事应当管，哪些权应当放，成熟一批解决一批。

二、正确认识形势，总结发扬去年的好经验

前几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形势是相当好的，认为去年有许多好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和继续运用的。我们应当从去年的经验中领悟到一些道理，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去年工业增长速度快，而又比较健康。全年工业增长 14.6%，但和 1985 年的经济过热不同。去年的速度，第一不是靠消耗外汇储备，大量进口零部件，组装产品内销来实现的，去年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外贸出现顺差、外汇结存也增加了。第二，产品没有积压，工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生产的增长，说明产品基本上适销对路。第三，经济效益好，亏损企业减少，亏损额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减少约四分之一。特别是下半年以来，企业上交利税稳步增长，产品质量提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

降低，流动资金周转加快，劳动生产率提高 7.9%。第四，预算内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不像往年，只有小企业发展快，大企业速度降低。总之，去年的速度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速度。我们反对片面追求高速度，但是对健康的正常达到的发展速度不应反对。去年的快速增长，从各方面看，没有危险因素。种种情况说明，我们国家具备了发展快一些的条件。

其次，几年来经济工作中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年开始缓解。前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一快，不稳定的因素就加剧，多发票子啊，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啊，消费基金失控啊等等。长期积累下来的不稳定因素去年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它趋于缓和了。货币发行和信贷增长速度是近四、五年来最低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控制，投资结构向合理的方向变化，重点建设项目完成较好，特别是电力建设成效显著。财政收入完成了预算，支出得到控制，财政赤字比预料的少。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速度（13%）略高于总需求增长的速度（12%）。消费增长也比往年低。

去年对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全面，形势好是全面的。不仅工业均衡协调发展，农业也丰收，粮食产量可达 8100 亿斤，接近一九八四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出口创汇增长 20% 以上。特别是基层的状况，农村、工厂的状况，都比往年好。今年一开始，各个主要方面的有利因素就比较多，呈现出好势头。这样全面的好形势，以往还是少有的。

总的可以看出，去年宏观控制既没有影响搞活，又确实起了控制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九八七年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当然，我不是说去年我们把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但是，去年是第一次出现微观进一步搞活，宏观控制也起到良好作用的情况。过去几年中，往往一加强宏观控制，就影响微观搞活，一说搞活，宏观控制就不起作用。去年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好经验。例如，承包是很好的经验，它既有利于微观搞活，又有利于宏观控制。金融体制改革也搞得较好，票子控制了，又没有影响正常生产和流通。企图把经济上不稳定的因素一下子都消除，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沿着一九八七年开辟的途径前进，不稳定的因素将会逐年减少。

我们必须把稳定经济和改革结合起来。稳定经济，要用改革的办法去实现。不稳定经济，改革很难进行下去；不改革，稳定经济也做不到。这

是近几年大家的一个共同认识。遇到问题，第一要正视它，不正视问题是不对的；第二要坚持改革，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一遇到问题就用老办法，也是不行的。在这方面，一九八七年有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我们总结还不够。认真总结一九八七年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从中增加信心。只要我们沿着这么一个路子走下去，不断实践，不断完善，我们的经济是可以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的。

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观点。去年春天分析形势的时候，有一些同志看得很悲观，说是“险象丛生”。今年又有一些同志说是“非常严峻”。我看这都是缺乏科学分析的。当然，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是好的，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但是，现在回头来看，1987年开头那种悲观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没有为实践所证明。今年对形势的悲观看法，肯定也不会得到证实。为什么经常发生这样的不正确的估计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用老观点来分析新问题。

三、物价和食品问题

1987年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都好，唯独物价情况不好。物价上涨幅度大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物价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食品问题。物价上涨，最突出的、反映最强烈的是食品价格上涨。一些大城市实行凭票限量供应的都是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

由此我们应当认清一个道理：食品问题确实是极大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首先在吃的问题上稳住群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去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55%用于购买食品，是开支的大头。物价指数上升，食品价格因素占65%。食物是必需品，家家不能少，天天不能缺。食品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不仅影响经济，也影响政治安定。所以说，食品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点认识得不够。只有对食品问题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群众才能安心、放心，改革才能迈开更大的步子前进。所以，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食品问

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认真研究，经常关注，切实解决。

食品供给不足，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食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是进行改革和搞活经济以后出现的，仍然怀念过去的“物价稳定”。其实通货膨胀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搞活经济以后出现的。应当说，在旧的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更严重。有钱买不到东西，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买东西排队越来越长，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是隐型的通货膨胀，也有人叫它压抑型的通货膨胀。票子发出去了，没有那么多商品来兑现，工人领了工资买不到东西，那还不是通货膨胀？要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过去一直都超过。如果不超过，为什么实行凭票限量供应。

食品问题，既然是长期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又是当前物价问题的核心，我们就必须找到食品涨价的真正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地去解决。

一说涨价，有的同志就喜欢笼统地说什么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是票子发多了。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光讲这种一般的道理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去年货币增长速度比近几年都低，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善，为什么食品价格反而涨得更厉害了呢？总需求必须和总供给相适应，这个观点是成立的。去年的货币投放仍然多了些，这也是事实。但是，具体说到食品问题，就不能拿这个来解释。事实上，人们并不是因为手里票子多了，就多吃了多少蔬菜，也不会因为收紧银根就能使猪肉的供应增加，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

说到底，当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从统计数字看，蔬菜、猪肉等食品在一个时期的供应量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银根松些还是紧些，供应都必然紧张，价格必然上涨。而食品供给量减少是农业生产问题，造成蔬菜、生猪生产不稳和下降的是政策原因。

回顾几年来走过的路子，可以从农业生产的严重的波动中得到不少教益。这几年的农业问题，总的不是发生在农业增长速度上，而是发生在波动上。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甘蔗、麻类生产都发生了大起大落、忽起忽落的严重波动。这反映了生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主要是收购政

策引起的，是违反价值规律造成的，而不是别的原因。如粮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包括提高粮价，结果粮食连年丰收。一九八四年，连雁北挖煤的地方也大量增产粮食，出现了许多新的商品粮产区。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多了 200 斤。再加上连续几年进口粮食的积累，仓库放不下了。一时“粮食太多”的呼声高起来了，许多地方停止了收购，农民吃尽“卖粮难”的苦头。粮食收购政策的改变，又使新商品粮产区受到了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很快就降下来了。又如棉花，也是一度发展很快，刚好了一阵，就感到“多了”。我们信息不灵，但又常常夸大某个信息。把棉花生产压下去很容易，再要恢复就要费力气了。又如生猪饲养，一度也发展很快，后来出现了“卖猪难”的情况，农民养猪积极性受挫，小猪价格降到五角钱一斤，说明农民不愿意养猪了。一九八四年下半年，我们订了几条鼓励政策，一九八五年生猪产量回升，避免了凭票供应。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粮价上涨，猪价不动，养猪普遍变得不合算。小猪价格跌到两角钱一斤，这对生猪生产是破坏性的。我们当时估计不足，怕提高生猪收购价会引起物价指数上升，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最后出现了现在这种猪肉严重紧缺的情况，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蔗糖，前几年广东就反映，再不提价，生产要萎缩。我们也是长时间下不了决心，拖到现在还得解决，代价更大了。

几年来农业生产的波动，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首先，农村经济已经转到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指导农村经济需要有灵敏的信息反馈，但我们信息不灵，或者虽有信息却没有及时作出必要的反应，造成了很大损失才被迫采取措施，往往是马后炮。其次，我们在价格改革上过分谨慎。明明知道某种商品不提价就会打击生产，因为考虑物价指数而不敢提价。现在看，物价指数是个重要指标，但不能机械地只看物价指数。购销倒挂，暗补，实际上也是涨价，但不反映在指数上，有多少道理？从实践来看，如果是在改革中有计划地提价，同时给消费者以补偿，那么即使提价多一些也没有什么危险。该提价的不去有计划地提价，结果伤害了生产，加剧了紧缺，最后自发涨价，涨得更厉害，危害很大。

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等多种原因，从长远来看，农产品逐步涨

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如果硬是不准涨价，就必然伤害生产，结果就会带来更严重的紧缺。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涨价，而是用什么政策和方法来对待食品涨价问题。

出路无非是两条：

一是走老路，恢复统购统销，全面恢复凭票限量。这一套驾轻就熟，很容易搞。但必须看到，现在就是恢复统购派购，也不灵了。过去基本上还行得通，但也不那么灵，有些农副产品多年来怎么抓也抓不上去，就是证明。现在，农村都在发展商品经济，再恢复老办法，就更行不通了。

二是找一条新的路子。下决心逐步提高食品的收购价，让农民有利可图，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给城市居民发食品补贴，把过去倒挂暗补的钱拿来给市民明补。实行补贴和食品价格挂钩。过一段时间，食品再涨价，补贴就再增加。把这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长期稳定地执行下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这样一来，农民有了积极性，食品生产有了活力，市民心中有数，也就稳住了。这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在农村低价派购、在城市暗补以后低价销售食品的老办法，既抑制生产，又鼓励消费，连不大喜欢吃肉的人也要把凭票供应的肉买出来，因为这是福利，不买就吃亏了。新办法所产生的机制正相反：促进生产，抑制消费。补贴发到市民手里，他觉得不必要的或不合算的，就不买了，减少了很多浪费。

暗补的老办法如果不改，财政负担必将越来越重。因为暗补的办法是补给经营环节，不是直接补给消费者。从补贴面来看，暗补不但要补按人基本定量部分，还要补餐馆饮食、糕点等，并且助长经营环节的管理不善，多补了好几块。食品多的时候，各个环节都不收购，甚至还抛售存货，加剧农民的卖猪难、卖菜难。食品货源不足的时候，各个环节都提价，都揩油。近来生猪调拨价抬得那么高，农民并没有得到那么多好处，大部分利益都让流通环节占去了。有几个原已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城市，最近把暗补改成了明补，他们的主要考虑就是按老办法搞下去财政补不起。

实行新办法以后，有一些配套措施必须跟上。

首先，要继续加强对食品生产的组织工作。提高收购价，但不能取消任务。对猪、禽、蛋、菜等，还要和农民订合同，定任务。既要让农民有

利可图，又要下达任务，要求完成。特别是大路菜，必须坚持计划生产，规定种植面积和商品量，要通过计划和合同的约束，以及财政补贴和乡镇以工补菜等措施，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保证稳定供应。副食生产，要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办好国营、集体养猪场和养鸡场，积极扶持专业大户，同时也不忽视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要两条腿走路。

其次，在食品问题上，外贸出口和国内市场要统筹安排。凡是国内市场紧缺的，要下决心少出口或不出口。粮食、饲料等还要适当进口。特别要避免外贸抬价收购，防止把国内市场价格抬得很高。

再次，要努力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过去很多补贴都花在中间环节上了。减少流通环节，是商业改革的一大课题，一定要认真解决。

还有一点，就是必须制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暴涨。对紧缺的生产资料，要采取综合对策，包括促进生产，限制消费，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反对垄断抬价等。

总之，抓好以上几点，食品问题将可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可以走出一条长期稳定的解决食品问题的路子。

在食品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现实必须考虑。食品问题归根到底是农业问题，而中国农业有一个根本的制约，就是人多地少。现在全国每人只有一亩半地，将来人口增加了，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还会越来越少。即使实现了我们粮食生产的发展目标，由于人口的增长，到本世纪末人均占有粮食也不过 800 斤，仍和现在一样，不会有多大改善。生产一斤猪肉需要四斤粮，比转换任何其他肉类消耗的粮食都多。所以猪肉吃得太多是有问题的。苏联、东欧有个教训，就是猪肉价格定得太便宜。苏联、东欧国家总的生活水平比西欧低，

但吃肉比西欧多，因为肉价太低，靠国家补贴。东欧的同志自己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中国人历来重视吃，中餐比西餐复杂，讲究吃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没有条件大吃大喝。所以，必须把我们吃的文化，向更科学的方向引导。从长远讲，在各种食物的比价上，肉价不能太低，特别是猪肉价格不能低。要提倡吃鸡、吃兔、吃鱼，吃植物蛋白。要不断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形成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食物结构。

四、进一步推行承包制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承包制的认真贯彻和落实，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坚决地抓好承包制的配套、深入、完善、发展。

很可能和农村情况一样，从承包开始启动，激发出巨大活力，带来许多新的事物。

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好像和包产到户是矛盾的东西。其实严格来讲，它也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在承包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的同志讲：我早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行，你看现在又搞规模经营了吧，又回来了吧。其实现在的联合体和过去的生产队是两码事。没有家庭承包制，就不可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不可能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也就没有专业户，没有新的联合和新的规模经营。

现在看，企业承包制也是这个发展趋势。第一，承包以后会大大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加强，为“满负荷工作法”等科学管理方法的推行提供条件，同时还必将促进企业内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第二，承包以后将会出现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之间产权的有偿转移和互相参股，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等等。第三，尤其重要的是，承包还将推动企业关心和加快技术进步。第四，将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总之，承包之后，许多新经验、新事物将会出现。如果不从承包制开始启动，这些东西就出不来。

把承包制抓好了，不只是今年，至少三几年内将是一年又一年地向我们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下决心推行承包制，是使我们渡过改革中各种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推行承包制，本身是重大的改革，又是使我们能够顺利进行其他许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五、坚决压缩集团购买力，反对奢侈风气

现在机关、企业，铺张浪费、摆阔气的现象非常惊人。去年全国的集团购买力高达 553 亿元，相当于一九八三年的两倍多。这不仅耗费了公家的大量钱财，而且败坏了风气，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今后要下决心把各级机关搞得很简朴。从中央机关做起。对行政开支和涉及集团购买力的事情，要进行仔细审查，除了真正必要的开支以外，该禁止的禁止，应限制的限制，可暂停的暂停。今年先实行若干个暂停，如暂停买沙发，暂停买空调机，暂停公费旅游式的活动等等。若干种类型的会议也坚决停止召开。一律暂停一年。在此期间研究有关制度的改革。以后怎么办再说。

同时，行政经费要实行包干。超支或节余，要使干部本身的利益受到影响，以便形成一种节约机制。

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具体办法。今年如果能从五百多亿元集团购买力中压缩 100 亿元下来，财政最紧迫的困难就解决了，可以避免多发票子，风气也变好了。

反对奢侈之风，提倡艰苦朴素，不只涉及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各级党政领导在艰苦朴素、反对奢侈方面都要带头，带出一个好风气来。

总之，今年我们要把几件事搞好：一是贯彻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这是全局性的大事；二是把食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主要食品价格和补贴一挂钩，老百姓心里安定了；三是大力推行和完善承包制，把企业的积极性和活力进一步调动起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四是把集团购买力坚决压下来，缓解财政困难，造成一个好风气。这几件事真正抓出成效，一九八八年的整个形势会更好。

注释

1. “四小”指当时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

关于起草制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 的三次批示*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一九八八年二月

对《温州农村一批私营企业主患有“百万恐惧症”》的批示¹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

陈俊生同志：

迫切需要拟定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营企业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经营，请予布置。

对《武汉市发布私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的批示²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

岳琦³同志：

请财经领导小组收集一下各地自定的私营企业管理条例和规定，加以研究。（我已告福建、浙江两省，也搞个管理条例）

* 这是赵紫阳请陈俊生负责布置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先后作的三个批示。

对《孙起孟⁴、冯梯云⁵谈民建开展 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工作问题》的批示⁶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俊生同志并告明复⁷同志：

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一定要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不是此稿子差不多了再拿出来征求，在没有稿子前就可先和他们座谈。也可考虑请民建也着手起草一个条例，以后再根据两个稿子比较修改。请酌！

注释

1. 这是赵紫阳 1987 年 10 月 14 日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258 期刊载的《温州农村一批私营企业主患有“百万恐惧症”》一文所作的批示。

2. 这是赵紫阳 1988 年 1 月 10 日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65 期刊载的《武汉市发布私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一文所作的批示。

3. 张岳琦（1938—），山东省枣庄市人。曾任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吉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4. 孙起孟（1911—2010），安徽休宁人。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副秘书长。

5. 冯梯云（1925—），浙江慈溪人。曾任民建浙江省副主委、省工商联副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6. 这是赵紫阳 1988 年 2 月 6 日对《零讯》第 12 期刊载的《孙起孟、冯梯云谈民建开展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工作问题》一文所作的批示。1988 年 2 月 8 日，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小组会议听取陈俊生等关于私营企业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确定了私营企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问题。

7. 阎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致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的电报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中共辽宁省委转沈阳电工机械厂厂长李正治同志：

在公开招标承包、聘请厂长的改革试验中，你果敢地应聘到沈阳电工机械厂当厂长，与广大职工一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这个厂的经济效益大为提高，企业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并向你表示祝贺。

沈阳电工机械厂招标承包取得成功的事例，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坚持“两权分离”、实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将使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并把我们工业企业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

我相信，你和全厂职工在初战胜利的基础上，只要进一步搞好企业内部的各项配套改革，精心加强经营管理，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今年一定会取得更为巨大的经济效益。

希望你再接再厉，更好地团结全厂职工，发扬首创精神，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承包经营的配套、深入、完善、发展上继续下功夫，大力开展双增双节，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

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是对十三大的科学评价，也对我们如何学习十三大文件和贯彻十三大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学习十三大文件，重点应当放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这样学，才能提高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自觉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真正有收获，起作用。否则，即使文件读了多少遍，如果思想依然故我，习惯于用老眼光去分析新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学，或者没有学好。

为什么要把解放思想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回顾一下我们九年来所走过的路子，就会得到有益的启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收获是，在明确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同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但是，有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给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提供了在实践中探索的可能和选择的机会。大家都清楚，我国农村的改革是从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我们的工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的。这些办法，六十年代有些地方也出现过。但当时我们的思想路线不对头，批判了这些东西，把它们都作为修正主义压下去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群众再度提出这些办法时，我们的态度就不同了。我们很重视这些新生事物，认真观察它们的实际效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看

* 这是赵紫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到了这些做法对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很有好处，就把这肯定下来了。即使如此，我们当时也没有在全国马上推广它，究竟怎么搞好，请各地干部群众自己去创造，去选择。当时有人说：“你过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他们所说的“阳关道”就是“一大二公”；“独木桥”就是包产到户。中央允许大家独立思考，在实践中进行比较，不出一年，结论就出来了，实行责任制才是真正的阳关道，大家都走到这条道上来了。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作的结论，而是实践作的结论。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以后，又出现了专业户。一部分农民脱离开土地，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就是乡镇企业。开始也是少数人搞，以后效果很好，我们总结了它的经验，逐步推广。人民解放了思想，进行了创造；我们也解放了思想，承认和总结他们的创造，才得到了这样好的效果。对城市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比如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租赁、合股、债券等等，我们也都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去处理的。可以说，这几年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提出和推广，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种局面。思想解放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没有办法可以有办法，没有方案可以出方案。由此可见，我们国家这九年之所以欣欣向荣，集中到一点，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得益于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这是讲过去九年，思想上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今后，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仍然有赖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国家为什么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不能实行另外的政策的问题，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这是九年来解放思想的结果，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的起点。

解放思想当然不是提倡胡思乱想。恰恰相反，解放思想的实质正是敢于实事求是。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敢肯定，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不敢革除，都叫做不实事求是，或者说，思想不解放。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我们都应

该承认，应该试验，应该探索。生产力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越有吸引力。怕生产力发展是没有道理的。顾虑重重，唯独不怕束缚生产力，归根结底，是被一些不从实际出发的框框禁锢住了，不敢解放思想。这样就很难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合拍。十三大总结了九年来改革和开放的丰富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生产力标准提到第一位，使全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现在应该通过学习十三大文件，用十三大的精神来武装全党同志，使学习十三大文件的过程真正成为解放思想的过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思想上的解放必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党就能更有朝气，充满创造的活力。各级党组织都要按照这样的要求来领导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和十三大精神的贯彻。

关于《对今年物价形势的分析及“双紧”方针的看法》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此件很值得一看。建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财经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社会经济技术中心、财政部、物价局各同志一阅。

在我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不要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这个原则还是对的。但是抽紧银根措施只能是适度的，否则会造成生产滑坡，供给紧张，加剧财政困难，也达不到稳住物价的目的。因此，宏观指导方针，不能只注意稳住物价一头，而必须兼顾物价与增长两个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有稳定，其他矛盾更无法解决。去年第四季度已开始紧缩银根，今后需要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动向，以便发现问题，随时调整。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一份物价和经济情况分析报告的批语。

接见全国企业承包责任制座谈会 部分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承包要引入竞争机制

对现在竞争招标不能估计太高。真正搞竞争的还不多，有些名义上搞竞争，实际上没有做到。现在真正引入竞争机制还有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要研究一个冲破阻力的办法。今年推行承包的重点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在承包中，真正引入竞争会有很大动力。今天早晨电台广播吕东同志的讲话，意见是对的。承包竞争先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内进行，首先要在本企业，可以是原班子，但要搞竞争招标，目标要面向全社会。实行竞争招标现在一般还是讲中型企业，鞍钢、首钢搞招标还有困难，但下属二级厂矿可以搞。总之要想个办法去冲破障碍和阻力。承包的潜力大得很，没有承包的企业要实行承包，短期承包要改为长期承包，同时要引入竞争机制，这是最大的潜力。承包饭至少可以吃三、四年，农村承包也是吃了四、五年。工业企业承包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高峰。去年承包是起步，今年要明显见效益，明年会大见成效，然后再继续发挥二、三年，城市承包至少也可以吃四、五年饭。

二、承包要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强调厂长的权威，另一方面要使工人发挥主人翁作用，使他们感到是为自己而劳动。今年要总结、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如何从厂长承包变为全体职工的承包，如何从厂长承担风险变为全体职工承担风险。这

样厂长就不会孤立，也不会妨碍厂长的权威。只有全体职工承担责任，把厂长的责、权、利变为全体职工的意志，这样风险才能落实，这是我们今年要在实践中研究的一个问题。总之，今天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机制目前多数企业还没有落实；二是厂长承包如何变为全体职工承包。

三、承包要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条件

（当汇报说，企业对国家承包以后，内部层层签订合同落实承包，工人干得好，收入还可以超过厂长，要给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也就是岗位靠竞争，实惠靠劳动时）对！机会要均等，工人多得了，厂长也敢拿了。机会均等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如果机会不均等就会引起一部分人不满，就像考大学一样，分数达不到就没有办法了。总之，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有本事、肯干谁都可以，没有本事、不干，走后门、拉关系也不行。企业风气好转了，整个社会也就好办了。

四、承包要搞好配套

（当江苏省提出要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时）将来地方财政都要实行包干，企业承包，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套，不能企业承包地方不承包。将来财政都要搞包干，可能多数是搞递增包干，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再讨论。总之一句话，城市搞包干了。

五、承包要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收入

工人工资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工人收入增加了，但工资含量不提高，就是经济效益的提高要大于工资提高的幅度。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职工从互相攀比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将来城市规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职工收入可以试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个问题劳动部门正在研究，但要经过试点。

六、要研究承包以后企业效益不均等的问题

现在企业的水平相差得很多，往往是经营好的企业工资并不高，经营差的企业工资也不低。现在一搞承包，肯定是落后的企业，工资收入就大幅度增长，上升以后，就成为既得利益，降不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办法可以是在一个城市的同行业确定一个平均先进基数，差的企业基数可以定得高一点，好的企业基数不能定得太高，同时要实行工资福利与经济效益挂钩，如果没有把握，可以先定一年再看。现在往往是越落后的企业油水越大，这部分企业如果工资奖金高于经营好的企业，将来全国一规范化，既得利益就保不住了，企业自身就没有竞争力了，这个问题要研究。

七、关于推动企业联合问题

原来讲的联合实行三不变和松散的原则是对的，但不能停止在这一步，这样不仅不能前进还要后退。现在迫切的是要向前进一步，向真正的企业集团发展，不进则退，不聚则散。吉化的办法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回去你们要总结一下大厂包小厂的经验。企业联合迫切需要法律保护和仲裁，要搞个法规，法院也可以按此进行调解或判决。

八、关于两权分离问题

我们说实行两权分离，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但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还没有解决，看来光有方针政策还不行，还要搞一个文件，怎么样强化经营权，怎样弱化所有权，这个问题《企业法》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总的是弱化所有权，但由谁来代表所有权，要有个办法。股份制的企业可以搞董事会，只处理财产关系，但不能搞成权力高于一切的董事会。

今年企业推行承包制，就是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按这个方针搞下去，今后几年会大见成效，这对于我国经济局势和整个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日报》登载的“财政靠工业，工业靠承包”，这是对的。承包的意义很大，承包这一着棋牵动全局。一九八八年将是承包制取得更

大效益的一年，去年是开始起步，今年显示明显效益，明年效益会更大。这两年很重要，要毫不动摇地抓下去。今年也是经验丰富的一年，配套、完善、深化、发展都是要出经验的，不要过早地提规范化是对的。今年将是效益更明显的一年，经验更丰富的一年。希望今天到会的省市和企业要带头做出新的贡献。

经济要繁荣 党政机关要廉洁*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广东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说，前几年有些人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这种顾虑已经很少了。对广东的发展，有口皆碑。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广东提供了生动的证明。不久前，中央又决定把广东作为综合改革的试验区，要求广东在改革中继续先走一步。现在看，不仅广东，全国的经济的发展都将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相当的速度，形势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实际上，在对外开放的初期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初期，贵族当权，商人有钱，那时行贿受贿十分盛行。以后，他们逐渐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但在有些国家和地方，行贿受贿之风依然盛行。现在东南亚有些国家，经济很繁荣，官场很腐败，官员花商人送的钱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国家决不能走这条路，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富裕起来了，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收入也比较高，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收入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党政机关干部继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是个

* 这是赵紫阳在广东视察时的谈话要点。

必须认真解决的新问题。有的部门，企业和专业户不给它点好处，就不好办事。对这种现象不能见怪不怪。不是说，现在已经发生了多么严重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必须清醒，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越走越远。等到严重了，再纠正就困难了。

我们的要求是：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企业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必管得太细太死。主要是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要管严。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要整饬吏治，保持吏治廉洁。人们出国常常看到，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往往越阔气，贵妇人们珠光宝气。发达国家反而不这样。所以，政府机关讲排场、摆阔气，是落后的表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奢侈之风决不可任其发展。我们要做到：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物资丰富，人民群众越来越富裕，而党政机关很廉洁，公职人员很清廉。为此，要加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改革人事制度，健全相应的规章和法制，当然也要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等等。总之，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希望广东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

规章制度要有利于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之后，外贸体制改革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要破除旧的阻碍这个战略贯彻落实的规章制度。要真正使大进大出、随时能进能出的方针实现，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按照过去的一套办法，要耽误很多时间，本来可以快一些办成的事，但搞来搞去，要花费几个月，这样，还怎么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海关、进出口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比如海关，企业进口原材料要纳税，产品出口再退税。从进口到出口，要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仅利息负担企业就承受不了。再比如外汇管理，我听古耕虞¹说过，旧社会结汇是很方便的，而我们现在搞得很复杂。这个东西能不能改一改？首先要把企业这一头搞活。企业一结汇，就分成两部分：属于上交的就由银行收购了；属于留成的部分变为外汇储蓄，企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办法行不行？外汇管理如果不简化，大进大出也会变为一句空话。

现在有些事情管得太细太死，使进出不方便，又有一些在宏观上该管的事情没有管住。因此，今后一方面要放宽、搞活，同时又要在宏观上对该管的进一步管严管住。在这方面，要研究一下发达国家的做法。怎样加强宏观控制？有什么办法，立什么规矩？看来，要有一套东西，需要逐步健全起来。

* 这是赵紫阳视察广东深圳经济特区和大亚湾核电站时谈话的要点。

应当鼓励外商来中国投资办实业。到中国来投资建设，不同于无偿捐赠。香港有些知名人士搞捐赠，拿一千万美元就不错了，拿两千万就很好了。他们什么也不要，非常大方。但我们光靠捐赠就能把四个现代化搞起来吗？合资搞项目，总要在商言商。他是资本家，为什么要来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关键在于既要让他占便宜，又对我们有好处。对方按合同多赚了钱，别人不应当眼红。如果没有钱赚，谁还来投资？项目有钱赚，是中外双方合作成功的表现，对我们也有利。

今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开发区主要的或更多的是兴办外资独资企业，尽可能多引进技术档次比较高的项目。当然，在起步建设阶段，也可以搞一些其它项目。开发一片新的地方，多办独资企业有好处：一是外商容易带进更好的新技术；二是中方不需要配套资金；三是外方独立经营管理，见效快。

以后搞合资企业主要放在对现有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嫁接”的办法。也就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嫁接”在我们的国营企业上。前不久，我到北京吉普车制造厂参观过。这个厂是与美国一个厂商合资的。基础还是原来的，厂房没有增加，对方出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些股份主要是先进技术投资。结果，就生产出了很好的汽车。这是非常合算的。我们要提倡这种办法，把一些国营企业转为中外合资企业。我们可以告诉外商，他们要搞什么，对什么有兴趣，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样做，外商可以把技术带进来，把科学管理经验带进来，把销售网络带进来。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不用拿配套资金。现在我们新办一个合资企业，从开始洽谈到投产要几年时间。但利用现有国营企业去与外商搞合资经营，当年就可以投产，资金回收非常快，效益非常好。如果各地都这样搞，特别像上海那样大的城市，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国营企业来搞合资，那就会很了不起。这里面有什么困难呢？我看主要是多余人员的安置问题。中外合资，由外商经营，首先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既要减少一般工人，又要减少一些科室干部。这样，有一部分工人和干部就要另行安排。这会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工人干部思想上也会产生问题。但要看到，这样做对企业有利，对国家有利，工人干部的思想工作还是可以做通的。对现有的国营企业引进外资来加以改造，通过中外合资经营的办法来实现向

外向型经济的转变，我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潜力也很大。如果北京和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沿海城市都这样搞，外商进来投入三分之一的股份，就可以使我们大批国营企业生产能力发生很大的变化。

注释

1. 古耕虞(1905-2000)，重庆市人，祖籍广东。曾任川畜公司总经理，其经营的古青记虎牌猪鬃占当时全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解放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¹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

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建议印发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下周一)。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把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事可以议一下。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赵紫阳

三月二日

注释

1. 这份调查报告是根据赵紫阳的指示,经芮杏文、温家宝布置,由国家科委、教委、中科院、中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和中办调研室七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87年12月到1988年1月,分11个子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后,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的综合情况和政策建议的报告。

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的回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全体同学：

来信阅悉。获知你们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非常高兴。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也为广大有理想的青少年展现了锦绣前程。殷切希望少年班越办越好，希望你们不骄不躁，锲而不舍，笃志博学，大器早成，努力把自己造就为德才兼备的能够负重致远、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

^{*} 这是赵紫阳为祝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创办十周年给全体同学的回信。

落实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后，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连续开了几个会议。一个是外贸体制改革会议，外贸体制改革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时间不长，就基本上落实下去了。在外贸体制改革会议之前，开过一个外资座谈会，研究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问题。再就是这次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九年以来开放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扩大开放，推进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这几个会议，都是围绕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召开的。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来说，部署已经就绪。这对今年和今后几年的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央确定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但这件事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能不能顺利实现，对沿海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很大的考验。沿海地区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到国际市场上去，既要看到必要和可能，看到有利条件，又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难度就在于，国际市场完全是个买方市场，而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我们说有可能实现这个战略，基本上具备条件，又应当说实现这个战略还有许多不适应的方面，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努力使沿海地区各方面的工作有大的改进。中国实行沿海战略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重视。总的看，反映比较好。但也有些人认为搞不成，说大陆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有些落后办法，

* 这是赵紫阳在沿海省、区、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确实必须改。现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既然定下来了，各方面都要考虑适应这个战略的需要。

第一，在政策上、规章制度上、作风上、办事效率上都必须适应国际市场上千变万化的情况，要有个比较大的改进。

外贸、银行、外汇管理等方面不适应的规章制度要修改。有关的各个部门都要为大进大出、随进随出很好地服务。当然，这个改进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要随着时间推进，不断暴露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第二，要组织科技力量支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实施沿海战略，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我们有个优越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比较充裕，费用比较低，这是参与国际竞争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我们充分利用沿海几千万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要看到，沿海地区的企业，乡镇企业也好，大中型企业也好，总的来讲，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还不高，许多劳动力的素质还比较差。因此，沿海地区要实施这个战略，必须使我们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人员素质有大的提高，不适应新情况的旧观念有大的改变。否则，就不可能有好的产品，不可能有竞争力。

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比较强。当然，比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还不行，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我们科技力量是比较强的。据科委分析对比，总的来说，我们比印度还要强。香港、新加坡、南朝鲜，还有台湾都不行。我们的科技队伍可以搞出很多尖端的东西。但问题是，旧的科技体制使这个力量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科技力量不能很好地和生产结合起来。

沿海地区要适应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迅速改变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技术水平比较差、管理水平比较低的问题，就必须抓科技力量同企业的结合，把科技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这既有一个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有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的问题。乡镇企业机制比较好，比较灵活，跟科技力量容易结合，只要科技体制的改革解决了，就可以有大批的科技人员同乡镇企业结合。但是一些国营企业由于体制上的问题，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并不怎么强，技术进步的兴趣也不怎么高。因为还是吃大锅饭，或者还是卖方市场，产品好坏照样可以卖出去，所以缺乏要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活力。让国营企业转向国外，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实行经营承包制，国营

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就会增加。因为在新的情况下，如不提高产品质量，不增加花色品种，不降低成本，就没有竞争力，有没有竞争力又与企业本身的利益紧密联系着。总之，既要利用乡镇企业的机制，促使大批科研人员同乡镇企业结合，又要通过国营企业体制改革，推行经营承包制，特别是把国营企业转向外向型经济，促进国营企业也关心科技进步。为此，科技体制本身的改革又必须跟上。

科学技术，广义的讲，也应当包括管理，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技术和管理上的要求，要使广大职工适应和掌握，就必须抓好职工培训。现在许多国营企业平均劳动费用虽然比较低，但效率也非常低。前几天我看了北京和美国公司合资的巴布科克锅炉有限公司，是外方管理的，这个公司每天职工在岗位上的纯劳动时间是五个半小时。用同样的办法测算，我们其他企业的工人劳动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这说明我们的许多企业松松垮垮，很不适应国际竞争的环境。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当然，我们不能等条件具备了再发展外向型经济。我们必须在转变过程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提高职工素质。

搞科技体制改革，坚持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当前最突出的是要抓好科技力量支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学校、研究所和各种科研机关动员起来，好好抓科技体制改革，抓科技人员同企业的结合。

这里要指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绝不等于档次低、质量差的东西，不是这个概念。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也必须是质量好的，它也要上档次，也要上水平。有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技术比较高的，有许多同时就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我们的传统商品、传统产业，也要采用新技术。把劳动密集产品当作低档的东西，那是误解。

总之，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各个方面、各个部门要适应大进大出这个要求，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沿海地区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抓科技力量与企业的结合。我们的企业要重视国外的管理经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让外商来管理。通过办合资企业，训练我们的干部，培养管理工业企业的人才，改变企业管理落后的状况。

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

十三大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以改革总揽全局，组织实施十三大的决议。四个半月来，中央政治局在落实经济发展战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一、关于人大和政协的换届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都将于本月下旬举行第一次会议。

政治局经过充分酝酿，并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拟推荐杨尚昆、王震同志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人选，万里同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李鹏同志为国务院总理人选，邓小平同志为国家军委主席人选，李先念同志为政协主席人选；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国务委员的人选，也提出了推荐名单。政治局认为，上述人选是适当的，请全会审议。

十三大对人事的安排，党内党外反映都很好，认为这个安排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全面实现十三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提供了组织保证；国际上反映也很好，认为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国家主要领导人选的推荐名单，是安排十三大人事时

经过长期酝酿、统盘考虑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十三大人事安排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提请全会讨论并作出决议。政治局要求，参加这两个大会的全体党员同志正确审慎地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发挥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同党外的代表或政协委员一道，把这两个大会开好，使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总格局得以顺利实现。

这次人代会将审议批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已经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李鹏同志将在政府报告中专门作出说明。机构改革是十三大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次改革仍然带有过渡性质，重点不是撤减机构，而是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无论是新组建的机构，还是继续保留的机构，都要着重解决好转变职能、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和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的问题。政治局要求在国务院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做好机构改革的各项工作，努力创造政府工作的新气象。

二、关于经济形势

春节前，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去年的经济形势和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形成的意见已作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国务院也作了全面的部署和具体的安排。

去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增长速度比较高，也比较正常健康。过去在传统体制下，往往是要稳定就只好减低速度，要速度就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出现不稳定。去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增长与稳定相统一的新情况，这是坚持改革的结果，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继续应用。最宝贵的经验是：以改革总揽全局，整个经济生活就会出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促进，速度与效益相互统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相互推动的局面。

今后的趋势如何？今年以至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在注重效益、稳定协调的前提下，保持一种较快的、持续增长的势头？政治局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将继续推动经济的顺利发展。特别是企业承包制的推行，使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有了较

好的基础。第二，我国正处在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大批农业劳动力陆续向工业转移，有条件出现工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势头。第三，当前国际产业结构正在又一次进行大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劳动力素质较好而费用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开发和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有利，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第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际市场，互通有无，调剂长短，来平衡经济，有利于改善过去那种受某些短线产品的制约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第五，尽管我们遭受了“文革”十年破坏，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十年的准备，为今后十年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些好的条件。“六五”期间完成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项目和技术引进项目，开始发挥效益。近几年来在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经验，也增强了我们工作的预见性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总之，今后我们应该而且有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

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稳定，都是必需的。经济不稳定，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许多矛盾会更尖锐。总之，经济要稳定，又要增长；要有较好的效益，又要有较好的速度。两者要统筹考虑，适当安排。要允许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和掌握两者的最佳结合。要运用价值规律来稳定经济，也要运用价值规律来促进经济发展，按照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来分析和处理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上好价值规律这个大学校。在传统体制下，想学也无从学起。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必须向全党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党员负责干部，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学会我们过去最不熟悉的東西。

当前经济形势中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物价的焦点是食品价格。这是城市居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去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7.2%，其中65%是农副产品涨价引起的。解决食品价格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副产品供应。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单纯依靠国家投资来发展农业是行不通的。最重要的是学会运用价值规律来同农民打交道，把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地吸引到农业生产上来。

农村已经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价格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最有效的信息。对扭曲的价格，该调的不调，该放的不放，忽而抬价抢购，忽而杀价停收，就会给农民以错误的信息，导致某些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忽上忽下，造成结构性的供需失调和价格失控。所以，必须消除把稳定物价等同于冻结物价的误解。我们在价格改革和物价工作上要采取这样的方针：一是对那些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价格，要自觉地有步骤地加以调整，使物价的起伏有利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同时坚决制止乱涨价的行为。二是在主要食品价格上涨时，给职工以适当的补偿，以免使群众生活受到大的影响。如何做到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经验还不足，要积极在实践中探索。把食品价格问题解决好，可以为整个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

为了解决好食品价格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务必抓好以下工作：第一，有计划地逐步调整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要纳入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二，积极改革流通体制，减少流通环节，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试行建立风险基金，使国家掌握调节供求和平抑物价的强大手段。第三，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运用包括价格杠杆在内的各种手段，正确引导消费，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第四，把主要食品人均定量供应部分的补贴，由暗补改成明补。这在物价改革期间要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第五，严厉压缩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缓和 market 压力。第六，统筹安排好国内外市场。凡是国内供应紧张而又影响很大的主要农副产品，要适当减少出口。这样几管齐下，有助于人心稳定，改革也可以加快。

三、关于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最近，政治局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战略，不只是地区性战略，而且是全国性战略。实施这一战略，能够促进沿海的发展和带动内地的发展，并将有力地推动外贸、科技、财政、金融、价格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内部的改革，是我们落实十三大提出的建设和改革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两个多月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布置落实，

一些部门和地方也已行动起来，围绕这个战略的实施，主动提出本部门、本地区的改革方案和改进工作的措施。

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有利条件很多，但难度也很大。特别是做到销售在外，进入国际市场，要进行多方面的巨大努力。现行外贸体制、企业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实施这一战略，关键在改革。

外贸体制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关、进出口和外汇管理等方面，都要主动创造条件，改进工作作风，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服务，以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剧烈竞争。不适应这个要求的规章制度和工作作风都要抓紧改。这次外贸体制改革，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能够做到在自负盈亏的基础上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就都好办了。同时，宏观的统筹协调不可忽视。

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科技力量较强是我国的一大优势。问题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没有解决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太长。科学技术一经与乡镇企业灵活的机制相结合，情况就迅速改观。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把乡镇企业作为推广运用已有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基地，鼓励科技人员直接到生产第一线，通过科研成果的有偿转让，技术入股，以及经营承包等多种形式，大力创办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乡镇企业。毫无疑问，大中型企业应当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起骨干作用。在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搞活和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将会解决得好一些。从目前实际条件出发，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品出口；从长远看，必须积极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力争有较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归根到底寄希望于科技。我国的科技力量应为此多作贡献。

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要更多地鼓励外商来兴办独资企业，也要更多地以中外合资来改造老企业，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销售网“嫁接”过来。从几年来的实践看，按照国际惯例，外资独资企业由外商直接管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为主管理，好处很

多，应当肯定下来。认为让外商管理我们的企业就是“丧失主权”，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必须加以转变。现在我国的不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硬要将这些落后的管理方法引入“三资企业”，势必把这些企业搞得非驴非马，不死不活，外商赚不了钱，对我们自己也毫无好处。真要振兴我国经济，就应该把“三资企业”办成培养管理人才的学校。把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真正学到手，我们自己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可以提高。现在，我们的企业不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都有很大潜力。管理搞好了，劳动力素质和工作效率都会提高，经济效益就能一倍、两倍地增长。

我们国家，总的来说，必须立足于广大的国内市场，但沿海地区确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决不意味着内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无所作为。沿海搞“两头在外”也不是绝对的，而且有个发展过程，内地能够提供的资源仍然要用，沿海与内地应继续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开发内地资源。内地许多“三线”企业，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应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些问题，都要全面地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

最近，邓小平同志指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在谈到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时，再一次指出：时机有利时，要坚决些。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一贯的、正确的主张。他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要怕担风险。他担心的是我们犹犹豫豫，过于谨慎，贻误时机。小平同志这些考虑，是建立在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当着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很需要紧迫感。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我们应当认真贯彻这个精神。

四、关于《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

今年一月中旬，政治局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人大常委会已决定把这个草案交付全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拟再作修改后提请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为什么现在要制定《企业法》？因为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近几年企业改革的实践有了很大发展，十三大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许多问题，各方

面的认识已趋一致。这是一。二是已有的企业改革成果，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企业改革要再上一个新台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也需要法律提供依据。三是几年来在改革企业内部领导体制方面虽有一定进展，但各种关系并未完全理顺。企业扩权以后，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厂长(经理)的法定代表人地位就非确立不可了。因此，颁布和实施《企业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企业法》的灵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第一，不改变所有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全民，但经营权必须交给经营者掌握。第二，下放给企业的应当是广义的经营权，即对企业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企业资产如何依法转移，包括相互参股，相互投资，相互组合，相互转让，都可以而且应该由企业依法自主决定。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只要不违背《企业法》及有关的法律，都是合法的。这应当成为检验是否认真执行《企业法》的一个标准。

贯彻《企业法》，必须紧紧抓住企业承包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企业承包制是我国现阶段实行两权分离的普遍可行的有效形式。这是经过反复实践得出的经验。当前要把引入竞争机制作为推行企业承包的一个重点，抓紧落实。通过竞争和承包，将造就一批又一批精明强干、具有开创精神而善于依靠广大职工的优秀企业家，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企业承包企业，是最近企业承包的又一具有深刻意义的新发展，体现了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优胜劣汰”和“扬长避短、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原则，有利于用经济办法打破地区封锁、条块分割。企业要以实行承包制为契机，大力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和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责任制，使责、权、利层层落实到全体职工，把蕴藏在企业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潜能发挥出来。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贯彻《企业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三大已经明确指出，无论企业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着眼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重点要放到完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改进企业工会的工作上来。既要保证企业经营者能够独立行使经营权，具有管理权威；又要保证工人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发

挥主人翁的作用。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厂长、职代会和工会的共同任务。关于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等，中央正在研究并制定文件，待在实践中完善后再提请立法机关形成有关法律。

搞好企业的党政分开，是贯彻《企业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企业法》规定，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企业法》体现了现阶段党对企业改革的主张。企业党组织贯彻《企业法》，首先必须保证监督落实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必须严格按照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办事，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起统一领导的作用，而是行使保证监督职能，通过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党的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带动全体职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令、计划的贯彻执行，保证企业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五、关于党的建设

政治局在作出若干加速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同时，把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中央领导机构新的工作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集体领导和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

去年十二月间，中央书记处开了两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了当前党风建设问题。总的看法是，正确认识党风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正确解决党风问题，也离不开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能从根本上减少产生不正之风的土壤。这是治本的办法。我们要有意识地把制度改革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要从群众意见最多、制度改革的条件又比较成熟的问题入手，逐项认真解决。要抓紧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给人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样人事方面的不正之风就会减少。要配合《企业法》的实施，把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搞好。要坚持实行差额选举制度，使干部在生动的民主生活中受到教育和监督。要结合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尽可能地开放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制度，便于群众监督。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也应加快步伐，以减少住房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使党政机关干部继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是个必须认真解决的新问题。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为此，必须加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健全相应的规章和法制，加强经济监督部门的建设和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加，还要逐步改善公职人员的待遇。制度建设要抓紧，但总要有一个过程。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起共产党员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弄权勒索、贪污盗窃、出卖国家利益等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纪、政纪查办。对党内的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繁荣经济和保持廉洁奉公优良传统这两件事情上，沿海开放地带都应当走在前面，为全国创造经验。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严厉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狠刹奢侈浪费之风的问题，这里还要再强调一下。现在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奢侈浪费、摆阔气成风，群众很不满，不狠刹不得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约资金，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风气，联系群众，振奋人心，艰苦创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所有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在这方面做出显著成效。

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十三大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了七个方面的经常工作，即“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地处置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这对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较长时期以来，不少基层党组织忙于行政事务，无暇顾及这些极其重要的经常工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基层党组织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当前要着重抓好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指导基层组织转变职能，做好党的各项经常工作。

应该以党的建设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改革和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繁荣理论研究、文艺创作和其它精神产品的生产，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良好风气。近几个月来，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作了若干部署，包括拓展和深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筹备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和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积极而审慎地推动新闻、出版、文艺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强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指导。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扎扎实实抓出成效来。

政治局建议，各级党委把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党纪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作好准备，以便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六、关于社会协商对话

十三大以来，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协商对话活动，一般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社会协商对话应分层次进行。

全国性的协商对话不宜过多。重点应放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前面提到《企业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可以说是一次全国性的对话。今后，这一类涉及重大改革的法律草案，以及重大改革的方案，如物价的调整、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等，也应在事前或事后与群众协商，认真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共同分析利弊，商议对策。关系到社会安定的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解释政策，通过广泛的对话，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合作。有关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的作用。

地方性的协商对话目前可主要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着重讨论与群众利

益休戚相关的市政问题，如公共交通，住宅建设，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商业服务，环境卫生等，推动这些社会问题顺利解决。

基层单位的协商对话是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围绕本单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本单位的改革问题，制度建设和劳动纪律问题，安全生产问题，以及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基层单位的领导必须同群众认真协商。基层单位福利基金的使用，住房分配，以及生活设施（如食堂、小卖部、浴室、托儿所等）的管理，应该由群众自己讨论，按照群众认可的程序进行管理。基层的民主生活，干群关系，对干部的监督，应成为基层对话的重要内容。总之，基层协商对话应该成为群众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和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何使协商对话生动有效地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如何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制度，也应该同群众一起商量决定。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应当学会通过协商对话，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同心协力解决本单位的矛盾，推动和改进本单位的工作，切不可使矛盾积累下来，波及社会。

协商对话不仅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方式，也是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沟通方式，这对在人民内部形成自我调节和约束的机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要。上面讲的几个层次的协商对话，都要注意吸收各群众团体和各方面代表参加。行业间、单位间的协商对话，现在还很不普遍，要认真加以提倡。

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党务和政务活动的开放程度。这是开展协商对话活动的前提。建议尽快地把人大、国务院及其各部的发言人制度健全起来，定期举行有实质性内容的新闻发布会。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社会协商对话的内容和形式肯定会有许多新的发展。要使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群众都懂得：一切协商对话活动，必须有利于维护而不得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都应当提倡顾全大局，平等协商，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而不应扩大和激化矛盾；都必须有充分准备，讲实话，办实事，办不到的事情不能开空头支票，办得到的事情务必抓紧落实，不能敷衍搪塞。应当牢牢

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宗旨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爱护群众参加社会协商对话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探索规律，提高实效，总结经验，逐步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

以上报告的是政治局四个多月来的主要工作和今后进一步贯彻十三大精神的思路和布局。十三大以来，中央的许多工作，包括一些重要会议的开法和一些重要活动的安排，都力求体现改革的精神。这次中央全会，也要开得生动活泼，讲求实效。各地区、部门、单位贯彻十三大精神有什么重要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对政治局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欢迎同志们畅所欲言。充分依靠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全党的集体智慧，我们就能紧密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给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的贺信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团校的同志们：

值此中央团校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教育、培养青年干部，是保证我们民族振兴和党的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希望你们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再接再厉，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教育青年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刻苦学习，深入实际，艰苦创业，谦虚谨慎，带领广大青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关于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两次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六月三日

发挥我国稀土优势¹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现在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说，在新的产业革命中，稀土与新材料关系重大。世界上 80% 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因此，中国在这场革命中如何打好稀土这张王牌很重要。

对《关于在新产业革命中如何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报告》的批示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这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各方对此有不少议论，建议交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议一次。议时除提出报告的三位同志外，计委、有色金属部门可参加。

注释

1. 这是赵紫阳在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新产业革命时的谈话摘录。

2. 这是赵紫阳对方毅、叶青、吴明瑜三位同志《关于在新产业革命中如何发挥我国稀土优势的报告》的批示。

叶青(1933-)，江苏苏州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组长。曾任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总工程师、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委副主任。

在研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日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议论一下生产资料价格问题。生产资料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生产资料价格是个上涨的趋势，许多涨价来自中间环节的盘剥，平价原材料有不少卖给了个人、“公司”，层层转手倒卖，现在管也管不住。实行两种价格以来，各方面都出现一些矛盾，而且越来越严重。企业虽然承包了，但原材料价格不平等，就不是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要进一步减少两种价格。从方向说，是向活的方面发展。减少平价供应部分，也就是减少倒卖。

目前是否有条件取消生产资料两种价格。现在形式上是计划调拨，执行国家定价，实际上有的卖议价，有的虽然卖牌价，但价外还要给东西，或带有其他附加条件。上海的同志反映，国家给上海的原材料平价部分占百分之三十七，实际上工厂拿到的平价原材料都加了费用或其他附加条件，就是说，不再是平价了。如果情况属实，说明这部分加价，用户没有得到补偿，完全自行负担了。这样一来，由于成本推动，工厂要求涨价，我们又不让涨价，结果下面乱涨价，对生产很不利，到后来，价格也稳不住，有些钱跑到个人腰包里去了。分析一下，会不会百分之六十的国家定价的部分实际上都变成了一种市价，而我们还在怕调价和变动价格产生成本推动，引起加工产品涨价。生产资料平价进，高价出，名义上执行牌价，实

* 这是赵紫阳邀集李铁映、马洪、陈先¹、项怀诚²、王兴家³等座谈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时的讲话。

实际上进来的却是加价的，到底占多大比重？这件事想请你们摸一摸。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大部分还是平价、相当多的部分是平价加附加条件、还有议价三部分。汽车的价格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摸一摸。

消费者买彩电，看起来国家定价没有涨，实际上一张买彩电的票卖三、四百元，还是由消费者负担了涨价部分，只不过涨价部分国家没得到，都落到中间环节和倒卖者个人腰包里去了。因此说越是供应短缺、紧张的东西，越没有低价（平价）的，大都是在平价基础上加了附加条件或加了价的。这些都是产销、卖者与买者之间协议的。

生产资料由“双轨制”改为一种价格，怎么过渡？不放活，不能刺激增加生产；放得步子大了，又怕受不了。从现在的情况看，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怎么改革，又不走回头路？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继续维持两种价格的现状，还是下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双轨制”价格。从生产企业来说，平价材料都涨了。涨价部分实际上已经承受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把它改革呢？

从两种价格逐步向一种价格转变，步骤怎么走法，要看实际情况来定。有些产品取消议价，由国家定价，即恢复统一计划。有些产品取消平价，实行市场价格，减少牌价品种。总之，工业生产资料要逐步地变为一种价格。逐步地变为一种价格，就带来一个年年变的问题，年年变会使承包、财政包干等也要年年变动。如果“双轨制”不改变，继续照目前的办法放任自流下去，只能是越搞越乱。要改变，就要有个方针，总的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向一种商品一种价格过渡，即一种是国家定价，一种是市场调节价格。

原材料价格采取统一提价办法，好处是有个来回账补偿问题。搞两种价格，初期可以起到增加生产、缓和供求的作用，一旦供求紧张，放开部分就控制不住，大涨价。经过一段实践来看，如果涨到国际价格水平或高于国际价格也好办，到那时，就可以通过外贸进口来调节供求。

放开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向国际价格靠拢，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开放政策。生产资料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有利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说，中国长期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是不行的。每年物价指数都要上升，物价上涨，是要解决问题的。如果每年物价也涨了，却又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是不行的。

两种价格向一种价格转变，要分品种、分步骤、分轻重缓急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接近国际价格水平，国内不足的部分可以进口，使用国外原材料。关键是现在价格的实际水平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一点反映不出来，而大家都在反映价格不合理。如果实际价格水平不高的话，那就别改了；如果实际价格涨得很多，就要下决心改革，使其合理化。

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东西少了，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造成的。比如火柴要加一分钱，硬是不敢加，结果工厂不愿意生产，大家买不到火柴。洗衣粉也是这么个问题。生产资料价格垄断性很强，消费品价格竞争性大，供应一紧张就要求提价。我的想法是，消费品价格不要压住不动。我们现在是生产资料价格、消费品价格都压着不让动，这不行，不能是一头乱，一头死。牛奶不让提价，就没有牛奶喝。不通过调整价格，增加生产和供应是不行的。消费品价格要年年调整一些才好。现在是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调价。实际上是每年都将会有些价格要动的，这种情况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要为促进生产、增加供应、调整生产结构服务，不仅仅是为稳定物价服务。有些价格问题是要在动中调整，逐渐使其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轮番涨价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不断地调整，把物价指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不断调整向合理方面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市场调节。我们是有计划调节，反映不了实际。我看目前猪价很可能是高了，搞不好又要出现卖猪难的问题。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蔬菜问题。

生产资料价格怎么改，要搞个改革办法。消费品哪个价格过不去就调吧。我看在价格改革上，不前进就会出现一些畸形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同整个改革的要求不协调。现在是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如此。怕涨价承受不了，不敢调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结果越理不顺。目前我国工业是处在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要理顺各种关系。不理顺各种关系，它就要自发地理顺，结果就出现各种各样畸形的东西。实际上价格涨上去了，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各种关系却更加不合理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轮番涨价要承认它，关键是如何驾驭它。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能提上去，经济又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物价改革如果不前进，而是退回去，那将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

注释

1. 陈先(1919-)，浙江宁波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华东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全国人大常委。

2. 项怀诚(1939-)，江苏吴江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曾任财政部副处长、副司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财政部部长，中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

3. 王兴家，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在全国第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大会。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出席大会的有我国各民族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的为繁荣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和普及科学技术做出了显著成绩，有的在抢险救灾、守土戍边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建立了功勋。你们的模范事迹，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民族关系是良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你们做出了突出贡献，各族人民感谢你们，国务院表彰你们，我向你们、向一切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

在今天这个各民族同志欢聚一起的盛会上，我想讲四点意见。

一、必须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充分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民族和国家不是一个范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许多国家又都是由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

民族问题往往同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上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民族问题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民族问题也不会随之消失。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并正确处理它，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问题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各民族既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又有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国现有各民族组成中华统一国家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极强，一贯地维护统一，热爱祖国。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和威胁的时候，中国各民族总是一致对外。远的不说，打开近代史和现代史看一看，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直至现在，各民族都为维护中国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涌现出了不少爱国民族英雄。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我们一定要维护和发扬这个伟大的民族传统。

二、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我们党一贯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当一律平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差异是不断变化的，民族之间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我国各兄弟民族都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到今，我国各民族都有值得自豪的创造和优秀人物。

在当今世界上，民族歧视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我们国家，不但不准许歧视少数民族，还在法律上、政策上为保护、尊重和优待少数民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主张，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今后必须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

以前说过：“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句话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从全国来看，我们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然彼此离不开。从局部来看，许多地方是多民族聚居的，各民族的劳动共同繁荣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构成了当地总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不管是在汉族占多数的地方，还是在其他各民族占多数

的地方，民族之间都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平等和睦相处，不应有任何民族歧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各有优点，各有所长，应当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汉族干部特别要尊重、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注意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大家齐心协力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设好。归根到底，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统一富强，这应当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也是中华得以振兴、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要团结，要统一，不要分裂，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现在有极少数人妄想分裂祖国，不难看出，他们根本不代表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即使是在中国衰弱的历史时代，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也都遭到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唾弃。今天，当中国已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时候，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外国反华势力妄想分裂中国的图谋，更是绝对不能得逞的。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那个本事。

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克服“左”的影响，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依法坚决制裁和打击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三、坚持改革开放，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民族问题，当前更多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同我国沿海地区相比，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更为艰巨。国家对沿海地区主要是创造条件，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机会，把经济搞活，从而对国家多做贡献，而对少数民族地区，除了放宽政策以外，还应当坚持从其他各方面给以支持和帮助，以促进其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处理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幅员广阔，拥有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各民族干部和群众都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有的擅长畜牧业，有的长于从事“绿洲农业”，有的在开发建设高原、山地方面有特殊能力和适应性，等等。有的民族地区还具有发展边境对外经济贸易的有利条件。正确认识这些优势，坚持改革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可以更快地发展起来的。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团结也好，各民族共同繁荣也好，民族区域自治也好，都不能离开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潮流和社会环境。整个国家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各个民族不改革开放，同样没有出路。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进一步贯彻到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去。

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特别要注意引进人才。哪里人才多（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以及有本领的能工巧匠等等），那里的经济文化就发展得快。从全国看是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是这样。如果人才缺乏，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无法开发，即使有钱、有项目，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实践所证明。所以，关键是人才。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也要特别重视从智力上，从培养、教育和引进人才上给以帮助，这样才能帮到点子上。

民族地区在注重引进人才的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和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勇于参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

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开放，会不会导致珍贵民族文化的消失呢？不会的。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正确的选择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可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将逐渐增多，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趋势会有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继续受到尊重。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本民族进步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至于那些阻

碍民族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习俗，当然将在现代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中被本民族群众所自觉摒弃，但这本身是一种进步。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各个民族只有开放，才能从同别的民族的比较中发现本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价值，才能更珍视它和发展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一定都会有自己更加光明的前途。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现在的发展也不平衡。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完全照搬内地的做法。搞经济建设，必须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不同的地区，不可盲目攀比，也不能机械仿效。各民族地区的建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优势，扎扎实实地搞，讲究实惠，重视效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国家对民族地区在改革上要更加放宽，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允许试验。已为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做法，要继续实行，逐步加以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采取切合实际情况的步骤，该稳的一定要稳妥，该加快的就不要放慢。民族地区如何搞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中央希望各民族的干部群众继续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积极改革，努力创造和完善真正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近几年来，我国有些民族地区同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有所扩大。应该看到，这种差距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也有较大发展而沿海地区发展更快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的目标是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面临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让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发展，这是符合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沿海地区如不利用这个机会，对内也没有好处。反之，沿海地区发展了，必将带动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整个国力增强了，国家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建设。当然，我们对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带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并采取正确有效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今后要制定中西部与沿海地区互补互济、各展所长的发展战略措施。就是说，不是通过放慢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是通过帮助民族地区加

快发展，逐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国家和发达地区必须继续从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要采取一套合乎经济规律的做法，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务必重视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法经济权益，使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能够随着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得到相应提高。

四、更好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必须有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载入我国宪法的，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创举。它既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空前的大统一、大团结，又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有利于每个民族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一九八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结晶。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和自治地方、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这部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法律，各级、各部门都要全面地、坚决地贯彻实施。一定要保证各个自治地方充分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它们的自治权。不能认为贯彻自治法只同少数民族有关，只是各自治地方的事情。前一时期自治法规定的某些自治权利未能很好地兑现，有干部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相应的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因此，必须把实施自治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一步抓紧抓好。各有关部门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制定出贯彻自治法的具体办法和细则。在做各种具体规定和进行工作部署的时候，对民族地方和内地、沿海，不能“一刀切”。

为了贯彻好自治法，应当突出强调的是，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大量培养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这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问题。只有培养出大批政治思想好、热爱祖国、密切联系本民族群众、有文化、

有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的素质才能大大提高，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才能更好地落实，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才更有保障。所以，今后一定要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花更大的力量，做出更大的成绩。在民族地区工作的许多汉族干部，多年来诚心诚意地为各族群众服务，深受他们的信任和欢迎。中央希望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继续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为各民族的团结和繁荣做出新贡献。

同志们，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政领导和各族人民都要继续给以高度重视。让我们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紧密团结，励精图治，沿着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对杜星垣和吕东关于闽粤两省对外开放 调查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印发财经领导小组各同志一阅。在治理整顿中要坚持对外开放、对沿海地区要网开一面的方针，不应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应具体体现在政策、措施上。请纪云同志综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认真研究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 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

一、推广石家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

山东省还在继续推广石家庄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钢材市场。石家庄是在流通领域，山东搞到钢铁厂。办法大体是分两块：钢铁放开部分，搞市场价格；省统一分配部分，属于省的，确定一个价格一千三百元一吨（牌价八百元），通过订货会议，价差两个月返还给用户，用户比较欢迎。用户希望钢材价格全部放开。现在钢材价格层层加码，有的钢铁厂认为奇货可居。请体改委、物资部好好支持山东把这件事情搞好。

二、认真研究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方案

生产资料价格要认真摸一下，不外乎三个方案：

（一）维持现状。

（二）指令性计划部分也放开，调整企业利益。关键是弄清楚按国家计划，企业能拿到多少按指令性计划调拨的东西。钢材现在说是二千万吨，实际上转来转去也都加价了。

* 这是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座谈当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时的讲话。

(三) 把指令性计划再缩小,使国家真正能控制住,真正变成国家订货。如果采取第二方案,还要加一条,特别紧俏的物资要统管,统一定价,实行专卖。国家统起来保证最必需的用户。如硅钢片、薄板、某些化工原料,品种不多。一般钢材放开,紧张的统起来。

这三个方案都可以讨论,但有一条,不能回到过去统一定价的老路子上去。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全靠市场调节了。

三、经济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过去产品经济那一套经济秩序,现在已经不适应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秩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新的经济秩序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企业和企业的关系等,都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地方和企业的利益,既有需要保障的一面,也有需要制约的一面,防止在利益上的互相侵犯。应当加强经济监督,同时对经济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具体,必须有确定性,以便于掌握和执行。建立一套新秩序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有清醒地认识,自觉地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二) 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工资制度问题

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比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人工资低,这种现象不可长期存在下去。而且物价不断上升,工资问题究竟怎么办,必须从长远着想来研究,从工资制度上解决,只采取临时应付的办法是不行的。各单位自行发补贴、发实物等等,不规范,很不透明,弊病很多。要重申不准机关经商,不然就会发生官商不分、以权谋私等问题,发展下去,积重难返。

要调节个人收入。对低收入职工要给予补助,对高收入者要坚持征收个人所得税。当前有一部分人收入很高,但不缴所得税,引起群众强烈不

满。所以，对高收入者依法收税，这不仅仅是与财政收入有关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公正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抓好。

最近各种公司新办了不少，需要认真清理。有些是名为“公司”，实际上继续行使原来行政部门掌握的审批权、物资分配权等等，借以谋取本单位的利益，获取不正当收入，妨碍经济的健康运行，危害很大。凡是行政性公司，除了个别经过国务院准许的以外，应一律撤销。正当的公司，其职工的工资待遇也不能定得太高。特别是对大公司上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应当规定限额；离退休党员干部去公司工作要经组织部门批准，转入公司后的超额收入应作为党费上缴。

（三）进一步深化流通领域的改革

当前流通领域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需要认真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重点要解决好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

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大大减少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缩小“双轨制”的范围。要创造条件尽可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对紧俏的农业生产资料要实行专卖，不准乱插手。

近来，地方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好的现象。看来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形成完全的统一市场还有困难。可以研究有两种市场；一种是全国统一市场，许多商品应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搞地区封锁；另一种是共同市场，在维护地方自己合法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地区之间可以采取合同、契约形式进行经济联合和交流。总之，既承认地方、部门的合法利益，又防止垄断和封锁。

同安志文和马洪谈物价与工资改革问题*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对物价怎么看，今后几年怎么搞，工资怎么搞？

物价问题，工资问题，都无法回避。临时处置往往考虑不周。都属于宏观管理上必须有计划解决的问题。如：物价每年动多少，幅度多大，解决多大问题，工资怎么办。总的原则，不能使劳动者生活水平降低。当然，在分配上有个稳步调节问题。是一九九〇年前搞，还是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搞。这个东西不下决心，发展搞不下去。

今年的问题比较大，物价指数比较高。不能年年如此。每年如此吃不消。但价格问题多，不理顺不行。看来，趋势无法避免。只有市场调节，价格向放方向发展。市场调节，国家如何影响市场。一方面，经济不能失去平衡；另一方面，有些一时放不开的，要有步骤地进行。

工资问题，中国工资制度的路子究竟怎么走。中国越搞透明度越差，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企业以奖金形式出现，机关也以奖金形式出现。发展下去，会积重难返。我们国家将无所谓工资制度。谁搞到钱谁就多分，谁搞不到钱就少分。还有个机关与企业脱钩。脱不了钩是死路一条。要专门组织一些讨论会，到北戴河开会要有一些说法。从明年开始，几年计划，出安民告示，宣布这几年就这样搞。像现在搞临时措施，群众都心中无数。

企业里边，不能完全靠奖金，也要搞工资制，死工资、活工资。

* 这是赵紫阳与安志文和马洪等人谈当时物价和工资改革问题时的谈话。

机关在脱钩以后好办，必须下决心提高工资。学校、医院、公用事业单位、警察、国家机关，工资要解决，与工人工资是什么比例，要有个原则，非解决不可。

中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各省发展不平衡，全国不可能一个标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工资就得高。实行不同工资会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全国统一工资加地方附加工资。退休以后怎么办。全国完全一种工资，行不通。胶东民办教师工资高于公办教师。国家不通过工资来解决，他就想多种办法补偿，久了就变成官商不分、公私不分，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从当前出发，展望未来，看工资问题、物价问题怎么办。经济高速发展还有几年时间，趁此时间理出头绪，避免出现东欧的情况。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理顺，速度下来了，各种矛盾都出来了。再改革，理顺这些东西，就得靠降低人民的收入。

工资中还有一个大问题，如何在克服平均主义中，减少不合理的过分差别，体现公平的原则。有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认真收。从政治上考虑不够，很多人不交。对不交的要处置，依法办事，向社会公布。

通过计划，体现这些东西。“七五”还有两年多，搞一个五年计划，搞到一九九二年。一九九〇年以前搞什么，一九九〇年以后搞什么，能不能基本搞好。首先要有一个模式，如公务员制，有个总体方案，有些地区先走，有些地区后走，有些措施先行，有些措施后行，但要在总体设想下进行。

今年物价太高了。今后要有个总的控制。比如，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百分之十以下，百分之八、九、十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把物价指数压得很低，时间放得很长，也不利。物价上涨，就有个收入问题。要研究一下国际上的路子是怎么走的。达到这个程度以后，每年物价指数只能百分之二、三、四、五，长期下去。但现在我们没这个经验，如何驾驭这个东西。在物价上涨情况下把价格理顺，在收入增加情况下使分配合理。这几年消费有很大增加，但分配制度没改进，是个损失。宏观上没有这个东西，等到时机过去后，要动价格就得降低收入。

几年内以物价上涨多少解决物价问题，以消费基金增长多少解决分配问题。不至于像东欧国家，不改革经济下滑，要改革就承受不了。

物价的承受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山东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学石家庄，生产企业赞成，阻力大的是钢铁厂。农产品价格，最后剩下城镇居民每月二十七斤口粮，可以长期不动，作为社会福利。再有如何解决低收入职工的工资问题，好的办法也很多。例如，宁肯分出来一些人去种树，照发工资，让另外一些人去搞技术培训，这也是一种智力投资。等到哪一年，矛盾不是太多的时候，认真把这件事情搞一下，把制度立下来。

工资、物价改革，以体改委、计委为主。

北戴河会议，就讨论工资、物价、流通体制。

五年之内，消费不能搞高了。分配超过生产，东欧都走进了死胡同。这一条要注意。货币投放走这条路：国家减少财政投资，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向社会发行股票和债券。一定要使生产增长超过消费。企业有盈利的可以扩大再生产。另外，分配到个人的，可通过债券和股票使其转为长期投资，以减轻国家投资负担，减少货币发行。股份制势在必行。

若不把消费资金转为再投资，货币发行少了也不行。要有一系列鼓励措施，发行债券和股票。这样，企业就会愿意用自有资金和入股资金，而不愿意用贷款。

资金太廉价，不可能改善经济管理。

多余的工人要有解决的办法。

对亏损企业必须有政策。有些就是不能照顾，长期亏损的只能让它倒闭，或者被实力强的企业兼并。

要从体制和政策上逼着大家去提高效益，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物价和 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九日

一、今年的物价问题

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城市达到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是改革以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

据物价局讲，今年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差缩小，有些产品比价不合理的情况也有改善，但形势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大家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搞好了会给今后的改革打下好的基础。过好这一关，不出大的问题，要进行全面的部署。

二、今后工资和物价问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有一个系统的方案，纳入改革的规划之中

工资物价问题，计委和体改委要有一个长远打算。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苏联现在价格还未动，南斯拉夫搞晚了。我们如果再拖下去，没有系统的决策，再搞几年可能会走上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道路，那时再来解决难度就大了。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有一个系统的方案，分步实施。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过这一关。今年北戴河会议要讨论这个问题，先搞一个现在到一九九二年的五年规划。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我们的纲领，市场调节是必要的，但不理顺价格，市场调节便是一句空话。动价格，物价就上涨，如果没有长远打算，势必避重就轻、避难从易，耽误了时机，最后解决的条件没有了。南斯拉

夫、匈牙利、波兰都是前车之鉴。今年物价上升幅度很大，今后几年之内，群众和社会最高承受能力达多少，在此限度内，连续几年把价格理顺。要弄清楚物价要理顺什么东西。每年上涨多少，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理顺，都应有规划。如我们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年时间就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上涨幅度，五年时间这个幅度，把物价基本理顺有无此种可能？也可分别计算，每年上涨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样需要十年、五年或三年时间？时间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要算账。

物价定到这个盘子，必须在工资方面有措施。要考虑物价、工资和经济的发展，三者统一考虑。例如，在我国，工厂和机关是否要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只要工厂和机关能够脱钩，实行不同的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解决的难度就不大了。现在怕互相攀比，在工资方面我们应有个明确的制度，向人民宣布，使人民接受。在机关搞公务员工资制，在企业搞企业工资制。

工资中有三个问题：第一，消费不能超过生产，必须给人民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分配超过生产必将导致生产衰退、下降。改革要使人民得到利益，但消费必须低于生产的增长。现在到了该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使人民改善生活的期望值冷却下来。否则，必然出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结局。人民没有正确的精神准备，收入多仍会不满意。生产的增长速度要高于消费增长的速度，消费的增长速度要低于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是任何社会必须遵守的规律，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第二，真正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第三，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几年我们走过的路，一是消费过大，膨胀过快，二是平均主义继续发展，三是分配不公，这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公平分配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虽然国家有规定，但没有认真征收，没有认识到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从现在起要下决心建立一套制度，城市中个人收入要申报，首先从大城市开始。先申报，后抽查，不申报的查出来要严肃处理。对非法收入、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取缔。

四、党政机关廉洁的问题，要当作一件大事情扎扎实实地搞

我们的口号是党政机关廉洁。首先解决党政机关的问题，地区和部门可结合自己的情况自己制定措施，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建立和制定严格的制度。

五、改革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工业企业效益

财政问题根本是工业效益问题。这也要有长远规划。必须把工业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放到重要地位，作为长远问题。现在企业用人太多，不仅提高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劳动纪律难于建立，松松垮垮。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在外围打圈子，一触及难度大的问题都绕开了。如物价、工资、劳动问题。现在工人不能辞退，多余人员不能减，城市工人已很多，但有些活不干，又从农村另招临时工，现在厂长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搞下去，改革的成果都将被多余的劳动人员冲销了。现在我们的一些观念、法律、政策都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劳动制度以及多余人员问题，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搞。

六、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一个如何加强、如何改善的问题。现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方法还是老的，不能为群众所接受。中央要专门讨论。

总之，今后几年是改革的关口，如何坚决而又谨慎地度过，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这些都不能回避，不能像南斯拉夫、匈牙利那样拖下来，把有利的时机丧失，最后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解决。对此，我们必须有统一而清醒的认识。

总之，物价改革，不有计划地搞，各地就自流地搞，自发地搞，付出的代价大得多，造成的矛盾大得多。物价乱动，工资就乱动。广东的办法，不能推广，透明度太差。

现在的形势是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有三个问题：

（一）使全党、各级负责同志，对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有个统一认识，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二）要有一个好的方案，由国务院来搞。

（三）必须考虑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局面。要准备出点事情。排除干扰，保持局势的稳定。要搞一个保证改革秩序的紧急治安法，授权国务院，需要时就公布，不需要时就解除。波兰公布半年内不许罢工，不许上街。这么多矛盾，没人反对不可能。

为了制定今后五年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国务院成立物价委员会，以姚依林副总理为主任。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发挥辐射作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们沿海地区办了十几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的看发展得不错，当然也花了不少钱。从天津开发区的情况看，今后建些大工厂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一个工厂地办，虽在这个地方很成功，却很难带动天津市的工业，不能起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广州、福州等城市，有很多大工厂或较大的工厂，技术人员很多，设备很多，但是观念落后，体制落后，管理落后。所以我对沿海地区提出了“嫁接”的口号。好比工厂是棵树，树长得还旺，就是品种不好。现在欢迎外商来“嫁接”，“嫁接”技术，“嫁接”管理，“嫁接”销售网。你们这个开发区，作为“窗口”，体制比较顺，办事比较方便，外商来天津可以经过你们这里来“嫁接”。你们更多地考虑在这里搞增值，搞组装。在你们这里搞一个工厂，作为龙头，其它工序放在后方，加强联合，搞专业化协作生产。后方有许多产品可以拿到你们这里加工增值出口，包括大包装改小包装。改包装、“加耳朵”、“加眼睛”，梳妆打扮，改头换面，提高附加值后进入国际销售网。你们背后有个大工业城市天津，往后还有北京、内蒙古以至西北。这样做，只要工作做得好，就把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带动起来。要注意研究香港的经济模式，那里基本是外面的东西进去加工后转口。特区、开发区应当发挥这种作用，例如把坯布搞成印染布，印染布搞后整理，这就增值了。当然，也可能会出点毛病，发生“水货”、走私等问题。但不

* 这是赵紫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的谈话。

能因噎废食，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加强管理，保护合理合法事情的存在和发展，防止不合法现象的发生。

我们过去把合资的期限看得很重，搞什么合营期限多少年，没有多大意义。长期合作有什么不好？外国人是会算账的。你规定二十年他有二十年的办法，最后你占不了他的便宜。合资时间短，对我们并不利，越是技术高的项目越不利，因为合资期短，他就不更新技术。现行规定要通过立法程序加以修改。

开发区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实行外方向董事会总承包，不包搞不好经营；一包，利润多了，他把钱弄走了，可能我们有些人又要眼红了。其实，销售网络学问大得很，你不利用他的销售网，产品就不可能出去那么多。你要叫他来销售，他就要赚一大笔钱。因为国外的批零差价比我们大得多，批零差价带给销售商的利润非常高。你们是不是读过《亚柯卡自传》？那是一本讲美国汽车生产经营的书。你看他多么重视销售商，要用相当大一部分的精力去讨好销售商，调动销售商的积极性。因为他考虑到，离了销售商是不行的。我们中国过去的产品，生产出来后物资部门统一收购，这是产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销售网是个非常大的学问。销售网本身的信誉，要靠好多年的努力。现在我国从总体上来讲，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销售网，但这不是一、二年能搞得起来的。目前，还得利用外商。

沿海已经开放了这么大的地区，在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中要有个共同规划，各有侧重，避免相互摩擦撞车。

关于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两次批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七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批示

对胜利油田今后如何开采及挖潜问题，听说有不同意见，如何支持他们增产更多的原油，有重要意义。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¹

印发财经领导小组。鉴于今后几年内胜利油田的前景，对我国整个石油生产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建议在下星期一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议一下。

注释

1. 康世恩和房维中受赵紫阳委托，召集有关部门及胜利油田的有关人员召开了三次讨论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了胜利油田挖潜增产的报告。这是赵紫阳对报告的批示。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最近，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认为，当前形势总的是好的。政治上保持了安定团结，生产发展相当快，财政收入和出口创汇增长幅度比较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迅速增强。但问题也不少，特别是物价上涨已成为社会议论的中心，引起了广泛的不安。看来，我国的改革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十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新旧两种体制仍处于交替过程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有待于我们去建立。当前，改革已经进行到这样一步：许多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过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像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冒点风险，迎着风浪前进。现在是不进则退。退回去，将前功尽弃，是没有出路的。继续前进，克服困难，闯过难关，就将坦途在望，出现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我们不能回避矛盾，不能把难题都推到最后去解决。如果那样，最终会失掉解决问题的条件，代价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像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到了该解决的时候如果不下决心去有计划地加以解决，它就会自发地盲目地膨胀，最后物价没少提，工资奖金没少发，结果什么也没有理顺。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结局。现在有个好条件，就是生产在蓬勃发展，人们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对改革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东欧一些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错过了这种好时机，等到经济增长放慢下来再去解决改革的难点，那时就只能被迫在降低人们收入的条件下理顺关系，困难和阻力会更大，很可能引起社会更大的震动。现在经济情况好，老一辈革命家又健在，我们一定要抓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诸多有利条件，迎着风浪前进，坚决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一些难点解决好。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这一关非闯过不行，工作做好了，也一定能够闯过去。

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中认为，要闯过难关，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好下面几个问题：

一、关于物价问题

今年将是我们改革以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有国际市场商品涨价、特别是进口原材料大幅度涨价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就必须理顺原来极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包括国内外市场的不合理比价，工农业产品的不合理比价，原材料与加工品的不合理比价等等。理顺这些关系，就不能不引起物价的上升。这是绕不过去的。今年以来，我们通过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补贴，对副食品暗补改明补，调高某些政策性亏损产品的价格等等，向着理顺价格的目标前进了一步。所以，物价上涨的代价并没有白白付出。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整个物价体系还远没有理顺，例如粮食价格、石油价格、运输价格等等，都还是极不合理的。许多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生产，但长此以往，流弊很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为了过好物价改革这一关，要作通盘打算，制订一个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物价改革计划，不能只是应付临时遇到的问题。例如，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物价指数每年上升多少为宜，大致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初步理顺，在工资、利率、思想工作等方面采取什么配套措施等等，这些都要纳入计划之中。能否考虑，大体在五年左右，把价格问题初步理顺。物价改革总的方向是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并使之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但是，少数属

于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如电力、交通、邮政等等),必须由国家定价。

需要放开的物价,有些可以一步到位,有的可以先实行“调放结合”,然后再一步到位。在物价改革的五年总体方案中,明年这一步如何走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做到社会震动不过大,而又能在理顺价格和促进生产方面真正解决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研究在生产资料、公用事业、农副产品三个方面,明年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哪里,步子如何走。明年这一步走得好,有利于增强以后改革的社会承受能力。

二、关于工资问题

工资问题和物价问题是紧密联系着的。既然要主动地理顺物价,就必须相应地解决工资问题。改革应该使人民得益。过去九年,这方面做得很好,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物价改革过程中,仍应保护人民的利益,使之不受损失,至少应使绝大多数人民实际收入不下降。这样,就有可能较为平稳地渡过物价改革这一关。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这两个问题难度都很大,但不能回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迟早都要过这一关。

实行工资制度的改革,既要有利于增强对物价改革的承受能力,又要解决原来工资制度中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现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报酬,层层“倒挂”,这种现象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各单位自行发奖金、发补贴来解决职工收入问题的做法,很不规范,很不透明,苦乐不均,甚至为了多发钱就搞机关经商,以权谋利,弊病很大,发展下去就会积重难返。应当通过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工资问题要考虑三个原则:一是消费的增长不能超过生产的增长,否则,就会引起经济衰退,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过去长期执行抑止消费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近几年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带有“还账”性质,也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今后的改革应当继续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但个人增加收入的期望值不能过高,这一点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是要克服平均主义,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现在,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合

理的必要的差别往往还不能被某些人所接受。目前不少地方在职工收入中，工资占一半，奖金占一半（甚至占一半还多），而奖金不少是平均发放的。企业之间平均主义、互相攀比的现象更为严重。有些改革，本来的宗旨是克服平均主义，但因攀比成风，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平均主义。攀比问题不解决，对提高经济效益极为不利。三是要认真调节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看来不可能搞全国一刀切的工资标准。具体来讲，地区与地区不能一刀切，机关和企业也不能一刀切。非这样区别开来不可。过去也曾多次想解决工资问题，就是因为怕攀比，一搞全国都得一个样，结果搞不起，只得放下来。可以设想，今后全国干部统一的工资标准，只作为档案工资（调动工作和退休时有用），在不同地方工作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平而有不同的附加。企业工资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要考虑脱钩。企业承包以后，应普遍实行经济效益与工资总额挂钩，允许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有关的政策自主决定本企业职工的工资。这样，剩下需要国家决定的就只有机关和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了，而这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可以按照财政体制分级解决。如能按照这样一条路子，把工资问题大体理顺，纳入正常晋级的轨道，我们就解决了改革中的另一个最大的难点。

工资问题，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物价的变动联系起来考虑，制定系统的解决方案。每年经济增长多少，物价上升多少，相应地工资提高多少，使人们收入的增长略高于物价的增长，这要有一个统一的盘子，并纳入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关于分配不公问题，也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一方面，当前分配中吃大锅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同时，随着经济逐步搞活，人们的收入也拉开了差距。这种差距，有的是按劳分配的体现，是对平均主义的克服，是合理的；但也有不合理的，有些人得到的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的质量与数量很不成比例。分配不公现象，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会降低社会对改革和物价波动的承受能力，必须认真对待。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三个措施：第一，征税调节。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也可考虑是否开征遗产税等），鼓励私

人经营者把其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或用于公益事业，从而有益于社会。对高收入者一定要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现在有很多人该交税而不交，税务部门也不认真去收。看来，对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意义需要提高认识。征收这个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为了调节收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与此相配套，要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先从大城市开始。不管从什么途径来的个人收入，都要申报。一开始执行就要严格，认真抽查，查出瞒报的就严肃处理。经过几年，逐步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第二，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坚决取缔和制裁。当然必须严格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划界从宽，执法从严。第三，对低收入者，要给予补助。最近，国家给了低收入者一点补助，虽然钱不多，反应很好。要逐步完善社会保险和救济制度。

三、关于企业经济效益问题

财政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经济效益，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来，国家的基建投资基本没有增加，军费基本没有增加，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基本没有动，但财政仍然十分困难，有很大的赤字，根本原因在哪里？除了行政费用增加过快以外，主要是企业效益太低。归根到底，国家财力要靠企业来提供，涨价因素要靠企业来消化。所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在是我们渡过难关、摆脱困扰的根本途径，全党一定要提高认识，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提高效益，既要靠好的政策，靠技术进步，更要靠严格的先进的管理。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管理状况相当落后，管理落后比技术落后更普遍、更严重。企业实行经济承包、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只是为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承包本身还不等于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承包之后，在加强管理、健全制度、严格纪律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许多地方对亏损企业没办法，许多企业对多余人员没办法，这对加强管理、严格纪律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造成一种机制：使亏损企业自负其责，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企业能够破产，能够被关停并转；使兼并真正成为优化组合，而不是让先进企业替落后企业背包袱；

使企业多余的人员能够拿出来去从事其他有益的事情，不再继续吃企业的大锅饭；使企业在实行承包制后，不仅能负盈，而且真正做到能负亏，创造利润少了，就要少发或不发奖金，至少发工资。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劳动制度，在这一点上也要敢于“碰硬”。

中国人本来是以勤劳闻名于世的，而现在由于企业管理松松垮垮，纪律松弛，使许多人丧失了传统的美德，变得怕苦怕累。一些青年人对外资企业的严格管理不能适应，不愿意紧紧张张地工作。所以，企业管理能不能改进和加强，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四化建设的前途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决不能小看这个问题。

在今后几年的改革中，如果不能甩掉对亏损企业补贴的包袱，不能让一些经营不下去的企业破产和关停并转，不能把企业多余人员拿出来，总之，如不能通过改革促进企业结构调整，使优者发展，劣者淘汰，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调整，不断地优化组合，企业的管理就很难加强，效益很难提高，消费超过生产的后果也难以避免。这也是难度极大，极易引起社会震动的问题，但要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

四、关于流通领域的改革问题

效益问题不限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里的潜力也大得很。当前，要着重解决好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改革，方向是放开，形成市场调节的机制，最终取消“双轨制”。现在实际上也已大部分放开。农副产品方面，应该有步骤地再适当减少一些合同订购，在城市里把口粮以外的粮食供应放开。大城市要与邻县订合同，解决好城市的大路菜供应问题。

近来，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地区封锁，设置关卡、路障，乱堵截，乱罚款。这是一种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错误做法，必须坚决制止。二是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有新的发展，这是好现象，要加以鼓励和引导。

我们既不可能再回到完全靠计划来“统”的产品经济状态，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市场机制搞得很健全。因此，可以设想，在一定时期内允许两种

市场同时存在：一种是全国统一市场，绝大多数商品应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搞地区封锁；一种是共同市场，由地区之间采取合同、契约的形式进行经济联合和交流，各自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此基础上实现互利和互补。应当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

流通领域里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中间环节太多。有些中间环节，对商品流通不起任何积极的作用，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流通费用，抬高物价，滋生倒手牟利等不正之风。必须取消这些起消极作用的多余的中间环节。流通领域的改革，应当尽可能促进产销直接见面。

许多物资过去实行统配制，形成了一些机构，其中许多工作人员对物资渠道很熟悉，这些机构还掌握着仓库、车辆等许多设施。改革之后，在新体制下，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来发挥这些人员和设施的作用，但必须防止以权牟利和增加中间环节。近来，不少新的公司纷纷成立，其中有些并不是企业性的经济实体，而是以“公司”之名，继续行使原来行政部门掌握的审批权、物资分配权等等，从环节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类“公司”，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妨碍极大，需要进行清理。凡行政性公司，除个别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批准的以外，应一律撤销。

五、为物价和工资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经济环境

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如何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问题，改革、发展与稳定经济的关系问题。

看来，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再去进行物价、工资改革的主张，恐不现实。继续放松货币发行，以无控制的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也是行不通的。如继续通货膨胀，恐怕物价、工资改革方案就难出台。因此，只能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兼顾。为了不使经济环境过于紧张，就不能去追求过高的速度。当然，在我国如果没有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从具体地区、部门讲，应该快的不要慢，不能快的不要勉强。不以速度去评价一个地区的工作。从全国讲，不可能较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沿海一些地区应该也可能更高一些，不要失去机遇。

今后货币发行应适当紧缩。为了既适当抽紧银根，又能继续使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必须在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上下工夫，使需要发展的得到支持，不需要发展的得到抑制，而不是简单的要松都松，要紧都紧，搞一刀切。为此，关键是改进机制，多用经济办法控制银根。几年来，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应当认真汲取，以便今后有更大的改进。

这里，想提出一个资金利率的问题。可否设想，较多地提高利率。一则解决因物价上涨而产生的负利率的问题，二则解决资金价格太低，助长资金浪费的问题。适当地提高利率，可以起控制基本建设膨胀的作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效益和合理调整结构。对国家需要支持的重大基建项目，以及有特殊原因需要国家支持的企业，可以另行照顾。通过这种形式抽紧银根，副作用要小。

六、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问题

党和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许多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都发生过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盛行的问题。现在仍有一些国家，经济繁荣，政府很腐败，当官的靠贪污受贿、花商人送的钱过日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决不能学他们的坏样子，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决地自觉地抵制和反对贪污、受贿、勒索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一己之私利，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玷污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败坏改革的声誉，这是国法党纪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今后不宜把各种消极现象笼统地称之为党风问题，而应根据各种问题的不同性质，如违法犯罪问题、政纪问题、党纪问题等等，区别对待，具体地加以解决。总的提法是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反对一切不廉洁的现象。开展这项工作的范围，限于党政机关，不要搞到企业里去。企业和机关性质不同，情况也不一样，搞在一起界限不清，弄不好不利于搞活经济。

从根本上解决为政清廉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贪污受贿和不正之风的土壤。但制度建设需要有个过程，我们不能等。当前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贪污受贿和弄权渎职，狠刹歪风邪气，不能让它泛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和制度建设，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采取搞运动的办法，但务必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要依靠各级组织，依靠监察、司法、纪检等部门，作为正常工作去开展。应当着重对干部进行教育，同时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工作。要建立并逐步健全人民检举制度，监察部门要专门设立受理群众检举揭发的机构。立案，销案，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对案件应及时认真查办，切实做到不纵不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明确自己那里的重点问题，作出具体部署，认真去解决。这项工作，要多做少说，不要在工作尚未开展起来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宣传。

七、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处在改革关键时刻的中国共产党，有责任把全民族的力量振奋起来，团结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讲物质需要，只讲个人利益是不行的。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必须有精神支柱，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我们既要讲经济规律、按劳分配，又要讲理想、道德、纪律，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二者不可偏废。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利于政治的安定，不利于改革、开放，也不利于发展生产力。

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支柱是什么？能够把亿万人民激励起来、团结起来去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只能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也就是十三大提出的今后世界上有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的问题，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要在这个奋斗目标下，使一代人充满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照搬具体结论），兼收并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决不能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个大目标下讲个性、民主、自由，是正确的，有利的。离开了这个大目标去讲个性、民主、自由，是错误的，有害的，只能使中国陷于混乱，变成一盘散沙，现代化建设也就没有希望了。

思想政治工作，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还要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树立和维护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还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随时对话和沟通思想。党的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成为深受群众信任和爱戴的知心人。

今后五年改革面临的形势，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大家应作什么精神准备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应当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工作不单纯是一个加强问题，还有一个改造问题。过去毛主席提出过“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著名的口号，今天我们也应该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改造。不改造就无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发扬过去真正的好传统，例如红军时代对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的民主主义传统，又要按照新时期的要求进行改造。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只进行训斥和说教，提些又空、又高、做不到的口号。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对象，总结新经验，赋予生动丰富的内容，采取有积极效果的方法。事实上，各地已有不少新鲜经验，例如把思想工作寓于对人的关心之中，把理想、道德、纪律的宣传寓于各种有益的有吸引力的活动之中，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及进行广泛、深入、平等、双向的社会协商对话等等。有许多好经验有待我们去发现、总结和提高。全党同志，包括从事党务工作的同志和从事行政业务工作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担负起这个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任务。

八、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基层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就能顺利地落实到基层，不安定的因素可以消弭在基层，意义非常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不起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认真进行整顿。最近，中央组织部会同一些地方党委，抓了一些试点，对不愿意履行党员义务，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不响应党的号召的不合格党员，首先进行教育，经教育不改的劝其退党，结果广大党员为之一振，党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不少群众要求入党。这项工作，前段只是在农村进行，下一步还应在工厂、机关里开展。

要使广大党员认识到，入了党就必须永远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否则，就不可能置身于共产党员之列。当然，处理党员要慎重，不能为劝退而劝退，不能追求指标。这是一项经常工作，要细水长流，一批一批地坚持进行下去。

九、为改革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

历史经验证明，改革总是容易引起一些社会震动。当前，我们的改革又面临着一些难度很大的问题，矛盾比较多。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每项改革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反对。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渗透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所有这些，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有应付闹事、对付动乱的长期思想准备。头脑要清醒，要准备出些事情。有这个准备比没有这个准备要主动些。

首先要加强基层工作，认真进行基层的民主建设和法制教育，努力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都要扎根于群众之中，支部、党员、团员都要起作用，工会、妇联等各种群众团体都要起作用，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各地，特别是大城市，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要有相应的人员和物资准备。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要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应当在平时就做好必要的法律准备。许多国家有紧急状态法，必要的时候就宣布生效，我们也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为保障改革秩序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并不矛盾。

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的环境。排除干扰，保证社会的稳定，以便集中精力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应当力争做到有备无患。

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我党历史上有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当代第三世界正在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每个社会、每种经济制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秩序。

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去产品经济那一套经济秩序逐渐不适应了，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秩序。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大课题。它不仅包括经济活动新规则的建立，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包括法制的完善，等等。现在在我国，一方面经济欣欣向荣，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而亟需建立这种过渡时期的情况。许多社会矛盾，要靠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来解决，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新的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要用法律加以规范。要建立反封锁、反垄断的法律和法规。对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利益，既有需要保障的一面，也有需要制约的一面，防止互相侵犯。特别要加强经济监督，对监督部门也要有监督。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制订大量法规，这是很大的工程。如每项法规都完全要自己研究，时间将会拖得很长，可以考虑有选择地参考和移植国外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的法规。

在新旧两种秩序的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和混乱。而新秩序的逐步建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就是改革的过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努力把工作做得周到一些，争取把新旧秩序交替中的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要自觉地抓紧改革，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步伐。

近期工作准备这样安排。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针以后，由国务院组织班子，精心设计方案；七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要听取汇报；八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此期间，还要与党外、各界进行对话磋商。

想办法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

把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的工作，今后几年要搞一搞。要与工资、物价改革一起考虑。现在方针已经定了，三、五年内要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革。如果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物价改革就要增加难度；如果紧缩过度，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今后几年如何抑制消费，尚无好的办法，再加上物价上涨，问题就更多。因此，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外，还要缓和物价中的矛盾，要通过各种办法，把消费基金（就是老百姓手中的现金）转为建设资金。如果做到，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即基本建设不太压，票子又少发。当然，一部分消费基金要转为购买力，债券也要还，但不必顾虑太多，要缓解这几年，因为这几年要进行大的改革。如果这次改革解决了机制问题，以后就不怕，实在不行再严格紧缩。那时紧缩与现在紧缩的后果不一样，因为今天还没有好的机制。如果今年票子少发会有什么后果不清楚，弄不好又是紧一年松一年。但如果基本形成市场机制就要好得多。特别重要的是这几年，要用各种办法，比如卖债券、股票，卖企业，卖房子等等，即想一切办法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为建设资金，减少人民的购买力，充实一部分建设资金，就两面得利，即市场压力小，紧缩影响不大，为价格改革创造了条件。

有些问题不必顾虑过多。如国债问题，将来还账与现在不搞了意义不一样，因为现在要过一关。只要银行储蓄稳定，把钱多搞些为改革创造环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境。如果这方面不开些路子，紧缩确有很多困难。消费基金转为生产资金，就是要老百姓少买东西，多买股票、商店、房子等等。如果这几年这条路子能走下去，胆子大些，决心大些，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从宏观上有利，帮助我们过了关，以后有些事还可另外考虑。当然这样做不是完全不顾后果，就是不要搞来搞去，都不解决问题，而物价、工资改革又要出台，事情就只好办了。

小平同志再三鼓励我们，不要怕冒风险，给我们撑腰，还讲“有那么严重？反正是比一九六二年好吧！”当然，股票、所得税、资产评估等工作很难一下子搞好。要有一些鼓励作用才行，但不能从国家这一头开支。要确定个利息标准（银行、股票），都要放手来搞，管你什么东西，反正老百姓冲击市场的钱少了，银行少发票子就可能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着棋，包括卖企业。这不是从一般改革上说的，是这几年现实的需要，为工资、物价改革创造条件。因此，只要对这几年有利，有利于消费基金转为建设基金，以后的问题就再考虑。关键是时间要错开，以后会有办法的，就怕现在议来议去解决不了问题，老百姓手中还有很多钱，冲击市场。怎么办？光靠银行少发钱，最后机制很不合理，基建下不来，生产下来了，农产品没钱收购了，最后又得发票子。这就是一年紧一年松，松的后果是原病复发。我们现在要为改革创造条件，要下这个决心。

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要害何在》 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三日

此件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白头文件，发中央财经小组、书记处、国务院、政治局各同志，并发有关部委。

我们的改革今后要转到解决物价工资的难题上来，承受力如何，能否顺利过关，关键在于提高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三上辰喜先生这篇谈话，所指出的我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严重情况，一方面是弊病，另一方面正说明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因此我们在部署物价、工资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工厂、企业的管理工作和企业内部的机制改革。只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管理，加强内部机制改革，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 这是赵紫阳对《光明日报》驻东京记者采访日本企业管理专家三上辰喜谈话的批语。

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视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近来，航空工业方面传来一些好的消息。我前几年到过贵州一个飞机工厂，去年又到了沈阳飞机公司，还听了黎明公司的汇报。看来航空工业的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好，现在已经开始找到一条路子。我相信今后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我们航空工业，也包括其他军工企业，在我们国家，设备是最好的，技术人员是最多的，而且水平是最高的，有一个很大的摊子，固定资产也是最大的。但是，由于整个国际形势是一个和平环境，愈来愈缓和，因此完全靠军队装备来支持这么大的一个摊子、这么大的固定资产、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多的技术人员，看来是很难的。在这样一个形势越来越缓和的情况下，完全或主要搞军工，搞军工产品，难于有用武之地。设备也好，人员也好，完全靠国内，生产国内的军队装备，恐怕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完全靠国内，大部分设备要闲置起来，大部分技术人员、工人就没有事情干，这恐怕不是暂时性的，整个军工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办？我看现在你们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们这个潜力怎样能很好发挥出来？设备、技术、固定资产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如何能够派上用场？我看就是姜圣阶副部长讲的两句话：一个是军转民，一个是内转外。就是要充分利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更好地把作用发挥出来。军转民是搞民品，内转外既包括民品，也包括军品。只有利用开放的条件，才能使军品有发展前途；只有利用开放的条件，才能够使我们现在的民品、军品的质量、技术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这两天，我和省委同志议论过这么一个看法。在我们国内，军工系统，当然包括航空工业，起点是比较高的。我们应当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同国外合作。我们发展国外合作，最好是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这样引进技术消化比较快，国内配套、国产化步骤也比较快。无论民品，还是军品，都要走这条路子。从民品来讲，军工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我们国内现在还需要引进的设备。我们国家在四化建设中要引进国外许多设备，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外汇，所以军工系统应当把主要力量用到这个方面，搞进口替代产品。我们国家需要引进什么样的设备，军工企业就应当生产这样的设备，改造我们国内的企业。军工力量比较强，科技力量也比较强，要尽可能搞这些产品。但又不是什么东西都完全由自己来搞，应该发展同国外合作，叫做攻关加合作。一是攻关，我们自己能搞的就自己搞；二是合作，有些不能搞的，关键的东西就引进国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生产出来代替进口的设备，花钱也比较少，比如纺织机械等。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设备更新问题，都有一个技术改造问题，都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机械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我看应该把潜力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来。自己生产加上同国外合作，实现外汇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现在采用的办法。我们的引进要以国内市场为谈判筹码，因为大家都想进入中国这个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很大，他愿意挤到中国来。我们要利用这个条件，进行国际合作。那么外汇怎么平衡呢？就要找一部分零部件来干，并且是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他一个工时48元钱，我们才12元钱。我们给国外配的东西，他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但在我们这里做比较便宜。这样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技术密集的东西，由他们总装后卖给我们，赚钱是他们的。这是由于一些技术密集的东西我们还不能做，或者做出来以后质量不行。这当然是不等价交换，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不等价交换是不合理贸易。他们买我们一些劳动密集的、价钱比较便宜的零部件，再用他们一部分技术密集的东西装到我们的产品上，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外汇平衡问题。

反过来再讲质量问题。我们的很多设备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东西质量不行，往往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就影响整个设备的质量。我们过去的办法是完全靠自己，测绘啊，模仿啊，当然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

办法。今后的趋势不应该是这样，要争取大部分零部件由我们来做，关键部分买国外的，而我们又把一些零部件卖到国外，这样外汇平衡了，质量也可以上去了。只要我们国内哪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样的设备，同国外引进的差不多，基本上接近国外水平，国家就可以给你保护，禁止进口，限制进口。如果你的东西不行，或者说虽然比原来的好一些，但还比国外的差得很多，国家就很难订货，否则用户就不满意。因为用户生产的产品要出口，用你的设备很难保证质量。军工企业要搞国际合作，一般机械工业也要这样搞，但他们没有军工企业的水平高。总之，我们现在既要反对一切都要引进，全部靠买；但也不能完全关起门来，封闭自己，都靠自己攻关，这样最后也可以搞出一些东西，但往往时间太长，或者质量不好。现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一些大的设备完全由一个国家搞是没有的。

军工生产，我看也是两条，一条是合作生产的办法；另一条是军品必须到国际市场上去，开辟国际市场。把军工企业搞活，就是你们所说的，军转民，内转外，我看还要加上一句，攻关加合作。民品主要是生产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装备、设备，通过国际合作的办法，自己生产大量的好设备来替代进口。军品就是通过合作提高技术，打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样，发展的速度就快了。现在你们的路子开始在这样走，我看这条路还是很宽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我们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好的队伍，这样好的基础；另一条是我们有开放的环境，有开放的政策，而且这个开放的政策、开放的环境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世界的大趋势是国际交往越来越多，过去那种封闭的做法，过去时代那种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苏联也想走这个路。所以，这个路子是长期的，不是暂时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看是很有希望的。航空工业有几十年建设起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基础，有这么好的一支技术队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这样说，你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会一年比一年好，前途是光明的。

在晋陕两省视察工作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

一、关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沿海和内地必然形成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沿海的开放和发展，对内地来说，是极好的机遇。不可能沿海发展了，内地不发展；内地不发展，沿海也不可能加快发展。沿海的发展迫切需要内地提供原材料，这给内地原材料丰富的地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强调沿海地区的加工业可以实行“两头在外”，是为了让沿海地区有个思想准备，在原材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要与内地争原料，也不要与内地争市场，而应主要立足国际市场来解决自己的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路问题。实际上，沿海地区一下子不可能完全做到“两头在外”，它势必还要大量使用内地的原材料。这对内地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促进。如果内地能够向沿海地区大量供应原材料的话，那当然比依赖进口更有利。可以“两头在外”，最好是“一头在外”，即用国产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沿海的开发和发展，对内地的大型科研单位、机械工业、军工企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样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沿海发展了，还将有大量资金、技术、信息输往内地，从而促进内地资源的开发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沿海和内地各有自己的优势，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包括那些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只有丰富劳动力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山西的优势在能

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化工业。陕西的优势在科技力量强，大型骨干企业多，煤等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各地都要研究和认识自己的优势，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上做文章。

过去说搞原材料工业不合算，是因为那时搞的是产品经济，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搞原材料工业就不会不合算了。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就是大量发展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也实现了现代化，它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的。山西雁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围绕着煤来展开的，乡镇企业很多都是挖煤，不挖煤的也大都和煤有关系，第二、三产业也靠煤，财政收入主要也是靠煤。这是雁北的特点。近年来，它就是利用这个优势，使当地经济发展得相当快。从前有人把燃料、原材料工业和重化工业叫“傻大黑粗”，认为凡是搞“傻大黑粗”的都吃亏。今后情况肯定是不同了，从发展看，这种“傻大黑粗”会越来越吃香。山西的经济，沿着重视发展能源、重化工业这条路走下去，是大有前途的。

内地要想把自己的潜在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靠大家办企业。不仅轻纺工业可以靠大家办，能源和重化工业也可以靠大家办。这几年电上得快，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放开让大家办电，冲破了一家独办的局面，允许地方、企业集资办电。前几年国务院成立“压电办”，集资解决以煤代油的问题，办成了好多事，起了很大作用。这几年的公路交通，也是大家办。煤炭工业的发展，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得力于地方和群众办的小煤窑。小煤窑投资省，吨煤成本低，发展很快。过去说，小煤窑不安全，资源利用率低。在开始阶段，那是难免的，经过一段发展，积累了资金，现在山西小煤窑的技术装备已有很大改善，事故少了，伤亡率显著降低，对深层煤也能开采了。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可以搞洗煤、炼焦，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小炼铁、小水泥、小化肥，还可以进一步办小电厂，搞电石、塑料，炼铝。这里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型耗能产品是很合算的，竞争力强，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办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由土到洋、由小到大是符合规律的。开始可以因陋就简，从低处起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增加积累，改进装备，逐步升级，几年之后局面就不同了。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搞得很先进，就想搞到一百年也不落后的程度，那是不现实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到几十年以后，许多问题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但

我们眼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要尽快起步，尽快发展起来。只要能发展起来，以后的回旋余地就大了。

内地和沿海互相不要封锁。内地要注意利用沿海的窗口。大企业搞横向联合，建立企业集团，发展出口产品，省和中央有关部门都要给以支持，对他们放开些，允许他们选择最合适的龙头厂和口岸来出口自己的产品。内地的原材料，如果在沿海精加工之后再出口更合算，就可以到沿海去加工，不一定非得自己精加工。过去内地的原料和初加工产品，经香港再加工和包装之后，就大大升值。将来沿海地区可以起这个作用。当然，沿海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香港的作用。还要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内地一些高级人才，特别是在当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高级人才，或与沿海联合起来才更能发挥作用的高级人才，将向沿海流动；而沿海一些实用技术和相应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和经营者，可能向内地流动。浙江人很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浙江人去做工和做买卖。人才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双向流动，是个趋势，是符合客观需要的。

当前，内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内地与沿海的经济联系，受制于交通。从山西、陕西来看，有运力就有煤，主要的制约是交通。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地方和企业积极集资开发煤炭和其他资源，有利于国家腾出力量，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去办交通。

二、关于加快企业内部改革

现在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必须着手解决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物价、工资的改革。物价、工资改革之所以难度很大，讲来讲去，主要是个承受能力问题。而承受能力的大小，关键在企业效益。财政困难的解决，涨价因素的消化，都要靠企业效益。如果企业不改革，社会对物价和工资改革就没有承受能力。当然，如果不进行物价、工资改革，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企业的改革就没有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很难深入下去。归根结底，物价、工资改革，要靠企业效益的提高。

现在一些国营大企业在经济效益方面落后于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设备差、所用原材料价格贵、技术

人员少、工资高、负担重，除了上交税收外，乡镇企业还要拿出一部分利润给乡政府以工补农；而国营大企业设备好、技术水平高，职工工资比较低，但经济效益却不如许多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原因主要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内部机制好，真正实行自负盈亏、按劳付酬，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而一些国营大企业管理落后，内部机制不合理，仍然是“铁饭碗”、“大锅饭”。国营大企业在改革中不能老是像前几年那样要求国家让税让利，一定要解放思想，加快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

国营大企业的内部改革，已经有不少经验。看来，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起带头作用的还是承包制，关键又是要把承包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改变在确定承包条件过程中“一对一谈判”的局面，真正实行招标承包，使大企业从总厂到分厂、车间、班组都建立起竞争机制。少数特大型企业目前在总厂一级还不好实行招标承包，但其内部的分厂、车间可以搞。在竞争基础上的招标承包，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这一条搞好了，企业内部的其他改革就将势如破竹，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就都有了条件。

竞争承包方面的许多经验，要很好地总结、推广，结合起来运用。如有的企业搞招标抵押承包、全员风险承包，其办法是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层层承包，每一层的承包者，以至广大职工都入股，股金也是风险押金，把承包制和股份制结合起来了。这种办法大大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还有的企业运用承包制在一厂之内搞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放手让各个单位在完成承包任务的条件下自行开发新产品、自找经营门路、自行创造更多的效益，非常灵活，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做法效果都很好。

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能人能够脱颖而出，使多余的冗员能够减下来。为此，企业的人事劳动制度需要认真改革。现在许多大企业人浮于事，特别是二线职工太多。在劳动制度改革中，一些企业采取了这样一种很有效的做法：按工作量给每个单位定编定员，然后在竞争基础上招标任用每个单位的负责人，而后每个单位再按照公开的原则选用职工。企业的生产第一线也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多余的人从岗位上退下来，有的从事第三产业，有的经过重新培训，用其所长，干更适合的工作。现在有些大企业抱怨“企

业办社会”影响了他们的效益。大企业如果完全不办“社会”，把现在为职工服务的事情都推给地方政府，从企业本身来看也许能提高经济效益，但从整个社会效益来看是不合算的，目前也是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企业办了一些为职工服务的事，而在于这样办，是不计盈亏、吃大锅饭，还是承包、租赁，用商品经济的办法去办。企业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都应尽可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的可以变成独立的企业，也实行招标承包，并与原来的大企业建立契约关系。有些因为劳动条件艰苦而没人乐意干的工作，可以提高工资，人们争着要干的工作，工资不要太高。要把工资作为调节劳动力分配的杠杆。在劳动制度改革中，必须重视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方向是实行统筹，逐步完善这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现在工人的奖金和浮动工资增多，固定工资占的比重减少，退休时如何计算退休金，需要研究一个合理的办法。有的企业把工人退休前三年内的工资、奖金总额加以平均，作为计算退休金的依据，这也是一种探索。总之这个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人事劳动制度的改革，看起来很难，但是，只要真正按照竞争承包的原则，认真去做，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的。关键是要增加透明度，怎样改革，按什么条件承包、聘任，组合，要让广大职工都知道，并造成舆论；其次，要坚持机会均等，在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在企业内部机制改革方面，国营大企业一定要重视并认真学习、借鉴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经验。大企业的有些经验，如组织跨省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利用开放条件，自己攻关加对外合作，开发高技术产品等，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不容易学；而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好机制和内部搞活的经验，大企业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移植。如果搞得好的话，国营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应当而且可能比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高。西安黄河机器厂，产值一度只有三千万，以后通过内部改革，工作搞上去了，现在产值达到七个亿。同样一个厂，产值可以是三千万，也可以是七个亿，潜力就有这么大。应当看到，现在很多大企业的能量还远未充分释放出来。大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应当有领导地加深和加快。

企业内部改革，需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国家经过这几年在宏观上的改革，包括许多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法的颁布实行，应当说基本的外部条件

已经有了。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和上级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按企业法办事，对国营大企业真正放开，不要乱加干预。美国的哈默为了与我们合作开办平朔煤矿，他用每年十八万美元的高薪聘请了一位经理，然后就充分放权给他，哈默自己很少管。外资企业的有些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的地方对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充分放开，结果也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许多掌握行政权力的公司成了改革的阻力和企业的枷锁。他们名为“公司”，实际掌握着若干审批权和紧俏物资的分配权，以及其他特权，对企业进行控制。这种状况不改变不得了。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还必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不仅要有高水平的经营管理才能，而且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职业道德。从长远看，必须造就这样一批人。

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造和加强，绝不能削弱。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在有些企业里，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关系总是摆不好。强调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书记如果没有行政职务，对党外群众做工作也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原则上党委书记可以兼任副厂长，作政治副职。这样，他在党内是书记，主持党委的工作，起监督保证作用；在行政上是副厂长，既便于对职工思想工作，也便于厂长对企业实行全面领导。除特别大的企业外，原则上都可这样办。

三、关于军工企业发展的新路子

我们的大型军工企业设备好，技术力量强，优势很多。但当前处于和平环境，军费有限，解放军买不了多少武器，这就产生了军工企业何去何从的问题。近年来，军工企业在改革中前进，开始找到了一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子，即：军转民，内转外，攻关加合作。当然，这是简单的说法，具体来讲就是：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设备、技术潜力，在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和生产民用产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发展对外合作和产品出口。不论是生产民品还是军品，起点都要尽可能高。军工企业搞民品，主要不是搞一般的低档的产品，而是要努力开发和研制我们原来需要进口的设备，提供先进装备，代替进口。西安军工企业研制和

生产的纺织机械，就属于这一类。要开发高起点的军品和民品，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己研究，而应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与国外合作。这就是攻关加合作。军工企业搞对外合作，有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你买我的零件，我买你的零件”。我们的军工企业可以发挥劳动费用较低的优势，通过来料加工、来图加工，为外国公司生产零部件，换取外汇，实现外汇平衡，同时逐步掌握那些重要零部件的图纸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赚来的外汇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我们的飞机制造厂为美国波音公司搞来图加工，就是很好的例子。合作一段以后，这种型号的飞机的许多部件我们就都能生产了，再进口一些最关键的部件，就可以生产整机了。这样生产出来的飞机将是具有先进水平的关键性零部件，在条件不具备时不必勉强国产化，可以继续进口，搞“国际拼盘”，以提高整机的质量。开发先进产品，无非这样几种办法：一是自己攻关、研制；一是对进口设备进行测绘、仿制；一是与国外合作生产。实践证明，走“攻关加合作”的路子往往效果更好些。今后，大型军工企业生产的军品和民品，除了供给国内需要以外，都应努力进入国际市场。这条路子会越来越宽，军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看来已经过去。

四、关于榆林治沙和高陵养鸡的经验

榆林地区治沙很有成绩。这里原来的大片沙漠，现已变成良田、草地和森林。林木覆盖率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这确实很简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是人进沙退，沙漠一年年减少；二是农民争着要承包沙地，大家都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治沙方法。这套方法是榆林的“专利”。榆林的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认为今后几年是治沙的好时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虽然治每亩流沙只补助一元钱，农民也愿意干，因为其他赚钱的门路还不多。再过几年，榆林的工业和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劳动力费用必然上升。应当预见到这个发展趋势，自觉地抓紧今后几年时间把尚未治好的流沙治好。有关部门要给以支持。

陕西高陵县群众养鸡的经验，值得推广。他们用笼子养鸡，科学饲养加一定的规模经营，每家养几百只、几千只，效益很好。开始是少数人搞

起来的，有利可图，别人就跟着学，于是出现许多专业户，形成一个个专业村。过去有许多其他的专业村也是这样形成的，都是完全出于农民的自愿，不用国家投资，生产发展很快。从现实情况看，解决城市里的鸡蛋和鸡肉的供应问题，主要还得靠农民养鸡，而且要靠离大城市远一些的县来养，那里劳动费用低。国家为支持农民养鸡，要办好几件事，主要是提供雏鸡、浓缩配合饲料、技术培训和防疫服务。现在市场对鸡和蛋的需求很大，这不是坏事。消费可以推动生产。没有西安等大中城市的消费需求，高陵的大规模养鸡也发展不起来。过去市场供应一紧张就凭票供应，就搞地区封锁，使需求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反馈不到生产上去。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机制不同了。今后产地要多考虑发展生产，并主动去占领市场。

五、关于加强团结，克服“内耗”

省里同志提出要克服“内耗”，这很重要。要为加强团结，克服“内耗”造舆论。搞“内耗”不符合时代潮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越搞“内耗”越落后，谁也占不了便宜。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有不少后遗症，留下一些恩恩怨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应当说，大的是非已经解决了。中央的方针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起来向前看。要提倡一种好风气，看人看事要有个正确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这是看事的标准。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行四化建设当中，一个人的实际表现如何，实际工作成绩如何，这应当是看人的标准。要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这方面来，使大家向前看，从恩恩怨怨中解放出来。省委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这种态度。

六、正确认识形势，宣传改革

我国进行改革，至今十个年头了。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身在其中，有时反而不觉得怎么样，但只要把现在的情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比一下，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就很明显了。看形势，要有分析，有对比，而且一定要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凡

是被实践证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不对的，绝不能不看这一点，而用过时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去衡量是非。改革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们的经济实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并且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各种社会问题才更有条件解决，这也是明显的道理。因此应当说，改革是对的，是成功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些陈旧的教条主义的是非观念，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但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思想，成为改革的障碍，必须认真克服。回顾十年，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改革的成就。如果对改革的成绩不充分肯定，而对某些阴暗面又过分加以渲染，那只能动摇人们对改革的信心，绝没有什么好处。

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也要加以分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混乱和腐败现象。怎样认识形势的这种特点？实际上，这是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对混乱和腐败现象必须正视，必须努力去解决。但如果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不敢通过改革来打破旧体制，那是因噎废食，是找不到出路的。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暂时的混乱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代价，不必惊慌失措；另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有领导地抓紧进行，尽量缩短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

目前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解决物价、工资等难度很大的问题，必须闯过这一关。为此，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务必加快内部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以增强社会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还要求研究制定一套可行的通盘的改革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尽量减少风险；除此以外，还特别需要全党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在此关键时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要加强政府的权威，而不能削弱政府的权威；要加强纪律性，而不能削弱纪律性。只要我们按照十三大精神正确地去，这些要求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这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

关于信访工作的批示*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

信访工作很重要，过去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今后应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解决党政干部廉洁问题上，信访工作应该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这是赵紫阳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报送的《今年上半年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的汇报》所作的批示。

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批语^{*}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进一步深入进行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使之能真正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是增加其活力的关键。此件印发财经领导小组同志并综合部门负责人同志一阅。

^{*} 这是赵紫阳对吕东报送的中国工业协会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若干意见的批语。

在中央军委授予军队离休干部 功勋荣誉章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在光辉的“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央军委举行隆重仪式，向军队离休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这是我军建设的一件大事！我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军荣获功勋荣誉章的老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六十一年战斗历程，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无数的革命老同志，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为我们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现代化国防，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忘我工作。其中，许多同志还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对于全军所有老同志的英勇业绩，我们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今天接受功勋荣誉章的，是在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久经考验并做出了贡献的老同志。你们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顾全大局，甘当人梯，积极扶持大批年轻干部成长，完成了老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今天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就是对你们几十年革命历史和戎马生涯的表彰，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体现了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你们的亲切关怀，表达了全军上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你们的敬仰之心和爱戴之情。

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我党我军的历史。没有他们长期的浴血奋斗，就没有我们军队的今天，国家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我们要继

续关心和爱护军队离退休老同志，各级政府和军队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要在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国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我们党和军队英勇奋斗的历史，增强国防观念，形成尊老敬贤，崇尚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老一辈的好思想、好作风，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国家和军队的改革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继续稳步前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抓住历史给予的有利条件，按照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方针，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面临的问题解决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努力奋斗。

军队的改革也和全国的改革一样，正在不断深化。不久前召开的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已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草案正在进行审议。实施这些条例和规定，是我军干部工作的重大改革，对于加强新时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上述条例、规定和军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军建设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同志们！在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面前，中央军委希望全军离休老同志，进一步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和全国人民一道，振奋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地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推向前进，为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争取更大的光荣！

会见瑞士苏黎世大学林德¹教授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欢迎您,很早想认识你。听说最近几年你到中国来过多次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今天想当面听一听你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

林德:(以下简称林)感谢您邀请我到您这里来,我能到这里来感到很荣幸。您说的很对,我的确几次来过中国。我应该这样说,在几次访问中,我试图努力理解中国的经济。与此同时,我也做过一些设想,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知总书记您是否知道,我曾经带了一批学生到中国考察旅行。在今年九月份我计划再带一批学生到中国考察旅行。另外,总书记先生,您可能更不知道了,在您访问波恩时,我曾作为观众见过您,当时人太多,您肯定没注意到还有我。

赵:我也到过瑞士,那时我是作为四川省的省委书记率代表团到瑞士访问的,当时可惜没有到苏黎世去。

林:那太遗憾了,苏黎世是瑞士最重要的城市,是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城市。

赵:林德教授在七月二十二日同国家体改委贺光辉副主任、高尚全副主任座谈过一次,我看了座谈材料,你们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林德教授很了解我们的改革情况。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搞个什么样的模式,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准备在所有制的问题上进行什么根

* 这是赵紫阳与林德教授的谈话摘要。

本的改变。在中国有庞大的国有经济、国营企业，这种状况我们不准备做根本的改变。当然将来可能在国营企业里有一部分另外的股份。但总的来说，国营企业的所有制不准备做更大的改变。我们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形式，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都允许存在和发展。但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里，公有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况我们不准备改变，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这样集中的管理体制必须根本改变，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句概括性的话，就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目标是，不管是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都将最终把它们推到竞争市场中去。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我们的设想和改革的目标，在现在的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现成的经验可用来借鉴或供我们移植。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大部分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和我们的过去，都不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又是公有制、又要用市场调节，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是我们改革的难点。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我们没有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一边实践，一边总结。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在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修正错误”。这样来逐步健全、逐步推进我们的经济改革。

十年来，我们对国营企业进行了很多改革，扩大他们的自主权，国家减少对国营企业的税收，在分配制度上注意了用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的原则，这几年我们也搞了承包制。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有关部门可能都向教授介绍了。但是，我现在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国营企业改革直到今天，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这就是企业的权利和风险的关系问题。我们扩大了企业的权利，并没有建立起使企业能够承担风险的机制，如何使企业在扩大权利的同时，能够把风险也承担起来，我们不知道怎样搞。几年来企业所谓自负盈亏，实际上只负盈不负亏，如何能够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如何能使企业把利益和风险同时都承担起来，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并没有解决，还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来。结果，在企业扩大权利以后，微观组织的行为并不合理。常常是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盈利的企业扩大了自己的利益，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对亏损的企业国家还是要承担起来，还要给予保险。国营企业有保险的机制，没有风险的机制。我想告诉林德教授，我

们国家有一种乡镇企业，由乡政府办，是乡一级的公有制企业，由于乡的财政力量很小，再加上这类企业从来都是在国家计划之外，所以这种企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市场竞争、自负盈亏、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特别具有活力，经济效益也比较好，劳动生产率几乎普遍高于国营企业，我们很想把乡镇企业的这种办法用来改造国营企业。当然小企业与大企业不同，多年形成的观念也不同，目前有一定的困难，但这条路我们可能是要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听一听林德教授的意见，如何使国营企业能够承担风险，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真正做到能够自负盈亏。

林：首先我对您讲的第一部分做个小的说明，我对中国的改革是能够很好理解的，我赞成中国改革的基本路线，我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最根本的是应该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的利用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经济发展以后才能提高，在经济体制当中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来达到一定目标。关于经济政策，有个名词叫做“秩序经济学”，这个词实际上是联邦德国40年代末期产生的，在4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改革。关于中国在保存公有制或叫国有制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当然市场有多种形式，这里“秩序经济学”这个名词就可以起作用了，就是说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以是加强还是削弱市场竞争这一点作为判断对或错的依据。加强了市场竞争，实际上就增加了经济效能，反之就降低了经济效能。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一个国家类似现在中国走的道路。但是我认为存在一个类似的逻辑。在世界上通货膨胀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当然通货膨胀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认为中国将来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走成一条不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当然，这里所有制的形式是起着重要作用的，我当然理解中国从根本上不愿意放弃国营经济，但同时我愿意强调，所有制形式对提高经济效益是起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中国是不愿意放弃现存的国营经济的，但可以看出中国愿意使国营企业有更多的支配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使企业有真正的决定权。比如讲，一个企业真正有权决定它如何进行生产，就让这个企业的人有权支配企业，如果不给企业支配权，企业任何决定也做不了。因此我设想，将来的情况是一方面这些工厂、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属于国家的，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厂子、企业有对工厂和企业的支配权。这也是你

们本身制度所决定的一个逻辑。我愿意提醒您，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所有制形式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不谈意识形态，仅就作用上来说国有企业同私人企业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当企业有支配权以后它的作用同私营的也就一样了，所有制形式也不会改变。我所设想的这种经济体制，跟私有体制是不同的，表现在财产最后属于谁不一样，尽管他们的财产都是从市场上得到的，但最后的所有权不一样。比如讲，我在瑞士买一条船，我本人即是船主，又可以使用这条船；在中国，将来可以设想，一个企业买了一条船，这条船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却是企业的，但最后国家还有权重新分配这条船。

请允许我对风险问题再谈几句，我在中国参观了不少企业，其中有不少是国营企业，我感到中国给企业的权力太少，国家对企业的指导太多。中国的权力下放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也就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省里，省里的下放给地方，但最后权力却没有真正下放给企业。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上面下放来的权力又集中起来，并没有到达企业。因此企业很难自主做出决定，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企业经营不好，责任由谁来负，是由企业本身来负，还是由省里或地方做决定的人来负呢？（紫阳同志：谁也不负责任。）因此，责任制变成了非责任制，并使企业产生这样一种态度，一旦企业经营不好，就会把责任推给省或地方政府，企业会说这是你们的事。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企业既有自主权、又有责任。应当把权力坚决放到企业中去，应该给企业这样一种机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努力去工作，如果经营好就该盈利，如果经营不好就该亏损，如果企业工作实在太坏，这个企业就应该从市场中消失。我认为企业这些性质都应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中体现出来，市场机制本身是对企业的一种监督，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企业前进。在风险这个问题上，应该使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观念，它必须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发展，或者消失。我发现中国有这样的問題：权力下放到省或地方后，在省和地方停止下来，每个省或地方都会给自己搞个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企业，这对市场竞争有害。中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正如欧洲要形成一个大的市场一样，这样才有经济活力。在这种机制下，那些生产好的企业才能盈利，那些生产不好的企业就会亏损乃至倒闭。企业的决策权和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风险，两者应为一体，否则企业不会做出好的决定来。不承

担风险的企业做不出好的决定来，统制型经济中的企业是不用承担什么风险的。当然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错误，一个企业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投资方向的错误。所以还要给企业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权力，在他们从市场上消失之前，给他们创造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不应让企业有什么问题都找国家解决。应该让企业把盈利中的一部分留成或投资，保存起来，作用是用来改正错误或重新在市场上立足。中国不要害怕有些企业会在市场上消失，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一定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不要担心那些产品不受欢迎的生产企业倒闭，这当然会出现工人失业的社会问题，这就要国家和企业共同兴办社会保障事业，使破产企业承包的人员各得其所。我认为企业工人不应成为企业错误经营者的牺牲品。

我的话总结起来就是，首先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把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即把企业扔到冷水中去，让他们在市场上立足；企业有自主权，也应该承担风险；企业实在不行了，就应该让它从市场上消失；如果企业破产了，对在该企业从业的人员应当给予社会保障。

赵：听了你的意见，很受启发。我们在认识上、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国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这种观点，引经据典是马克思曾经阐述过的观点。最近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企业法，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对国家赋予的资产有使用权、经营权、支配权、处理权。现在确有像你所说的那样，中央把权下放了，部门没有下放。地方政府没有下放。我们的企业法是今年四月初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贯彻企业法还有很多不太清楚的问题。现在确有这样的情况，在部门和地方政府把权全部交给企业后，对企业能否承担风险有顾虑。比如说，有一些国营企业由于经营和决策失误造成了损失，还是要由国有财产来补偿，不可能利用另外的财产来补偿，国有财产不像私有财产那样有股东或董事会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目前部门和地方政府所以不大愿意把权力完全放给企业的一种理由。这可能是借口，但是也可能确有这方面的问题。

林：这就是所有制问题了。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关于权力下放问题，仅仅从职能上来看，我觉得这跟私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正如曾在许多国家所发生过的现象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国营企业的性质。我去过上海，觉得有点悲伤，我看到上海老区的房子非常破旧，我问上海市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不采取点措施呢？他们说：上海市政府没钱。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能解决，就是把这些房子全部卖给个人，因为每一个房子的主人都愿意使自己的房子处在最好的状态，这些房主会节省开支，把积累下来的钱投到修房子上来。这样实际上上海市政府也就有钱了。这个例子说明只有所有制改变才能发展。

赵：我们准备推行住房私有化。盈利比较多的企业，我们也准备增加一些私有成份，将来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就是说除了有国家的股份外，还允许有本企业职工的股份、其他企业的股份，也可以有私人和外国的股份。但是我脑子里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公有制企业就一定不能办好呢？比如说，瑞士工会系统是不是有一笔很大的财产？我知道联邦德国工会系统有一笔很大的财产，它这个财产应当说是公有财产，也是聘请经理来经营，不知道它的经营怎么样，我听说有些企业经营得还不错，关键是能不能聘请到比较好的经理。

林：企业的好坏，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经理，一个国家的好坏取决于他的政府。

赵：瑞士工会是不是也有财产？

林：瑞士工会有财产，但属于非集中化性质，我们的工会组织跟联邦德国不一样，联邦德国的工会组织都是统一管理的，瑞士的工会都不是集中管理的工会。

赵：请问林教授，据你了解，联邦德国的工会企业经营得怎么样？

林：工会企业工作办法同其他产业所有者的工作办法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的企业想到市场上去的话，他们必须按着市场机制去进行工作。联邦德国工会的财产不像您所说的意义上的公有财产，准确地讲，其工会的财产是工会成员的集体财产，工会的财产是在一旦发生罢工的情况下用作救济的资金，换句话说，就是斗争基金。但瑞士同联邦德国不一样，我们瑞士的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成员相互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成员利益平衡基础上。因此，在瑞士实际上是没有罢工的。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一个工厂干得好与不好，监督者首先是市场本身；第二个是工会，工会代表劳方；第三是工厂给劳方规定某些权利。

赵：今天听了林德教授的话以后，我有这样的感觉，可以使企业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同时也自己承担风险。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到前者，首先要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使企

业有条件参与市场竞争，有了这样的条件，承担风险的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原来考虑，是想把两者平行地提出来，互为条件，这就并列起来了。听了教授的话以后，似乎首先应当解决第一个问题。

林：改革的逻辑是由制度本身延伸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应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因此，给企业自主权时，产品价格应由市场本身来确定，这样才能反映出产品在市场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同时，还要进行价格改革，不搞价格改革，尽管搞了其他改革，工厂还是不会有多大的动力。但是价格改革要十分小心和谨慎，不能搞得太快。如果物价指数升得太快，改革的气氛、大的环境会受到破坏，改革本身一定要坚决，但步子又要稳当。中国的先生们告诉我，说在五年内把价格调整好，我认为五年是个很好的时间。价格改革太慢也不行，太慢就像走进了沙子里。匈牙利是一九六八年开始搞价格改革的，搞了二十年还没搞完，这是不好的例子。价格改革不彻底，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起来。另外，在投入和产出各个方面都要给企业自主权，给了自主权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否则企业会滥用自主权。我在体改委同他们讨论了如何进行市场竞争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否则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受到各个封闭市场的损害。

赵：我想同林德教授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统一市场问题，要发展商品经济，毫无异议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全国性的自由贸易，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建立统一市场的难度。

林：您的说法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瑞士山区发展水平比其它地区就低，在意大利有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欧洲共同市场当中，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三个国家是经济比较弱的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经济比较强，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如果中国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话，经济发展可能更快，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太高的地区来讲，统一市场对他们有好处。在市场经济中有一个词，叫做“结构政策”或叫“结构政治”，这就是说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一个结构性的任务，都要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我认为对那些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应该通过建立基础设施对他们进行帮助，使这些经济发展弱的地区能够参与经

济发展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使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同经济发展强的地区一下子拉平。但我们可通过多建立基础设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不应该制造人为的边界，商品的边界，也不允许搞一些人为的保护主义措施，否则就会影响经济效益的发挥。一个国家不应该把钱补贴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补给企业，第二补给物价，第三补给那些应当消失的企业。应该把这些补贴转到补给基础设施，特别是补给经济发展比较弱的地区建立基础设施。在这方面也要建立一个改革的战略，应减少物价的补贴，也应该向企业讲清楚，企业自主权扩大了，盈亏是自己的事，国家要把钱拿出来用到真正落后地区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上去。

赵：今天同林德教授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总的说来，我赞成你的见解。从你所提的一些看法可以证明你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了解得相当深入。今天讨论了企业问题、市场问题，还有个重要的金融问题，今天来不及讨论了，货币问题也没说，但你讲过的意见我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后几年内要下更大决心搞价格改革，价格改革不是孤立的，价格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决定于价格改革本身的方案是否妥当。而且决定企业的效益、企业机制的改革以及决定于市场条件的形成，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统一市场条件的形成。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货币政策。没有这三条，价格改革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建议，希望您今后以更大的兴趣继续研究中国的改革。

林：感谢您跟我的谈话，这些谈话非常有意义，我对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激动。作为教授迄今为止，我更多的是站在课堂上，站在讲台旁，但在中国我看到了实际，所以我对中国的兴趣非常之大。当然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戴经济眼镜，中国还有其他的问题，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讲，经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感谢您的接见，谢谢！再见！

注释

1. 林德(Wilhelm Linder)，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著名的“秩序经济”学家。

认真整顿流通秩序 坚决控制物价上涨*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物价、工资改革，依林同志让我讲一讲。

一、物价改革的方向不变，在步骤上应重新考虑。全国发生提款抢购风，货币发行量超过北戴河政治局会议¹的预计，至少多发了一百亿元票子。再加上今年农业歉收已成定局。这对明年物价改革增加了难度²。在物价改革方向不变、五年改革方案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当重新加以考虑。作为五年实行价格改革的第一年，步子要小一点，以避免大的风险。钢材价格放开不搞。

二、明年改革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立经济秩序上。同时，深化和展开进一步物价改革所必需的各项配套改革。

三、明年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住，使之大大低于今年。这对提高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缓解一下紧张心理，为改革创造条件，极为重要。这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必须千方百计达到。有些同志信心不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央工作会议时先确定物价指数只能多少，然后再考虑措施，必须下此决心。关键是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这是对党的能力如何，政府能力如何的严重考验。我们要经得起这次考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有能力的。

四、下更大决心，采取更坚决态度压缩基本建设。这是治理经济环境最重要，最容易见效，又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在控制基本建设这个问题上，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时的讲话。

手段还比较有效。中央、国务院下决心，制定措施，地方、部门要大力配合。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说起来难，做起来也不一定难。关键是部门、地方牺牲一下自己的利益。关键是两条：中央、国务院有没有下决心，有没有得力措施；地方、部门支持不支持中央、国务院。

五、认真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制止各种混乱现象。这是最得人心，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有大利而无小害的事情。流通领域中问题很大，大量的钱为中间环节拿走，生产者没得到利益，消费者付出了大钱，这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成本、增加计划外基建的重要根源。根本消除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要靠市场发展，改变“双轨制”，这需要时间。目前应强化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清理行政公司，制止层层加码、层层抽头、倒来倒去。官办公司、民间团体办公司、协会办公司，垄断性的多头多环节而又是垄断的经营。计划高度集中放松了，这是对的，但出现了垄断性的多头多环节的抽头。不能等到市场发育，那会愈演愈烈，市场根本不能形成。流通领域要严格管理。

几个重要产品，要一个一个地把流通领域理出来，一个一个地加以规定，直接订货，一竿子到底，不许中间插手。

六、控制消费基金增长。恐怕大体上只能进一步完善企业消费基金增长与效益挂钩，经济效益不好的，要解决攀比问题，严格控制集团购买力。

七、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适度降低。大体控制在百分之十或者更低一些。出口增长也要适当降低。

八、抓紧提高经济效益的各项工作。深化企业机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促进企业集团的建立，推行兼并。十一月破产法生效，明年必须认真搞。

九、采取措施回笼群众手里的票子。四季度开始认真搞住房商品化、私有化，以及发行股票、债券等问题。紧俏耐用消费品预售要同储蓄挂钩。

十、市场供应必须进一步搞好。粮食库存是好的，可以经受一年歉收。去年净进口一千万吨粮食基本未动。日前在国际上大量购进粮食不利。可以进口一些粮食，要大量压缩国内库存。问题是可能调不动。不是指地方库存，是指中央库存。要把库存情况通知省委书记，哪里拒绝调动，就撤省委书记的职。轻工市场生产也要搞好。

以上这些能否实现，都不是客观有无可能的问题。关键是主观上能否做到，能否充分实现这些可能性。关键是发挥政治优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严格纪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核心作用。在这样关键时期，更需要全党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需要维护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既然十三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七届人大选举了中央政府，就必须使他们有威信。不能讲原来那个人干什么，我可以不听你的。就个人来讲，现在每个人都比不上老一辈革命家，但他们是一个集体，政治局权力一点没减少。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都要严格执行，令行禁止。要重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以上这些，都是全面改革攻坚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都是深化改革的问题，有些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也是为今后物价改革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实行五年价格改革方案来说，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注释

1. 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七日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一方案是在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制定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从六月二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今后五年特别是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初步方案。七月十一日，赵紫阳同志主持专门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意见，有关机构又进行了测算、修改。八月五日至九日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讨论。

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的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价格、工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改革的轮廓设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初步方案；改革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必须采取的配套改革措施。

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

会议强调指出，价格、工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价格、工资改革的成功要依靠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最重要的是要转换企业机制，加强市场的组织与建设，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从而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和整个经济运行效率。为了保证价格、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同时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继续做好政企分开和精简机构的工作。总之，价格、工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搞好这一改革，对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会议除了审议方案本身的有关问题外，还集中讨论了方案出台后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必须相应采取的对策、措施。会议强调指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进行价格、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问题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很大。只要我们把这些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一定能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明年的改革至关重要，迈好这一步将为后几年的改革创造条件。会议认为，明年要围绕价格、工资改革认真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快企业内部改革，切实提高工业企业的效益。企业要完善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经营，自负盈亏，行政部门不得滥加干预。这是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

——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特别是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对钢材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为改革创造一个较大的回旋余地。

——厉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狠刹奢侈、浪费之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认真清理和整顿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惩处贪污受贿和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反对垄断、封锁、地区分割和囤积居奇，积极治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改造和加强思想工作，广泛开展协商对话，使广大群众更加理解和支持改革。

会议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更加生气勃勃地工作。当重大措施出台的时候，一定要统一行动，令行禁止。全体共产党员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大力发扬我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明年改革和整个改革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会议决定，九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和审议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在此之前，还要在党内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就这一方案广泛征求意见。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五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人因公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主持了会议。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新华社发）

2. 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

国务院物价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我们根据会议讨论精神和当前经济形势，对方案作了进一步修改，现汇报如下：

一、价格、工资改革的重要性和指导方针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难度很大而又绕不过去的价格、工资改革是这个阶段的关键任务。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如果现在再不着手从根本上解决价格问题，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经济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障碍。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较多，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但在理顺价格关系方面又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如果不主动抓紧改革，听任这种状态发展下去，价格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工资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随着物价总水平的提高，必须给职工群众以适当补偿。当前分配领域中仍然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某些分配不公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束缚着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从总体上看，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价格、工资改革为主线的深层次改革。只有取得这方面改革的成功，才能顺利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为下个世纪的经济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搞好价格、工资改革，需要遵循以下指导方针：

——坚持边改革边治理经济环境。治理经济环境的关键问题是，坚决把目前已经连续几年存在的过大需求压下来，坚决把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势头遏制住，

逐步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如果不下决心治理环境，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势下，硬性推进价格改革，就必然会造成各类商品价格轮番上涨，工资和价格竞相推进，导致在更高物价水平上的不合理比价复归，不仅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且会带来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因此，在改革进程中，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控制建设总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信贷结构和消费结构。必须努力增加有效供给，并采取多种办法，吸收、转移和推迟结余的社会购买力。今后五年内，必须确保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幅度 10% 左右，货币供应增发率不超过经济增长率和结构性物价上涨幅度之和。

——坚持边改革边整顿、建立经济秩序。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条件下，各方面的生机和活力日益激发出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跟不上，许多方面存在着种种摩擦和漏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为了保证价格、工资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当前整顿和建立秩序的重点是：整顿流通环节，清理各种公司，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严禁经济上的垄断、割据，反对封锁和分割市场，制止层层抽头、乱收费、乱摊派等错误作法；端正企业行为，坚决纠正乱摊成本、偷税漏税、截留收入，以及弄虚作假，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坑骗国家和群众等违法乱纪现象。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手软，不能一阵风，必须持之以恒，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和法治。这样做，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会有力地促进改革、开放、搞活。

——坚持把推进改革同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稳定经济、深化改革，并使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这是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的重要方针。在价格、工资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许多矛盾都不好解决。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必须以提高效益为前提，绝不能靠过多地占用银行贷款和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追求脱离实际可能的过高速。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着经济过热、速度过快的现象。速度过高，经济生活绷得太紧，既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行。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坚持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在速度问题上，不要排位次，不要助长攀比之风，不要把产值增长速度的高低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

——坚持综合配套改革。价格、工资改革涉及经济体制的全局，不可能也不应当孤军深入，必须同时搞好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并相应采取正确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和收入分配政策。要加强市场的组织和建设，培育和健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改进宏观调控机制，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切实提高宏

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放开经营，真正做到自负盈亏，切实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增强企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承受消化能力，克服国家财政困难的基础。

——坚持积极稳妥的改革步骤和方法。价格、工资改革是一项势在必行而又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既要坚决推进改革，又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精心筹划，稳步前进。经济生活中许多因素复杂多变，事先很难看得清楚。因此，对改革的方向要坚定不移，步骤要积极稳妥，具体方法要走一步看一步，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必要的正确的调整。

以上这些指导方针，在全面改革攻坚阶段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认真加以贯彻执行。明后两年更要着重注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这些指导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在改革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令行禁止，绝不能各行其是，自由行动。全党上下要同心协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争取全面深化改革的胜利。

二、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价格、工资改革的轮廓设想

(一) 关于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有些商品价格逐步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具体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1、逐步放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取消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放开价格的商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绝大部分化工原料，以及机械电子产品。放开的步骤和方法，要根据商品的重要性和供求状况区别对待，有的进一步放开，有的先调后放，少数特别紧缺的重要品种，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实行指定供货，保量不保价，有的要实行专营。在价格放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国家对市场价格新的调控机制和管理办法。

2、通过有计划地调价，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交通、通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价格和收费，以促进这些基础产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增强后劲。

3、有步骤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并使农产品内部比价逐步趋于合理。

4、消费品价格逐步实行市场调节，并在价格总水平上涨过程中，使内部比价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大体协调。除城市口粮等个别品种外，基本上解决购销

倒挂的问题，减少国家的财政补贴。

结合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改革，大力整顿流通环节，扭转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局面。

实现上述改革目标，双轨制价格的混乱现象可以得到基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产品比价关系将朝着合理方向前进一大步；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总额，在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现在的50%左右提高到70%至80%左右。

进行以上改革，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大约上升70%左右，其中城市上升80%左右，农村上升60%左右；职工生活费上升90%左右。

关于价格改革的实施步骤，总的想法是，通盘计划，分步推进。前三、四年把主要措施推出台，后二、三年进行巩固完善。

（二）关于工资改革

五年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工资和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有所改善；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适当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脑体收入倒挂问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取缔非法牟取暴利行为，解决分配不公的矛盾；健全工资基金的宏观调控机制。

具体要求是：

1、对职工继续实行若干生活必需品涨价后给予适当补贴的制度，对离退休人员也建立相应的补贴制度，并健全对低收入职工的生活补助制度。

2、全面推行和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使职工工资增长主要依靠本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工资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脱钩。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定额工资制。

3、逐步建立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相适应的行政机关工资制度，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系统的工资制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升级、增加工资的制度。通过多增加一些脑力劳动者工资，以及放宽政策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增加收入等办法，逐步改变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

4、逐步建立工资和个人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加强银行、税务、审计、物价、统计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合理控制工资总额增长，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者严格征收收入调节税。

5、统盘考虑职工养老、待业、医疗等项保险，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合理负担的社会保险制度，并实行社会化管理。同时，减少各种津贴、补贴在职工个人收入中的比重，改善职工个人收入的结构，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实行以上改革，五年内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将增长一倍左右，扣除生活费指数上升因素，平均实际工资每年增长1%到2%。脑力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将由现在低于一般体力劳动者平均工资的状况，转为高于一般体力劳动者。

上述价格、工资改革的轮廓设想还很粗略，无论是放调价格的范围、幅度和实施步骤，还是工资改革的目标和要求，都需要进一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测算，并在实践中根据条件和情况的变化加以补充和修正。

三、一九八九年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明年是价格、工资改革新起步的一年，这一步迈得好不好，至关重要。安排明年改革方案考虑的基本原则是：在着重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条件下，适当出台一些改革措施，确保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同时为后几年的改革创造条件。改革的具体设想和初步综合平衡的情况如下：

（一）价格改革的方案

明年的改革，主要是：适当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客运价格并调整其他少数亟需调整的不合理价格。

1、调整农产品价格。

粮食合同订购和公粮合计一千亿斤不变。对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价格一律不动。

合同订购的粮食，稻谷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五元三角，小麦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一元五角，玉米每五十公斤提价不超过一元。在这个限度内，按提价款由中央和地方依据现行办法分担，以及调出省外部分相应提高调拨价的原则，由各地具体安排。预计合同订购粮食提价总金额约三十六亿元。

粮食议转平的收购任务取消，改为随行就市收购。中央财政补贴的每斤六分四厘仍留给地方。地方必须收购的粮食，价差由地方财政补贴，谁用粮谁出钱。

以上国家合同订购和议价收购的粮价总水平每五十公斤提高四元三角六分，提高幅度为18.7%。

是否取消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将价差款转为粮食收购的价外补贴，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不影响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生猪价格上涨的条件下，自行决策。

逐年压缩城镇口粮以外的行业平价粮食的销售。争取在两三年内，将行业用粮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的原则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先压与群众生活没有直接影响的行业，后压其它部分。农村水库移民、救灾用粮、直接影响市场零售物价的用粮，为了保持市场稳定，明年先不动，或采取补差价的

办法。行业用粮价格放开价格后，原来议转平的差价仍留给各地，主要用以解决影响职工生活的暗补改明补，以及充实粮食丰歉的调节基金，不得移作他用。明年全国压销大体按一百亿斤左右安排，具体实施方案另定。

合同订购的油料中，花生、油菜籽适当提价，提价金额五亿七千万元。加上议价油料价格上涨，油料提价总金额约十五亿元。

棉花收购价格不动，明年看一年。国家定价的其它经济作物，价格也不提高。

2、提高陆、水、空运的客票价格。铁路客票提高一倍，人公里从二分提到四分；行李、包裹运价和站台票价格适当提高。民航客票价提高 77%。公路客票价提高 20%，水运客票价提高 80%。货运价格基本不动，只对矛盾特别突出的价格进行局部调整。客货运提价金额合计九十六亿元。

3、调整少数急待调整的不合理价格，合计提价六十一亿三千万元。其中包括：每斤食盐零售价提高八分，盐及盐化工产品提价三十五亿元；报纸提价十八亿元；尿素每吨从四百一十元提到五百元，提价金额八亿三千万元。

4、二十八种进口补贴商品除粮食、化肥、洗衣粉原料、木浆外，改为代理价，并考虑到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因素，预计将推动市场物价上涨 0.5%。

按照以上设想，明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 10% 左右，其中城市 12% 左右，农村 8% 左右；职工生活费指数上升 13%。

（二）提价利益的分配

1、交通运输和生产资料的提价收入，基本上拿到国家手中，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负担。

2、银行调整利率净增加的利息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3、已确定的财政包干体制不变；价格、工资改革中的开支，按现行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中央对地方财政既不挤也不让，个别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个别解决。各地应努力通过增收节支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

（三）职工工资的安排

考虑到明年价格改革中，有些措施对职工的实际生活影响较小，例如提高客票、报纸价格等主要影响集团消费，因此，明年职工平均工资按增长 10.4% 考虑。

机关事业单位明年出台的工资改革措施有：

——调整工资标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普遍调升一级工资，去掉现行工资标准各职务的最低档，并适当延伸等级，增加高档。这样，大约人均每月增加工资八元，全国年约增加工资二十六亿元。

——适当解决工资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提高教授、讲师、助教（含

科学、卫生等系统相当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提高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水平,提高教育龄、护龄津贴标准,以及解决其它一些突出问题。这些,全国需三十一亿三千万元。

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明年主要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工资。初步测算,由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职工每人每月可增加工资七元五角或者至九元,全国共计六十五亿元。这部分资金原则上由企业自主安排使用,可以允许企业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调整工资标准。

从明年一月起,对全国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离退休费八元。

(四) 调价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初步测算,由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它农产品涨价,明年农民将增加收入约二百八十八亿元。由于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调价,农民需要增加支出一百四十七亿元。农民增加的收入超过增加的支出一百四十一亿元。随着明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将进一步增加。

(五) 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1、初步预算,由于提高客运和生产资料价格,财政减收三十九亿元;由于提高农产品价格,财政增支五十九亿元。两项合计财政减收增支九十八亿元。

2、由于增加工资和补贴,财政增支减收一百四十四亿元。

3、由于调整利率和开展保值储蓄,财政减收三十一亿元。

以上三项,将扩大财政收支差额二百七十三亿元。

4、据财政部初步测算,明年农业生产增长4%,工业生产增长1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国内财政收入可能达到二千五百九十亿元。各项支出从紧安排,总支出为二千七百五十亿元。差额为一百六十亿元。加上调价和增加工资后发生的收支差额,明年财政支大于收四百三十三亿元。

现在想到的增收节支措施是:

——对彩电、冰箱、小轿车征收特别调节税,增加收入五十亿元;国家专营一部分彩电,增加收入二十八亿元(所需六亿美元外汇尚待落实)。

——整顿和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包括加强农林特产税和乡镇企业税的征管,增加收入二十三亿元。农林特产税和乡镇企业税的收入留给地方,作为提高粮价和支援粮食生产的资金来源。

——借新债还旧债四十五亿元。

——向国外发行政府债券或借低息贷款八亿美元,用以偿还到期的外债本息三十二亿元。

——建立养老保险信托基金,发行特种长期债券十五亿元。

——压缩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十亿元。

——动用 112 专项基金二十亿元。

——提高建筑税、烟酒涨价收入、工商企业扭亏，以及出售公房、土地、股票收入等措施六十七亿元。

采取这些措施后，财政可增收减支二百九十九亿元，还有差额一百四十三亿元，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四、必须采取的若干重要经济措施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在讨论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除了要求对方案本身继续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之外，特别强调要进一步研究稳定发展经济和积极治理经济环境的政策措施，以保证改革取得成功。会后，我们在原方案已经提出的措施的基础上，又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补充。归纳起来有以下二十条：

（一）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除了保住必要的重点建设以外，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非生产性建设、过分的城市建设和盲目发展的加工工业建设压下来。明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要比今年的实际规模压缩五百亿元，相应减少钢材需求四百万吨左右。

（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这几年，集团购买力急剧膨胀屡禁不止。明年要采取严厉措施，把全国的集团购买力中可以压缩的部分坚决压缩下来。

（三）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在价格、工资改革进程中，如果发生消费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要核定工资总额和奖金总额，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由银行、财政、审计和监察等部门加以监督。

（四）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开办保值储蓄和多种形式的有奖储蓄、预购实物储蓄，稳定和扩大储蓄存款。积极发展债券、股票市场，大力开展各种保险事业，加强资金融通和吸收社会游资。

（五）认真清理、整顿公司。对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对那些倒买倒卖、非法牟取暴利的公司，对那些破坏和捣乱金融的公司，都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整顿以至撤销。

（六）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专营。农民急需的化肥、薄膜、农药等，一律由供销社统一经营，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七）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安排好城市居民的肉、蛋、蔬菜等副食品供应。

（八）健全钢材、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的市场管理，严禁封锁资源、垄断价格、倒买倒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贿受贿等非法行为和不正当竞争手段。

（九）压缩国内紧俏商品和物资的出口，严格控制洋烟、洋酒、洋饮料及水果等消费品进口。

(十) 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出售公房, 逐步实现住房私有化。

(十一) 选择一批盈利的大中型国营企业发行股票, 出售一部分国营小企业。

(十二) 在沿海部分城镇和集市出租或转让一些国有土地使用权。

(十三) 坚持和完善企业经营承包制。对那些供求大体平衡、生产工业消费品的企业, 坚决放开经营, 进一步把他们推向自负盈亏的轨道, 实行优胜劣汰。

(十四) 广泛推行企业的兼并和联合, 发展企业集团, 改善企业组织结构。

(十五) 优化企业劳动组合, 严格按劳动量、工作量额定员, 加强培训, 严格考核, 严肃纪律, 提高职工素质, 扭转纪律松弛、效率低下的现象。对多余人员实行留职离岗、厂内待业等多种办法消化。

(十六) 调整就业政策, 引入竞争机制, 允许一定比例的失业率。与此相适应, 尽快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明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减员的二百五十万人, 由职工队伍内部调剂解决, 不再向社会招工。现有的一千多万计划外用工, 要进行清理和压缩。

(十七) 坚持每年实行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

(十八) 强化税收征管工作。税权不得分散, 不许乱开减免税的口子, 已经减免的要进行认真清理。税务系统实行双重领导, 以垂直领导为主。

(十九) 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 认真检查外汇收支和上交情况, 堵塞漏洞, 改进外汇分成办法。

(二十) 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 努力开源节流。

以上这些措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拟定具体的方案和办法, 将尽快地陆续付诸实施。现在的关键是, 必须努力做到措施得力, 执行坚决, 真正落实。如果说了不做, 或者做得很不好, 党和政府的威信以及改革的声誉就将受到严重损伤。除了以上各项经济措施之外, 为了保证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 还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广泛开展协商对话, 综合治理社会治安, 维护安定团结, 创造出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目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从明年起抓紧进行价格改革、工资改革, 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 但是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也很大。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一致, 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把各方面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就一定能够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在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仪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

同志们：

今天，中央军委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军衔的仪式。我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军委邓主席，向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全军授予中将以下军官军衔和士兵军衔的仪式也将相继举行。在这里，一并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十七位同志，都是担任我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军官。这些同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贡献和才能的肯定，也体现了国家对军队的关怀，同时表明了这些同志肩负责任的重大。这是被授衔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

实行新的军衔制，是新时期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一制度着眼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状况，吸取了历史经验，借鉴了外军的有益作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实行这一制度，对加强我军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将产生推动作用。

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光荣使命，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通过新的军衔制的实施，每一位军人都应看到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与重托，更自觉地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名利，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忠诚地献身于国防事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要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作风培养，提高军政素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顽强，锐意进取，进一步焕发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希望全军在实行新军衔制以后，展现出新的雄姿和新的风貌，把我军建设推向更高的水平。

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是国家总体改革和建设的一部分，它的成功有赖于国家总体改革的深入，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全面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我们在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难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也很大。改革必须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每一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都应满腔热情地拥护和支持改革，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党的高、中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克己奉公，俭以养廉，艰苦奋斗，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为夺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同志们，军队在新时期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们深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主席的领导下，随着包括新的军衔制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今后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将迈出更大的步伐，全军广大官兵一定能够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新的卓越贡献。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刚才依林同志讲了《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作了说明。为了帮助同志们理解这个方案，更好地进行讨论，我想强调讲几点意见。

一、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要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

明年后年要不要把我们改革的重点，建设的重点，坚决地、突出地放到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上面来，这是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政治局和国务院在研究明年及今后五年物价改革方案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现在不下决心，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物价改革就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回顾一下，我们从搞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就存在这么一个老问题：经过一段大发展，然后进行一次大调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与我们整个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这种经济机制带来经常性的投资饥渴，需求缺乏约束。虽然经过十年的改革，但我们还没有解决企业自我约束、部门和地区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至今还一直严重地存在着需求超过供给的问题。我们差不多每年都讨论这件事，在一九八五年曾突出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时候，我们希望能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另外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不进行大的调整，而是踏步三年，不是马上

多压，而是原地踏步，叫“软着陆”，这样损失要小一些。这个方针在全国贯彻之后起了作用，突出表现在：预算内、计划内的基本建设规模，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些。但是，只控制了计划内的基本建设规模，而全社会的建设规模仍继续膨胀。如果说在去年以前，这种膨胀，这种需求过旺，社会还能承受的话，那么，现在已到了不能继续承受的时候了。这几年，经济发展了，建设扩大了，同时问题也潜伏下来、积累起来了。集中的表现就是银行发了那么多的票子。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量和度，不到一定的时候好像问题不大，但是达到一定的度，就会爆发。现在回头来看，如果今年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就像现在这样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问题，情况会好一些。当时更多地看到去年经济形势中好的方面，对潜伏的问题分析研究不够。这一点，从中央来讲，我们还是见事迟，抓得晚了。当然现在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也来得及。但如果再犹犹豫豫，左顾右盼，因纠缠一些局部、枝节问题而影响下决心，那就要出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要不要下这个决心，要不要扭转这种局面。这个事情要说难也很难，要说容易也容易，就看全党是不是共同下这个决心。方针定了、决心下了以后，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方案有待研究，但首先认识要统一。

一直到今天来讲，我们应当说，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十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充分认识。引起乱涨价和乱抢购的触发性的原因很多，包括许多谣言和误传，但根本的问题是几年以来，一年一年积累起来的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难以前进，还会损伤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要好好议一下。

所谓治理经济环境，主要就是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前年是5%，去年7.5%，今年可能是17-18%，三年加起来大体30%以上。其中真正属于物价改革引起的，不超过10%。去年由于物价改革措施出台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只占2%，其余5.5%是自发涨价。为什么自发涨价，就是钱多了要买东西。今年物价上涨如果是18%，就全国来讲，真正属于物价改革措施带来的，不会超过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是自发涨价。可见物价上涨

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物价改革，而是由于通货膨胀，是需求超过供给所带来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在通货膨胀未能控制的情况下，去搞价格改革，其结果，就会是火上加油。

总需求过大，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基建规模过大。刚才我说了，基本建设，计划内的不怎么多了，但是整个社会的规模过大。从北京到一个乡镇，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国到处都是工地。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加工的，基础的，全面大上。城市面貌这几年的变化也太大了吧，标准太高了吧。过去是光搞加工不搞基础，这几年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也上得很猛。港口、机场、电厂、公路都上了不少。钢铁已搞到 6000 万吨，有色金属产量也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加工业增长更快，需求极端旺盛，所以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仍然供不应求，十分紧张。从计划内到计划外，从生产到非生产，全面铺摊子，规模太大了。同时，消费基金特别是集团购买力也猛烈增长。工业发展速度过高。过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不行，这是对的，但今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搞到 17%，八月份还在上升，达到 18%，这个速度是太快了。

另外，我们某些商品出口也太多。现在出口的商品总值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4%，这个比例不算小了。美国现在的出口总值只占他国民生产总值的 11%。中国是个大国，终究不能搞贸易立国。某些国内很需要又比较紧缺的产品出口多了，会加剧国内市场的供应紧张。所以，外贸发展速度搞到多快比较合适，需要很好的研究。各个地区不能完全一样，有些地方应朝外向型发展，有些地方则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中国这么大，不能要搞什么都搞什么。

治理经济环境，最主要的就是缓解需求与供给的紧张关系，因此，必须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控制消费基金，压缩集团购买力，调整进出口，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各个地方条件不同，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可能一样，但总的速度必须适当降下来，消除经济过热现象。

整顿秩序，主要是整治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由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在转换过程中漏洞确实很多。发生一些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有效的宏观控制。通货膨胀助长流通领域中的违法乱纪，

给流通领域的混乱提供了土壤；而流通领域里的混乱反过来又推动物价上涨。两者相互助长，互相推动。所以对流通领域必须认真整治。要整顿公司，官商分开，减少流通环节，制止流通环节上不合理的层层抽头。部门有权力，地方也有权力，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可以加价，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流转环节很多，又是垄断性的多头经营，造成层层盘剥。譬如山西小煤窑产的煤，每吨大概是十七、八块钱，到了上海是一百零八，这中间一吨煤加了九十块。这里面有应该加的，如运输费用，但是大部分应当砍下来。很多商品都是这样子的。整顿流通领域的工作，还应包括加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促进市场发育，逐步建立起既有竞争又有秩序的市场。

在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同时，还要用很大力量去增加有效供给，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产品和轻纺产品的生产。

明年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是否成功，集中表现在明年的物价指数能不能明显低于今年。这个问题已是个政治问题了。公开的提法还是使物价指数明显的低于今年，但工作必须按照百分之十去布置，去做。我们过去也讲压缩基本建设，稳定经济，类似的口号讲得很多，老百姓的感觉是你们的用心是好的，但讲的根本没有作用，你讲你的，物价还是照涨，因此没有信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明年的物价指数能不能明显低于今年，这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领导能力和能否驾驭局势的一个考验，人民现在就看我们这一条。如果我们明年做不到这一点，后果是严重的，以后我们再讲话人民就不会相信。相反，如果我们明年说到做到，这就可以使人民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二、关于五年改革方案思路上的两个问题

今后五年，我们必须坚定地推行价格改革，原因依林同志刚才已讲了。概括地说，就是我们的改革到了这一步，价格不改革，整个改革就很难深入。目标是五年或再多一点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大部分市场消费品，也就是下游产品，和粮、棉、油以外的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不是一步做到，而是用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逐步做到。

这里我着重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既要进行价格改革，又要控制每年物价上涨幅度不超过10%。现在看，10%是个界限。进行物价改革，还要求降低物价，当然不可能；但物价如果大幅度地上涨，在中国也行不通。这就是说，价格要改革，但改革的步子只能够在10%的物价指数这个框框里来考虑，要受这个制约。积极而又稳步地进行价格改革，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这是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消化能力所决定的。

物价改革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效益来承受，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不提高效益，必然是轮番提价，结构改革的目的达不到。譬如，原材料提了价，加工产品也提价，加工产品提价以后，原材料价格又显得低了，还要提价；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工厂成本高了，工厂要提价，工厂一提价，农产品的价格又低了。最后总是旧的比价复归。因此必须提高企业效益，使之能够消化大部分涨价的因素。但如果每年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企业就消化不了，就要造成轮番涨价，比价复归。

能不能在10%的幅度内五年达到初步理顺价格，关键仍然是控制需求问题。因此控制需求不是一个短期的方针。既然要走市场调节的路子，如果市场需求过大，大部分商品供不应求，结果就要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在旧的体制下，需求也过旺，但那时实行票证供应，由票证限制消费，购买力不能实现，外国人说那是隐形通货膨胀。所以，如果不控制需求，或是通货膨胀，或是隐形通货膨胀，总之是通货膨胀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控制需求，需求与供给不是悬殊过大，不过于紧张，使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大部分能用于物价改革，再结合着税收、财政等等配套改革，那样初步理顺价格就不需要物价上涨幅度很大。所以，只要能够控制住需求，就有条件在物价上涨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初步理顺价格。

第二个问题，根据我国的情况，放开价格，主要应当是指下游产品，也就是最终产品。除一些垄断性的公用事业，如运输、电力等需要国家定价外，相当一些上游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也不能过早取消。一段时间，我们曾想早一点取消“双轨制”，现在看来不行。因为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包括粮、棉、油等主要的农产品，在相当长时间里会是供应不足。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完全实行市场调节，就会无限制地大幅度涨价，而每种上游产品涨价都会影响一大片，结果，将造成整个工业成

本大大提高，使中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地丧失竞争力。同时，上游产品完全由市场调节，并不能够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的产品现在也不是都靠市场调节，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我们还要有一条政策，就是必须使国家定价的产品的生产者有利可图，获利不低于平均利润，而且还应超过平均利润。在当前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全部由国家定价也不行，因为不可能把全社会的生产都纳入国家计划。中国的工业成份比较复杂，特别是有占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乡镇企业。比如钢材，如果统统是国家定价，实行“单轨制”，按计划供应，那样，乡镇企业就根本买不到钢材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实行“双轨制”，一部分价格由国家控制，来适当稳定物价，同时又放开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来满足社会上的多种需要，满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需要。这看来在中国是不能不实行的一个政策。我们这几年也是慢慢走上这条路的，一直走到现在。前一段由于看到“双轨制”弊病很多，助长投机倒把，我们曾设想早一点取消“双轨制”，现在看来行不通。

既然“双轨制”在一定的时期还不可避免，就必须研究如何减少它带来的混乱现象。这是对宏观调控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的“双轨制”已搞了多年，有一套办法。当然现在农民对国家下达任务内的那一部分农产品，也不太愿意卖了。这个问题我看关键还在各级领导，只要积极做工作，农民还是可以说服的，如果我们大家动摇，当然就很难办了。农产品中棉花是“单轨制”，粮食和油一直实行“双轨制”。农村多年来已经这样办了。工业中的重要原材料，也有条件实行“双轨制”。生产这些重要原材料的工厂大部分都是国营企业，如生产钢材的，主要是十大钢厂，是比较容易进行统计和监督的。

以上讲的是我们对“双轨制”思路上的一个变化。上游产品在相当时期内还实行“双轨制”，这同前边讲的以每年物价上涨不超过百分之十进行价格改革的设想是有直接联系的。如果上游产品价格过早放开，物价肯定会大幅度上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不足，又没有大量的外汇去进口。因此，一些原材料在相当时期内难以避免供给不足。所以要通过“双轨制”适当稳定上游产品价格，以便创造条件使下游产品价格放开，实行

市场调节。上游产品一般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下游产品则是千千万万，如不让供求关系起主要调节作用，就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很大浪费，社会需要的不生产，生产的社会又不需要，造成积压，这样也就无法将大批企业推向市场竞争，企业的改革也很难前进。

三、价格改革，实质上是整个改革的深入

小平同志最近讲：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个价格改革，而是多方面的改革，只有多方面才能创造价格改革的环境和条件，但是，最后真正建立新的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他还说：对深化改革的概念要改变。深化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深入，各种改革的深入，不单纯是指价格改革。小平同志这些话，讲清了价格改革和全面改革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价格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必须和多方面改革相配套，必须是全面改革的深入，但前一段强调得还不够，价格改革与其他多方面改革是互为条件的。我们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系统进行价格改革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但价格改革不能离开其他改革。

在多方面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机制的改革。中国不能走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路，但要进行企业机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中要抑制需求过旺，必须有一种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机制。今天，我们的企业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机制，既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也不能自我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物价改革所以非常困难，实质就是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个问题，资本家不会滥发工资奖金，也不会不顾效益地乱搞基本建设，他是要算细帐的，银行也不会像我们这样随便贷款。政府基本上不要为这些事操心。而我们的国营企业是公有财产，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我们进行改革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改革，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放权、让利，这是一段。后来搞承包制。承包制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今年，我们企业没有承包制，发生的情况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但是现在看来，还很不完善，而且光这个还不行。企业的改革，势必要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向股份制的方向发展。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化，而是产权的明确化。现在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不明确。经营权明确了，归承包者、

经营者。产权归谁？谁关心产权这个问题呢？国营企业的产权是谁的？是财政部的，还是计划委员会的？没有哪一个具体部门能代表财产的所有者关心这些财产。我们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解决产权明确化问题。股份制就是把笼统的、不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最近中办组织了一个调查，有几个部门参加，写了个材料，不是笼统地讲股份制，而是有一套具体的设想，特别是着重研究了如何通过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而过渡到股份制。体改委可以组织一些人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方案。当然，搞股份制也不能一哄而起，还要试点。

再一个问题是政企分开。要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能自主经营，放开经营。产品供求不紧张的企业，可以放开经营。这种企业不隶属某一主管部门，他就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按合同办事，参加市场竞争。

企业改革中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事物，就是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的涌现，这是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三不变”（所有制不变、财政上交渠道不变、隶属关系不变）。

解决的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看来主要应通过自愿联合、兼并、参股、控股等方式来实现，不能走硬性上收企业的老路。发展企业集团要根据实际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特别要防止为了取得优惠待遇而硬凑“企业集团”。

另外有几项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全党要重视，认真把它抓好。

第一个就是住房私有化的问题。企业不能私有化，私人住房可以私有化。当然不是绝对不能租房子，但基本上要实行住房私有。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现在看，比较可靠的容易使用的回旋余地就是房子。全国公房有多少？光城市就有二十亿平方米。算大账，如果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元，就是三千亿。照道理讲，房子卖给职工，对职工是有利的，买房子保值比什么都可靠。现在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元，十年以后起码要值五百元。当然要允许他卖。很多人是有钱的，银行里存有几千亿嘛。当然这里头也有很多具体问题，都得解决，应当好好研究，看究竟怎样才行得通。办好这件事，对改变消费结构，对购买力的分流，对治理通货膨胀，都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是出卖国营企业股份。这个问题刚才依林同志也讲了，我认为这也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个就是紧俏高档商品的销售与储蓄挂钩。一部分收入不高的人，积蓄多年，就是想买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现在需要采取储蓄预购或与储蓄挂钩的办法，使他们积蓄的钱不贬值，想买的东西能买到，或推迟一段时间能买到。这样做，对群众有利，又能吸收大量储蓄，对稳定金融大局也有利。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全面改革。这个问题，我们这次会议不可能详细讨论，我只把思路说一说。

四、保证改革的成功，要靠全党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要靠加强纪律

不少同志反映，这个方案提出的政策、措施是好的，好是好，就怕实行不了。我认为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能实行，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必须实行，必须落实。怎样才能保证它实行？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研究，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讲。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统一认识的关键是解决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

这几年来，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分权，承认利益的多元化，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可忘记，局部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毕竟得服从整体利益。小平同志最近跟一波同志谈话，着重讲了小局服从大局的问题。我们承认有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但归根结底，小局利益不能任意膨胀，不能不受制约。现在，在不少同志的头脑里面，局部和整体、小局和大局的正确摆法，确实有些模糊了，淡薄了，甚至颠倒了。有的只顾本地区本部门，把它置于整体、大局之上，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惜损伤整体和大局的利益，极力扩张地方和部门的利益。现在，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这种倾向。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落实下去，就必然要求地方、部门承担一些艰巨的任务，忍受一些痛苦，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我看落实的结果必然要落到这个问题上。为了整个经济的稳定，为了改革能够继续进行，必须做到这一点。

现在有一股愈演愈烈的攀比风。地方、部门之间，比产值增长速度、比投资、比工资水平、比物价水平，竞相争先，竞相争利。这是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不住、信贷膨胀、速度过高、产生种种经济过热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受到一股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攀比。群众说，人代会一开会有的代表就说，人家为什么搞得那么快，我们为什么搞得这么慢；人家的工资那么高，我们为什么比人家低；人家跑到北京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们到北京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跟我讲，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中央、国务院的有些做法需要研究，应避免给地方造成这种攀比的压力。比如有的统计表发到下面，各地就经常拿来对照，当地工资水平原来在全国是第几位，现在是第几位；工业原来是第几位，现在是第几位。位置往后排了，人家就说你这个领导不行。各地方条件不同嘛。从国家大的部署来讲，也总是有先有后嘛，哪能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齐头并进。这个话今天讲清楚，以减少地方领导所受的压力，改变竞相攀比的精神状态。毛主席过去就讲过，不管怎么比，只能有一个第一。过去说力争上游，都是上游也不可能。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各个地方好像并不很怕涨价，而是要求涨价，认为谁不涨价谁吃亏，先涨价者先得利。这是目前涨价制止不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种盲目攀比的倾向极为有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又这么大，中国的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总的来讲，我们不可能搞得过快，当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速度。在总的不可能过快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一些地方，根据全局的考虑和当地的条件，发展可以稍快一些；而有一些地方就得慢一些。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比较大的国家，是有广大内陆腹地的国家，虽然我们海岸线也很长。我们要对外开放，要发展对外贸易，但是我们不可能以贸易立国，还是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具体来讲，沿海地区应当根据自己的有利条件，较多地发展对外贸易，内地的对外贸易就不宜搞得过多，也不可能搞得过多。这一点不能相互攀比。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地区要实行“两头在外”。如果沿海高价抢购内地的原材料来发展出口，国家承受不了。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利用沿海的劳动力，利用沿海对外交通方便等有利条件，发展以进养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

然后出口，主要靠劳务和技术赚钱。现在重申这一条，沿海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建立在“两头在外”的基础上。

要治理环境，必须加强宏观控制。现在的宏观控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旧的产品经济那一套控制办法失效了，很多都不能用了，新的控制办法又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出现了许多漏洞和自流现象。如何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加强宏观控制，这次会议要好好议一下。我们要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不可丢掉行政手段。当然，现在运用行政手段，要考虑到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的特点。所谓行政手段，主要是纪律手段。小平同志讲：你什么经济手段，都是国家财产，你罚他他才不怕罚呢！因此，必须强调纪律。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既要搞活，又必须强调纪律，不能把纪律和搞活对立起来。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企业利益，我们要承认，不能随便侵犯，但是，地方和部门如果超越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范围，侵犯、损害了全局利益，损害了别的部门和地区的利益，这就要制裁。现在要强调集中。应当给地方、部门、企业的权力要给，应当集中的权力必须集中。

我们党过去战胜过许多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困难，靠的就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目前要克服困难，推进改革，必须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党，必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小平同志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党的领导。大家都说目前的困难和过去没法相比，有利条件多得很。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涣散，思想不那么一致，行动不那么一致。现在如果不强调党的作用，不强调纪律，就没有办法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党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国务院的权威，在重大问题上一定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令行禁止。现在流行一种“红灯、绿灯”之说，很多人说这是广东介绍的经验。广东的同志讲，他们从来没有介绍过这种经验。不管怎么说，流传很广。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可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可以自行其是。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不能这样做。

价格、工资改革的任务、目标、措施，依林同志刚才说明的方案中都有了。为了使同志们在讨论中抓住重点，我根据最近两次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做这么个补充。

同弗里德曼¹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热烈欢迎弗里德曼夫妇一行的到来。今天机会难得,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对我们的改革很关心。在经济学方面你是个大教授,我是个小学生。你从远道而来,话应该由你多说,我多听。

弗里德曼教授(以下简称弗):八年前,即一九八〇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桂林、广州等地。此次再度访华,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来到北京。与上次相比,中国有很大变化,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使我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

赵:为什么不到西安去看看?

弗:我们明天去。

赵:在听取弗里德曼先生意见之前,当然我应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改革整整进行了十年,刚才弗里德曼先生说,同上次相比有变化,这主要是显示了经济活力。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总的来说,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由原来的经济模式转换到另一个经济模式,的确问题不少,也比较复杂。

一九八四年我们中央全会决议上就讲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去年,我们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们感到改革要深入,就要进行价格改革。当然,过去我们在价格方面做了不少事,但现在应把价格改革摆到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价格调整,主要是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即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目前，中国的现状是这样的：百分之五十的价格是放开的，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大量的机电产品和除粮、棉、油料以外的农产品；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农产品是双轨制，即一部分是国家价格，一部分是市场价格，比如钢材、有色金属、粮食等；还有一部分完全是国家价格，如航空、电力、运输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说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实行双轨制的部分减少，把国家控制价格的部分减少。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却出现了难题，即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今后的价格改革同治理通货膨胀一起来考虑。当然，通货膨胀不是今年造成的，而是几年所积累的，但我们感到今年的通货膨胀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治理通货膨胀考虑进来，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话，人们就有实际承受能力的问题。这个承受能力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中国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六年物价是冻结、不变的；中国人民是在这二十六年物价不变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人们对物价变动，心理承受能力很低。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八年，人们在物价观念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心理上还是承受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有储蓄的习惯，把大量的钱存入银行，如果物价上涨过猛、过大，就很难避免银行存款大量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物价大幅度上涨，银行存款利率提得很高，企业就可能承受不起，就会使不少企业倒闭、破产。我赞成破产是好事、可以新陈代谢的观点，但是如果大批企业一下子破产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的物价改革要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考虑到承受能力。中国的物价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二者要同时并举。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你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通病，叫短缺经济，需求超过供给，跟市场经济国家情况相反，西方是供给超过需求。现在，我们虽然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没有解决企业和部门的自我约束问题，或者说没有根本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比改革前更坏，但改革还没有达到地方部门和企业有自我约束的地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规

模过大，地方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过快。由于这样几个原因，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多。因此，我们准备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减少固定投资的规模、降低消费基金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条件，即能够继续进行价格改革，进一步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同时进行企业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提高企业内部效益。价格改革是靠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来消除由于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带来的影响，而不应该因为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我们决定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同时，通过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使企业真正建立起自负盈亏的能力。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增强国营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自负盈亏的能力。我们想走这样的路：第一，实行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有经营权、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和处置权。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财产的所有者就像一个乐队乐器的所有者，而经营者就是乐队的指挥。目前，能够体现两权分离的大量形式就是承包责任制，即国家把企业承包给经营者。另外我们准备试行股份制，以便明确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现在我们的财产所有权不明确，国营企业的财产究竟归谁，归我？归他？还是归财政部，归计划委员会？不明确。财产的所有权不应当是笼统的，而要明确。比如说，某个部占多少股，某个地方政府占多少股，企业的职工占多少股，当然也还有国外公司占多少股等等。笼统的国家财产要分解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今后企业的改革，一是实行两权分离，一是实行股份制，产权明确。这个问题我们是受到乡镇企业启发的。近几年，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这是中国最富活力的企业，弗里德曼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去苏州和无锡参观一两个乡镇企业。

弗：我已经去过了。

赵：他们的财产不是私人的，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归乡镇政府。当然我不能说他们这种所有制同西方企业私人所有制哪个有活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它比国营企业要有活力。因此我想，在中国实行股份制把产

权明确，是对国营企业的一个极大的改造。这个问题在中国已讨论了近三年，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意见大体趋于一致，所以可以说，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已经有了条件。当然这一点我也是受到西方，如联邦德国情况的启发。这个弗里德曼先生比我知道得多得多，联邦德国很多企业是工会的，但他们经营得很好，比国有化企业经营的好得多。

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是价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货膨胀；其三是实行企业股份制。当然，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经验不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实行股份制也是个新问题。因此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难度不小。但是有一点需要向弗里德曼先生讲清：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然啦，有些问题要探讨，但方向不会变，具体步骤、方法可能会根据中国的情况不断地调整和改变。

最近，香港报纸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情况，不断地进行研究，进行讨论。中国有句话，即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说起来，这也有点人治的味道。做任何事首先应该确定方向，这非常重要。要到美国去，方向定了，但怎样走要研究，因为要绕大山啊，要过大洋啊！这就是“审时度势”。什么事情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分析变化了的现状，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领导层有了分歧，而是我们要经常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会面，如果不是在现在，而是三个月前，我的话就不是这样讲了。如果我们明年再见面，我也会讲些不同的话。我讲得很长了，现在想听听弗里德曼先生的意见。

弗：非常感谢总书记给我们介绍情况，您讲得非常清楚、全面。刚才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

赵：（大笑）我只读过中学。

弗：不要把在学校时间的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在学校念了很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却非同小可。

赵：中国也有这样两种人的。中国古话叫做“不学有术”；有的是“学而无术”，有的是“不学有术”。

弗：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不是专家，在座的每位先生都远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准备谈了。我曾用许多年研究进行改革的许多国家的情况，每个国家的环境都不尽相同，都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殊的；但有些情况并非如此，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适用于每个国家。比如，物理学的原理在每个国家都适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每个国家也适用。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有一条重要而有简单的经济规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私营企业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和企业活力。我不想具体地谈这些问题，具体问题你比我更清楚。通货膨胀的现象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我们不能用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许多国家曾试图过，结果都失败了。远在一千六百年前，罗马帝国使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罗马的皇帝想控制通货膨胀，但失败了。

赵：我们过去就是用这个办法。

弗：再举一个新的例子——美国。它一九七一年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当时尼克松总统说百分之四点五太高了，他采取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把个别物价和工资冻结了。三年后，由于这种控制措施使美国经济发展很不顺利，不得不放弃了，但那时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八。这是七十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的开端。

关于通货膨胀最大的教训是把价格上的通货膨胀与个别价格的上升分开。许多国家并没有采取控制个别价格，而是控制了货币量就抑制了通货膨胀。比如日本就是这样。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日本通胀指数是百分之二十五，货币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放慢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控制，其后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结果为日本后来经济顺利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经济改革问题，其实这里有个重要条件，即以控制货币发行量来

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大。抑制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中国的银行不能像西方银行那样通过机制降低货币发行量，中国银行是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印钱，向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的。我认为中国的通胀问题不在于投资和消费，而是钱印得太多了。当然社会需要投资和消费，但这些钱应来自于储蓄和生产。

放开价格对控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鼓励储蓄和防止浪费的现象。您讲的工业的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您讲储蓄利率如果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而企业就因为利率低便争着到银行借钱，但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就可以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的投资。第一个（通胀）问题要讲的还很多，但怕占你的时间过长，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刚才讲要放开价格，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有提到，这就是汇率问题。我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时，是三十年前。我当时是印度财政部长的经济顾问。当时印度有几种汇率，最简便的发财致富途径就是通过关系搞到一张进口许可证，这样，一些人成了富翁，但更多的人成了贫民。还有，这种制度非常容易引起腐化。我当时向印度政府提出取消外汇管制，建议放开汇率，但印度政府没有采纳。正因为他们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印度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跟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

我认为印度经济失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批准进口许可证和多种汇率。一次，我访问印度的一家纺织厂，发现这个厂的设备很先进，都是进口的先进设备，省人省力，而另一方面印度的许多人在等待就业。我于是问工厂厂长为什么进口这么先进的设施，他回答说，这是因为政府批准以官方汇率买机器，合算。这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便宜，但对国家不利。

据我了解，中国也有好几种汇率：较低的国家汇率，中等的半官方汇率和更高的市场（黑市）汇率。如果你们取消了双轨制，高的向低处降，低的就会向高处升，采用双轨制其市场汇率就必然较高。

我认为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官价低而买不到东西，实际不是低价。如果花五个小时排队抢购，也不能算价格

低。我的夫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同一条街上的两边有两家肉店，一位家庭主妇到一个店里买羊肉，说这个店里的肉贵，店主就说，你认为价格高，可以到对面那家去买，那里低。但那家肉店没有羊肉，这样的便宜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说双轨制是使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谈第三个问题。权力下放问题，我已经谈到了，但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企业要有活力，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我再谈谈印度的例子吧。过去三十年，我多次访问印度。在印度建厂要得到许可证，给了某个人许可证，他就有了权，这和国家垄断一样糟。重要的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自己经营商店、企业，当然对经营者要征收适度的税。只要有很多的私人自由建了企业，自负盈亏，就会迫使国营企业要么提高生产效益，要么破产。美国的国营邮政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这邮局有垄断权，是合法的，但现在其他人也有权传递这种快件，把国营邮局的快件生意杀得片甲不留。要是美国的国营邮局在其他邮件上也没有垄断权，我就可以肯定地推断这邮局会破产了。因此我提出中国要取消许可证。我认为要使企业有活力，就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它们来竞争，无论是乡镇企业或私人企业都要让它们来竞争。

最后简单地再说一点。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着”，不进不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过去我几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国去的，当时是从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从奥地利去又是另一种感觉。那时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没有把产权交给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红，但却不能将权利卖出或转让。这些企业为赚钱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资，工人也难以另谋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产权转让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工人合作社制如何好，而是要说明改革不要半途而被“胶着”。我非常赞赏总书记刚才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下去，方向是不会变的话。现在我非常愿意回答总书记提出的问题。

赵：非常感谢弗里德曼先生谈了很多好的意见。关于物价问题，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弗里德曼先生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银行的改革刚

刚开始，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通过银行抽紧银根，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抽紧农业，而重复建设的并没有抽紧。

弗：这是由于权力部门在上层，上层完全控制了权力。

赵：两个问题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性质不合理。

弗：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相互竞争的体制。目前，中国与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方相似，当时西方小城镇建立了银行，银行利率根据市场来决定，这些小银行发挥了作用。中国也可以在小城镇建立银行进行调节。

赵：刚才讲到私人企业，今年三月份人大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个法律，允许私人企业的发展，对私人企业没有特别的限制。

弗：两天前，我曾在无锡访问过一个做私营生意的个体户，他说要开店就需要取得许可证，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还要请客，很困难。究竟他所指的困难是今年三月份以前的事呢，还是三月份以后的事呢？

赵：法律上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完全消除还要一段时间，这个现象还不少。不是说法律一定下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弗：请允许我再提一点。中国邻近的地区，如香港、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它们发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于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难最大，但取得的成绩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预最小。中国由于国家大，遇到的困难自然也大，但我想，中国也可以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西方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邻近的地区都从西方汲取教训，其中包括借鉴技术和工艺等等。我希望中国人民更加富强，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南朝鲜和香港等地区的发展对美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对美国有好处，这是友好的竞争，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赵：谈谈汇率问题。两年前，一个叫邹至庄的美籍华人教授向我提出汇率浮动的建议。

弗：他是我的学生。

赵：他告诉我，他多次向蒋经国提出过这个建议，但蒋开始并没有采纳。他希望中国也能实行浮动汇率。

弗：即使是台湾也没有完全浮动它的汇率，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干预外汇市场。

赵：我们国内不少人也提出建议，中信公司的老板荣毅仁就多次讲过放开汇率问题。但我们有这么一个困难，中国正在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结构不一致，我们的换汇成本不高，大体是四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当然做为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在国内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放开汇率就可能出现汇率价格不合理的现象，使原料的成本提得很高。

弗：但是放开外汇管制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解决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避免浪费资源，可以促进改革。

赵：价格改革与开放汇率要结合起来，价格放开与汇率放开应大体是一致的。

弗：当然二者一起来考虑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有政治上的障碍，不能同时解决，则解除外汇管制是最重要的。

赵：我再次对你提出的有益建议表示感谢，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很好研究你的建议的。总之，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变的。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中国的发展完全符合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利益。

今天就谈到这里。

注释

1.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1975年因其对货币供应和消费分析的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创立的芝加哥学派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行政干预闻名于世。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关于这次会议

这次会开得是好的。全党高层次统一思想的任务，在这次会上解决得不错。这个层次包括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各部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高级干部、实权派。到会所有发言的同志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中央所制定的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方针和重大措施。同志们都表示要小局服从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准备作出牺牲。大家没有什么不愉快，没有什么埋怨情绪，没有什么勉强。会议开出这样一个结果，确实令人鼓舞和高兴。这又一次证明，我们这个党是很有力量的。

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上，只要中央把情况讲清楚了，把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方针而不能采取另外的方针，为什么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民利益的道理讲清楚了，就可以得到全党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事实多次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央在这里开会可以把部长、省委书记、省长的思想统一起来，我相信你们也可以把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专员、县长的思想统一起来。当然，对中层、基层干部要多做一些工作，做更细致的工作。逐层去开会，逐层把道理讲清楚，把情况讲清楚，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把全党的认识统一起来的。全党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了，我们就可以带领人民前进。

这次会议需要统一认识并已统一认识的，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明后年要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第二，

关键是要消除经济过热，抑制需求过旺，治理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为此必须坚持小局服从大局。第三，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加强纪律，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这样，我们的困难就可以克服。希望大家按这个精神，把会议的中心内容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

二、关于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与会同志对这个方案提了一些意见，民主人士和专家们也提了不少的意见。政治局将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考虑，凡是能够吸收的都加以吸收。

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明年的措施和要求还是绷得紧了一点。我想，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斟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明年务必使物价上升幅度降下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做到了这一点，其它问题才比较好解决，也有时间解决。否则，整个方案实施起来很困难，矛盾还会增加。社会上的票子，不可能完全靠商品来回笼，还必须靠增加储蓄。只要物价稳定了，再加上提高利率，社会上的钱就会回到银行里来。在这种情况下，毕竟群众把钱放在手里或买些不合用的东西，都不如存入银行有利。有了社会上存入银行的这些钱，银行就不必再多发新票子，反过来又有利于稳定物价。这对大局至关重要，对人民群众也最有利。实现这一条的关键是采取一切手段先把物价稳住。所以我们明年工作的最主要之点不是价格改革出台多少，也不是工资提高多少，而是把物价稳住，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有显著的进步。其他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一个大道理。各地各部门的工作都要本着这个精神来安排。

三、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最近不少事情，例如抢险救灾，制止抢购风，包括中央发的关于严肃党的纪律维护改革大局的通知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都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党还是有战斗力的。在完成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这场艰巨任务中，必须充分

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应当而且可以依靠这个政治优势来克服当前的困难。

应该看到，当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党的观念有些淡薄了。因此，现在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强调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建设民主政治也好，都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削弱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会陷于混乱。

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中，要使每个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组织，经受严格的考验。我们不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吗？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清理不合格党员，开除腐化分子等，这些工作都要在这次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来进行。要通过发挥党的作用，保证这场斗争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一个好机会。在和平时期入党，在和平环境中锻炼党员，用什么来考验呢？当然，对敌斗争也还有，水灾、火灾、风灾也是一种考验，但日常大量的还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考验。究竟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还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这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最容易看出来。要看一个党员在改革中间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一心谋取私利。总之要有意识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要依靠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同时，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考验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

四、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中， 向广大群众进行一次深入、系统的形势任务教育

人民群众只有认清形势，看到光明，明确任务，才会齐心去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在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时候，认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进行这次教育，主要是向广大群众讲清十年改革的业绩、当前面临的问题、今后任务和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要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向人民

群众讲清这些问题。还要向群众解释，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没有变，明后两年重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做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建设事业，就会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改革十年，惠及全国人民。可以说，至少80%以上的人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好处。但是，同时人们的意见、牢骚又很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现象，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最近，洛阳一个干部给我写信，完全是善意的，他说，改革以来，他个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职务提高，收入增加，家庭主要成员的变化几乎和他一样，是“多喜临门”。但他对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分配不公和其他不良现象“愤怒难忍”，禁不住“骂娘”。我觉得，写信人很坦率，他的想法和情绪也很有代表性。

人们所以不满，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和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人们有理由对这些问题感到不满意。但从这种有时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中也可以发现，许多人对改革、开放的期望值过高（自觉或不自觉的），总认为社会的一切应该比实际情况更理想，改革带来的好处应该更多；另一方面，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一时难以避免的某些消极的东西，又缺乏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

人们所以产生对改革期望值过高的心理，又可以从我们的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的缺点中找到原因。

首先，我们没有充分地、如实地向群众讲清十年改革做了哪些艰苦而又复杂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在这方面，领导知道的情况，群众不一定知道。有一种说法：“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现在看，不讲成绩也不行，不利于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如果一方面不去实事求是地宣传改革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不断地渲染、夸大，其结果就会使人们渐渐对改革的好处淡忘了，而怨气和不满却滋长起来，互相感染。这种现象的消极作用绝不可忽视。改革的十年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少人对改革的认识与这个基本事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很不相称。这与我们如实宣传改革的成就不够，有直接关系。

其次，我们对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对改革、开放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等，也都讲得很不够。世界上的事情，利和弊总是联系着的。改革、开放对人民和国家有大利，但也难以避免有小弊。“小弊”，从局部或某一角度来看，人们可能感觉并不小。例如随着经济的搞活和市场调节成份的增加，生产发展了，人们的生活也方便了，但同时也会出现投机倒把、非法谋利、不正之风等问题。对外开放使我们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好处很多，但同时也会传入和诱发一些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兴利除弊，努力把消极的东西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只能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暴露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才能解决，兴利除弊的制度、办法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如果只准备接受改革，开放的好处，而不准备接受另一方面的现实，那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所以，我们必须花足够的精力和功夫，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解释这些道理，帮助群众很好地进行分析。

再次，我们对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措施，向群众宣传解释也很不够。人们不很了解为什么必须采取这样的方针而不能采取另外的方针，因而常常产生误解。这样的事例很多。

尽管人们有一些不满和意见，但我们对改革大业绝不能动摇。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向人民群众做工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一心想把中国建设好。但由于改革事业复杂而有风险，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工作肯定有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们可以胸怀坦荡地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但总的来说，改革的十年还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我们对人民群众没有什么讲不清楚的问题。

当前群众的不满和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物价上涨，二是某些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三是社会分配不公。关于物价上涨问题，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方针，可以讲明中央的决心，统一群众的认识，并动员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关于腐败现象问题，主要讲清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产生这种现象的复杂原因，讲清党为实现党政机关廉洁而正在进行的努力，号召群众进行监督检举。至于分配不公问题，既需要认真解决，又需要认真解释，因为其中

既有实际问题，也有观念上的问题。由于管理办法不健全和制度上的漏洞，出现了非法牟取暴利的现象，投机诈骗的现象，这些都是必须取缔的。有些单位（特别是某些公司）自定高工资，与其他单位形成不合理的收入悬殊，这也是必须解决的。对正当的高收入，要依法征税，政府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都是实际问题。至于观念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合法收入差距看不惯。有些合法的高收入，也许并不是从任何角度看都很合理，但那是政策允许的。例如个体户，只要他合法经营，多赚钱是允许的。又比如出租汽车司机，赚钱也比较多。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允许一些人多赚些钱的政策，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回到过去的状况，社会财富减少，群众生活不便，只有全民和集体这一个就业门路。那样，人们的收入可能比较平均，但是，真要回到过去的样子，恐怕谁也不满意。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提高。但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得的更多，这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不赞成的人不少。但是，如果一定要绝对的平均，谁也不准先富，结果只能是大家一起穷。平均主义，我们搞过，因为实践证明不好才改的嘛。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讲明白。还有个知识分子待遇低的问题，那是长期遗留下来的，我们也正在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不是没有改善。知识分子收入也不平衡。写作多、讲学多、有发明创造和有机会出国的，情况就会好些。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又要随着改革的进程，逐步改变人们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增加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这次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的方法，除了宣传舆论的适当配合以外，主要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与群众对话。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要如实地向群众讲明。要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失误，知道改革是会有风险和失误的，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要向群众讲清，并同群众商量。要求大家共同完成的任务，应向群众交底。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把道理讲清楚。让群众把疑问提出来，领导同志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讲成绩，但也决不隐讳问题，特别要着重引导大家向前看，使人

们对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味埋怨，牢骚，而是团结起来去奋斗，去解决。改革大业，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自觉地出一把力。我们要相信群众，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将使人民群众进一步树立起“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统一意志，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更加理解和支持改革，使人民群众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增强信心和力量。

很多同志提到，传达贯彻中央的精神还是要先党内后党外。当然，什么事情都先党内后党外也没有必要。但是，许多重要精神的传达，重要任务的部署，解决复杂问题的动员，都需要实行先党内后党外，首先把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一齐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样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有利于克服巨大的困难和完成复杂的任务。这一次统一思想，就需要先党内后党外，党内层层开会，层层武装骨干。实际上只要把党内思想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各级都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叫“改进”、“改造”、“改革”，都是一个意思，目的是为了思想政治工作更有力、更有效。要通过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形势任务教育卓有成效地进行，同时通过这次形势任务教育，进一步探索、研究在新形势下怎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走出一条路子来。

五、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昨天，王芳¹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维护社会的安定。请各地的同志都注意这个问题。要多做群众工作，经常进行协商对话，有问题及时解决，尽量避免激化矛盾。越是有困难，越要重视内部团结。当前，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肯定会加紧活动，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要有应付的办法。小平同志最近说，专政的问题，不必多讲，但是不能没有。由于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敌对势力肯定会利用我们的困难，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我们不能麻痹。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至于出多大的事。但是恐怕要准备出一些事，专政的武器不能丢。

六、要重视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

这对我们克服困难是非常重要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效益有所提高，我们的困难就会减少。而大中型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根本的问题还是深化企业的改革。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要放慢，但大中企业的改革步子不能放慢。

原来我们说过，今年应该是企业承包制明显发挥效益的一年。各地反映，这个作用确实是明显的。但由于原材料过分涨价，效益抵消了一些。今后几年随着承包制的完善、深入，股份制的逐步试验、推广，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等，大中企业还会发挥出很大的潜力。为了深化企业改革、提高经济效益，还有三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报纸上讲的“三害”，要认真解决一下。第一害是政企不分。现在很多权力放来放去，放到了主管部门，放到了主管局或者行政性公司。企业应该得到的权力在中间被拦截了很多。第二害是流转环节太多，层层抽头，造成原材料涨价，使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第三害是对企业的摊派。对企业的摊派与城市建设的高标准有直接的关系。应当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制止城市向企业摊派。如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企业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变，企业的积极性会提高，活力会增强，这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克服困难，并为改革的全面深化创造重要的条件。

七、要千方百计地增加供给

明年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但市场需要的商品要抓紧生产，有效供给要尽量增加。长线要压缩，但短线的、紧俏的、人民日常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要保证。对为生产市场紧俏商品服务的技术改造还要很好地支持。

农业问题大家讲了很多好的意见，纪云同志发了言，我赞成。农业上的许多问题，都要认真解决。同时对农民、对基层干部也要进行教育。道理不能只讲一面，好像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比城市居民的生活变化还要大些。当然，粮价还是低，生产资料供应也不太好，国家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国家，国家的困难怎么渡过？国家的困难

渡不过，农民的日子怎么能过好？我看得进行这个教育，得讲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讲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正像企业要向国家交利、交税、交产品一样，农民应当向国家交粮食，卖农副产品。公民对国家都要尽自己的义务，而国家则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对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另一方面也要向农民讲清道理。有些道理不讲清楚，就会气不顺。

八、检查整顿必须集中力量

我们宣布过不再搞政治运动，开始是讲政治领域不搞运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在其它方面一般地也不提搞运动，这是对的。我们今后解决问题，主要靠立法，靠制度，逐步建立新的秩序。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有些单位、有些情况很严重，有关的法律、制度又不很健全，只靠少数人去查，根本查不进去，常常不了了之。我在会上插话说的要搞不叫运动的运动，是指某些单位某些问题的整顿。第一、要集中地搞，第二、要发动群众。这丝毫不意味着重复过去搞运动的作法。过去搞运动，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宁左勿右。现在不能那样搞。当然，为了避免误解，可以不用“不叫运动的运动”这个提法。但是，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中，某些单位问题很严重，就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去搞，这样才能突破。对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问题，要认真查证，坚持实事求是。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依法办事。

注释

1. 王芳(1920-2009)，山东新泰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旅保卫科长，军保卫部长兼组织部长，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保卫部长，浙江宁波地委书记，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国务委员。

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十三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半年中，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多次讨论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最近，又为此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认为，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不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把改革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步骤和方法应当审时度势，力求稳妥。现在我向全会报告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的意见，提请全会审议。

一、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是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

我国改革已进行了十年。十年改革，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革，我国就不会有这十年的大发展、大前进。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经给

* 这是赵紫阳 1988 年 9 月 26 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鉴于当时进行价格改革时，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一些地方出现抢购商品等现象。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中央决定 1989 和 1990 两年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前进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坚决而稳步地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我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近几年我们在控制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预算外基建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今年年初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更好一些。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当然，现在解决还来得及，如果再犹犹豫豫，当断不断，那就会出大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坚决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的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否则，不但价格改革很难进行，其他改革也难以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损害我们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第一，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压缩五百亿元，大体相当于今年实际投资规模的百分之二十，只能多压，不能少压。要对重点产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切切实实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把全社会的投资规模真正管起来。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在集团购买力的使用中，虽然相当部分是合理的、正常的，但其中确有严重的挥霍浪费，必须坚决砍下来。第三，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包括出售公房和发行股票、债券，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百分之十甚至更低一些。这是就全国范围来说的，各地都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相互攀比速度。

控制投资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过去所以屡禁不止，教训有两条：上面的原因主要是手软，抓得不实；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条教训不允许再重复。明年要采取非常措施，要真压、真砍，而不是假压、假砍。坚决砍掉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和重复建设，砍掉集团购买力中用于铺张浪费的部分，一不会影响有效供给，二

不会削弱发展后劲，三不会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得到的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这个问题事关改革和建设的大局，现在就要预先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打招呼，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年必须照办，今年第四季度更不许突击上项目、乱花钱。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现在流通领域中问题很多。物价上涨助长了流通领域的违法乱纪，流通领域的混乱又推动了物价上涨，两者相互助长，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坚决整治流通领域的混乱。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国务院已经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物价、财务、税收大检查。各地必须认真组织力量，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切实抓好，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非法涨价收入必须上缴国家财政，严重违法乱纪的必须依法惩处。要通过检查，进行教育，严肃法纪，堵塞漏洞，把物价、财务、税收监督制度和市场规则建立健全起来。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所有公司，除极少数经国务院特别批准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的以外，都必须限期同党政机关脱钩，依法经营，否则就吊销营业执照。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要一个一个排队，认真解决多头和多环节经营的问题，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高价抢购粮食、棉花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必须立即制止。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必须在中央集中统一指挥下，强化计划、银行、财政、税收、海关等部门的宏观控制职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的监督作用，同时加强对它们的监督，形成严密的监督系统。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所有这些都应当作为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作。

解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一方面要抑制总需求膨胀，另一方面要用很大力量来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否则，市场供应就会出大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轻纺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压缩建设规模腾出来的能源、原材料、运输能力，就要用到这些方面去。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消费品，要减少出口量，保证国内市场供应。特别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的问题。今年我国自

然灾害较多，预计粮食比去年减产百分之三左右。今年农业歉收是世界性的，大量增加粮食进口对我不利。总的说，目前我国粮食储备的情况是好的。为确保在粮食问题上不出乱子，一是必须坚决制止高价抢购、哄抬粮价、扰乱粮食市场的行为；二是中央在全国各地的粮食储备，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调度。在粮食调度这个重大问题上，务请地方同志以大局为重，支持中央。如果出现拒绝中央统一调度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唯省委书记和省长是问。这一点现在就要说清楚。“菜篮子”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大意不得。去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菜篮子”涨价因素占三分之二。今年以来这方面涨价也较多。全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要确保今年第四季度特别是春节的市场供应。有关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问題，今年将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专门进行研究。

这次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宏观控制要体现在中央能够说话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如果不放，能搞出这样一个规模吗？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向小康社会过渡的宏观管理。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既要搞活，又要制约，既要放开，又要管理，宏观控制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尤其不能过早地轻率地放弃行政手段，以免出现经济生活的混乱。加强行政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走老路，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们要在实践中努力学习，积累经验，逐步掌握和提高宏观调控的本领。

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首先要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已成为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驾驭局势能力的考验。人民现在就看这一条。说到做到，取信于民，深化改革就好办了。所以，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明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就是当前的大道理，明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二、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前进中面临的复杂问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坚决而稳步地全面深化改革。

姚依林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将向全会作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说明。关于价格改革，这里着重讲两个问题。

第一，明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明显低于今年，此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百分之十以内。这是衡量我国价格改革是否积极而又稳妥的一个尺度。从当前我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企业的消化能力来看，一般地说，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两位数，企业就消化不了，势必造成轮番提价，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搞得人心惶惶。

那么，在上述物价上涨的控制幅度以内，用五年或较多一点的时间能否达到初步理顺价格的目标呢？这就要看我们能否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总需求。只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不大，自发涨价的压力就会相对缩小，价格改革的回旋余地就会相对扩大。因此，紧紧抓住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这两个环节，切实控制住社会总需求，我们就有可能在物价上涨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用五年或较多一点的时间，初步理顺价格。我们要力争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第二，某些重要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双轨制不可能也不应当在短期内取消。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做到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适应“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但是，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只能逐步进行。近期可以放开的，应当是供大于求和供求矛盾不大的产品，主要是为数众多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国家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铁路运输、通讯、电力等，仍由国家定价。对极端重要并将长期短缺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包括粮食、油料等农产品，煤炭、原油等燃料，钢、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不能硬性地过早取消双轨制。这些产品，如果没有市场调节这一轨，整个经济就无法搞活，特别是占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就无法生存；但如果没有国家定价这一轨，就会造成包括人民生活必需品在内的众多产品的价格全面暴涨，物价上涨就无法控制，并将大大提

高整个工业生产成本，使我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很快丧失竞争力。价格双轨制是我国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市场远未发育的情况下，硬性取消看来是行不通的。既然双轨制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就必须强化管理和监督，减少混乱现象，尽量限制它的弊端。这是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工资制度和社会分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必须保证绝大多数职工生活水平不下降，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有所改善，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工资制度要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着重克服平均主义。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待遇偏低的问题，要有计划地解决。有些新办的国有公司，工资待遇过高，国家要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对合法的高收入，要通过税收加以调节。对一切非法收入，必须依法严加取缔。

深化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价格改革不应当也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改革而孤军深入。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必须特别注意认真贯彻执行企业法，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它们真正建立起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就能提高，消化能力就能增强，轮番涨价和比价复归的现象才能避免，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才能更加奏效。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应当放慢，企业改革则必须抓紧，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

一是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目前严重影响企业活力的，主要是：应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被部门或地方截留；各种各样的行政性公司或中间环节对企业进行种种限制或盘剥；四面八方对企业的摊派名目繁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给企业造成更好的外部环境，关键是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今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要求应当是：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履行合同。对违法的，偷税漏税的，不执行合同的，必须严肃查处。国家不干预企业的正当经营，也不包它的亏损。企业放开经营，可以首先在那些全行业产品供求大体平衡的国有企业，以及县属国有企业中推行。

二是认真完善承包制，逐步推行股份制。企业改革，我们已经走了两

步。第一步是放权让利，对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步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普遍推行企业经营承包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前要继续搞好企业承包的配套、深化、完善、发展，包括真正引进竞争机制，优化劳动组合，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力促进科技进步。要注意借鉴和吸取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有益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要认真研究，逐步推行。我国国有企业决不走私有化的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而是把笼统的、不够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以利于促进企业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合理化。发展企业集团是一件好事，应当通过自愿联合、兼并、改组、参股等方式进行，切忌硬性捏合。推行股份制和发展企业集团，都应进一步试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规定明确的政策界限，不要一哄而起。

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整个企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办好企业，要靠经营者和工人共同努力。既要保证企业经营者独立行使经营权，又要保证工人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和工人的主人翁作用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各项工作中，都应当掌握并体现这个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还包括计划、劳动、商业、物资、外贸、财政、金融、投资等各个方面。特别要抓紧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加快出售公房，逐步实现住房私有化，坚持数年，有可能回收一批巨额资金，并有力地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领导、有步骤地公开出售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可以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抑制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还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方面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以上这些改革，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样，都不会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恰恰相反，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游资，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切实抓紧抓好。

三、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

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全党必须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党的领导作用、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每一个基层组织，都应该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全党要有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组织服从党中央。过去，我们依靠这些政治优势，战胜了许多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困难。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充分发挥这些政治优势，从严治党，强调党的作用，强调党的纪律，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为实现这次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近几年来，中央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今后，中央仍将尊重和照顾地方的利益。但是，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必须集中，不得分散和削弱。各地方，各部门，都有责任维护和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模糊，更不允许颠倒。在治理经济环境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全国的经济环境是一个整体。中央财政过不去，全国日子都不好过。货币控制不住，全国市场都会受到冲击。治理环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忍受一定的痛苦，作出必要的牺牲。越是困难，越要同舟共济，不能各顾各，各行其是。更不能做于局部有利而于全局有害的事，搞什么“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了一股攀比之风。真要比，应该比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实绩，这对全局和局部都有利，中央是赞成和支持的。但是，决不能盲目攀比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更不能竞相攀比楼堂馆所、工资福利和涨价收入。这种攀比，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此风不止，中央的决策和宏观的调控就无法贯彻。各级党组织都是党的组成部分，都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执行党中央的号令。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在谈到治理经济环境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要有权威，没有这个保证不行。措施定下来，要坚决执行，宁可从严，不可从轻。就是过分一点，也得这样做。政治局认为，今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于顾全大局、模范地执行中央政令的党员和干部，应该给以支持和表彰；而对那些不顾大局、自行其是、目无组织、违反纪律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要用事实使全党同志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都知道：党的纪律是一定要执行的，决不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政治局相信，我们党的绝大多数领导骨干，都能认清形势，认清自己的责任。能否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决策，这是当前对领导干部党性的最实际的检验和考核。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要紧密结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来进行。最近，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维护改革大局的紧急通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传达，把广大党员动员起来，对刹住提款抢购风起了重大作用。经验再次表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上级党组织抓得紧不紧。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党，绝大多数党员是守纪律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起作用的。重要的是，党组织必须讲清道理，讲清形势，把任务和要求及时地明确地告诉大家。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一定要首先并着重做好党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工作，使他们心中有数，便于他们向群众做工作。在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任务面前，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诚实劳动，增产节约，艰苦奋斗，严守法纪。一切违法的事情，都不能做。一切中央明令禁止的事情，都不能做。如果连这些要求都做不到，就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这也是对共产党员党性的最实际的考验。

总之，当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牢牢掌握两条：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切实保证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胜利；一是通过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的实践，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提高党员的觉悟。

用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群众，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政治优势。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当前，要以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广大群众是拥护改革的。群众中意见最多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物价上涨，二是社会分配不公，三是党政机关中的某些腐败现象。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工作逐步解决的，也是可以说清楚的，应当在形势教育中使大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改革十年的巨大成绩，要如实地向群众讲够。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要明明白白地向群众讲透。克服困难的办法，应当同群众一起商量。要求大家完成的任务，应当向大家交底。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为什么提倡，为什么反对，都要把道理讲清楚。对群众提出的疑问，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一一加以分析和解答。这样的形势教育，是最现实、最受群众欢迎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掌握了真理，大家齐心来干，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要把这次形势教育作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起点，并从此经常坚持下去。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实际，生动，有吸引力，有说服力。要彻底抛弃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形成的脱离实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在党政分开的条件下，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企业、农村、学校、机关，对象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应从各自的特点出发，认真总结经验。这次提请全会审议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就是这种探索在企业范围内的初步总结。思想政治工作，不但宣传工作干部要做，全党都要做。全党干部，全体党员，包括从事全面领导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领导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部分，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出贡献。

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是现阶段党的建设中一个极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从历史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一定阶段，法制、规则和各种秩序尚未确立，政权机关往往难以避免发生各种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应当而且有能力约束自己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奉公守法，为政清廉，从而把各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决不能听其泛滥。十三届二中全会郑重地提出必须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表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严肃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做到为政清廉，就是这样一种考验。我们既要学会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又不要被腐化的漩涡所吞噬。目前，发生在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勒索、倒买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等，是群众最痛恨的。影响所及，已经不只是党员、干部个人的品德问题，而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失掉人心。近几个月来，各级党委、政府已经行动起来，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尽可能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建立各种举报中心，完善有关制度和纪律，查处违法乱纪案件等，都取得

了好的效果。最主要的经验，一是要把廉政工作真正提到领导机关的重要议程上来，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二是要提高办事的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三是要切切实实进行制度建设，使行政管理工作一步一步走上规范化、程序化，使弄权营私者无可乘之隙。各地在廉政方面已经开始的试点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要坚持进行下去，做到办一件，成一件，整一片，治一片。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十三大提出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都迫切要求保持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必须妥善地处理社会矛盾。要总结近年来处理局部性风潮的经验教训，努力扩大基层民主，认真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学会在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解决可能出现的磨擦和冲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为了确保社会稳定，不排除在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力求不出乱子，出一点乱子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必须坚持。我们固有的政治优势，必须继续发扬。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要坚持党政分开，使党组织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好地加强和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要理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使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并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权威。要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之间更加亲密的合作共事关系，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这些根本道理，应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懂得。牢牢掌握这些宗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进展得更加顺利，经济环境的治理、经济秩序的整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也就有了坚强的保证。

关于形势教育问题*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前一个时期，全军结合传达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普遍进行了一次形势教育，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从部队反映看，还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形势教育还需要持续地进行下去。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并不是一次教育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例如，前一个时期，由于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某些腐败现象，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而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治理整顿贯彻下去，又出现了新的认识问题。所以要不断地进行形势教育。不仅军队，在全国都要认真地进行形势教育。但是，很多地方和单位还没有真正把形势教育抓起来，因此迫切需要引起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不断总结经验，真正抓出成效来。

开展形势教育，实质上是要结合当前实际，对干部战士进行关于改革开放这一总方针、总政策的再教育。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十三大提出来的。这不是一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总的方针、总的政策。形势教育，实质上就是进行十三大确定的路线的再教育。

形势教育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革十年来，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的？要使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十年改革的成绩，增强对改革的信心。过去有一种说法：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这个话也对。但是现在看来，不重视把成绩讲清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的形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摘要。

势，涉及到对改革开放这一总方针、总政策的看法，更不能不把成绩讲清楚。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成绩，人们就看不到光明，得不到鼓舞，也就不能增强信心和凝聚力。现在，存在着一个凝聚力的问题。如果一天到晚总是渲染阴暗面，散布灰色情绪，人心就涣散了，本身就会成为极大的不安定因素，这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有些同志总有一股子情绪，只愿意讲阴暗面，不愿讲光明面。这样搞，即使动机是好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现在看来，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社会就一定越来越安定。有一些国家，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生活也不错，但国家非常不安定。这种事例，在国际上并不鲜见。就我们国家而言，如果不加强领导，不通过教育引导人们认清成绩，看到光明，那么，也可能经济越发展，生活越改善，民主越扩大，人们的不满和牢骚反而越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说，经济的发展常常并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意和社会的安定。当然，经济情况好，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但是，如果其它方面做得不好，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形势教育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必要的。

形势教育还必须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性质，认清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出现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这些问题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的。无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还是党政机关的一些不廉洁现象，还是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单就这些问题本身而言，都是消极的，都是坏事，有些甚是在我们国家早已消除了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但是，我们还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它们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借着新旧体制交替之间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而产生的，它们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消失或减少、减弱。尤其应当看到，与这些问题同时存在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是各个领域生机勃勃的发展，是诞生中的新体制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同衰败中的问题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衰败中的问题是不可克服的，不可救药的；而我们面临的这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正在克服中。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这些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进行大量的工作。现在看来，很多问题是在破除旧秩序中间，新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建立新的秩序。

总之，经过形势教育，要使干部战士认清我们的改革既有成绩也有问题，比较而言，成绩是主要的；其次，认清我们的问题，其性质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不致于对改革开放发生动摇，从而使干部战士增强对改革的理解、信心和支持。

这次形势教育，还应当引导干部战士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使他们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学会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分析的观点看形势。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例如，我们面前的制度、体制、经济技术条件以至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建设，不可能脱离客观条件，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那么完美，那么合乎理想。改革是我们的希望，改革的成功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同时又必须认识到，改革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改革需要探索，不可能一帆风顺，困难和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大家对改革的困难越理解，越能同心同德地去承受它、克服它，我们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渡过困难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这里关键是引导大家摆正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改革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但生产的发展只能是逐步的，人们也不可能同时获得同等的利益。在某个时候，有些人甚至暂时失去一些利益。这就要求人们自觉地以个人眼前利益服从整体长远利益。在形势教育中，要入情入理地向干部战士讲清这些道理，以增强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这样深刻的一场改革，人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比较差。可以看出，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比较低，固然与改革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不够。现在较为普遍的是人们对这场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对在改革中间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甚至会出现某些痛苦和利益变动，思想准备不足。而另一方面，对改革可能带给每个人的实惠，期望值又过高。所谓实惠，就是立竿见影的利益。现在，对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这场改革，不少同志认识不那么清楚。改革当然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但我们中国所以要进行这样一场改革，最主要的还不在于马上会给人们提

供多少实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发展、进步是比较快的。社会主义一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吸引力。在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还是这样，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很多优越性。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显得社会主义原来的那种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束缚。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改革，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不改革，就无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竞赛中将会掉在后边。根本的问题，还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那么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旧模式的问题。不要把社会主义的某种模式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为一谈。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要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理解改革，不能只从眼前实惠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场改革。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他们现在的结论，都不是要停止改革，更不是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进一步进行更大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我曾同外国人讲过，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不改革，将来也得改革，越改在后面越落后，总是要改的。原来的模式将会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准备，就会认识到这场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不会因出现某些困难而犹豫，坚定性和承受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在形势教育中，要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十三大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我们要结合形势教育，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商品经济的观点深入人心。用这些理论武器去观察分析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建设。

总之，无论是军队，还是全国，形势教育都要注意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改革的成绩与问题，特别是问题的性质；二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观察形势；三是提高对改革的认识，解决干部群众对改革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四是要用十三大的理论来武装头脑。

肃贪工作必须有制度有机构*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城市管理分工过细，部门很多，各管一套，遇到问题就会互相推诿。香港警察管的事比较多。人家怎么管的，要考察考察。城市管理，部门过多，不便监督。谁来管，怎么管，要好好研究。

执法人员要有手段，又要受监督。老百姓和执法部门发生争执，要有地方仲裁，民可以告官。要使受害者有申诉的地方和部门。

商人有钱无权，执法部门有权无钱，因此就发生权钱交易，拿权去换钱，政府就贪污受贿，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过去搞产品经济，一是分配上平均主义，二是高度集中，所以就不产生这些问题。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腐败现象容易产生，所以必须相应地有一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迫切需要解决反贪污受贿问题。要有反贪污受贿的机构，要有一批专家和特殊手段。趁中国贪污受贿分子经验不多时赶快搞。廉政也好，肃贪也好，如果没有有力措施和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设立了举报中心，如果搞不出案子，一年以后就没有人相信了。不搞则已，要搞一开始就要把信誉建立起来。举报中心要真正起作用。

监察部门要抓反贪污受贿。如果别的事没办好，这件事干好了，也是好成绩；如果什么事都干一点，这件事干不好，就是不及格。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我们过去搞运动，几年一次。现在环境变了，运动不搞了，保持廉洁必须有制度、有机构。光有制度没有机构也不行。公开办事制度开始很新鲜，但制度公开后，有的人不照办，又没有机构去监督，群众就没有信心了。不靠群众运动靠制度，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机构。

当然你们东城还是按你们设想的去搞，我今天讲的不是一下就能办到的。

总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肃贪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保持廉洁。如果繁荣而不能保持廉洁，最后繁荣也保持不住。当然也不能只要廉洁而不要繁荣，那又是走老路，也维持不下去。

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经济繁荣，又要廉洁。同贪污受贿作斗争，必须赋予反贪污受贿的机构很大的权力。监察部和检察院之间要协调好。纪委、审计署、检察院、监察部四个部门要协同动作，集中力量同贪污受贿作斗争。

你们说的两大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

物资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 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办法*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

一、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问题大、弊病多，原来想取消它，现在看不可行。对此要看远些。许多初级产品，较长时期还会供不应求，完全放开将要年年涨价，有些产品可能会涨得没边，甚至要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不取消“双轨制”，这就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双轨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管理，如何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要下大力气来研究。物资部门是个集中受腐蚀的对象，你们要有一套反腐蚀的办法，要做出明确的规定，譬如：干部的亲戚朋友、老领导、老同事介绍来要办的事，不予受理，一律按正式手续办。办法制定后，要在报上公布，要贴在办公室里，增加透明度。这样你们也就好办了。同时，还要有单位监督你们，内部也要有监督办法。

二、要研究如何改善供给的问题，不能仅仅理解为增产一般适销对路的产品。日本有人向我们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基础工业建设，包括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这个意见是对的。即要制定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缺这个。同时，在税收、信贷、物资供应等方面，也要相应跟上去。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

我很高兴能够见到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们。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召开了第八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全球性的企业家的盛会，我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今天见面，看来还要回答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我想到的是：我们现在治理经济环境对改革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改革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十年来我经常向朋友们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朋友们对改革、开放政策问题有疑虑。自从我担任总理后，已经经历好多次了。一九八一年，在我担任总理的第二年，经济出现了问题，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那次调整比较大。例如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很多设备，那时不得不封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搞那么多项目。当时在国际上就引起了很大疑虑。特别是日本朋友，他们以为我们要撕毁合同，但后来他们都看到经济调整的负担全部由中国承担了。例如宝钢合同经解释后，对方还是同意延期了。我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合作。那次虽然调整很大，但外国朋友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次调整也比较大。当时中国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一月，我正在美国访问，差不多每次招待会或宴会上，美国朋友都提出这个问题。那时有许多传说，说中国反对精神污染，妇女不能涂口红、戴耳环。

* 这是赵紫阳在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代表团时的谈话。

我告诉他们，不会有这种事，你们可以亲自到北京看一看嘛。大街上妇女涂口红、戴耳环的有的是。当然后来他们的疑虑打消了。

还有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前年底、去年初，中央人事变动。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引起了怀疑，国内也有很多人怀疑。他们认为胡耀邦总书记是主张改革的，他不当总书记了，就标志着改革的政策变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中央领导与外国朋友见面，总是要做解释。

以上是我记得的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可能还不止这些。对于国外的朋友经常产生“中国的改革政策会不会坚持下去”的问题，我们很理解。因为十年以前，中国确实有问题，发生过突然的变化，容易使人产生疑虑。

我叙述这一段历史，也是为了告诉朋友们，改革开放是我们确定的长期方针。我们把它叫做总方针、总政策，不是具体的方针、政策。它管的时间很长。我们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如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算起，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方针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奉行的政策。这个总方针、总政策决不会因为暂时的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变动。一个国家政治上、经济上在一个时期有所变动，是经常发生的。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变动。在座朋友的国家很多都是多党制。竞选总统，每四、五年就要变动一次。在座美国朋友不少吧，再有六天美国就要换总统了。所以在你们的国家，内阁改组是经常发生的，经济上的变动也是经常发生的，利息有时高，有时低。我相信这种变动不会影响你们国家总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过去十年是这样，今后也还会这样。我是以十年的历史、经济发展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今年我们提出明后两年主要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个问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¹同志已经做了详细介绍，我就不想多占用时间了。简单地说，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短短的十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座的，过去来过中国的朋友们也像我们一样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确实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但不是严重的问题。请注意我没有用严重这个词，我用的是“明显”，在经济学中大概没有这个词。我为什么要用“明显”呢？因为中国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些问题与国际上

其它国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通货膨胀不过是17-18%，现在是15-16%，到年底可能会达到16%多点。巴西总统访华时，我向他请教过，为什么我们的物价指数上涨16%就承受不了，而你们的通货膨胀率是200%，你们还不觉得什么？总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说，你们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我们国家努力的目标。所以国家与国家的情况确实不同，中国人有储蓄的习惯，银行有大量存款，物价上涨后，储蓄大量下降，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现在虽然还不能叫严重，但是要认真治理。

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过热。北到松花江，南到云南，东到上海，西到甘肃、新疆，到处大兴土木，百废俱兴，这样的大规模建设，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另外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从前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今年大体上也会达到这个数字。这样的速度和建设规模带来了需求过旺。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膨胀，但都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那时的物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所有的产品都是统一定价的，所以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表现为有钱买不到东西，大量的建设工地停工待料，人们买东西排长队，但物价是稳定的。现在不同了，虽然物价是比过去高了，但有钱就可以买到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压缩。我曾讲过，这是旧体制的弊病在新经济情况下的反映。进一步放开物价，这是我们的目标。经济改革就是要放开物价，靠市场调节。如果通货膨胀不能制止，放开物价就困难。所以要治理经济环境。压缩经济膨胀的目的还是为了放开物价。我们虽然改革十年了，但旧体制还在起作用，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还不能真正自负盈亏。现在治理通货膨胀，一是靠继续深入改革，一是治理经济环境，这两点正是为了进行全面经济改革做准备，这是物价放开的基础。

中国不存在走回头路的问题，中国走回头路没有条件，也没有群众基础，当然中央领导更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国家不改革没有希望。十年改革证明，改革能使经济得到发展。在十年改革取得这么大成绩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走回头路呢？不可能！治理经济会不会影响改革的政策呢？从长远观点讲，中国采取的措施不会影响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恰恰是为了与国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当然从具体年度来讲，哪一年步子迈得大一些，哪一年步子小一些，贸易规模小一点，各有不同。比如

说这两年要缩小建设规模，引进先进设备和资金可能受发展速度的影响。但已签定的对外合作合同一定会切实履行。增加一些新项目，如引进外资，先进设备还是有可能的，还会继续签一些合同。这里我要说一点，中国很欢迎外商来华办独资企业，因为现在中国资金困难，要收缩，但独资不影响收缩。还有，能不能发展另外形式的合资？在中国原有企业基础上发展合资，以中国的厂矿设备作为投资，国外增加股份，我们可以提高技术，好处是不需要增加更多的资金，周期短，见效快。北京有一个中美合资的吉普车厂，效果很好。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原有的树上嫁接外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中国有很多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我想也可以成为合资企业的形式。总的来看，所采取的措施，丝毫不影响对外合作。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项目不搞那么多，不是由于政策改变，而是由于我们存在着实际困难，中国没有那么多资金。顺便说一下，今年春天，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时间不长，但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沿海发展战略也会继续下去，不会改变。要利用沿海地带逐渐发展，将经济逐步推向国际市场。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不仅有利于沿海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内地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不仅对中国发展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利，首先是对亚太地区发展可以助一臂之力。

谢谢大家。

注释

1. 高尚全(1929-)，上海嘉定人。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国家体改委副局长、局长、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农业发展关键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形势，要有个正确的分析。总的说，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应当盲目悲观。悲观没有根据，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因素，要认真对待，积极解决；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许多有利条件。不但整个农业的开发潜力很大，就是粮食生产同样也有很大的潜力。从开发性农业讲，我们还有很多资源，这是没有异议的。就从粮食生产来讲，虽然耕地少，但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提高单产还是有潜力的。今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不要说更多，只要每年提高2%，到本世纪末就能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而每年增长2%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今后农业的发展关键要靠政策调动积极性，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以及靠增加投入。主要靠这三条。

一、靠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总的是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家庭承包制、家庭经营形式，需要在稳定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充实、发展。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项目，承包和经营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因地制宜，不拘一格，顺乎自然，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优选，只要有利于生产，当地群众又欢迎，这种形式就可以发展。城市郊区和沿海地区土地规模经营问题，有条件的可以搞，只做不说，不登报宣传，没有条件的不要勉强。在农副产品流通中，要重点抓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订购粮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取消，但要采取多种方式使种粮的人有利可图。完全放开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没有条件，只靠行政命令也不能持久，所以粮价还要逐步调整。如果粮食同生产资料挂钩是个好办法，可以逐年增加挂钩数量。总之，农民要有义务观念，国家要注意照顾种粮农民的利益，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二、农业生产下一步的突破点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农业科技要大力开发新成果。可以推广的现有成果也不少。总之，在发展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需要下大气力。

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靠增加投入。要采取措施增加化肥、农膜、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近年内要保证化肥的进口。安排经济发展计划，必须考虑加强支农工业，尤其是化肥工业。在一些老产粮区，只要合理改变一下化肥结构，由单纯使用氮肥改为多用复合肥，粮食生产就可以再上个台阶，大量增产。山区、高寒地区，如果能广泛使用薄膜，单产也会明显提高。从长远看，把农业的基础建设和农用工业搞上去，对农业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坚持做好，扎扎实实地抓下去。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切实际的要求，对工作也不要进行不切实际的责备。不能指望什么人突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能搞到全国粮食多得放不下。不会有那种奇迹。但是，靠上面讲的那样一些政策逐步地搞，我国农业还是可以稳定增产的。至于将来，到下个世纪，15亿人口会怎么样，这些更长远的事，可以议，学术界也可以讨论。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都在进步，人类的事情总会有办法，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可以从长计议。

明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抓好明年的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实施党中央、国务院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部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各地区、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做好工作，争取来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我们有这个条件。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已连续四年粮食产量基本没有什么前进。明年不是在大丰收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丰收，而是在连年徘徊的基础上提高，这应当比较容易。只要我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包括把教育农民的工作搞好，争取明年有个好收成是可能的，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在会见世界银行副行长 兼首席经济学家菲雪¹时的谈话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很高兴会见副行长先生。我们和世行之间多年的合作不错,合作项目也很有成果。世行对中国经济的几次调查研究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次听说你来参加一个高级宏观经济管理研讨会,我们对此很有兴趣。现在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很想听听副行长先生的见解。

菲雪(以下简称菲):非常感谢你,总书记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在此见到你是我的很大荣幸。我过去长期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当你们一九八七年决定走新的路子后。如你所知,世行认为过去八年与中国的合作是世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科纳布尔²行长请我转达向你的问候。他也请我告诉你,世行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重要,而且很有意义。世行认为,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报告是世行形成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文件。我们正在准备的这个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控制通货膨胀问题。这将在这次的研讨会上讨论。

赵:我们之间有13个专题研究的合作,又有25个专题研究,这是其中的一个吗?

菲:这是25个专题之一。关于通货膨胀,短期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几个月前决定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定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正确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碰到通货膨胀问题,有的国家决定在通货膨胀达到20%之前就加以解决;有的国家则设法伴随着通货膨胀前进。巴西就是后者的例子。开始几年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巴西遇到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很难治理。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要平衡发展速度和

通货膨胀这一困难问题。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个长期的任务，不是能一劳永逸的事情。中国现在决定在放权的同时加强经济管理是正确的。控制总需求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会在放开部分价格时不引起通货膨胀。如果能在需求和供应之间保持大致平衡，放开一部分价格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是小的。反之，如果放开价格的时候，总需求仍然增大，这就会引起较大的通货膨胀问题。除此之外，并没有理由说明改革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中国近二、三年中所面临的短期问题和五、六年后可能碰到的中期问题是不同的。短期内一般难有有效的宏观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看来投资过猛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只有通过控制投资这一手段才能制止通货膨胀。但同时，要逐渐建立起货币和财政控制的手段和机制，从而避免使用直接控制手段。就货币控制而言，从这几天的会谈和我们世行的研究表明，你们只要严格执行现行的办法就会生效的。但要防止省一级当局通过各种途径超过原来的信贷指标。我读过你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这是个十分重要和正确的报告，思路深刻，重心对头。两年之后，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金融市场来控制通货膨胀，特别是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和全国货币、债券和股票市场。一旦做到这一点，就可在中央控制货币发行量，从而影响利率和投资。要在解决通货膨胀的同时发展金融市场。在其它国家，宏观管理的另一手段是财政政策。由于改革放权，地方政府的权限和自主权大了，这给中央执行财政政策造成了困难。现在的体系中，税率和税收额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谈判来决定的，这给每年的中央财政平衡造成困难。当然原来下放财权是有理由的，今后几年有必要适当收回已下放的一些财权。在省一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需要有很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预算赤字是造成货币发行过多的原因之一，现在省当局有可能通过其它途径找到信贷，这给人民银行造成压力。概而言之，宏观经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是货币政策，这是和信贷控制紧密联系的，此外还有财政政策。在中期，有必要对这两大政策体系进行调整。

赵：我们财政还有个问题，中国地域非常大，如果在税收上地方政府持不关心的态度，我们的税就收不上来。当然可以采取分税制，把难以征收的税种划给地方。但作为中央主要收入的那些税种，如地方完全不关心的话，不知是否产生影响，我们现在还无把握。这就是为什么财政税收政

策演变为中央和地方的包干制度。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有很大影响。

菲：就中央和地方的分税政策，正如赵总书记所表明的，许多国家的税收体系就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各级政府征收不同的税种。以美国为例，房产税、销售税是地方税，所得税是联邦税。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就分成而言，即使地方遵守规定，大多数的税收还是留给地方。现行体系是否为最好的办法，仍待研究。短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就长期而言，政府对向哪个方向发展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将取决于中央和地方讨论的结果。

赵：关于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遇到这么个问题，中国由于长期的价格扭曲，价格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物价相当大幅度的上涨。这种供小于求的问题是我们多年实行产品经济积累下来的。物价放开，需求大于供给是否能得到控制，不仅取决于当年的供求状况，还取决于多年形成的供需矛盾。这表现在人们中间有大量的储蓄存款。物价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物价上涨，这就有一个储蓄利率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实际利率是负数，因此今年储蓄增长下降，这也是今年货币发行过多的原因之一。我们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大概是这样的，货币发行，一部分通过商品回笼资金，另外一部分通过银行储蓄收回。居民储蓄相当大，如果这一部分发生了问题，那对通货膨胀就会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储蓄利率，但同时又要相应提高贷款利率，这又会推动企业成本上升。解决办法，除采取压缩总需求，压缩投资和基建，降低发展速度的传统办法之外，还有储蓄利率和贷款利率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解决的问题，现在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不一致。

菲：如赵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价格放开本身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是在需求过度时才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二、三年里要严格控制总需求。如能做到这点，放开价格并不会造成过高的通货膨胀。在这方面，对你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析，有一点我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关于价格放开这个问题。你在报告中提到先放开长线产品，然后放开短线产品，这样你先解决容易的问题，而把困难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最好是既放开长线产品，又放开部分短线产品，从而使两者得到平衡。其它国家有过这

样做的成功例子。关于储蓄问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手头持有大量的货币等待购买商品。重要的是创造人们可以拥有其它资产的机会。某种程度上，这可通过提高储蓄利率来实现。出售住房的建议是解决人们手头储蓄过多的一个好主意。因为在许多国家人们储蓄的大部分用于购房，如有这一可能的话，就可稳定住储蓄。提高贷款利率，肯定会造成成本上升。但你不得不面临这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个银行体系内存贷利率倒挂是不可行的。如果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很高，几年下来，政府就得提供补贴，这本身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因此，要适当提高利率，开始略为提高一点，最终几年达到3-4%的实际利率。各国在对付通货膨胀时有这么一种倾向，短期中对产品提供补贴，但这使长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难。

赵：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还有其特殊性。西方有一些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如提高利率就很有效。我国除需求大于供给造成通货膨胀外，还有因为长期的产品经济体制正在向商品经济转换中的情况。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收紧银根，利率上升，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但如果有了竞争的制约，企业就不敢随便提价。但中国没有竞争，因为企业改革不深入，没有竞争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确定了一个方针，即物价上涨必须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可以承受的水平。我想，如果物价上涨不超过两位数，即低于10%，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尽管物价每年上涨，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但如果银行储蓄利率能大致保持在10%左右，居民的银行储蓄就能得到稳定。中国人有储蓄的长期习惯，别说3-4%的实际利率，只要有1%的实际利率就可以了。如果维持1-2%的实际利率的话，企业的信贷就比较容易解决，这就不致于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带来我们现在还不能承受的社会问题。这对成本推进造成的通货膨胀也会有限制，充其量不过是1-2%。这能使我们赢得时间。我们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第一，住房私有化；第二，小企业拍卖。我们国家公有房产价值可能有几千亿，是相当大的一批国有财产。如能卖出500亿，就能解决不少问题。还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可进行私有化。至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可搞部分股份化。这样就可收回人们手中的节余购买力，使之分流，从而减少市场压力。但住房私有化和小企业拍卖短期内不能产生太大的效应。因为中国人没有买房子的概念，不买房子也可以有房子住，为什么要买呢？因此要提高

房租，这又要相应增加工资，但在现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提高工资，人们不一定马上去买房。实现住房私有化是可能的，但这是个渐进过程，需要多方配合。在这些措施发生较大的效应之前，如果过早或过多地放开物价，带来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压缩基本建设总规模，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储蓄的原因，创造条件，为着手研究上面提到的改革措施做准备。而这些，没有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治理通货膨胀既要采取其它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又要和新旧体制转换这一特点结合起来，否则许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一些外国朋友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的政府可以说很穷，也可以说很富。中国政府除拥有大量的公房和企业外，还有大量的地产，从中可以回笼资金，但要做大量的配套工作，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而这在一、两年内是收不到效果的。今年开始卖公房了，总的来说，出售的房子很少，回收的资金也只有几亿元。

菲：利率推动企业成本的问题，我认为，对企业来说这个因素往往会被夸大。利率提高对企业的成本上升造成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但不会造成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利率每提高1%，总的来说，企业成本的上升远低于1%。就你提到的关于企业需花多少时间才能吸收利率变化带来的影响一事，我认为，这取决于企业根本性改革的深入进行，取决于谁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国际经验同你刚才所说的是一致的。如果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0%的话，局面就不会失去控制。另外，关于继续推进价格改革或是等一等，我认为一方面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总需求，从而减少总需求压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放开价格，其原因是，你刚才谈到的问题有许多是由于价格控制的结果。你不能进行企业改革的原因，是由于不能让它们承担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因为它们现在没有权力定价。这样拖延了价格改革，从而使以后的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我们的分析中尚看不出储蓄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有必要出售公房，回笼货币。人们需要确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用储蓄来交换其它资产。新旧体制转换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困难的。关键的是要冲过这一过渡阶段，而不能等待，否则又不得不再次面临过渡阶段。

赵：我们现在国内对价格改革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价格改革时间不

宜太长。如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夜之间从统制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帝国马克迅速贬值，从而刺激了生产、改善了供应。我们曾有个方案，估计放开价格之后，市场物价上涨一倍，其好处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物价猛涨以后每年上涨2-3%。但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我们很无把握，所以不敢采取这一方案。另一种主张是不断地调整物价，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也是长期的。总的说来，在控制物价的同时进行价格改革，使每年的物价水平上升不多，即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0%。价格改革的步骤大小服从于价格指数，如果价格工作做得较好，物价改革进展就快一些，反之亦然。一边控制物价，一边进行物价改革，使物价上升总幅度低于10%，同时进行全面配套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后两年价格改革要放慢，因为明年要使通货膨胀率降到10%以下的难度极大。听说，世界银行有个预测，认为明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4%以下的难度很大，我赞同世界银行的预测。明年物价不可能下降太多，后年情况会好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后两年物价改革的步子要放慢，我们不想走得太快，主要是人们手头尚有大量储蓄。如果通货膨胀高于20%，银行的储蓄利息达到23%，所带来的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两种考虑中，我们基本上选择了后一种。不知副行长先生和其他世行朋友的意见如何。

菲：关于这两种意见，我想起你最近见了弗里德曼，他肯定建议你采取第一种意见。但德国一九四八年的情况和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当时，西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只要理顺了价格，生产就可迅速搞上去。

赵：我在此还想补充一点，从统制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西德和日本成功的例子。但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处于军事占领之下。看来，军事占领下的人民忍受力可能强些。如果政策确实好，人们不接受也只好接受。

菲：当时的西德财长是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经济改革搞好，这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所以经济改革要放慢，但要保持合适的速度，不能太慢。当决定放开价格的程度时，重要的是知道最终的上涨幅度。只要商品生产能增加的话，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减少。如果同时紧缩货币和财政的话，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现在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在你的分析中，你认为人们手头的储蓄是极其重要的，这取决于你们所采取的其它政策和利率政策，后者决定人们是否会把钱存在银行。在采取紧缩

性政策的同时渐渐放开一些价格的效果会比只执行紧缩政策要好，后者只会使问题在两年以后变得更大，扭曲更为严重。

赵：副行长刚才说的这些看法，我们将认真考虑。你同我们有关各个部门见面时，可更多地了解情况，也可和他们交换意见。

菲：谢谢！作为结束语，请允许我谢谢总书记抽出时间见我。我再次向你保证，世行非常珍惜与中国的关系和有机会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我重申一下我的主要意见，在旧新体制转换过程中，建立起能够控制总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机制是很重要的。

赵：我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跟你交换一下意见。我们物价改革的总方向已经定了。这是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要放开，即实行市场调节。但是有这么个问题，是一下全部放开呢？还是有一些产品先进行调价，后放开。美国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莱因³教授。最近我看到一个他的谈话材料。他的基本论点是：有一些紧俏商品、短缺严重的商品，也可先调价，后放开。还有一位原来的苏联经济学家，现在住在美国，叫里昂梯夫⁴。据说他现在受苏联的委托，帮助苏联搞价格改革方案。我听说他也主张先调价后放开。好像还有这么个主张，先搞批发价，尔后解决零售价。大量的一般商品看来还是放开比较好，有的商品品种多、市场千变万化，完全靠调价有困难。但重要的品种单一的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可以先调价，等条件具备时再放开，如钢铁、煤炭等，还包括一些有色金属。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虽然我们对外开放，但我们外汇紧张，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有一些建设周期长的产品，如钢铁，如价格放开，价格会上升得很高，但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能很快地发挥，造成某些产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会把整个物价水平抬到不适当的高水平。不知副行长先生有何看法？

菲：我认为供需均衡相差很大的重要产品恐怕还是先调价，然后才放开比较好。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品。调整一种相对价格之后，重要的是理顺这一调价对总物价水平的影响。但如煤炭提价会对生产有刺激作用，这有助于遏制物价上升。我想你提到外汇紧张时，肯定想到利用进口短缺产品来制止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一事。可能的时候，可通过适当进口来调剂国内短缺，作为稳定经济的一种手段。

赵：我们现在好多了，可通过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短缺。过去我们要从

最短产品的平衡做起，从而使其它产品不能平衡。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进口一部分平衡国内供需状况。如木材只依靠国内供应的话，我们什么建设也搞不了，现在，我们可以进口木材，而过去我们只好在国内资源上进行平衡。因我听说副行长先生是经济学家，对治理通货膨胀很有研究，所以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都是涉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关于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我没说许多的话，丝毫不是说我对合作不太重视。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合作。我认为我们合作得很好。今后我还会像过去那么重视。我很感谢世行几任行长、副行长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感谢你们在北京的代表林重庚先生，我同他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希望副行长先生回去后转达我向行长先生的问候。

菲：非常感谢你。我将一定把你的问候带回去，让我再次代表我的同事对你给我们这一珍贵的会谈机会表示感谢。

赵：我感到我们的交谈很有意思。你今天讲的意见很好，也很重要，我很重视。

菲：非常感谢。

赵：再见。

注释

1. 菲雪(Stanley Fischer, 194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美国联邦储备局副主席。1988年至1990年, 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 科纳布尔(Barber Benjamin Conable, Jr., 1922-2003), 美国纽约州人。军人出身, 曾任美国国会众议员, 财经服务规律委员会主席, 1986年起任世界银行行长。

3. 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 1920-2013),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计量经济学家。1980年因其建立的不同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 里昂梯夫(Wassily Wassilyevich Leontief, 1905-1999), 俄裔美籍经济学家。曾来华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 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1973年因其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个方针要通过这次会议具体贯彻落实。

今天是党中央请同志们来座谈。我想着重讲的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定要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就这个问题，讲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措施要坚决贯彻实行。全国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听到的反映，除了赞成、拥护以外，主要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怕贯彻不下去，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走过场。目前，这种担心是主要的，反映也比较多。第二个担心是怕控制过头或者方法不当，使经济萎缩，造成“滞胀”。估计今后几个月内，这种担心可能增加。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强调下定决心，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防止遇到困难就动摇以至使治理和整顿半途而废，走过场。这是各级领导者在思想上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对出现的新问题及时研究，采取对策。在治理、整顿中，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并且真正做好了，第二种担心，即出现“滞胀”的危险，就可以消除。

* 这是赵紫阳在出席全国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部分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坚定不移。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全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能够迅速见效的最重大的措施。这个措施的消极影响也比较小。但是，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来说，确实有个痛下决心、忍痛割爱的问题。如果大家不下这个决心，全局的困难就不能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如果压不下来，即使其他工作做了一些，也很难对全局有大的影响。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要求地方和部门准备作出一些牺牲，首先就是指的这个问题。现在不要怕压得过甚，而是要防止决心不足。如果压得不够，就可能把整顿的时间拉长，使通货膨胀继续加剧。

这次压缩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要把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调整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过去多次搞调整，在政策和措施上没有很好地把压缩同调整相结合，因此，经过一次压缩、下马之后，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善，过一个时期，在旧的结构基础上又会出现新的“过热”。当然，把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难度相当大。计划综合部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手段也很不够。但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之后，中央、国务院和各地还需要下功夫研究这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二是不仅要压缩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而且一定要研究和制订控制计划外、预算外投资的措施和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找到控制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有效措施和手段。近几年计划内的投资，按实物量讲，并未增加，而是在减少。不断膨胀的恰恰是预算外的基本建设投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有效地压缩预算外的基建投资，那我们的治理和整顿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计划内投资压缩过度，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计划外、预算外的投资压不下去，整个投资规模就会继续膨胀。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找到控制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计委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必须覆盖全社会。如果只能控制指令性部分，指令性以外的根本没有办法调控，那么计划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当然，必须注意到指令性计划和非指令性计划是不一样的，不可能用改革前的老办法全部统起来；但是，必须能够对基建总规模和产

业结构进行有效的控制。找出能覆盖全社会的办法，研究用不同的办法来控制指令性部分和非指令性部分，这是计划改革的一个大课题。

三是在这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中，要制订一套不让老实人吃亏的办法。不能形成哪里积极压的就压了，不压的也没有事。决不能让那些不认真执行政策的地方和单位占任何便宜。

第三，紧缩信贷同稳定储蓄要结合起来。如果单靠控制信贷规模，不重视稳定储蓄，治理通货膨胀就难以成功。在我们国家，能够大容量地吸收人们手中货币的手段是储蓄。

为了稳定储蓄，看来提高储蓄利率势在必行。存款利率提高后，就要相应地提高贷款的利率。也可以考虑贷款利率分步提高，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别利率。

如何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是一门学问，必须重视。这也是有通货膨胀的国家或地区普遍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不大懂得这一点。今年夏季，我们就吃了亏。当时只是在内部研究物价改革，却通过报纸大讲放开物价，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极大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就是人们对今后物价将要上涨的一种估计。人们的心理预期过高，就必然引起对市场、对储蓄的不正常的冲击，造成很大的混乱。许多国家就如何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却很不注意。今后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小心，要研究怎么做才有利于减缓人们的心理预期。前几个月发生的提款抢购风，一方面有我们去年物价指数上涨过高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们人为地提高了群众的心理预期，宣传不当，给人们造成一种全国物价很快就要普遍大幅度上涨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原来以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人们都赞成的，物价上涨后，只要使人们的收入相应增加，保证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问题就不大。但没有充分估计到，一旦引起人们对物价上涨的过高心理预期，就会产生一系列盲目的冲击。抢购商品，挤提存款，一下子就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本来充足的商品，一抢购就不能正常供应了。本来能够正常周转的资金，储蓄一不稳，也就紧张了，逼着你多发票子。这样，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今后从中央到地方，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和做宣传工作的同志，都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回笼货币要采取多种手段。除了千方百计增加有效供给以外，还应当通过住房商品化、出售小型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办法，来使一部分购买力转化和分流。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从当前来讲，只有把储蓄稳住，大力吸收存款，才能为治理通货膨胀赢得时间。

第四，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有效供给。我们既要把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降下来，同时又必须把有效供给搞上去。有效供给，首先是粮食和副食品，再就是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纺织产品、出口创汇产品、对回笼货币有重要作用的产品，当然还有人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的能源以及某些重要原材料。需要开个单子，然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这实质上也就是生产结构的调整。要明确哪些生产要降，哪些生产要保，对于最必需的要确保，要根据生产的条件和能力来排队。产品排队之后，还要挑选企业。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有的效益好，有的效益差；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有的消耗大，有的消耗小。所以，商品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企业结构的调整，有的要保，有的要压。在调整中降低速度是不可怕的。应当把不必要、不急需的基本建设，以及长线的、不适销的产品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所占用的原材料、资金、能源、运力，转到能增加有效供给的生产上来。只要认真组织好，落实好，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关键是要在调整上做文章。如果一说压都压，一说保都保，或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能源、原材料不够就大家分，那样问题就很难解决。当然，全国怎么排队，怎么保，会不一样。调整工作不是两三个月就能够见大效果的，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去做。

第五，寻找有效办法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过快增长。不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过快增长，就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现在，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手段还不多，不够有效。迫在眉睫的是要找到能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有效办法。国外的办法也可以研究，看哪些适合我们的情况。要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存款或债券。现在不少地方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总的反映还好，但不够完善。效益提高了他就挂，降低了他就不挂，奖金能升不能降。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要下功夫去完善这个挂钩的办法，这比较现实。有的地方实行整个城市的效益挂钩，这也可以试验。

另外，要加强对企业账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企业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很多是靠账外资金支付的，因而形成失控。加强对企业账外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属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范围内的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或临时措施。国家一方面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必须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包括账内的和账外的，都要纳入国家监督的范围。许多国家对此都有些办法。当然，也不是一讲管就能完全管得住，完全管得好，但是我们必须着手来加强管理。至少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可以把这个工作先抓起来。

关于分配不公，这个问题虽然从我们整个社会来讲，现在还不很严重，高收入的人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看来这确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它影响到改革的承受能力，助长了人们的不满。现在人们之所以一方面增加了收入，一方面还有很多牢骚和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分配不公。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找到调节的办法。

允许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和发展，是既定政策，必须坚持，但同时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监督。对违法经营、非法牟利的要取缔。要坚决同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作斗争。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这方面税收不多，是零星的，而且难管，各地往往不认真去收。应当强调，各级都不能只从经济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哪个地方对这项工作放任不管，就会增加那个地方人们的不满。加强管理和监督并不是政策的改变，而是改革中应该完善和配套的内容，也是属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问题。

第六，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要保教育，这要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定下来。对教育不仅不压，还要加强。我们正要着手进一步解决教育问题的时候，恰恰碰上这次调整。如不注意，很可能也压到教育头上。所以，必须特别强调一下，各级都要引起注意。

第七，在治理和整顿中要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同过去历次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减少我们治理、整顿中间的困难。我认为这方面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我建议组织一个专门小组去研究，提出方案。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和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有些事情可能同我们国内的治理、整顿有矛盾，但是，

很多方面是没有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避免互相矛盾而使之互相促进的办法，就是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这包括发展以进养出、三来一补。另外，在引进外资方面，要多利用国内老企业“嫁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吸引外商兴办独资企业等。靠国内劳动力和技术来创汇的，要积极搞。在治理、整顿中发展这些方面，也属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沿海地区，认真搞好这种调整，进一步实行沿海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既不会妨害治理和整顿，又有利于防止生产萎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第八，继续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的改革。企业改革不能放松，步子不能放慢。当前主要还是进一步完善承包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改革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深化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治理、整顿中研究并建立符合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的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经过多年的改革，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济形式发展了，商品经济发展了，企业有了自主权，整个经济搞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宏观管理显得更为重要。但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工作显得薄弱。研究改革，应当很注意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有人不是提出要防止旧体制复归吗？要防止旧体制复归，就必须去寻找并建立新的宏观调控手段、新的宏观调控方式。由于我们还处在新旧机制转变时期，治理、整顿所采取的办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属于建立新的调控方式，加强新的调控手段。这不是后退，也不是复归，而是本来就应当解决的，现在应当有意识地利用治理、整顿的时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另外一种，虽然还是旧的调控方式，但今天不得不用。因为新旧体制的过渡没有完成，新的办法、新的机制还不健全，原有的一些行政手段暂时不能不用。但是，要心中有数，要运用适当，不能无限制地强化它。当然行政手段也各不相同。经过改革，有些行政手段逐渐不用了，但也有许多行政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是要长期使用的。我们新的调控方式中也包括行政手段，而更多的属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和培育有调控的市场。我们的经济机制，十三大确定的目标，叫“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一定要研究如何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我们所要建立的这种市场，不是一种盲目的、

没有调控的市场。一部分小商品主要靠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但在必要时也应当是可以调控的。重要的商品，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以外，一般都不能实行独家经营和主要靠内部调拨的办法，而必须通过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国家能够管理、能够调控的一种市场。很多西方国家的市场也有国家调控，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外汇市场，经过前一段的运行，证明国家对它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控制了人民币的投放，控制了进口，外汇的价格就下降。人民币多了，进口多了，外汇的价格就上升。国家可以通过宏观措施影响外汇市场，银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以进行指导，但不能取消这种市场。外汇市场尚且可以如此，为什么别的市场不能调控？要么失控，要么管死，总是走这种老路是不行的。多数商品的价格不能采取冻结的办法，也不能由国家定价，但也不能不加管理。市场机制发达的国家对物价也要管理，也有物价申报制度，一些商品和服务项目如果要涨价，必须申报，提出理由，政府要审核它的利润率。我们全国一时还做不到，大中城市可以先做。对企业制定价格，既不能完全不加干预，又不能一说干预就冻结，就变成官价。总之，今后更多的注意力要放在探索新办法上，加快建立国家指导、调控下的市场。

第九，防止“滞胀”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过热”引起物价上涨。如果生产停滞，物价还上涨，就叫“滞胀”。“滞胀”是比一般通货膨胀更麻烦的问题。前面讲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不会发生“滞胀”。应当指出，一个时期的低速度，甚至短时间没有速度或负增长，并不等于“滞胀”。明年第一季度的工业增长速度可能相当的低，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在结构调整基础上的低速，是不可怕的。可以回顾一下，一九八五年我们连续紧缩银根，结果出现了一九八六年初的生产滑坡，整个上半年没有速度。由于生产结构没有调整，一滑下来就经受不起，结果不得不放开。由普遍收紧到普遍放松，结构没有改变，效益也没有提高。因此，不应当再重复这种一紧一松的做法。如果不在调整结构上做文章，一直紧下去，生产就停滞，放松了，就又会出现过热，导致新一轮通货膨胀。所以，关键在于调整。要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使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投资结构、信贷结构、商品结构都有变化，朝着合理的方向变化。随着治理和整顿工作的展开，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要逐步展开。对

此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同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细致周密地做好大量的组织工作。

把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了，既可以防止生产萎缩，又可以避免新一轮通货膨胀，而且会使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这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所在。所以说，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本身就是一次结构调整。不单是投资结构的调整，而是涉及整个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商品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在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如果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就有极大的意义。经过这么一次调整，我们整个经济的质量就会提高，效益也会提高，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今后更加蓬勃地健康地发展下去。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有过几次大起大落，这同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有极大的关系。其直接表现是，每次调整或紧缩都未能有效地在结构合理化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的话，很重要的一条是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这个问题，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工作部署上、措施上，都需要非常认真地去研究解决。

在治理整顿中进一步实施 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

田纪云同志在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好，听说大家也都表示赞成。今天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了许多很重要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现在沿海地区确实出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的好形势。这同近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分不开，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也分不开。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这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目前恰逢我们国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这样，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些矛盾，不能不对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应当看到两面，既要看到制约的一面，或者叫作困难的因素，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有利的因素。关键就看我们怎么搞。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既能利用这个机遇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又同全国范围内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不发生矛盾而使两者互相促进的路子。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做的一篇大文章。我赞成田纪云同志的那个提法，就是两个“坚定不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坚定不移；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要坚定不移。我们既不能因为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就不继续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把良好的机遇白白地失去；也不能不顾治理经济环境、整顿

* 这是赵紫阳在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部分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经济秩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部署，而另搞一套。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

第二，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同过去历次调整不一样。如何利用开放的条件和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以减少我们在治理和整顿中间的困难，我认为是有许多文章可以做的。这不只是讲沿海，也包括内地。我们国内有相当大的生产力。我们的机械工业，包括军工企业，都有很大的潜力。许多企业可以逐步转为外向型，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搞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生产，或者进口原材料生产能够出口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使不少企业在调整中间继续运转，而且可以创汇。

灵活地利用国际市场来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这里面学问大得很。六十年代我在广东办过这样一件事，就是用优质大米出口转换普通大米，来解决粮食问题。那时国内吃的都是普通大米。我们把出口优质大米所得外汇，一部分用来进口普通大米，弥补粮食缺口，剩下的外汇进口化肥，用化肥向农民换购粮食。在省内，一斤化肥可以换一斤半大米，出口以后，一斤优质大米除换回同等数量的普通大米外，还可以换两、三斤化肥，这样来回一串换就赚了很多。化肥多了，粮食也增产了。原来广东粮食不能自给，后来各种账算下来，每年还可以调出大米十亿斤。所以，会不会利用国际市场来互通有无、扬长避短，效益大不一样。现在我国有很大的生产能力，有一支很好的技术队伍，就是比例不协调，能源、交通和资金缺乏。要是只着眼在国内搞治理的话，就会使很多工厂停下来，很多人失业。如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一大片就活了。当然，不能搞乱，有关的章法和监督措施必须跟上。

如何利用开放的条件来减少我们在治理、整顿中间的困难？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次治理、整顿，沿海地区如果不从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找出路，就会发生相当大的困难，整个生产水平就要下降很多。因为各方面一紧缩，国内找不到资金，靠消耗内地的原料来搞加工业也难了。沿海地区要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就必须利用国际上的机遇，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技术力量、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

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发展“以进养出”、“三来一补”，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我们的老企业进行“嫁接”，以及鼓励外商前来兴办独资企业。这些方面的发展，对我们进行治理和整顿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好处。对保持经济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都大有好处。

发展外向型经济，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哪些东西能搞，哪些东西不能搞，哪些企业能搞，哪些企业不能搞。还要防止不走正当的路子而走邪路。“以进养出”，有的能赚钱，有的可能赔钱。因此，一开始要谨慎一点，选一些好的厂子来搞，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也好监督，搞出了名堂再逐步发展。

第三，沿海地区走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一条路，必须认真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为能源、运力等都有限，不停一些、压一些，出口的生产就保不了，外资企业也保不了。因此，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信贷结构的调整。通过调整，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不利于全国治理经济环境的要坚决控制，对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积极促进。对那些不适销的、浪费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对那些效益极低和亏损的企业，要压缩，让出一部分能源、原材料、运力和资金，来保效益好的外向型企业的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讲，治理、整顿对沿海地区旧模式的发展是一种抑制，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促进。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得越好，对全国经济越有利。

第四，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网开一面的方针，同时必须有一套保证其健康执行的办法，使之不走邪路。网开一面，其余三面就要堵。不堵就变成网开四面了。大家都要乘这个车，都往里挤，最后就搞乱了，什么都搞不成。因为没有这个承受能力，最后只有全部关起来。因此，我们在确定这个方针的同时，就必须研究监督办法，切实加强监督，以保证有关法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尤其是权力下放以后，各级地方政府更要把监督当作自己的主要职责。

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一、物资部门的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

一个是计划内物资，如何防止倒出去；另一个是计划外物资，如何形成市场。当前要研究怎样才能形成国家调控下的生产资料市场。苏州物资贸易中心搞得不是很好吗？国家调控市场，要尽量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不能物资一紧张就搞垄断，一多了就放任不管。如果调控过度，就可能把市场搞掉，那将是一个损失。现在，经济搞活了，要因势利导，兴利除弊，走一条国家调控市场的新路子。至于计划内物资，如何转向市场，可以下一步再说。

要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的管理。在我国现在搞完全的自由贸易还不可能，要建立一个有弹性的市场，即国家调控下的市场。在市场上，有些东西可以管得紧一些，有些就可以管得松一些，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我不同意“只有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市场”的观点。我国基本上是物资供不应求的条件下搞市场，要建立有领导、有组织的市场，多搞产需直接见面。外汇可以形成市场，生产资料怎么就不行呢？

* 这是赵紫阳同物资部部长柳随年的谈话摘要。

二、市场问题关键是价格问题

我同意搞最高限价，那主要是解决防止囤积居奇的问题。最高限价是人定的，但如果限价与实际情况差别太大，那就没有市场了。制定最高限价，要考虑市场供求情况，并注意及时进行调整，不能一年定一次价就不管了，这样会影响生产和流通。

三、对物资部门的企业要有一套监督的办法

现在企业行为很容易违背宏观经济的要求，在政企不分的条件下，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部门垄断，现在农副产品方面也应注意这个问题。

四、加强对物资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

究竟从哪里搞起，要解决些什么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薄弱，要加强、重视。

进一步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全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们：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委托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今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同志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理论工作者表示党对理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和意志，打破了“左”倾思想的长期禁锢，构成了全会的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卓有成效地从事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十年。中国改革的序幕，是这次全会揭开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是由此发轫的。指导我国改革和建设的理论，是在这次全会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十三大，我们已经形成并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轮廓。它是全党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号召下集体创造的成果。它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近四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它分

* 这是赵紫阳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析了我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趋势。它分析了我们的国内条件和新的国际环境。它论证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这条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它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同时也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与建设实践的统一。这一理论，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对我们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起了指导作用。今后，它将在实践中继续丰富，继续发展，并进一步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当前我们党在理论工作上的首要任务，是用十年来逐步形成的十三大的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把这项任务摆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应当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反复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回答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应当根据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得到拓展、充实和深化。各级党校，都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教材。全党同志，特别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有责任向群众宣传十三大所确立的基本理论观点。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和支持实践。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回答得越清楚、越透彻、越全面，它的作用就越大。具体工作中的各种方案计划和措施，当然只能在实践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做出抉择，但是，解决规律性的问题非常重要。正确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预见性，增强我们在实践中的勇气和坚定性。理论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有成效。

中国在前进，世界也在变化。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求人们做出回答。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实，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挑战正是发展的契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回避现实，不害怕挑战。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从中发现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在生动丰富的实践和复杂纷纭的事物面前，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对此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理论研究是艰苦的劳动。党中央尊重你们的劳动。在十三大确立的一系列的基本理论观点中，凝聚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文化艺术领域中，党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创造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工作环境。理论工作者内部要团结，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也要团结，要同命运，共呼吸。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应该为改革和建设的胜利而团结，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团结。

十年来我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发展，是个大题目。大题目也可以开短会。我们赞成你们开短会，我也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就讲这几句短话。祝理论讨论会成功，祝大家在今后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同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部分代表 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你们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内容不仅仅涉及党员教育，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建设会议。当前开好这个会议很重要，很必要，对于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十三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除了党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外，我看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党员的素质。因此，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是党的建设中最基本的工作。我们全党有不少的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光荣的。

一、各级党委都必须十分重视和切实抓好党的建设

要从中央开始，真正把党的建设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日程上。你们会议反映，加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解决党委重视的问题。我同意这个观点。党的建设确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党委重视起来，认真去抓，才可能逐步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一定能够解决。重视了，大家就会去研究，并在实践中创造经验，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经济建设是中心，党委当然要关心和重视经济工作。但党委抓经济工作主要是抓大的方面，决不要把党委的精力用在经济工作的日常事务上。否则，一方面会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另一方面会使党委没有更多的

精力去抓党的建设。党委不能不过问经济工作，但有个抓哪一些、放哪一些的问题，只能抓大的方面。什么是大的方面？各级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地划一划界线。党委总是要用更多的精力去抓党的建设。

二、必须研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来如此。毛主席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的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个大环境，党的建设必须适应这样一个形势。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的建设要为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服务，保证党的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执行，要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理解、支持并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总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做。另一方面，就是要看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环境给党员、党组织带来了新的考验，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严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防止一部分党员经不起考验而走入歧途。必须使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坚强的党性，保持严格的纪律，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广大党员经得起考验，党组织才有条件、有资格去领导改革开放。当然，有很少数的党组织和党员发生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足怪的，但在总体上，我们党必须经得起这个考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小平同志有个明确的思想，就是要两手抓。他讲的这个两手抓，意义很广泛。又要改革开放，又要整党，这是两手抓；又要改革开放，又要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这也是两手抓；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加强法制，也是两手抓。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又要改革开放，又不能丢掉我们的政治优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也是发展的，会有很多新的东西，但在根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上，不能把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既要使党组织成为改革开放的促进者、推动者、领导者；又要使党组织和党员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中间，必须使我们的党不涣散、不腐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党的建设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结合起来。要通过发挥三个作用(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十三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实施，保证治理、整顿的进行；同时，三个作用发挥好了，本身也就是党的建设的加强。

当前，抓党的建设还要和保证党政机关廉洁结合起来。明天，书记处就要开会讨论如何保证党政机关廉洁的问题。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要起领导作用、监督作用，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只有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

三、加强党员教育的问题

你们会议的材料讲，在党员教育中要重视和加强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对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实际上就是党章、党纲的教育。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作为一个党员，如果连党的最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那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呢？不可能。现在新党员很多，其中有不少人不懂得党的最起码的规矩，这是值得各级党组织严重注意的问题。所以，一定要重视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不仅对新党员要进行教育，即使是老党员，也要对他们重新进行基本知识的教育。因为长期不教育，就容易淡忘。同时，还要对党员进行基本路线的教育，也就是十三大精神的教育，用十三大的理论武装党员。这两个方面的教育都是重要的。陈云同志说，每一个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在党员教育中要抓好这一条，使广大党员都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

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

过去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或者叫使命，用它把全党、全民族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比如，推倒三座大山，打倒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等等。现在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全民族要为什么

样的共同目标而奋斗？每一个人要为什么目标做贡献？现在，这个目标只能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我们一定要通过经常的、深入的、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人民中间树立起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要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做贡献。这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的具体化。每个人都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贡献自己的力量。应当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功过的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作了贡献，看他是不是尽了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就集中表现在这里。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应当提倡的一种价值观，一种道德规范。

多年来一直有个矛盾，就是一讲境界、觉悟，就不讲物质利益原则，不搞按劳分配，就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混淆起来。反之，一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物质利益原则，好像就不能再讲觉悟，不能讲奉献精神。其实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把它解决好。按照我们提倡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一个人工作和行动的动机和出发点，应当是为四化，为国家，为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勤劳致富。报酬是国家和社会对一个人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的一种承认，一种鼓励，一种奖赏。谁为国家、为人民出了更多的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就应该得到更多的荣誉，得到更多的奖励，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作为价值观，作为道德规范，则应提倡自觉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而不是追逐个人利益。两者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真正把国家的按劳分配政策同人们无私奉献的道德精神结合起来，这不但不会带来什么矛盾，反而会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因为国家的政策是多劳多得就否定奉献精神，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就必然助长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使人心涣散。追逐个人利益、一切向钱看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更有可能做出对国家和人民有害的事情。我们应当提倡每一个人为国家、为人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这种精神，共产党员要起表率作用。这种精神发扬起来，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增强。

共产党员应当有更高的情操、更高的境界，就是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

义理想。但是，共产党员的现实目标也是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共产党员要带头树立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当然，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对共产党员也一样，也是实行按劳分配，对他们的贡献，也要给予应得的报酬和奖励。但是，从觉悟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上，对共产党员应当要求更高、更严。要通过党内教育，使广大党员都来发扬这种精神，并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全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既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又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五、关于从严治党的问题

这首先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要搞好现代化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有从严治党来保证。另外，这也是党组织本身建设的需要。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存在着松、散、乱的问题。绝不能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必须下决心、下力量来从严综合治理。我们要解决社会上的松懈、涣散、混乱现象，就得由从严治党着手。因为中华民族的精华、精英是在共产党内，党的状况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严治党，必须认真清理不合格党员。能教育好的，一定时期内要教育、提高；教育不好的，该劝退的劝退，该除名的除名。这项工作已开始做了，要继续搞。

从严治党，必须切实抓好基层支部的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支部去贯彻，如果支部是强有力的，许多非常困难的任务在下面都可以完成，许多乱子也可以解决在基层。所以，加强基层支部建设非常重要。要配备好支部的主要干部，健全支部生活制度，真正把党的各个支部建设成战斗堡垒。

从严治党，还必须加强监督，包括党内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要进一步搞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级党委都要支持纪律检查工作。

从严治党，解决松、散、乱的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行全党统一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小平同志说过，没有这个纪律，我们党就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

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这个纪律历来都是写在党章里的。不严格执行这个纪律，党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任务。在当前情况下，重申和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强调全党统一的纪律，同发扬民主没有矛盾。严格党内纪律，正是社会民主健康发展的保证。严格执行全党统一的纪律，对党内民主的发扬也不会有妨碍，因为这个纪律本身就包含着党内民主最基本的原则。

附录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和国家机关 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正确认识当前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状况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党和国家机关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是经得起改革开放考验的。十年来，我们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同广大党员、干部的克己奉公、艰苦奋斗分不开的。如果不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肯定这个主流，就不能正确认识当前党和国家机关的状况，就会挫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廉政建设。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关中确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受贿贪污，弄权勒索。这种腐败行为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它玷污党和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败坏改革开放的声誉，直接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干扰、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绝不能任其发展，侵蚀我们的健康肌体。

在商品经济开始趋于活跃，而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严密规范的时候，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最容易滋生蔓延。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改革过程中的新旧体制交替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有待确立。在这种情况下，这类问题的发生也会比较突出。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允许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要充分发挥党的作用，特别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只要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依靠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我们完全能够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保持廉洁。全党同志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二、把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中央早就强调指出：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不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就很难发展，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不进行廉政建设，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社会主义方向就难以保证，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进行。

近一年来，特别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结合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采取了一些廉政措施并取得了成效。但是，廉政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某些腐败行为尚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仍然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必须把廉政建设作为保证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党委主要领导要亲自动手，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作出部署。要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加强检查监督，切实抓出成效。

当前，开展廉政建设的时机是有利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的精神，正在得到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在进行的财务、税收、物价检查和对各类公司的清理整顿，各级举报中心的建立和开展工作，都为查处受贿贪污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法律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正在发挥作用。各地进行的廉政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各级党委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治理、整顿中抓紧廉政建设，同时通过加强廉政建设推动治理、整顿工作，把廉政建设同治理、整顿紧密结合起来。只要思想重视，措施有力，扎实工作，我们就能在保持廉洁和治理整顿两个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

三、综合治理，突出重点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有效地抵御和战胜各种腐蚀，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总的思路，是坚持我们党一再强调的“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保持廉洁的自觉性，从根本上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正确的思路前进。

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必须综合治理。所谓综合治理，就是要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制度的、纪律的、教育的手段，五管齐下，互相补充；就是要使查处危害严重的案件、抓紧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从严治党和加强思想教育等工作相互配合，同时进行。根据各地开展廉政工作的经验，当前有必要突出抓好重大案件的查处和廉政制度的建设。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索贿、受贿、贪污行为，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危害特别严重。因此，打击受贿贪污是当前廉政工作中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同时，对非法倒卖牟取暴利，利用公款公物营造私房，弄权勒索等违法违纪行为，以及群众意见很大的以权谋私、挥霍浪费等行为，也必须严肃查处和认真解决。

四、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

当前，必须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危害严重的受贿贪污等经济犯罪案件，严惩一批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这样做，能够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同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推动整个廉政工作的开展。

查处经济犯罪案件，要很好地依靠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犯罪分子再隐蔽、再狡猾，也逃不过群众的监督。对群众的检举揭发，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凡属比较重要的线索，一定要抓住不放，追查到底。

查处经济犯罪案件，要充分依靠各级监察和检察部门，党的纪检部门和工商、审计、税收等部门要大力协同配合。当前查处案件任务繁重，专

业队伍力量不足的，应及时加以调整充实。要注意研究犯罪分子在新形势下作案的特点，并采取必要的手段。在立案侦破、调查取证等方面，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断提高办案水平和破案效率。同时，要抓紧完善惩治受贿贪污的立法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在查处经济犯罪案件中要注意发挥指导和协调的作用。在组织人员、提供经费和创造其它工作条件方面，单靠一个部门无法解决的，应由党政领导机关出面，统筹安排。

五、加强制度建设

在严肃查处案件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和抓紧廉政制度的建设，以堵塞漏洞，完善管理，建立秩序，减少乃至消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办事公开和群众举报，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在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廉洁方面的两项重要制度建设。要认真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建立制度，办事公开，切实抓好这两条，就能消除工作人员的随意性，从制度上保证谁办事都一样。各部门特别是掌握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要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吸取改革中的新经验，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明确具体的审批和办事制度。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抓紧做好。当前，应从直接与居民和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开始，从群众最关心和最容易舞弊的环节抓起，从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逐步延伸和完善。为群众办事的规章、程序、结果和期限，应向群众公布。该办的不得刁难不办，不该办的不能徇私舞弊。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有利于保持廉洁。我们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将在政务公开、民主监督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开创新的局面。

设立举报中心，是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揭露腐败现象的有效形式，也是人民监督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县级以上监察和检察部门普遍设立举报中心，很有必要，应切实做好，不要流于形式。对群众的举报，要认真查处，适时反馈。要表彰和保护举报有功人员，并酌情予以奖励。对打击报复举报人和利用举报诬陷他人的，要依法查处。

六、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

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制约，对于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在同腐败行为作斗争和发挥监督作用的过程中，既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严格执行法律、政纪和党纪，又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法规。监督部门也应接受监督。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要不负人民的重托，秉公办事，无私无畏地同各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作斗争。

广大党的纪检干部，是同党内各种违纪行为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级党委要对纪检工作加强领导，使这支队伍在履行党内检查、监督的职责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七、舆论监督

利用报刊、电视、广播来宣传法制和弘扬社会正气，揭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关键是运用好这种手段。新闻报道在揭露腐败现象时，必须注意事实准确，依据法律和政策，把握分寸。结案处理前，新闻报道不得随便给当事人肯定罪名。对所有公开揭露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公开交待处理结果。如果报道严重失实，要公开更正。

新闻报道要特别重视宣传廉政建设中的好典型、好经验。这对提高人们的信心，交流经验，推动廉政建设的深入，很有作用。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一批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在保持廉洁、整治腐败现象方面也创造了宝贵经验。前一段，对这些事迹和经验宣传不够，今后应大力加强。

八、发挥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监督作用。要按照干部管理规定和法律程序，吸收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监察部门的领导职务。要为群众团体在所在地区和单位发挥监督作用提供条件和方便。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经常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对廉政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要吸收他们参加经济案件和其它有关案件的查处工作。他们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廉洁行为的举报，监督和司法机关应认真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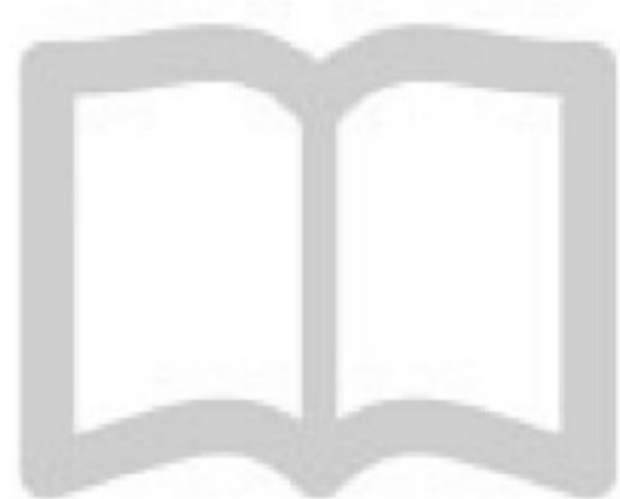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九、从严治党

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对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国各级政府机关任职的干部中，党员占大多数。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为政清廉，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从严治党。

当前，要特别注意把好两关。一是把好干部关。要把廉洁奉公这一条突出出来，作为推荐、考察、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绝不能提拔和信用那些不廉洁的干部。二是把好党纪关。对有不廉洁行为的党员，应按党纪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党籍。对触犯刑律的除给予党纪处理以外，还必须依法惩处。

各级党组织在廉政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监督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克己奉公，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做保持廉洁的表率。一切共产党员都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在廉政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委要把保持廉洁作为机关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结合形势教育、民主评议党员和民主考核领导干部，经常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廉洁奉公和遵纪守法的教育，增强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一九八九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在全国政协元旦茶话会上的致词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庆新的一年的来临，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各位，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根据中国的国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来寻找一条道路，使曾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伟大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摆脱其越来越难于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旧体制，重新显示出它固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然也是艰难而复杂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巨大而复杂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面前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去年以来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我想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曾经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们国家不应该以高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使一九八九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一九八八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求得稳定中的发展。但是，也正由于我们是在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商品经济，所以遇到了许多在国内外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运用的新问题。例如，在公有制条件下，放权、搞活以后，如何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的约束机制，如何有效地控制消费基金的自发过快增长，以及相应地如何保持信贷的总量平衡和合理结构等等。

在未经一定实践的情况下，许多新情况很难完全预见到；对许多新问题，很难预先就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缺的对策。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失误和挫折。但是，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我们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办法正在多起来，措施将会越来越完善。

自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开始生效。大批应当停缓的基建项目在陆续压下来，银行储蓄在增加，物价涨幅在减少，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开始下降。在这次治理、整顿中，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着重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下功夫，按照产业政策，该压的压，该保的保。这次调整如获成功，将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得到真正的改善，并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将意味着效益和质量的提高。因此，治理、整顿完全是积极的，和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治理、整顿才开始不久，对已取得的成效决不能估计过高，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容不得半点松懈。必须把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治理、整顿的措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同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新的手段和方法。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因为困难而对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发生动摇，是错误的；那种因为困难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更是错误的。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有着共同的认识。在前一段治理、整顿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作了不少工作。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的改革一定会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加强民主建设，要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这些根本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进一步完善，而决不能削弱。这些根本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尤其适合中国经济文化振兴的需要。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选举；在这些制

度下，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之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经济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广大群众，有着最广泛的共识。我们希望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一起，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实行互相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下大力量搞好党政机关的廉洁，进一步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为祖国的统一，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

第一，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不能变

现在，国外有一些人，国内也有一些人提出，中国的改革，经济上必须搞私有化，政治上必须搞自由化，学西方的轮流执政和议会制，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改来改去，出了这么多问题，还不如过去的老办法稳当，因而对十三大提出的改革方针表示怀疑，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表示怀疑，想回过头去。我认为这是两个极端，都是对改革的干扰。当然，也不奇怪。改革遇到了困难，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药方，但是对两个极端的话都不能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战略不能变，也没有理由变。

现在，确有一些同志对困难认识不足。我们讲治理整顿，消除经济过热，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也很不容易。所以要把情况摆明，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不治理整顿不行，听任问题发展下去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持消极悲观论点，甚至不愿意听人们讲成绩。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经济情况是好的，对此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有的人不爱听这个话，听了就反感。其实，我们不外乎用两年或再稍多一点的时间，把基建规模搞小一些，把速度降低一些。我认为，按照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用两年时间，把这几年积累起来的问题大大缓解一下，是完全可能的。不下决心治理整顿，当然不行，再拖下去会使困难加重。但是一讲治理，就认为不得了啦，消极悲观，这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基

础，有了这么大的生产能力，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能比的。过去也曾发生几次“过热”，调整一下，就解决了，这次也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情况与1960年完全不同。那时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是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上的过热。我们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以后还是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幅度即使降到百分之七，还是相当高的速度。在治理整顿中即使发生短时间的萎缩，也不可怕，过去也发生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之间，我们进行过两三次调整，但总的经济还是提前翻了一番。

把困难看得过大，就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要退回去，另一个就是从西方找药方，照搬西方的东西。这两条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有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得改变所有制，公有制不改没有办法。我向他提了个问题：为什么私有制企业也有大批经营不好而破产的，而联邦德国工会的公有制财产却经营管理得不错？对这个问题，他也回答不了，无法从所有制上来解释。事实上，现代多数西方大公司的经理，都是受雇管理别人的财产，企业并不是他私有的，不是也可以管好吗？从我们的情况看，私有化并不能解决当前人们关心的经济问题，公有制企业也可以经营管理得很好，而且公有制还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总之，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能使中国振兴起来。

我们这条路，这个改革、开放的方针，到底行不行？事实证明是行的。小平同志开始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时，很多人不相信，但是不到十年我们就翻了一番。当然，即使翻两番以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我认为中国在本世纪翻两番就很了不起，我们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在十年前那样的基础上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确是大胆的设想，是宏伟的目标。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十年以前小平同志讲翻两番，有多少人相信？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现在不是翻了一番吗？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产品是按市场的需要生产的，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办事、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而且有能力办好。十年改革，我们无负于人民。我们应当增强自信心，进一步振奋精神。去年尽管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前进了，而不是后退了。当然，发生问题就要正视它、治理它，不治理不行。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方针，不松劲，不半途而废，坚决地搞下去，就一定能够见效果。到明年这个时候，有些话就比较好讲了。在有困难的时候，怨天尤人、消极悲观情绪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大夫、这样那样的药方都出来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我们要清醒。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不能变，不需要变，也没有理由变。

第二，要认真抓好形势教育

如果人们对形势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各条战线包括新闻单位，都要把形势教育摆到重要位置上，认真地去抓。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也要通过形势教育来进行。

形势教育要面向基层，不能用千篇一律的办法。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在教育的内容、方法上不应当完全一样。这项工作不简单，难度很大，要使教育收到好的效果，很需要下一些功夫，要重视各方面的实践，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好的路子、好的方法。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宣传要增强效果，就必须在方法上作些改进。各条战线在进行形势教育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路子，宣传舆论工具应当加以介绍，不一定要长篇大论。前不久，内参登了一个材料，辽宁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冯玉忠在学生中讲形势，效果很好，他讲的内容比较适合大学生。农村、机关、学校、部队的情况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经验，我们要注意总结和推广。

形势教育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必须使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人们看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中央和各地都在认真解决；特别要着重向人们讲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性质，讲清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要通过有说服力的事实和道理让人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把困难看成是主流，或认为无法解决，因而助长悲观消极情绪。正因为是发展中的困难和前进中的问题，因此，都是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看清问题的性质。例如，有些消极丑恶腐败的东西，是在社会大发展大变动中趁着新秩序还没有完全确立，我们主观上警惕和预见不够等空隙而泛起的沉

渣，并不是新体制所固有的。这些问题随着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都可以逐步解决。

第三，必须使人们认清改革的意义，并对改革的艰巨性 复杂性有精神准备

改革虽然进行了十年，由于前一段总的还比较顺利，人们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还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很多人对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改革，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进行改革，也缺乏深刻的认识。

现在有的国家在改革中发生了很大困难，那里的人们对现状不满意，但如果让人们选择的话，他们还会选择改革，而不会羡慕某些不改革的国家，尽管那些国家看起来很平静，控制得很好。愿意走回头路，回到旧的模式中去的人，肯定是很少的。我认为，中国也是这样。不要说现在这些困难，即使遇到再大一点的困难，人们可能很不满意，但是如果说回到1978年以前去，我看绝大多数人不会赞成。历史车轮不会倒转，没有这样的形势，也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进入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无例外地都要走改革这条路，这绝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发展都比较快。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旧模式越来越束缚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是旧的模式不好，所以必须改革。再不改革，就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越来越落后，连原有的地位都不能保持。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采取集中的方式搞建设是必要的，不能分散搞。否则，在当时会站不住脚。苏联也是一样，当时不集中就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工业化基础较差的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那样搞。实践也证明有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的这种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但是，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在变、在改，特别由于科技的发展，使它原来的那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在这期间，社会主义却把苏联模式固定下来了，越来越束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打破旧模

式，建立新体制，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显示出来。

这场改革，小平同志讲，实质上是一场革命。要把过去那种模式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这确实是相当大的变革，包括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这样一个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人们精神准备不足，对改革的意义理解也不深。人们往往把改革的目的看作就是为了得到实惠，对获得眼前利益期望甚高。这是对改革缺乏正确思想准备的突出表现。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生产长期停滞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下去后，很快就使农民得到了明显的实惠，农民的生活在三、四年之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这引起了人们的一个更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城市一改革，也很快就得到很大的实惠，而对改革会遇到的困难没有思想准备。对改革太理想化，觉得改革什么问题也不应当出，改革后发生好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为还不够，但对出现困难却没有精神准备。这些都需要在这次形势教育中，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使人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增强对改革及改革中困难的承受能力。

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 妥善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形势教育，就是要统一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对形势和对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的思想认识。现在看来，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某些思想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弄不清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搞改革决不是偶然的，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显示过优越性，可是后来这种体制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具有必然性。我们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一场大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有困难和挫折。对改革的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把得到眼前的实惠寄托在每一项改革措施上，期望值很高，这样碰到一些问题就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发生动摇，就会发牢骚。

当前形势教育中难度较大的问题，是怎样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丑恶现象、腐败现象。对这些现象人们意见比较大，当然，意见比较大的还有分配不公、物价上涨等问题。我们要在形势教育中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要告诉人们，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正在设法逐步解决。同时要指出，这些终究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一些丑恶的东西乘隙而出，是所谓“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当然，这些问题确实不能任其泛滥下去，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发

* 这是赵紫阳在考察湖北省时谈话的要点。

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廉政建设、政法工作都要认真抓好。

如果我们不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得不到发挥；反过来，生产发展了，社会风气搞得乌七八糟也不行。过去我们的社会风气比较好，但对发展生产力不够重视；现在我们注意了较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同时必须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如果经济搞活了，但经济秩序、生产秩序混乱，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治安混乱，也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于富有活力的经济 and 良好而安定的政治的结合。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方面必须走出一条路子来，也可以走出一条路子来。

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抓好党的工作，发挥党的作用。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政治优势，这就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的党是非常强大的党，只要党认真去抓，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不管多么困难的问题，只要党组织认真去抓，就会有经验，有办法，就会见成效。各级党委在重视经济工作的同时，一定要下大力量、更加自觉地抓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细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研究有效的政策、措施，恰当地解决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党委不要陷于经济工作的日常事务，而要拿出更多的精力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各项工作。只要认真去抓，混乱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各项工作都会出现新局面。

当前我们正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治理、整顿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压缩基建投资和控制过分膨胀的消费基金。压缩投资，不是简单的一律平均的压缩，而是要注意研究和认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样，治理、整顿就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办法，做到管而不死。所谓宏观调控办法，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地方对企业的领导方式，还包含很多把经济搞活、保证活而不乱的管理措施，如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制度等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不可能一下子从旧体制中脱胎而成，它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在这方面继续下功夫。

要重视企业里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贯彻《企业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企业党组织要搞好职能转换，尽快理顺党、政、工、团的关系。厂长和书记都要适应新的体制，尽快进入角色，到达自己的位置，不要犹犹豫豫。从旧格局进入新格局的时间不能太长，这个转变过程拖得越长，损失就越大。现在有许多企业已经创造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在新体制下发挥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好经验，要及时总结，认真推广，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法》贯彻好，把企业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社会治安问题必须综合治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

各级党委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必须下大力量抓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民主和法制建设等工作。一个地方只有经济发展了，同时又抓好了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那里才会有安定团结的环境，才会有巨大的凝聚力，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才能持续高涨。

这些年来政法部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广大干警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政法队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可以信赖的，整体上是一支优秀的队伍。

在和平建设的时期，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大业中，政法部门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担负着十分繁重的任务。政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给政法工作以更大的重视、理解和支持。

当前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很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各级党委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发展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

有这样一个大的方针，形成一个大气候，再依靠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社会秩序就可以好转。

* 这是赵紫阳在同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应该包括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首先应该把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沿海地区管理好，要建立一套办法。这些地方有条件先管好。

加强社会治安，一定要把综合治理和集中打击、集中整顿结合起来。某项犯罪活动特别猖獗，就必须进行集中打击；某个地区、某些场所问题很突出，就必须进行集中整顿。在集中打击、集中整顿的同时，认真抓好制度建设，搞好综合治理。

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党的建设研究班已经办了二十四天，讨论得很好。中纪委正在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也开得很好。现在党建研究班的专题讨论还没有结束，我趁这个机会，就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作为我的一个发言，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第一点，必须把党的建设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程上来。党委的工作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是两手抓：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手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而要抓好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关键是抓好党的建设。我们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党把这两手抓住了，抓好了，就能够提纲挈领，驾驭全局。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社会既不能停滞，又不能动荡。停滞和动荡都不符合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不改革开放，不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就快不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会停滞，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如果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就会滋生蔓延，就会把我们的社会搞得乱糟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和建设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新闻舆论、政法工作、廉政建设、群众工作、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但必须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班上的讲话。

抓住党的建设这个重点和关键。党有了战斗力，思想政治领域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主心骨。所以，总起来讲，就是三句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行；抓商品经济而不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不行；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而不重点抓党的建设也不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两手抓。小平同志说，“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小平同志又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整党”，“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是从不同侧面讲的，意思是一贯的。小平同志还多次讲过，抓打击经济犯罪也好，抓整党也好，抓法制也好，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没有这一手，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很难搞好，很难顺利地进行。我理解，两手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牢牢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委的工作要围绕一个中心来两手抓，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两手抓中的思想政治领域这一手，很重要的一条是为了防止腐败现象。因为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一种腐败的危险，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现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直接带来的，但改革、开放、搞活的环境，确实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危险，也就是有土壤、有温床、有空隙。因噎废食，怕有腐败的危险，就不改革、开放、搞活，怕苍蝇进来而不打开窗户，或者打开了又关上，是不对的。但是窗户打开了，飞进了苍蝇不去扑灭，也是不行的。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所执行的一整套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尽管在经济工作方面，人民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看改革、开放、搞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条，绝大多数人是公认的，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能够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我觉得应该这样看：我们只有在促进生产力较快发展的同时，又能够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才能充分显示出我们路线的正确、制度的优越。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富有活力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应该是良好而安定的政治，两者密切结合，就有可能以较少的代价和较快的步伐，求得中华民族的振兴。

第二点，对党的现状的估计。同志们讨论得很热烈，列举了大量的事

实，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我看基本估计是一致的，就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问题。这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方法。十年大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党的各级组织在总体上是有战斗力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人民努力工作的。这些都是基本的不容抹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党是漆黑一团的，过去的成绩怎么能够取得呢？将来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党内确实存在着腐败和涣散的现象。这些消极的东西，正在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和群众的联系，危害党的事业。我赞成同志们说的，要动态地看问题。就是说，对我们党的现状作出估计后，还要看今后党究竟会怎么样。现在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有许多消极现象在发展，在滋长。采取正确的方针，我们党今后就会沿着正确的、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如果采取另一种方针，那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要从动态上来看问题。如果放任下去，听之任之，是会泛滥成灾的。这是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做到的，是实现好的可能性，这就是正视问题，从严治党，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同这些腐败涣散的因素作斗争。这样，党就能进一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就能进一步加强，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强的保证。

为什么一方面是党的事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不容忽视的问题？乔石同志在研究班开学的时候讲，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的大转变时期。这个话讲得很好，指出了观察党的状况、研究党的建设的大背景。我们研究党的状况，一定不要忘记党处在历史性的的大转变时期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是在历史性的的大转变时期，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有的对党的路线迷惑不解；有的经不起新的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从十年内战转变为国共合作，就有人对统一战线的政策想不通，也有人经不起统一战线环境的考验。进城也是这样，从革命战争转变为和平建设，有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人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下坡了。现在的转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可以称之为又一次革命。从产品经济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不理解，有人经不起考验，同样也是不足为怪的。唯其如此，

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大转变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整个党的考验。客观的考验是严峻的，因此，从主观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必然会有一部分党员被淘汰，但我们党和党的事业必将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党在以往六十八年的斗争中，胜利地通过了多次严峻的考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在和今后，也一定能够胜利地经受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并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足够的信心。

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反复论证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密切地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

一句话，党的建设一定要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不能离开党的政治路线。这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的最宝贵的经验。党的十三大和十三届三中全会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的时候，都着重指出了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党内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党的状况的某些方面同党的路线不够适应，或者很不适应。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进行党的建设，需要紧紧抓住三个问题：廉洁问题，党内的凝聚力问题和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问题。这三个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只要我们的队伍是纯洁的，步调是一致的，又能把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点，保持党政机关廉洁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经济越是繁荣，商品经济越是活跃，共产党员在保持廉洁方面的觉悟就应该越高，党的纪律对这一方面的要求和约束也应该越严。我们是在开放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而且为了发展商品经济，我们也需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决不是学习资本主义私有制，决不能羡慕和模仿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而造成的损人利己、贪婪、欺诈和其它一切坏东西。在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有些社会现象是难于完全避免的。经济搞活了，内外交往扩大了，人、财、物都广泛地流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管得像过去那样“净化”，确实难度很大，需要有一个法制建设的过程，需要有一个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总结和积累经验。但是，对党政机关应

该管严。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百分之六十九是共产党员；担负领导职务的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更大。共产党员不仅应该廉洁自律，而且应该成为维护廉洁、反对腐败的最勇敢最坚决的力量。热心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应该热心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借发展商品经济混水摸鱼，利用行使公共权力之机索贿受贿、弄权谋私，是破坏改革开放的害群之马，是违反国法党纪的蠹虫。共产党员，工作能力有大小，认识水平有高低，但是，必须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决不能犯拿权力同金钱作交易这种性质的错误，如果犯了，就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我们所以要把党政机关管严，不仅是党的性质、政府的性质有这个要求，而且这也是制止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的最有效的办法。所谓腐败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拿权力同金钱作交易。社会上有些人需要通过利用掌握权力的人取得方便，而掌握权力的人主要在党政机关，其中有些人又想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这种现象，一般讲，许多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很突出，特别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时候。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应当而且有能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绝不能听其泛滥。我们把党政机关，包括执法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管严，把这些部门存在的问题真正解决好，遏制住权力同金钱交易的现象，就可以制止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

中央书记处最近讨论了廉政问题，认为这是从严治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当前要着重抓两件事。一件是认真查处案件，凡是有线索的一定要查到水落石出，凡是违反国法党纪的一定要严惩不贷。涉及法纪政纪的，当然由国家司法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查处。但是，对有关的共产党员还必须绳之以党纪，党纪的要求应该比政纪、法纪更严。这是党的各级纪委当前的中心工作。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一定要铁面无私，坚持原则。再一件是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直接为居民、为企业办事的行政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办事的规章要公开，办事的结果也要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照章办事和公开办事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一大建设，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建设。行政部门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应该在本单位的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项工作，难度

很大。但是，北京东城区、上海黄浦区、山东郯城、河北蒿城等试点单位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认真去做，坚持下去，逐步完善，必有成效。山东姜春云¹同志对乔石、宋平同志和我说，他们的郯城、昌乐抓得很有效果，群众反映非常强烈，而抓的时间并不长。可见，廉政建设这件事说难也难，但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河北邢台抓廉政，几个月时间就有了变化。所以关键还是要坚决去抓。领导态度坚决，亲自去抓，带头去抓，方法也就会出来。抓什么？从人们关心的、意见最多的、议论最多的热点问题抓起，逐步地扩大。现在下面还是有新鲜经验的。总之，把查处案件和制度建设这两件事抓好了，既能防范于前，又能惩戒于后，我们党就有了反腐蚀的机制和能力。

第四点，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内部的凝聚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只要我们党内不出大的问题，国家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出了问题也有力量解决。这就是上一次我在党校座谈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的问题，关键还在我们共产党身上。我们党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国内政局稳定的主导因素。全党四千七百万党员，多数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全党团结，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稍微现实一点的，也知道无法从外部取代我们，摧毁我们。他们寄希望于我们内部涣散。中国人长期被讥为“一盘散沙”，孙中山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他没有做到。我们党由于有正确的理想、理论、政策和工作，由于有强大的献身精神和严格的纪律，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了，使中国革命得到了成功。

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讲过一句言简意赅的很深刻的话：要使每个共产党员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我理解，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增强党的观念，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原则。大家都这样做，党就能巩固，否则势必涣散。我们的党很大，这么多党员，分布在各个方面，岗位不同，有的在中央，有的在地方，有的在党委机关，有的在政府、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有的在企业、学校、农村。但是，大家都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都有义务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原则，增强党的观念。这样，我们的方向、目标、步调就能一致，党就有战斗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靠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其中，首先是思想建设，也就是用党的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来武装全

党。这次党建研究班在讨论中，也把这个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说明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都看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十三大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反对改革开放，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能允许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懂得这个道理，是拥护党的路线的。但党内确也存在着模糊观念，对改革开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有的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缺乏思想准备，不大了解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由之路。有的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思想准备，希望改革的路直而又直，走得快而又快。有的对改革必然会付出代价和遇到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幻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能对每一个人立即带来巨大的、直线上升的利益，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这些都是导致思想涣散的因素。还有一些人，看问题的方法不对，过去在封闭状态下，不了解国外的情况，现在开放了，把中国同发达国家一比，好像社会主义不行了。其实，要比，应该看两条，一条是看社会制度，再一条是看发展阶段。离开发展阶段，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好像一切问题都是社会制度带来的，好像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了。应当如实地看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百美元这样的水平上作比较，在社会安定、分配公平、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卫生条件、社会福利、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状况比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好。且不说我们有十亿人口，有更多的困难。和我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几百美元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政局动荡。可以放眼去观察，可以去比。还有一种比法，把我们同欧洲、美国、日本比，这种比法不是科学的、客观的，因为我们原来就落后，不是现在才落后。他们经过一百多年、两百多年的发展，其中还包括殖民掠夺的阶段。怎么能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相比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上是领先的，这是公认的事实。将来，到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的社会状况在许多方面会比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好。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对比，只能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水平比，不能把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社会制度混淆起来。我们处在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这不能怨天尤人，更不应归结到社会制度上，而应该发愤图强，

同心同德执行十三大的路线。十三大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现在，大家对我们落后的状况不满，我看不需要开什么新的药方了，就是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执行十三大路线，发愤图强。尽管十三大的理论、路线还要充实、完善、发展，但只有坚决贯彻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别的药方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一点，全党必须坚定不移，首先是各级领导要坚定不移，不能摇摇摆摆，不要受这样那样错误思潮的干扰。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的教育，应该结合形势教育去做，要做得很认真，深入细致，生动活泼，有针对性，有说服力。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产生，这个热点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别的热点问题。党内的模糊认识是经常会有，强调党的凝聚力，同发扬民主是统一的。党内民主的发扬，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的强大因素；而党的凝聚力的增强，又可以提高我们的承受能力，成为进一步发扬社会民主的必要条件。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是为了使党在伟大斗争中充满活力，是为了巩固党的队伍和推进党的事业，充分有效地执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如果以民主为借口，给党的形象和党的路线抹黑，损害党的事业，那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

第五点，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增强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吸引力大，党就能更好地实现领导。党的内部要讲凝聚力，党对非党群众要讲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样，党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做群众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学会新本领。毛主席讲过，“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主席的这段话，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讲得很好，我们应该悉心体会。这就需要更高的领导艺术。战争年代尚且应该如此，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更应该努力这样去做。

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在中国搞反对党，既无条件，也无需要。在我们国家里，有共产

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我们党和民主党派都赞成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符合我们的国情，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后还会起更好的作用，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要进一步充实，形式要进一步完善。这要根据实际条件一步一步走，要靠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取消我们党的领导的大格局，而是要更充分地发挥这个大格局的优势，使我们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合作得更好，更亲密，更有成效。

十三大以来，党政分开有明显的进展。这是正确的，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县以上各级党委从日常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中摆脱出来，可以更好地履行政治领导的职能，集中力量抓改革，抓党的建设。党的政治领导，很重要的是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有的同志提出什么叫“重大”？我们说中央同地方党委的职能、权力不同，但都负有在重大方针政策方面实行政治领导的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具体怎么做，可以在实践中探索、研究。改革是统揽全局的，各级党委应责无旁贷地抓起来，抓好。党要真正管党。这个问题讲了多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除了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外，同过去党政不分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党政分开以后，在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同志应该和在党委机关工作的同志一道，共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关系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相互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企业法》颁布以来，不少企业在理顺党政关系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各级党委要注意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使更多的企业党组织能够坚定不移地按照《企业法》和中央的《通知》的规定，转变自己的职能。企业党组织应当真正把本企业的党员管好，使党员（包括担任行政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能起作用，都按党的政策和原则办事，都按国家的法律和计划办事，都密切联系群众，把保证和监督的任务担当起来。

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如何，对党的事业关系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领导班子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

是好的。当然，由于缺乏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年轻干部原来是搞技术、专业的，不熟悉党的工作；一是在年龄结构上没有拉开，如不注意，将来会出现一起退、一起换的问题。现在不能再来搞大的变动，只能在经常工作中逐步调整、改善。总的来看，现在需要注意稳定和提高。鉴于新成分大量增加，当前在领导班子建设上要特别强调学习和团结。学习非常重要，包括在实践中学习。进了领导班子，就必须认真学习身为领导班子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东西。我们不要教条主义，也不要经验主义，但是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学马列，学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学党的方针政策，学党的基本知识。要结合实际工作，反复深入地学。在领导班子里的同志，还要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的观念，解决好个人同党的关系。有一些年轻干部有开拓精神，很能干，但由于缺乏党性锻炼，在对待名、位、权的问题上，缺乏正确的态度。共产党员应该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但不能伸手要权、要位、要名。团结也非常重要。进了领导班子，应该更顾大局，更守纪律，更严格要求自己，更密切联系群众。班子内部应该有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面说的廉洁问题、涣散问题等等，都应该从领导班子抓起。对严重不团结和问题比较多的领导班子，上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帮助解决。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各项工作都可以开展得生气勃勃，也可以把好的队伍、好的作风带出来。

第六点，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建设面临的各种问题，大量地体现在基层组织的建设上。这方面的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许多典型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去抓，就会发现问题，就会找到办法，就会取得成效。现在我们有些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有的甚至瘫痪了；但也确有一些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直发挥得比较好，各地都有一些。而且，最近一两年来，还有一些新经验，就是对原来涣散的党组织，上面一抓，情况就变了。乔石、宋平同志看过一些农村，我也见到确有一些党组织，那里经济发展了，思想政治方面的情况也好，主要是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同时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不放松。有的农村，一说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各顾各的，支部不管。而有的村子是党组织带领群众致富，那里的党组织威信就高。所以，关键是要抓，而且要经常抓。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党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大学也一样，有些党组织的状况好，有些不行。要从好的典型、好的经验、包括近几年出现的新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三大提出了基层党组织的七项经常工作：经常地进行教育，经常地加强监督，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地整顿纪律，经常地清除腐败分子和妥善处理不合格分子，经常地吸收优秀分子，经常地发扬正气和抵制歪风，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十分重要，真正做好了，并使之形成制度，党的作用和威信就一定会提高。上级党委，要关心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经常出题目，给基层党组织分配任务，基层党组织也应给党员分配任务。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起作用，首先要抓。不抓，没有任务，没有要求，没有检查，就会涣散甚至瘫痪。有的地方，党员不起作用，就是因为支部没有要求他们起作用，支部没有给他们分配任务。好多支部，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要求党员帮助群众致富，党员有了任务，也很高兴，在带领群众致富中也就提高了威信。看来在党组织瘫痪的问题上主要是我们没有认真去抓，没有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必须坚持，这是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之一，否则党的组织就会松松垮垮。现在有一种思想，认为在和平建设时期，要淡化党组织的作用，淡化党的领导，不能像战争时期那样，强调组织，强调纪律。这是错误的。中央组织部在不少地方进行了民主评议党员的试点，即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条件，对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评议党员是否合格，效果很好。下面的反映是：“风声不大雨点大，雷声不大震动大”。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和民主评议，可以动员全体党员都来关心党，爱护党，都来做党的工作，都来起作用；可以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到实处，使党内的监督有约束力，有利于党员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顺利地处置不合格的党员。另外，提高党员素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次我就不讲了，因为刚刚开了党员教育工作会议，那个会议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七点，讲几个原则问题。有的同志问：现在搞改革，好像很多东西都在变，究竟有哪些不能变？我想，简要的回答就是两句话：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能变。

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坚持。政治体制要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改的，执政的具体方式则是可以改变的。党政分开是讲具体的工作体制，充实和改进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是为了密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丝毫不意味着改变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产品经济的管理体制要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公有制的形式可以探索，所有权和经营权应该分离，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发展个体经济，也可以发展私人企业，但中国经济不能私有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不能变。至于公有制形式，可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规定它的具体形式。我们允许非劳动收入，但按劳分配应该是主要的形式，这也不能变。我们过去采用过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但后来情况发展了，暴露出不少弊病。怎么改呢？要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我们的公有制成为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形式。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人民内部应该逐步扩大民主，但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丢，基本原理不能丢。把四项基本原则丢掉了，中国一定大乱，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改革，能做到吗？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战略不能变。从国际国内形势看，都没有理由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把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丢掉了，中国也一定大乱，现代化也没有希望。

顺便说一下，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要进行科学的阐述，不能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比如靠拼设备，搞短期行为，来追求增加利润，这是曲解生产力标准，恰恰是破坏生产力。有人说既然讲生产力标准，为什么又要搞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改变生产关系，这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行动。反过来，只

是追求生产关系的所谓高级形式，而不顾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就会犯“左”的错误。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但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理解生产力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同利润、产值等简单划等号。

至于讲到党的建设，必须明确：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必须坚持。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坚持。干部管理制度要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要建立，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必须坚持。党员的模范作用必须坚持，党员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现阶段的任务、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的宗旨必须坚持。党的社会政策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物质利益原则，鼓励勤劳致富。但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当是自觉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而不是追逐个人利益，不能“一切向钱看”。我们需要把社会政策同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区别开来。这种世界观、价值观也要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当然，不能用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去要求人民群众，但对共产党员则必须这样要求。总之，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

第八点，讲一讲研究班这种形式。办研究班，把负责干部集中起来，用不太长的时间，采取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讨论一两个重大问题，这是一种好形式。大家把实际工作中的感受和考虑向中央反映，中央同志的考虑也同你们交流，这对帮助中央决策和改进地方工作都有好处。长期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抽出一段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思考，同其它地区、其它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讨论讨论，对个人也是一种收获。我看这种形式可以继续采用。这次是专门研究党的建设，对推动全党重视党的建设会起重要作用。将来，可以继续办党建研究班，也可以根据需要，开办廉政建设研究班、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班等等，推动各方面的工作。可以通过这种形式，集中大家的智能，帮助中央决策。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推动工作。同时，对参加研究班的同志来讲，也有利于提高。这个办法，花的时间不长，也易于实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的建设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要用全党的力量来做好这篇文章。这次办研究班，可以说是破题，还要继续研究，认真去抓。

上星期日我到党校同全班同志见了面，前后又找一些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老同志座谈了三次，对我也很有启发。今天就谈这些，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听到同志们的批评。

注释

1. 姜春云(1930—)，山东莱西人。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曾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必须在全国人民当中树立爱国主义和发奋图强的精神，必须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在所有这些方面，文艺工作者都是大有可为的。党和人民需要文艺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振奋民心民气，增强全国全民族的凝聚力，为创造健康、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风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文艺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总之，文艺的天地是宽广的。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很艰巨，也很光荣。

在我国，艺术家同党和人民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顺利，人民高兴，国家兴旺发达，艺术家的日子也就好过，成就也就丰硕。反之，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遇到挫折时，艺术家和文艺事业也必然受挫折。在我国，党的事业与艺术家的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今后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贯彻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在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中，文化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同志继续和进一步关心、重视文艺工作，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和党对文艺工作的各项政策，注意与艺术家们对话、谈心，听取艺术家们的意见、要求，积极帮助文艺工作者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西楼文学艺术家新春聚会上的讲话。

在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

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了。今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在这里举行老同志迎春茶话会，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全国离休、退休的所有老同志拜个早年，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当全国千家万户欢度春节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正是老一辈革命者浴血奋斗、长期努力，才创造和赢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和繁荣。老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军队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同志们都很关心当前的形势和工作。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向到会的老同志作一个简要的通报。

大家都知道，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改革。十年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探索和建立一种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又能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的新体制。当然，这是一条曲折而又充满困难的道路，任务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要想完全避免任何挫折和失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一九九〇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已提前完成，证明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证明

我们党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走下去，并及时注意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就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既定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必须坚持两手抓。现在，我们就是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一手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就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不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社会就不能安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盛行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就会滋长起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条件做到既发展商品经济，又不让消极腐败现象发展起来。前提是必须坚持两手抓。

去年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和整顿上来。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整顿开始取得成效。当然还是初步的，工作决不可放松，还必须继续努力，扎扎实实地抓下去。

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治理、整顿的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据此，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陆续抓了几项工作。围绕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问题，中央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书记处进行专门讨论，发了纪要。去年十二月底，中央召开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部署了党员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今年一月中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研究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问题。一月下旬，召开全国纪检工作会议，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讨论和部署在治理、整顿、调整、改革中进一步加强党风党纪建设。从今年一月四日开始到月底，中央把一部分省委书记、副书记，集中到中央党校，举办党的建设研究班，深入讨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问题。

中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行；抓商品经济而不抓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不行；抓思想政治领域而不以党的建设为重点也不行。在当前党的建设工作中，特别需要认真解决几个突出的问题，如：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党员干

部的廉洁，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全党思想的统一，增强党内的凝聚力；在全体党员中（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和担任何种职务），保持严格的统一的纪律，克服涣散现象；通过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来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等等。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确有不少新问题，但是只要从中央开始，各级党委认真去抓，摆到重要日程上来，就会有办法、有经验，就能抓出成效来。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将会继续抓下去，并希望得到老同志的大力支持。老同志有很高的威望、广泛的影响和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重视老干部工作，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爱护老同志，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为老同志参加力所能及的、适合个人特点的活动创造条件。要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需要老中青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持续奋斗。我们全党全民族要同心同德，发奋图强，一代接一代，继往开来，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

大中型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投资仍嫌不足，一方面是企业钱少，另一方面还由于机制的原因，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不够迫切。乡镇企业肯花大钱去买技术，聘请技术人员，就因为他们有这个迫切需要。

电子对撞机的应用是为基础研究服务的，但这个工程本身又是高技术开发工作。

我在河北、河南等地看到，科技人员去农村搞技术承包，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单位组织的，一种是由个人牵头的。后一种在开始的时候是某一个技术员，从一项技术业务承包开始，有了成效之后，其他技术人员也参加进来，逐步扩大成集团，扩大到更多技术领域，成为企业化、社会化的集团公司，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好形式。

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方面抓“横向收入放开”，引导研究所改变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又要靠搞拨款制度改革的“推动”。此外，你们在搞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研究和开发的计划，这就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了，实践证明这一套办法效果是好的。“星火”、“火炬”计划起到了这个作用，名字也起得好。

“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方针早已经确定了，这并不是什么新精神，新方针。当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也不是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关键是要继续贯彻，全面落实。王大珩同志提出与其说基础性研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听取国家科委宋健等人关于基础性研究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究是技术进步的“后劲”，不如说是“后盾”更合理，这个意见是好的。应当强调基础性研究要为高技术开发提供支持。过去我们曾提出过“任务带学科”的口号，现在当然不必重提，但仍要特别注意围绕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来选择重大课题，组织力量开展这类基础性研究工作。比如农业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大的课题，中国人口多，土地少，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选题不只是为了写论文，脱离实际的论文不仅近期不能解决重大问题，长远也解决不了重大问题。因此，主要还是应当围绕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任务来选题。

我们国家财力有限，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实验室要真正发挥作用，要使其社会化，不要搞成单位所有，部门所有，实验室要向各方面开放。重大科研装备搞一点是必要的，搞起来就要为全国服务，不能只为本单位、本部门服务。例如，电子对撞机之类的装备，可以做什么研究课题，让大家来提，供大家使用。这样就可以少投资，多办事，提高设备使用率，提高投资效益，发挥更大作用。

基础研究目标也不应该过于笼统，应当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要有一点竞争机制，及时评价，好的要及时给予表扬奖励。可以组织科学家们评论优劣，不要由政府指定。

在发达的信息社会中，知识、信息都是财富，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应当逐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知识产权的法规也要抓紧制定，使其逐步完备起来。

我还要再次强调农业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不管主战场、高技术、还是基础研究，农业问题都是重点课题，人口、土地、粮食，对中国来说不论近期或长远都是关键问题。科技也是一种投入，看你投到那方面，要在“科技兴农”上想办法。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农业发展，包括种子、饲料、农用工业等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开发，“星火”计划对提高农业科技作用是好的，特别是科技人员大面积承包效果显著，收效很快。日本也是人多地少，为提高覆种指数和提高产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例如农用薄膜、地膜，都是日本搞起来的。希望我们的科技人员在农业问题上多做文章。科技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对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告孙维本同志：齐市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报告很好。特别是提出抓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性，看了很受启发。并告计委、体改委。

注释

1. 孙维本(1928-)，辽宁营口人。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 马国良(1936-)，黑龙江哈尔滨人。时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后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 这是赵紫阳对孙维本¹、马国良²《关于齐齐哈尔市搞活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报告》的批示。

关于一些集体企业将资产折股 划给职工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

应明确国营企业不得私分股份。原来的集体企业（如二轻、乡镇、街道、大集体等）也不得把财产作为股份分给职工。至于像海威这类企业，原来已分了的，可进一步完善，未分者暂时停止，尽快研究出几条原则，再有领导地试行。

* 这是赵紫阳对马洪来信反映一些集体企业甚至有的国有企业将资产折股划给职工个人问题的批示。

关于制定长期规划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

这次搞长期规划，要先务虚。总的想法是，要着重分析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劣势在什么地方，找出我们的优点和缺点。

对国际形势要作很好的分析。世界的情况不同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同了。戈尔巴乔夫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大势。集团也好，地区保护主义也好，都还是要相互依存的。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的发展战略，要从国际经济联系上考虑，发挥我们的优势，避免我们的劣势，大的文章就在这里。搞清楚这一点，可能代价小一点，收效大一点；反之，则可能代价大，收效小。也就是毛主席讲的要多快好省。要组织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同美国封锁我们的时期不同了，八十年代，我们已开始与世界联系，但还不完全自觉，没有充分利用。

规划要搞到本世纪末，搞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可以细一点。但有些问题五年看不出来，在十年规划中才能解决。

我们有很大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多；一是人比较聪明；二是有相当大的生产力，工业制造能力尤其是军工能力很强，虽然有些产品参加国际交换不适应，但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基础，三线也开始走出了新路子；四是我国的科技力量相当强，在发展中国家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的劣势：一是资源不够；二是基础设施太差，首先是交通太差，形成“瓶颈”。现代化，交

* 这是赵紫阳约丁关根和房维中谈对制定长期规划的一些想法。

通是第一位的。没有交通，怎么搞现代化？应当发挥我们的优势和优点来弥补我们的弱点。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想自己的问题。应当很好地考虑利用国际形势。

我不主张中国越慢越好，慢下来也很容易。脱离实际的快要栽跟头，但如何运用正确的战略保持一定的速度，仍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应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优点来补短板，不利用优点集中攻弱点，很可能事倍功半，闹出很多紧张来。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思路是好的，想把关系搞顺，绕过一些暗礁。我看，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没有7%的速度不行，7%也不简单，工业就得有8%到9%，农业4%。中国人口这么多，如何缩小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而不是扩大，这仍然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十年，我们的发展战略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过去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现在已有所好转。例如轻工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进步。钢铁工业，国家的投资也不是很多，但发展很快。煤炭当前紧张，但前几年发展很快。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钢铁徘徊不前，煤炭紧张，轻工业挤掉了。这几年能源交通仍然很紧张，那是工业速度过快带来的。抛开这些，钢、煤、电、运、轻工、有色发展的规模是空前的。

我们要回顾一下十年，哪些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办法，哪些还没有找到办法，哪些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现在能源、交通、钢材紧张，如何缓解这种状况，如果集中力量去攻这个坚，情况会怎样？如果轻工萎缩、外贸萎缩，怎么办？过去集中力量搞钢铁，结果没有搞上去，这几年没有集中力量搞钢铁，结果也搞上去了。这里就有一个利用优势的问题。一九八〇年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讲，我们有一个十年倍增计划，当时感到没有把握，实际上达到了。我到北京时就碰到了煤的问题，提出增产与节约并重，以节约为主。后来进口钢材节省了不少能源，进口钢材和矿石也节省了不少投资。

世界各国经验都证明，不是资源多的国家就一定发展得快，不是没有资源的国家就一定不能发展。日本有什么资源，联邦德国除了煤之外也没有什么资源。这主要说明一个观点，制约因素不能用一种办法解决。一是靠自己，二是通过国际交换。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资搞一些基础工业。对于国内投资大，制约因素大的产业，还是要用国内的一些东西到国外去交换。

对外贸易怎么看？现在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且是在石油、粮食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中国还是有本事的。只要多出口就能多进口，国内条件好的自己搞，条件差的用出口去交换。过去军事上反对死打硬拼，在经济上也应如此。因为现在国际形势比较有利，国际间的对话、贸易、缓和是大势所趋，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小，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多。我们是从长期战争中过来的，后来又遇到国外封锁，对自力更生有不正确的理解。如果这个思想不清理，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国内资源中重要的是煤炭，现在紧张，原因要好好分析。铁路要下决心搞，中国幅员这么大，长期规划里要解决。我们有这么大的基础，好好搞管理，提高素质，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过去谁也没有想到，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这说明中国还是能打出去的。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就是自力更生。

长期规划要务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困难会越来越小。反之困难会越来越多。因此发展战略不能回到老路上去，走老路必然不能自拔。不是说不要搞自己的基础工业，还是尽可能搞得更多一些。第一，要研究基础工业如何搞，利用外资搞进口替代。只要我们外贸出口能搞上去，还债问题就能解决。第二，搞基础工业也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没有资源也可以搞，南朝鲜钢铁工业就是这样搞上去的。所以抓基础工业也不能走老路，如果花大量的投资，从头搞起，其他方面要萎缩。要根据新的情况研究新的发展战略。

农业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第一是人口多，第二是土地少，究竟怎么办？既要搞粮食，又要搞棉花、油料，还要发展畜牧业，也有一个怎么搞比较好的问题。大量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运也运不进来，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福建、江浙）就那么点土地，种什么东西在国际上交换价值最高要研究。当然，一下子转不过来，但是，在长期规划中要研究。一种办法是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一种是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换回粮食，当然还要看国际粮食市场的情况，但问题不大，进口一些粮食是可能的。过去工业化国家用制成品换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现在反过来了，美国、加拿大、欧洲农产品都多了。中国可以搞创汇农业换回更多的粮食。必须从开放、国际交换来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沿海地区因为目前粮

食紧张又回过头来主要搞粮食，这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多，要发挥这个优势，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有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参加国际交换。

总之，搞长期规划不要在矛盾没议论清楚之前就搞方案。要好好分析一下国情和国际环境，如何搞才有利于工业化进程，如何利用比较好的国际环境，通过交换，趋利避害，加强薄弱环节，绕过或减缓“瓶颈”部门的制约。要搞十年规划，五年时间短了些。十年规划主要搞展望、情况分析和应当采取的对策，最后形成计划，还是五年计划。

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邹至庄¹等人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

一、关于香港的中资问题

中资到香港本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起窗口作用，通过香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二是搞转口贸易。后来，中资公司的规模和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现在要进行整顿，在港设公司的出发点不是要去占领阵地，也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要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内地搞四化，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不是要在香港的经济中占多大份量，没有这个考虑，也不应该这样做。

有人说中资在香港有多少多少实力，我看恐怕没那么大，言过其实。内地较闭塞，各省市都想在香港设窗口，掌握国际市场的信息。刚才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指邹至庄等人提出的在港中资建了和买了很多大厦，各省的公司很多，很难查清等意见），我们许多公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做的结果却不太理想，出格的事也是有的。现在正在整顿，要撤销一些，但不会撤得很多。（胡应湘表示：我们不怕中资赚钱，怕的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它们是国营企业，不怕亏损，有国家垫底。有的公司在香港做投机生意，搞股票买卖，这对香港不利。）我们言行一致，将按照上面所谈的方针来整顿。你们来了，正好多听听你们的意见。

* 这是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香港前途研究会邹至庄等人的谈话中关于香港问题的摘要。

二、关于香港的前途问题

直到现在，国际上尤其是香港人很关心一九九七年后的香港前途，我是看好的。但是你无论怎么解释，人家总会有疑虑。从中英谈判开始到现在已经七年，总的说香港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有问题，如移民，这与信心有关，也有别的原因，如外国放宽了移民限制。这在一九九七年前不会完全停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多做解释工作，使港人有信心，另一方面也不必过分紧张。对此，我们要认真做工作。一九八〇年以来我们做了几件大事，都比较顺利，首先中英谈判，接着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我看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解决了不少困难和棘手的问题。基本法起草工作情况是好的，征求意见后，对《征求意见稿》作了一百多处的修改，但还有一部分人仍不满，主要是对民主的进程和选举的条文。这个问题我看还得从维持香港的稳定来考虑。香港这个地方，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从英国搞的殖民体制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的过渡不能太快，太快了对香港不利。香港今后如果像意大利和戴高乐²前的法国一样政局不稳，几个月换个政府，港人能有信心吗？搞民主一定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不能为民主而民主，一定要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出发。对此，你们研究会应多向香港人讲清道理。我们国内的目标也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我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发展中国家过早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搞好的不多。民主问题要与发展联系起来，步子多快问题不在中央，而要看实际，一切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三、关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现在大陆一发生什么事，香港就敏感，这不好。我们已经讲清楚两地的制度不同，将来香港还是搞它的资本主义。前年反自由化时，我会见港澳人大代表，我对他们说，香港不会反自由化，一国两制就是让你们搞自由化。这一条要跟港人讲清楚。还有一条，就是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总的趋势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现行政策不可逆转。现在我们有困难，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把今后二、三

年的速度降低一些，但还能达到本世纪末的目标。我提出两条：一是时刻记住大陆与香港是不同的制度，香港受基本法制约，搞资本主义，大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大陆与香港的距离不会越来越大。我不是学者，而是政治家，不会完全执行哪一派学说的主张，治国要审时度势。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中国总的趋势是不会变的，有了这个，香港人的疑虑可逐渐减少，信心也会逐渐增强。

四、关于留学生回国工作的问题

关于留学生回国工作问题，有些研究项目国内没有条件的，不一定非要回来不可。留学生回来可以去特区，也应该允许他们去香港。（鲁平³同志插话：去中资机构港府已同意，去香港的其他公司尚未同意。）公费派出的最好能回来，也可以两头挂，留在当地也可以，这个搞得死了不好。发展中国家都有规定，要求公费培养的留学生回来服务多少年才可以再出去，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五、关于香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香港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应该上一个新的层次，可以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内地沿海地区，把中国内地的科技力量与香港的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今后香港可多发展一些技术密集的产业，以提高香港产品的竞争力。

注释

1. 邹至庄(Gregory C. Chow, 1929-)，生于广东广州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

2. 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 1890-1970)，生于法国里尔。二战时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反对纳粹占领，战后曾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

1959年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1969年4月27日因其地方区域改革和参议院改革方案在全民公决中失利宣布辞职。

3. 鲁平(1927-2015)，祖籍四川阆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历任《中国建设》杂志副主编，国务院港澳办秘书长、副主任、主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

关于厂长如何领导好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办研修班专题讨论如何领导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贯彻《企业法》和中央关于加强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体制、新格局，这个办法不错。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厂长工作怎么做、党委工作怎么做，都有不少新的问题。通过研讨的形式，用总结交流经验的办法，既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又解决具体的工作方法的问题，对于促进新体制的建立，是会有帮助的。一个新的事情，开始不要怕少。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讲到合作化时谈过，大家说农村搞合作化问题很多，但总有一些是搞得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好好解剖一下，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通过分析研究就可以找到其他的也可以做好的办法。现在听起来好像新的体制面临的困难很大，但不要一听困难很大就觉得不行了，现在全国大中型企业至少有 5-10% 是上了路的（王忍之：恐怕不只这个数。王维澄¹：据北京调查，有 20%），就说只有 20% 上了路，那说明这个路是可以走通的嘛！如果说它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这 5-10% 是怎么起来的？那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不要一听有多少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就犹豫不决。你就抓住那些搞成功的，他为什么会成功，就推广这些东西。既然人家能搞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搞

* 这是赵紫阳在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思想政治工作研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

成功？为什么他们这里能到位，你那里就不能到位？你们这个班上就念一本经，搞好的说一说是怎么搞好的，大家都对照对照嘛。当然各个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但我们集中一下搞得好的经验，把那些特殊性，比如厂长、党委书记哥俩好的去掉。不能说5-10%都是哥俩好的。总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是要下功夫总结、推广、宣传那些搞得好的经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为什么我们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什么我们要实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体制？这个道理要讲透。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啊？本来就挺好，为什么又颁布了《企业法》，又搞了思想政治工作通知？这必定有它的道理。要把这个道理讲透，认清为什么必须这样搞。刚才大家说了一些了，这种体制的好处很多。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是融为一体的，绝不能搞“两张皮”。采取厂长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有利于克服企业长期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经营“两张皮”的现象，有利于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成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现代化管理，特别是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注意到现在一些企业的科学管理工作法，其中就包括一些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例如，工人参加管理，尊重工人提合理化建议，等等，这既是一种管理，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山东的新泰毛纺厂搞三大民主工作法，由于厂长尊重工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工人的积极性就相当高。企业怎么搞管理，这里边既有经济管理方面的，又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而且它们本身是互相促进、互相结合的东西。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企业各方面的力量，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我们多年来形成车间主任不管思想政治工作，不抓思想，厂长不管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这种新的体制真正能够解决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问题，有利于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民主管理相结合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体现在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同经济工作、管理工作，和分配、民主管理等结合起来，和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它就不是空洞的东西了。所以，只有这样搞，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工作或保证经济工作。所以说，这个制度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建立厂长全面负责的新体制，是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企业里的一个必然结果。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就必须实行这样的制度。我们现在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厂长，就不能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负全面责任，就不能不既管物又管人。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讲生产要素，人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厂只见物不见人，那是不可能搞好的。因此，就要既管物，又做人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仍然像过去那样，实行厂长管生产经营，党委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这就发生一个问题，企业发展的成败，究竟由谁来负责？那一种体制只能是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在企业是经济管理部门附属物的情况下的一种产物。可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必然要实行这样一场改革。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讲得很透。要告诉大家，必须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

第三，现在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对新体制不适应或不熟悉的问题。原来的制度，我们搞了几十年了，我们的干部，厂长也好，党委书记也好，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或者说是在那样一种制度下培养起来、成长起来的。现在有个新的制度，自然就发生了一个不适应、不熟悉，或者还要加个不理解的问题。因此，就要帮助企业的同志，厂长也好，党委的同志也好，让他们理解、适应、熟悉。只有这样一条路，没有别的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不理解、不适应、不熟悉，是任何一个制度进行较大的变动的时候都会发生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如果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制度，我们的干部已经适应了多年习惯和熟悉的制度改变了，现在推行一个新的制度，一下子都那么理解，那么适应，那么熟悉，倒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些不熟悉，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不适应，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此就徘徊犹豫，举棋不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各个城市、城市党委的工作，好好抓一下这个转变。就是建立了这么一种新体制，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企业的同志能够熟悉它、适应

它、理解它。这种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缩短这种转换、过渡的时间，尽量减少损失。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坚定地去做，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体制，坚定不移地贯彻《企业法》和中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通知，坚定地按这个精神去做。只要坚决去做，路子就可以走出来。态度越是犹犹豫豫，抓得不紧，这个路子走出的时间，就会大大推迟，造成的损失也就会大。其次，就是要很好总结那些好的经验，宣传好的经验，推广好的经验。这一点，我今天听了大家谈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启发。

看来，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帮助厂长就位。首先厂长要到位，坚决按这个路子去做。应当说，我们现在企业中的多数厂长距这个要求还有些距离，就是刚才说的不适应、不熟悉。因为我们的厂长长期以来是管理型的，这几年搞商品生产，叫经营型。厂长们对如何统揽全厂，还不熟悉。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推到这个位置上，把担子加在他们身上，慢慢地适应，逐渐地熟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到了这个位置，把任务加上，绝大多数厂长能够适应。现在应当把重点放到这上面来，要求厂长到位，把任务担起来。各地方也应该采取研修班、讨论会、短期培训班的形式。当然，也可能有少数厂长的素质实在不适应这个工作，那当然可以作一些调整了。但这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厂长应该让他在实践当中学习、提高、适应，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对于党委书记和党委的其他同志，很重要的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所谓“失落感”，我看是应当改变、应当丢掉的东西。要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必要的。要理解这样做对整个四化、对企业的兴旺发达，是必须进行的一场改革。党委书记首先应当把自己的精力真正用在抓党的工作上。很多同志说，现在新的改革、新的制度是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工作。我认为，恰好是要加强党的工作，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实行这样一种新的制度。过去党委书记的大部分精力陷于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没有很多的精力去真正抓党的工作。刚才有的同志讲得好，所谓管党的工作，就是围绕企业里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围绕本厂的任务真抓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宣传群众，带领群众。一个企业的党委，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那么企业的凝聚力问题、企业的精神风貌问题、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问

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怎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首先要真正把党的工作抓起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在中央党建研究班讲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題，只要把党员的工作做好了，党组织的工作做好了，这个问题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厂长到位，党委书记也有个到位问题，就是要认真地把党的工作抓起来。同时，应当协助厂长去抓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的《通知》上是推荐了党委书记兼任副厂长这种办法。这个问题不一定要求统一，如果有些地方觉得不愿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必勉强。但是有两条要强调，首先党委要把党的工作抓起来，真正去管党的工作，管党员、党组织。我们企业里，一方面行政各级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融合在一起抓起来了；另一方面，党委把党的工作抓起来了。这样，企业也就能够搞好。

第四，我们的治理、整顿能否顺利地进行，能否使我们从困难中走出来，关键是企业的效益问题。因此可以说，企业改革对于治理、整顿能否顺利完成，能否从困难中走出来，能否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出现一种新的好形势，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围绕提高效益的企业改革绝不可放松。企业改革的问题，今天我不准备多说，就讲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一定要搞现代化科学管理。我们现在推行承包制、股份制、自负盈亏、放开经营，等等。都是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光有积极性不行，还必须有科学的管理。如二汽“一个流”的工作法，并没有增加什么投资，就是采用日本的管理方法，结果半年时间，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效益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现在我们已经有一部分企业在探索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最近企业管理协会开会，把各地方的方法集中了一下，有一些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称为“综合”的，有些是专项的，共有二十多种方法，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国家一采用什么方法，就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的效益？说明我们的企业管理实在不好。现在日本很厉害，好像很多困难都挡不住它。日元升值，现在看它还可以渡过；石油涨价的困难，它早就克服了。美国的工厂，日本人买过去，派几个管理人员一搞，效益比美国的工厂提高百分之二十。要认识到，整个来说，我们的工业管理是非常落后的。有的大企业好一点，也不理想。劳动力浪费严重，我们的有效劳动时间在很多企业一天最多也就是四个小时。物资消耗浪费很大。同

样一种商品，我们消耗的材料、能源，要比日本、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所以，外国人到中国工厂一看说我们到处是“黄金”，生产上、管理工作中造成的浪费是很严重的。这说明我们的落后。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引进先进设备，但许多地方买了设备用不上，放在那里。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虽然也一直在抓，但是不是很有力。所以，这样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的工厂设备是落后的，技术也落后，但是更落后的是管理。如果在管理上认真下功夫，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效益。对于企业，将来我们要实行这样一种政策，企业的自主权不能缩小，还要按照《企业法》的规定进一步落实，进一步把应当给企业的权力交给企业。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条件把管理搞好，把效益挖掘出来，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恐怕要树立一个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即今后企业挖掘的经济效益，企业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应当是国家得大头。过去多少年，我们采取扩权让利的办法，总的是对的，现在权还要进一步扩，至少扩大的要落实，但现在到了企业为国家多作贡献的时候了。企业说，目前我们已经很困难了，都过不下去了，还要多作贡献？那你就去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国家对企业的政策不能过于苛刻，搞“苛政”；但是过分宽容，对企业也没有好处。所以，今后我们国家对于企业的政策的基点应该是这样，即承包也好，税收也好，真正搞得好的企业，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或留利，可以有较多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一般的，恐怕只能维持，或者有较小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差的企业，就不能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是这样一种政策，而不是马马虎虎也能混得下去，稍微好一点就得益很大。这样，国家吃不消，社会也承受不了，而且对于推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自我挖掘潜力也不利。我们的企业要通过进一步改革，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条件的要放开经营。这个路子必须继续走下去。另一个方面，企业要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企业既要有动力，也要有压力，让压力变动力。这个观点，我到几个省去陆陆续续讲了几次，上一次同袁宝华等同志谈企业管理问题时，我主要讲了这个问题。企业要搞管理，要提高效益，多作贡献。

注释

1. 王维澄(1929-), 浙江桐庐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主任,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

认真搞好治理整顿 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为进行治理整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这次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今年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提出了一套政策和办法，人大已经通过了，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贯彻执行。

治理整顿工作是由国务院直接负责抓的，半年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项任务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在治理整顿中间出一点问题，发生一些顾此失彼的现象，在所难免，今后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希望地方的同志给以理解和谅解。

从中央和国务院来讲，应当注意发挥地方积极性，作决策之前，尽量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这也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所要求的。从地方来讲，则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做到令行禁止。当然，地方有意见可以积极地反映，中央、国务院对各地的意见应当重视，如发现已经做出的规定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及时加以修正。总之，上下要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治理整顿工作做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这次治理整顿，与历次调整有不同的特点，认识它并把握它至关重要。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大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过去的几次调整，如大跃进之后一九六〇年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之后

* 这是赵紫阳在同出席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的调整，都是在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认清这一点，可以增强对搞好这次治理整顿的信心。

这次治理整顿又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价格存在“双轨制”这样一个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治理整顿的复杂性和难度，对我们的工作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进行调整所采用的一些很有效的办法，现在有些已很难奏效，因为我们这几年把经济放活了一大块。指令性计划容易调整，而现在的经济已不完全属于指令性计划。对放活的那一块，用老办法控制很难见效。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再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搞死。恰恰相反，这次治理整顿，应该巩固改革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找既能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又有利于改革，至少不为今后改革增加困难的新办法。新的宏观调控办法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找到的，这需要探索，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在控制消费基金，难度就很大。压缩基本建设，也是对搞活那一块感到难办。价格也是这个问题，已经放开的价格不好管。在治理整顿中采取的有些办法，有的看起来像是后退，但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暂时付出的一种代价。例如现在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虽然明明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符合改革的方向，但从当前的全局出发，只能这样。因为不把物价稳住，就不能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赢得时间。对这类问题我们要清醒，要心中有数，并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步地用新的办法来代替它。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情况，建立新的宏观控制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新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治理整顿的最终成败。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国际条件比较有利。参加国际交换与竞争，我们有几个优势：一是劳动力充足，而且费用较低；二是我们已经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工业加工能力较强；三是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正在发展。有利于我们进行和平建设的国际条件，看来不会一年两年就消失，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好的机遇，发挥我们的优势，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换来缓解我们的困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它的制约因素，有个“瓶颈”，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短线。由于有开放的条件我们就不必完全按照短线在国内求平衡，这和以前在封闭条件下不同。不仅沿海，全国都是这样。过去十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外贸有了很大发展，进出口总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出口47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已接近美国。这说明中国的商品是出得去的，如果有东西，还可以多出，问题就看你有没有。这同有些国家欠了大量外债而自己的产品又出不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十年来我们的产品不仅出口数量有很大发展，出口结构也有很大变化。过去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石油、矿物原料和农产品。近年来，上述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工业制成品包括机电产品比例大大增加，势头很好，方兴未艾，看来大有可为。从中央、国务院到各个地方，都需要注意研究这方面问题，在安排今后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我们过去丢掉了，因为我国长期处于被封锁的情况下，后来自己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现在好的机遇又出现了，这次并不比以前的那几次机遇差。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比过去好，有条件利用这个机遇。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发挥。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没有理由悲观。重要的是，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使有利的机遇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所用。

第三点意见，当前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要抓好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一是农业。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的调整所以比较顺利，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农业情况比较好。当时整个调整时期，是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一经调整，农产品丰富了，轻工业原料充足了，出口也增加了，连续几年出现大量顺差，有了外汇我们可以多进口钢材和其他原材料等，促进了整个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稳定。所以，一定要看到夺取农业丰收是搞好治理整顿的基础和关键。各地区、各部门都要重视农业、支持农业、保证农业，措施要落到实处。

二是坚决压缩基建和制止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解决需求过旺的问题。在治理整顿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是我们能够抓得住、作用也最明显的措施。如果真正按照国务院的决定把基本建设压下来，情况就肯定会向

好的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下半年或明年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控制消费基金比较复杂，但是总要解决，要认真研究、试验、总结出有效的办法来。

三是认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过去历次调整，都注意了总量的控制，但结构调整做得比较差。这次无论如何要把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说，总量能不能控制得住，控制的结果能否为今后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更好的条件，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国务院已经提出了产业政策，要进一步研究、落实和制定配套措施，保证产业政策的实现。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落实产业政策不容易，但是必须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坚决搞好。

除了投资结构以外，企业、产品结构也要认真调整，使之合理化。电力、资金、原材料不能不加区别地投到经营不好、效益很差的企业，而应当集中保效益好的企业。这样，对能源、资金、原材料的需求总量可以减少，而效益可以提高。政策不仅要按照产业的划分向农业、交通、能源等方面倾斜，而且在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间也要倾斜。下一步的问题是切实整顿落后企业，改善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开展企业之间的联合、兼并。

四是金融问题。国际上尤其是东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利率、增加储蓄。我们前一段这样做了一下，也证明是有效的。这个办法既可以治理通货膨胀，又可以缓解资金的紧张。多发票子会有严重后果，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也不是长久之计，归根结底得把票子收回来。陈云同志在六十年代的经济调整中提出了几条办法：一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减职工两千万人，三是通过高价商品回笼四十亿票子。这些办法实行以后非常有效。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已不完全相同，对货币除了进行商品回笼以外，还必须增加一条信用回笼。这就需要适当提高存贷利率。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像外国那样把利率一下子提得很高。只要基本上能保值，再加上有较好的服务，存取方便，群众就会积极储蓄。中国老百姓是有储蓄习惯的。群众知道，把钱拿去买些用不着的东西并不合算，不如储蓄。为了引导消费基金变成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还需要逐步研究开展住房、劳保、教育等多种专门储蓄，还可以搞债券。当然这些事情不可能马上都办起来或者马上就见效，但要认真研究，朝这个方向走。当前比较迫切而有效的，主要还是通过吸引储蓄把流散在社会上的货币尽快收回到银行里来。

五是重点抓好企业改革。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企业效益，不然很多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不了。例如控制物价、提高贷款利率，最后还得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效益，要靠深化企业改革，这方面的潜力很大。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承包责任制。其次要大力推行企业的科学管理。企业要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了让企业有条件加强改善管理，就必须给它自主权，认真贯彻《企业法》，进一步抓好政企分开。企业就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很落后，潜力没有挖出来。所以，今后国家对企业原则上是给权不让利。使企业自主权多一点，同时贡献大一点，这将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人代会上有代表提出，不但要治理经济环境，还需要治理社会政治环境。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对的。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否则，经济上的治理整顿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最近中央在党校的建设、思想工作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希望各地抓紧落实。

有些地方反映社会治安问题很突出，必须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开过一次会议，作了部署，希望各地按照部署精神主动做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把社会治安搞好。

计划生育的问题，我赞成李鹏同志刚才讲的意见。现在有些同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宽严尺度有争论。实际上人口的过量增长并不是由于现行政策宽严尺度的问题，而是没有认真执行现行政策，没有按计划落实。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处于自流状态，这是最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计生委不久前开了一次会，提出了要求，请各地党委、政府把工作抓紧。四月十四日是中国十一亿人口日，趁这个机会，全国要对计划生育工作做一次大的宣传动员，进行一次有力的推动。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上来，进一步抓紧抓好。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

这次治理整顿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间，也就是说，是在新旧体制交替、价格存在双轨制这样一个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治理整顿的复杂性和难度，对我们的工作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进行调整所采用过的一些很有效的办法，现在有些已很难奏效，因为我们这几年把经济放活了一大块。对放活的那一块，用老办法难以控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再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搞死。恰恰相反，这次治理整顿，应该巩固改革的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找既能解决治理整顿的问题，又有利于改革，至少不为今后改革增加困难的新办法。在治理整顿中采取的办法，有的看起来好像是后退，但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给其它问题的解决赢得时间，是暂时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并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渐地以新的办法来代替它。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情况，建立新的宏观控制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新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治理整顿的最终成败。

这次治理整顿又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点对我们有利。我国劳动力充足，而且费用较低；我们已经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工业加工能力较强；我们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这些是我们参加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有利条件。当前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国

* 这是赵紫阳在同出席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趋势在发展，这是一个好机遇。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们不必完全按照“短线”在国内求平衡，而可以通过国际交换克服困难，促进发展，这在封闭条件下不同。不仅沿海，全国都是这样。过去十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很大发展，出口增长快，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看来大有可为。在研究发展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如何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发挥。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没有理由悲观。重要的是，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工作，推动治理整顿和整个四化建设。

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应当特别强调，在治理整顿中，必须重点抓好深化企业改革。要坚持和完善承包制。在承包制的基础上，大力加强科学管理。现在一方面要认真贯彻《企业法》，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企业要运用国家给的权力，下功夫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

承包制还没有完全解决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承包制助长了消费基金膨胀，也是没有根据的。要使企业既能负盈又能负亏，这里当然有机制问题，但也有当地政府的决心问题。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下决心兑现承包合同，是可以使企业既负盈又负亏的。

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

今天，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士进行座谈，就是要听取大家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畅所欲言，共同把这个文件修改好。

各民主党派一直非常关心、重视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年来，大家一再呼吁，为发展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对中共中央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我觉得，在发展我国教育事业这个问题上，中共和民主党派切磋琢磨、真诚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

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两次，国务院讨论过三次。文件中大量吸取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于教育问题的宝贵意见。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七次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讨论，决定对这个文件进一步征求意见。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又作过一些修改的文件。

我们相信，只要全国、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下决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决定(草案)》表达了这样一个决心和信心，也提出了发展和改革教育的一些重大措施。这些认识和措施行不行，需要进行哪些删除、修正和补充，请同志们提出意见。民主党派和一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些无党派人士对教育事业不但热心，而且内行，今天到会的有许多是教育专家，不少同志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状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有真知灼见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把这个文件修改好，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新的贡献。

在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起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

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

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一九五二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十分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一九六四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他担负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坚决进行整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处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十一年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他重视调动我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他在关于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四化建设实践中去，经受磨练，健康成长。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讲话，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了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建设，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作出了努力。

胡耀邦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他深深地热爱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也深深地热爱他。全党全国人民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不知疲倦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近两年来，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不辞劳苦，到基层调查研究，鼓励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和光明前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他始终注意广泛结交朋友，通过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率交谈，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营养。他曾多次长途跋涉，深入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远地区和穷困山区调查访问，同当地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对外开放。他还多次深入祖国边陲和海防前哨，亲切慰问人民子弟兵。他在处理党和国家重要事务的同时，亲自阅处了大量人民群众的来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他以身作则，待人宽厚，作风民主，手不释卷，追求新知，保持共产党人不断进取的活力。

胡耀邦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们要同心同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坚韧不拔，努力奋斗！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朝友谊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这春光明媚、万象更新的季节，应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满怀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贵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感到格外高兴。

我们一踏上你们美丽的国土，就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沉浸在友好情谊的海洋之中。今晚又能同朝鲜的各位领导同志欢聚一堂、共叙友情，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转达邓小平等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同志对尊敬的金日成总书记同志和朝鲜的各位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并通过你们转达全体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的良好祝愿。

一九八一年我曾率党政代表团来贵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那次访问，使我难以忘怀，朝鲜的悠久的历史文明、朝鲜人民在捍卫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革命精神以及你们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早就期待着再次访问贵国。我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以后，多次表示，如果出访，我将首先访问我们的亲密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金日成同志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中朝友谊，并亲眼看看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 这是赵紫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自从我上次访问贵国已有7年多了，这7年间，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的周围，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你们的成就再一次证明，朝鲜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朝鲜劳动党是英明的党。目前，朝鲜人民正积极响应金日成同志和劳动党中央的号召，为提前完成第三个七年计划，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此深表敬佩并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了伟大友谊；今天，在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互相支持、互相信赖和互相理解。这种友谊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并且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十分珍惜这种友谊，并将和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一道为把这种友谊推向一个新阶段而作出积极的努力。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我们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去年以来，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了关于祖国统一的一揽子和平方案以及各项合理倡议，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创造有利于朝鲜和平统一的气氛和条件作出了巨大努力，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历来主张，美国应从南朝鲜撤走其全部驻军和军事设施，应该停止有可能加剧本地区紧张局势的联合军事演习，因为这与当前世界局势转向缓和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的。我们认为，应该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和平统一问题。我们相信，经过全体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朝鲜的和平统一终有一天能够成功。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这已经在全世界形成强大的潮流。尽管导致国际形势紧张、动荡的各种因素仍未消除，但经过世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面对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九七八年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由于坚持这条路线，这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已提

前两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奋勇前进，克服一切困难，为早日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 发扬五四精神*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同志们！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是中国青年的伟大节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周年快要到来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新时代已达十年的今天，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维护社会安定，推进建设和改革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吸引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投入这次运动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对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向往。五四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那时的广大青年开始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一部分最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救亡方案的探索 and 比较，通过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一九二一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这个人民大革命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也是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不断发扬的进程。

* 这是赵紫阳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人民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破坏——破坏阻碍中国前进的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心的任务转到了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破坏到建设，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使命的极其深刻的转变。我们过去没有能够充分自觉地有效地实现这个转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是一场完全违背历史要求的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围绕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今天讲爱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是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和支柱，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教育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繁荣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科学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指在政治上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反动阶级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现在我们还要说，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只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才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上，在综合国力的世界较量中，完全站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地充分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鼓舞起亿万青年的献身精神，鼓舞起广大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医生、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国家公务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献身精神，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我们今天讲民主和科学，也同样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建设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是整个社会改造和整个民族素质

提高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改变落后状态。要摆脱贫穷。要克服愚昧。要把社会生活和人民意识中种种不民主不科学的思想 and 习惯，一步一步地加以消除。要在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改革建设的一切工作中，发扬民主精神，建设民主制度，发扬科学精神，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办事，并使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逐步地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民主，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进程中，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学习科学，尊重科学，是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在稳定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大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一旦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我们渴望办成的事，就一件也办不成；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稳定破坏了，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吗？能得到改革和建设的果实吗？能得到祖国的振兴吗？都不能！只能得到动乱。动乱的日子难道我们过得还少吗？从一八四〇年到今年一百五十年间，我们只争取到二十几年安稳日子。其余一百二十多年，一百一十年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还有十多年被林彪、“四人帮”和我们自己的主观指导失误闹得人心惶惶。如今大家共同感到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实确实过了十年好日子。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愚昧甚至野蛮的东

西，就会泛滥和横行。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去想问题，做工作，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才能扎扎实实的推进。我们的党，是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党，是依靠人民、依靠青年的党。六十八年来，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生机勃勃的党。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气氛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吧！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民族，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我们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要改掉我们党的性质和固有的优势，而是要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泡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要讲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懂得并且尊重这条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

同志们！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反复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青春中华之创造，全靠青年之觉醒。他们对于青年的信任与期望，他们的这种远大眼光和乐观主义，在我们今天观察中国青年和中国命运的时候，同样

是极其重要的。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党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厚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中，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始终召唤着青年一代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事业中前进。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能推进建设和改革。青年人要求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积极性应当受到保护，使青年能够在现代化事业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锻炼自己，提高自己。青年人爱思索，勇于探寻各种新知，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没有思索，怎么能够前进呢？没有各种新知，就不能丰富自己，并进行比较。在思索过程中，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是，只要有爱国精神，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要有民主精神，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的力量联系起来，只要有科学精神，把美好的理想同现实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体验到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要求，体验到时代的呼唤和潮流，体验到自己的努力同前辈努力的历史联系，体验到自己对国家未来负有的崇高使命。这样，青年就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从整个国家的前途中认清自己的道路。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长期的、极为艰难复杂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全民族几代人进行持久的努力。历史注定了你们这一代青年，只能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一代。改革和建设没有快捷方式可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劳动和奋斗。我们需要的是坚韧不拔、扎扎实实的长期奋斗。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中国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共青团作为我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近七十年青年运动的发展过

程中，在改革开放十年全面开创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更加重视、关心和支持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也要不辜负党的希望，联合青联和学联等青年团体，同最广大的青年群众保持密切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党和政府同青年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青年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代表作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引导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现在起，再过十一年，我们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党寄希望于你们，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全国青年们，全国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为中华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后 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